

Copyright Undertaking

This thesis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with all rights reserved.

By reading and using the thesis, the reader understands and agrees to the following terms:

1. The reader will abide by the rules and legal ordinances governing copyright regarding the use of the thesis.
2. The reader will use the thesis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only and not for distribution or further reproduction or any other purpose.
3. The reader agrees to indemnify and hold the University harmless from and against any loss, damage, cost, liability or expenses arising from copyright infringement or unauthorized usage.

IMPORTANT

If you have reasons to believe that any materials in this thesis are deemed not suitable to be distributed in this form, or a copyright owner having difficulty with the material being included in our database, please contact lbsys@polyu.edu.hk providing details. The Library will look into your claim and consider taking remedial action upon receipt of the written requests.

**CONFLICT BETWEEN POLITICAL
IDEA AND REALITY——
THE LIFE STORY OF FEMALE
LEADERSHIP IN PRC**

政治理想与现实冲突
——女领导干部生命故事研究

YANG JING

Ph.D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2010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Conflict between Political Idea and Reality——
The Life Story of Female Leadership in PRC**

政治理想与现实冲突
——女领导干部生命故事研究

YANG JING
杨静

**A thes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November 2009

Certificate of Originality

I hereby declare that this thesis is my own work and that,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nd belief, it reproduces no material previously published or written, nor material that has been accepted for the award of any other degree or diploma, except where due acknowledge has been made in the text.

_____ (Signed)

YANG JING (Name of student)

Abstract

This study starts at understanding the reasons of low wome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rate since the 1980s in the context of discourse of “gender equality”, which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60 years in the socialist Chinese mainland.

After reviewing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s on wome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 decide to adopt the integrative approach of feminism, critical theory and post-structuralism to study the life stories of 9 female leaders in socialist Chinese mainland.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I had chanc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female leaders training program as the trainers. Based on the in-depth interview with the female leaders and the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the training class, I would like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ow did the female leaders’ awarenes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merge and form their political subjectivity in different stage of their life? How to understand their agency in the process of thei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y conclusion is that the female leaders have different sort of subjectivities and view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ifferent stage of their life. However they have never ever had the view of serving for the women via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 argue that dominant discourse could not shape the political subjectivity of the female leaders and their political identity. Besides, I also find that even though the female leaders had obtained high position in political hierarchy, they still experienced the discrimination and exclusion in political arena. They found it very difficult to actualize the ideal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or women and fulfill their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In this difficult situation, there were no collective actions or movements against the exclusion of women’s political right. However, the National Women Federation still played the “rightful resistance” and the female leaders also adopted the strategy of “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 in defending their political right. In the process, we can discover that they are active agents rather than the passive dominated objects.

摘 要

自 49 年至今,中国实行“男女平等”的政策已经 60 年了,但妇女参政率自 80 年代以来处于低谷的状态却从根本上无法改观,女领导干部没有整体出现为妇女参政的主体意识。本研究的目的正是为了寻找上述的答案而展开的。

本研究通过对以往国内外妇女参政研究的文献回顾,提出采用女性主义、批判理论的立场,结合后结构主义的一些主张,用女性主义/建构主义的范式下的解释性互动论研究方法,重点对 9 位与新中国同步成长的女领导干部进行生命故事、以及将我个人 20 年来因工作原因和她们深入交流、了解她们的经验作为研究的基础进行了研究。本研究的是结论:无论 80 年代前国家主导的论述、或者之后国家和市场以及其他主导的论述下,女领导干部们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主体性和不同的参政观,无论那种论述,都没有建构出女领导干部们为妇女参政的参政观。研究发现,从建国至今,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论述将女领导干部从一个结构位置建构为女权主义主张的为妇女参政的政治主体。女领导干部在实际的从政场域中遭受的性别歧视和权利排斥,也使得她们从政的道路举步维艰,严重障碍了女领导干部们从政的积极性。面对妇女参政率低的现状,全国妇联采取“依法抗争”的策略,女领导干部们也应用“日常生活的抗争”策略,积极维护妇女的参政权,表明了在任何时候女领导干部都是一个能动的、而不是完全被控制的客体。

感 谢 信

仅以此文献给

我过世的父亲，以此悼念他！

我的导师丁惠芳博士及

陈锦华博士

古学斌博士

我家人，儿子、丈夫、妈妈和婆婆

以及所有给我帮助和支持的朋友

对你们的爱和感谢我将以此文表达！

对你们所做的一切我将用后记的方式铭刻在文！

目 录

第一章 研究主题的生成	9
一、研究缘起.....	10
二、研究背景	13
三、以往研究妇女参政问题中的局限	15
第二章 文献研究及理论框架	20
（一）妇女研究中的妇女参政研究	20
（二）领导学中对女领导干部的研究	33
二、对妇女参政的理论研究.....	34
（一）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34
（二）西方女权主义对妇女参政的理论解释	36
三、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多视角理论.....	41
（一）多视角的重要性	41
（二）多视角理论	42
（三）两种视角的结合	45
（四）理论框架	46
小结.....	5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55
概论.....	55
一、研究范式中的理论差别	55
二、女性主义视角的批判理论——建构主义范式	57
（一）女性主义视角的批判理论、建构理论范式的主张	58
（二）本研究的立场	59
三、解释性互动论的研究方法.....	60
（一）重视研究者的经验介入以及反思性	61
（二）重视研究参与者经验	62
（三）重视研究者和研究参与者之间的关系	63
四、研究过程和方法	64
（一）确定研究主题	64
（二）解构关于现象的前在观念——文献分析	65
（三）把握现象——资料收集	66
（四）现象的化约——资料分析	71
（五）现象的建构——主题发展	71
（六）现象的深化——解释	72
五、研究的有效性评估	72

(一) 说服力 (persuasiveness)	73
(二) 符合度 (correspondence)	73
(三) 实用性 (pragmatic use)	74
六、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75
小结.....	76
第四章 论述与主体性建立	77
概论.....	77
一、官方媒体对主体性的建构.....	77
(一) 第一阶段从 1949 到 70 年代末	78
(二) 第二阶段从 80 年代初至今	80
二、“新中国妇女”——社会性身体的建立.....	82
(一) 接受教育	82
(二) 以榜样为镜，塑造自己的主体性	85
(三) 自己成为别人的榜样	90
(四) 运动打造社会性身体	92
三、成为女领导——社会性身体的形成	97
(一) 党的政策保证新中国妇女成为女领导干部	97
(二) 把自己的前途交托给党和组织	103
(三) 为谁而参政?	106
(四) 从政的动力源——被认可	113
小结.....	114
第五章 社会性身体——规训 认同 主体性	116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116
概论.....	116
一、领导位置的配置 ——男尊女卑.....	117
(一) 副职的配置	117
(二) 依据性别而划分岗位	121
(三) 知足/有野心和不求上进	123
二、领导角色与家庭角色的平衡.....	125
三、对身体的规训.....	127
(一) 生育与工作	128
(二) 长相漂亮与不漂亮	130
四、参政机制中的游戏规则.....	133
(一) 推荐干部中的游戏规则	133
(二) 规定比例的游戏规则	135
(三) 女干部的提拔年限和退休年限的游戏规则	138

(四) 女领导培选——差额选举制的伴生物	140
小结	142
第六章 主体与多场域抗争	144
概论	144
一、妇联组织的依法抗争——改变和修正不完善的制度	146
(一) 借着国际社会的力量推动中国政府制定推动妇女参政的纲领性文件	147
(二) 推动中央组织部门制定有利于妇女参政的政策	148
(三) 各级妇联借着各级领导层换届呼吁和推荐女干部	148
(四) “依法抗争”的灰色地带	150
二、日常生活的抗争	151
(一) 我要读书	152
(二) 恋爱的抗争	152
(三) 不能当花瓶、怕丢官，要敢于说话	153
(四) 赢得别人的尊敬，靠实力不是靠姿色	154
(五) 想办法应对男领导对女领导的刁难	156
(六) 不想当官了	159
三、身体的抗争	159
四、公开的文本与隐藏的文本	162
小结	165
第七章 总结、讨论和建议	166
概论	166
一、总结和研究发现	167
(一) 不同时期、不同论述下主体性的建构	167
(二) 全景敞式的监控和规训与主体性	171
(三) 抗争的主体	174
二、讨论	177
(一) 没有论述的介入，女领导干部不可能自动出现为妇女参政的主体性	177
(二) 全国妇联能否突破代表妇女的局限性，要看她是否能突破自己的结构位置	178
(三) 对妇女素质低的误认	180
(四) 产生集体的抗争的困难	181
(五) 中西方不同的妇女参政论述和逻辑	182
三、建议	183
(一) 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论述以及政治认同产生的过程	184
(二) 妇女参政不是一个简单的性别问题，因此也不能只解决性别问题	185
(三)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结合	186
(四) 多场域的抗争	187
四、政治理想和现实的冲突	188

后 记	190
——为谁而书写	190
参考文献.....	195
中文部分	195
英文部分	201
附件一：女领导干部们画像.....	205
附件二：中国行政级别列表.....	213
附件三：历年妇女参政状况表.....	217
附件四：研究范式的比较.....	226

第一章 研究主题的生成

世妇会民谣：中国要开世妇会，谁说妇女无地位，呸，那是万恶的旧社会。

——民间谚语

每个人都赢回了他自己的权利，去说自己的话，去命名这个世界。

——保罗·弗雷勒（1977）

引子

我静静地躺在手术室里，等待着医生做完冠状动脉造影后的宣判。近些天，我心慌、胸闷的厉害，来医院检查，医生担心是心脏出了问题，当即建议我作动脉造影检查心脏。

此时的手术室里很静，我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内心有两个声音不停地争吵，一个说你可千万不要生病，孩子太小，刚刚争取到同行们羡慕的香港理工大学的博士资格……，另一个声音说，有病也不是一件坏事，可以彻底、心安理得地休息，趁此机会维修一下身体，可以不上课，可以不管孩子、家里的事情……。一个声音说，今天不上课明天也要补，孩子耽误了明天更难教育……又一个声音在旁边提醒，书要读，不读怎么在大学当老师，孩子要管，否则耽误孩子你会后悔一辈子，孩子比什么都重要……。两个声音争吵起来，我的心跳顿时又加剧，乱成一团，又开始心慌起来……

真烦，你们统统走开，让我安静一会，听天由命吧！

一个清晰的声音从手术室的另一个房间传过来，心脏没有毛病，住院再检查别的吧！这是医生的宣判！没病，这不是折腾人吗！可是没有病，为什么心脏的难受仍真切地感受到？

听到宣判，我不知道是欣慰还是难过。

手术室外，家人、单位领导、同事们紧张地等待检查结果。听到医生的宣判，有个声音说，她读书太辛苦了，她太好强了，就是累的，就是压力太大，如果是我，我决不会像她这样，身体要紧，……

动脉穿刺，无法动弹，我无奈地躺着，听着这些内外交织在一起的声音，委屈的眼泪顺着眼角淌下来，我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一个职业女性该做的？单位要求的、社会要求的、女人的角色要求的，怎么就是好强？”我很享受读书生活，我不是读书累的，读书是我的享受……

我的授课任务太重，我要半职读书全职工作，这是我读兼职博士的条件。

家务事几乎都要我操心，孩子太小，照顾孩子的事情总是要落在母亲身上；丈夫不擅长家务，……

有些事情不是我争强好胜，而是不能不做，我觉得有责任……

……

天哪，这难道不是好强吗？怎么可以做这么多的事……

好强、女强人……怎么听上去都是那么刺耳。女人干点事情怎么这么难，这么累……

哎!!! 一个沉重的叹息由我的心底发出。这个无奈的、充满了挣扎和痛楚的叹息声，我发出过无数次，也听到过无数次，这样熟悉！我似乎听到了母亲那清晨一起床就发出的沉重的叹息声，和我的叹息是那样的相似!! 那些我接触过的女领导干部们发自内心真切的叹息声，这些声音是我十几年来熟悉的，此时似乎凝成了一股的力量，变成一个沉重的叹息，在我的耳边越响越大，并化成一句话：

——解放了的妇女有很多无名痛！

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海伦·赛克休斯（Helene Cixous）认为，女性受到的压迫首先是从身体开始反映的，女性必须用行动将自身投入到文本之中，女性的身体本身就是一种书写方式（Cixous, 1981:245 转引自 乔治·瑞泽尔，2003: p260）。身体上的反映不仅仅是生理的问题，正如福柯所说，灵魂是身体的监狱（福柯，2003）。我的灵魂（——我是我，我是女人却不像女人——我希望是个女人——我是谁？）一个不断在别人的言说中寻找主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体会到作为一个女人、职业女性身体所承载的辛苦和难言的压抑，这种压抑让我似乎又听到母亲——一个新中国被解放的女领导干部沉重地叹息声，那种不自觉地常常发出的无奈、辛酸的叹息声，以及那些我遇到的女领导干部，她们在“解放”和“女强人”、“女界精英”背后所承载的种种压抑，正是这些沉重的叹息声变成一种使命感，带给我去探知压抑缘由的欲望。

一、研究缘起

女性主义取向的研究表明，研究者的研究一定以自己的关心和经验为出发点。本研究的动机来源于我十几年来一直关心的女领导干部们。

我所在的学校的前身是全国妇联下属的妇女管理干部学院（1995 年前），是专门培训妇联妇女干部的基地，大部分学生来源于妇联系统和各行业的女领导干部。八十年代，面对日益严重凸现的妇女问题，全国妇联认定“妇女素质低障碍了妇女运动”。从此，提高妇

女干部的素质就成为那个时期妇女运动的战略重心，各级党委和妇联制定了一系列提升女干部“素质”的培训计划。作为全国妇联下属的学院，理所当然地承担了大量的培训任务，其中我教授的《领导学》是女领导干部们的必修课，课上课下给我创造了很多听她们故事的机会，她们谈到在基层工作的酸甜苦辣——女性提拔的艰难、遭受男性领导排斥、付出120%的努力才能换来80%的肯定、如何对待风言风语、如何在家庭和工作中寻找平衡等等。那个时候，没有性别视角，我除了用男尊女卑等两千年封建意识在人们的思想中作怪作为简单的理解和解释之外，说实话，我也觉得是女领导干部们自身素质出了问题，比如当了领导之后官气似乎显得比男性重，女性之间的嫉妒比男性更厉害、她们更加排斥同性的升迁，她们拿腔拿调更做秀等等，对她们的苦衷我没有太多的同情和想法。那时的我，尽管也学习和教授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原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总觉得妇女受压迫是万恶的封建社会和旧社会的事情，这和我们今天的妇女没有关系，制度已经规定了男女平等，如果实际中男女不平等，那就是妇女素质不高，就是自己的问题。我甚至认为，领导科学就是一门客观的科学，谁当领导都一样，和性别无关。而95年后，发生的系列事件促成了我生命中的“顿悟”。

第一个事件，九五世妇会给中国妇女运动带来了新的契机和气象。95’世妇会以后，社会性别意识引入中国的妇女界。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很荣幸成为最早接受性别意识教育和传播性别意识的一员。随着我性别意识的启蒙，当我再听到女领导干部的故事和倾诉，我内心有一种被震撼、被唤醒的感觉，从性别视角去看她们艰难的从政历史，我似乎能够深深地感受和理解她们内心的痛苦、挣扎和无奈。我转化了将问题个人化的视角，看到她们无奈和挣扎的背后所面对的是带着社会性别歧视和排斥的政策、文化、社会机制，惊讶在男女平等政策的背后实际起作用的却是传统的社会性别文化。也慢慢开始理解了为什么代表着权力、标榜着解放了的妇女，有的那种“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的无名痛！她们在荣耀和风光的背后也经历着性别歧视和“失权”，她们挣扎在“贤妻良母和革命干部”的角色矛盾中，她们生活在“素质不高和结构排斥”的夹缝之中……

我从她们的故事中，从女领导干部们身上存在的“无名痛”中，开始了解和理解了我的母亲常常会发出的沉重的叹息声！

我的母亲，生长在“妇女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的50年代时代。十八岁参加工作，二十岁担任全市第一个女派出所所长。做了几十年的妇联主任，从事“解放妇女工作”。丈夫被下放到牧区十几年，家里家外一把手，既当爹，又当娘；不仅要有出色的工作，当新时代的新女性，还要养活四个女儿和一个母亲。她认真地去实践了那个时代对女人的要求——男人能做得到的女人也能做到。然而，这辈子她都不能明白，她所付出的却得不到一年只回家几天的丈夫的理解和支持，反而得到的是埋怨和压力以及丈夫对自己妈妈的恶语相加。尽管妈妈这个新时代的女性有工作，当派出所所长，但她的婚姻是包办的，夫妻关系成为一辈子母亲最沉重的负担，不开心和痛苦陪伴了大半辈子至今，她为自己的母亲

争得在“女婿家”居住和生活的一席公平的待遇而和丈夫斗争了多半辈子，为自己的女儿们有个圆满的家、为了给做妇女解放工作的自己保住面子而不离婚，迄今仍带着一团的迷雾无法解释自己到底在和谁抗争？自己的丈夫？自己的观念？她总觉得自己被什么人看着动弹不得……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甘心，这辈子自己苦、自己挣、养活着母亲和四个孩子，为他遭受了种种的苦难，到头来怎么就一辈子怎么受制于自己的丈夫，甚至连自己的女儿，竟然也不能够理解苦了一辈子、奔波了一辈子的母亲，指责母亲没有女人味，不是贤妻良母……母亲只能把一辈子的辛酸和无奈化作重重的叹息、重重的叹息……

冥冥当中命运似乎早对我做了安排。我继承了母亲奋斗了多半辈子却从来没搞清楚解放妇女要解放妇女什么的事业，毕业分配时阴差阳错地来到了女子学院，稀里糊涂地也开始了“妇女解放”的工作。自开始接受西方社会性别意识启蒙后，也慢慢地将自己变成了女权主义者，糊里糊涂地将自己变成“女强人”，也经历和感受着母亲、女领导干部的那种无名痛，挣扎在你要“做女人——你不像女人——我要做女人——我是谁”的身份认同中。我与母亲、女领导们最大的不同在于，我是在不断地学习女权主义理论中艰难地成长，在理论和现实的距离中挣扎，在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中挣扎……。将我的以及母亲和那些女领导干部们的经历叠加在一起，我脑中出现一个形象的画面：旧社会的妇女，她们的命运就像有笼子的老虎，知道自己的活动范围，逃不出，所以认命。到了这些女领导干部们、母亲和我，我们被解放了，从老虎的笼里解放了出来，有一片开阔的天地可以活动，然而有一天我们强烈地感觉到，那个天地是有界限的，一张无形的网和无形的眼睛看着我们，以至于最后自己也给自己设置网，从行动和思想上都有一张无形的网限制你。但这个网已经不是那个旧社会关老虎的笼子可以看见界限，最恐惧的这是一张无形的网，我们看不见界限，却弥漫在我们当中。

第二个事件，是我读博士课程时，老师为我们专门开设了叙事治疗、女性主义研究方法等课程。这些课程打开了我的研究视野，将我从传统的实证主义研究的思维框架下解放了出来，寻找到做学术研究的力量。

90年代初，我参与了刚刚起步的民间妇女组织为妇女的服务和研究，如参加红枫妇女热线的电话辅导工作，参与京伦家庭研究中心的家庭辅导和少女课堂，针对妇女家庭暴力的法律服务和医疗干预等等。从中积累了大量的社会实践经验。我的本科学的是历史，没有社会学的理论功底，很长时间，我不会写带有理论分析的文章，总结实践经验只能平铺直叙，不知道如何与理论对话，在学术上一直处于失声的状态。在女性主义研究方法课上，同学们和老师们书写自己的生命故事，我也把自己深爱的、那个旧社会的一个普通妇女却影响我一生的姥姥的故事、那个我真切的生命经验行云流水般的一气呵成，我才深深体会到传统的学术界将抽象和理论作为学术标准而压抑女性经验的做法是多么霸权地占据了学术的统治地位，长期以来的失声状态是我从来否认我所擅长的书写，而去追求我很难达到的那种抽象的实证研究的书写。

这个顿悟增加了做本研究的信心，写女领导干部们的故事，从她们的故事出发去看故事背后的故事，让我由原本的研究目的——从女领导故事中找出规律性东西以告知——转而走向对她们生命故事的“展示”（show）。

随着顿悟，我越来越清晰地明白为什么我割舍不了书写女领导干部生命故事的情感，我不再困惑于我个人经验如何搁置而去“客观地”不留个人痕迹地去研究女领导干部，我也不再困惑我个人的写作风格是否很不学术，因为我知道从头到尾我都是带着生命的体验和感动，带着激情投入在我的研究和书写的整个过程中。我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成就我的学术地位，而是为了女领导干部们、为母亲寻找答案，为了我作为女人——一个主张女权主义的女人——一个妻子和母亲——一个希望有自己事业的女人其中的挣扎和痛苦找寻答案，寻解弥漫在周围的那张无形网是什么，为了我那坚信的社会公正和性别公平社会的出现，我要书写，用我能够发声的方式！

二、研究背景

古今中外，政治一向是男性的领地。绝大多数政治家都是男性，女政治家凤毛麟角，这就是所谓父权制的政治体制。不仅政治体制是父权制的，家庭、家族、宗族体制也都是一脉相承的父权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男权社会。

中国的历史男性是主角，女人只能是配角。英雄总归需要美人来点缀，美人，只能为英雄而存在。英雄美人的公式，形象地概括了父权政治当中性别的特征。美人一旦越界，试图成为政治的主导者，控制者，她就侵入了男权的领域，成为僭越传统的野心家，而为社会和舆论所不容，她往往必须以强权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于是就出现了像吕后、武则天、慈禧太后这样的被史学家讥讽为牝鸡司晨的、没有政治合法性的女皇或者准女皇，而这三种女人参政的情况，大致就概括了史书记载中女性与政治的关系。

近现代工业化和妇女走出家门与男性一起参加社会劳动，以及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妇女参政才慢慢被提上议事日程（陈瑞生，1995）。在中国，女领导干部作为一个群体出现是最近半个多世纪的事情，是伴随着民权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而产生的。时至今日，妇女参与社会事务的各个方面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

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推动妇女参政、促进男女平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这些措施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推动了女领导干部的成长。特别是95'世妇会（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以及中国领导人在世妇会上将“男女平等”作为国策提出，更进一步推动了对妇女参政的关注和研究。

《行动纲领》指出：“如果各级决策进程没有妇女的积极参与，没有吸纳妇女的观点，就不

可能实现平等、发展与和平的目标”，并提出在立法和各级政府决策职位中妇女至少应占30%的目标。在95’世妇会的推动下，中国政府出台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等一系列政策¹，有力地促进了妇女参政的进程。各级地方政府也采取一些积极的政策措施保证妇女参政的比例，取得了有益的进展（彭佩云，2001；顾秀莲，2001）。

在中国，妇女参政比率高低是考察中国妇女政治地位和“男女平等”的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国家统计局，2001），对妇女参政的研究妇女理论和工作界的一项重要工作。

理想的妇女参政局面和现实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妇女参政依旧是一个薄弱环节。在民主参与方面，妇女的参选率、投票质量、政治关注度低于男性。在权力参与方面，仍表现为数量少、正职少，重要领导岗位上的女性比例偏低，并呈现下降趋势（谭琳，2004）。《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在中国执行情况的调查研究》中显示，女党员、女代表、女中央候补委员的比例过低，女党员占15%，女党代表占16.8%，目前女中央候补委员只有7%。省部级女性领导干部只占到14.81%，地市级占到9.7%，而区县处级女性领导干部目前参政的比例只占到14.8%（郭砾，2001）。除此之外，在参政领域中性别歧视还表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被打折扣，落实上存在着替换、僵化和敷衍的现象，选拔女性领导干部的政策中按照男性的成长规律为标准设计，缺少对女性的生理特点和成长规律的考虑，导致对女性干部选拔和成长不利（杜洁，2001）。

“男女平等”是从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开始就倡导的目标、建国后即在法律中明文规定的并在95’世妇会时定为国策的，为什么妇女参政却成为一个举步维艰的难题？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我的好奇带给我探究问题的欲望，成为我研究的起步。这种好奇带着我去探究，一步步进入研究妇女参政的领域，我发现该领域既是一片蓝阔的天空，也是浩瀚的云海，感觉就像水中望月、雾里探花，各种官方的、社会的、媒体的、参政妇女自己的对妇女参政和参政妇女的论述相互矛盾，犹如一团乱麻纠结在一起：

——官方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妇女解放，因此妇女的解放必须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支持。

妇女的参政意识不强，主要表现在依附心理严重，因此妇女必须要有“自尊、自立、自强和自信的四自精神”。

——妇女参政需要政策的保护，这是对不平等的纠正。

你们是靠政策保护上来的，保护本身就是不平等。

——女领导干部患有“恐夫症”、“假男症”、“淑女症”，变态……

女领导干部女人没有女人味，下辈子我决不娶这样的女人当老婆……

¹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出台于1995年7月，它不是95’世妇会召开后的结果，而是为了迎接95’世妇会中国政府所做的一项工作，但仍要归功于95’世妇会的推动。

——女领导说：做领导一定要记住没有性别，领导就是领导。

做女领导一定要发挥女性善于沟通、有亲和力的优势……

——妇女参政不能单纯说为了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而应该是为了促进人类发展。

妇女参政首先要为妇女的群体利益说话，否则就不是妇女参政。

.....

当我越多地去阅读这些官方的论述和各种研究报告以及社会媒体充斥着相互矛盾的关于对女领导论述和形象，越看到现实生活中女领导干部在事业和家庭中的两难和挣扎，我就越发对这个人群感到心痛，那种心痛又如自己所经历一般。妇女参政似乎对一个国家来说代表着国家对人权的重视情况以及妇女在一个国家中是否有真实的社会地位，但对参政的这些女领导干部们来说参政到底意味着什么？她们为什么参政？是否能感受到“解放”？或者感到解放了什么？参政对她们生活的影响是什么？她们每天生活在这些相矛盾的论述中，她们如何作出他们的应对和选择？

三、以往研究妇女参政问题中的局限

我带着种种的疑问去梳理之前的研究，经过文献研究（将在第二章中详细介绍文献研究）之后我发现，之前的研究存在以下的一些不足：

（一）将研究重点放在妇女“如何”才能参政的条件上，忽视对主体性的研究。

以往一类研究重点和焦点放在对妇女参政的渠道、障碍、条件、比例、参政规律的研究上，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提供政策建议服务；另一类则研究参政妇女的素质对妇女参政的影响，这类研究笼统和主观地认为妇女素质低是导致妇女参政的重要因素之一，甚至有些研究者称为“关键因素”。绝大多数研究都将笼统地将妇女参政率低的原因归结为“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立法不足，执法力度不够”。很少研究关注女领导干部自己的声音以及在领导岗位上的女领导干部的主观感受。这与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缺乏将人作为一个动态的对象有关，同时与中国社会否定个人的价值和否定个体参与群体的感受等价值观有关。对妇女参政的解释都是国家的、代表国家的和男性的解释，却看不到女领导干部们自己如何解释参政。

（二）将女领导干部看成是一个整体，忽视了女领导干部中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女领导干部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她们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如城乡的差别，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区别、区域性和文化等等的差异。“妇女”也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有很大差

异，如打工妹、农村妇女、知识分子、工人等等之中都有妇女，其中能够参政的、从政的只是“妇女”中的极少数，因此动员“妇女”中的什么人参政也是值得研究的课题。而关于妇女中参政状况差异性的研究很少。

（三）将焦点集中在权力妇女的参与上，忽视了对 NGO 组织、基层妇女等的民主参与的研究的关注。

没有基层妇女群体的参政议政基础，这也是导致妇女群体参政意识薄弱的一个原因。近些年全国各级妇联以及研究机构逐渐开始关注基层妇女参政，但很多以引进项目的形式在一些县、村等进行村级妇女参政的尝试，缺乏对基层妇女整体的宣传和动员，也没有硬性的措施，也是导致妇女参政出现青黄不接和玻璃天花板效应的原因。

（四）现有的理论不足够解释现存的妇女参政问题，并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不能解释现今妇女参政中存在的问题，但处于政治的考虑，该观点依旧成为主导妇女参政研究的指导思想，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既不能很好地去研究西方妇女参政的理论也不能很好地发展本土的理论，研究处于就事论事水平。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毫无疑问，缺乏批判和反思的精神，因此使得参政研究没有突破。

（五）国内的研究将政策规定力度不够和妇女参政素质低看成是影响妇女参政的两条并行的原因，看不到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妇女素质的影响和持续的作用。

个人素质和制度等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十几年来就是从个人素质和制度上寻找原因，尽管大家都知道传统性别文化持续性的作用，但是仅仅作为一个参政的背景知识，却对性别文化如何与国家倡导的意识形态相互作用、持续地发挥作用方面缺乏分析和研究。

（六）研究方法的局限。

学术界和政界受传统实证主义的影响太深，绝大多数的研究多采用定量研究中问卷调查的方法，用一些数字来说明问题，即便采用了访谈法，也是从中找寻规律性的探索。对妇女参政的研究多数集中在比例上，用比例高低来衡量参政水平的高低以及将推展比例作为争取参政的途径和目标，这就决定了它的研究方法采用定量的即必须是带着普遍性、数据性的研究，人们的观念中认为，只有依据数字的研究才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而个人生命故事的研究方法登不上大雅之堂，至少认为不能作为科学决策的依据。更大多数关于妇女参政的文章，既没有量化调查也没有质性研究，随意性很大，缺乏严谨性，而这些研究足已形成了对整个妇女参政和女领导的建构和定型的认识，这是一种非常令人堪忧的局面。

中国妇女参政是中国妇女解放和妇女研究中最受关注的一个领域，但几十年来参政的

局面没有根本的改观甚至不容乐观，与我们十几年来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中没有突破是否有很大的关系，值得反思和研究。

上述的研究局限，不是本研究都能解决和弥补的。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女领导干部生命故事的研究，试图开启从参政主体去研究妇女参政和解释妇女参政问题的空间。对女性领导干部的生命史进行研究在中国大陆尚属首次，从女领导干部的角度去解释参政也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本研究期望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尽管我的研究本身也存在着局限和不足。

四、研究目标和研究问题

本研究的目标是通过文本和女领导干部生命故事的研究，分析各种论述是怎样地影响和具体形塑着女领导干部的生命历史及她们的主体性，探索女领导干部有怎样的参政观以及是如何被建构的，开启另一种解释以及解决妇女参政问题问题的空间。为此，我建立了三个研究问题，希望从回答这三个问题中来达到上面的研究目标。这三个问题是：

（一）自 49 年至今，各种论述是怎样形塑女领导干部，塑造出了怎样的女领导干部的主体性和她们的参政观？

（二）各种的论述透过那些微观的权利技术规训了一个怎样的主体？

（三）女领导干部在被形塑过程中有无抗争？如果有，其方法和效果怎样？如果没有，为什么？

五、研究参与者界定

如果把“妇女参政”定义为不仅是指一个目标、一个过程、一个行动，更重要的是指为整个妇女群体最终目的的实现而有意识和目的地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全面管理，那么“参政妇女”则是泛指参与到整个过程中的人。“女领导干部”则是特指一群有职位的人，她们已经参与到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职位上，担任各级领导职务，掌握政治权力的人（王行娟，1995）。在我的研究中我则用“女领导干部”以区别于一般的参政妇女。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大陆地区就大量使用“干部”一词¹。干部在当时的意义是“在一个组织中担任管理和领导职能的人”，这个组织可能包括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团体等，因此，女干部也就是女领导干部，区别于工人和农民，就是管理人员。当干部作为一个职业分层的时候，干部²是指列入干部编制、享受干部待遇，从事各种公共管理工作的公职人员。主要包括以下 6 类人员：（1）国家机关的领导和工作人员；（2）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干部，各民主党派的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3）在军队中担任排级以上职务的现役军人；（4）社会政治团体与群众组织的领导与工作人员；（5）专业技术干部；（6）国有

¹ zh.wikipedia.org/wiki/干部

² www.china.org.cn

企、事业单位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当国家把干部作为一个职业分层的时候，通常指那些正式在党和国家机关担任公职的工作人员，因此女干部一般指没有担任领导干部却是国家公务员的人。而我在本文中使用女性领导干部区别于一般女干部。

本研究的对象是那些在党政机构、以及半官方的群众组织中担任领导职位的女性，而不把企业、军人、学校等领域的女领导干部作为研究参与者，尽管我了解每个女领导的生命历程不一样，但我也更相信不同的行业的领导的心路历程有一定的差别。

六、本研究的框架

全书共分为七章：

第一章，主要通过对研究缘起、研究背景以及以往研究中存在的局限和不足的分析，引出我的研究目标和研究问题，以及研究参与者的界定，给读者一个本研究的指引，即我的研究从哪里来要到那里去，清晰展现研究者的研究路径和意图。

第二章，文献回顾和理论框架。这一章系统地梳理了以往关于国内和国外的妇女参政的研究，以及中国和国外女权主义对妇女参政的理论解释，从文献回顾中清晰看到以往研究的优势和不足，从而发展出我的理论视角，即综合女权主义、批判理论和后结构的理论视角，并用主体性、规训和主体、抗争和主体三个核心概念去理解女领导干部生命史(参政史)。

第三章，本章主要描述了我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认识决定了她的研究方法。我选用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相结合的多视角理论来指导我的研究，那么必须所选择的方法论是在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批判—建构研究范式下，并借用该范式下的解释互动论的研究方法作为具体的研究指导，进行的研究主题的确立、文献回顾、资料收集、资料分析和书写等研究过程。

第四章，开始进入主题，进行资料分析。本章主要阐述了 80 年代前后国家、媒体、教育等如何建构了一个女领导干部的主体性，主体性呈现出的不同样态，展现出了女领导干部不同的参政观和参政样态。

第五章，主要阐述参政中的各种规训女领导干部的纪律和游戏规则，呈现这些规训和纪律如何被复制和传播，如何影响和制约了女领导干部的参政主体。

第六章，针对上面论述建构主体和规训建构主体的局面，本章主要论述在建构和规训下主体的能动性和积极抗争的策略。

第七章，是本研究的总结、讨论和建议。

小结

本章在整个研究中起一个引子的作用。梳理研究者的研究缘起，从个人的生命体验和关心入手开始的研究，找到女性主义所说的个人经验与研究的关联。从研究背景和研究局限的梳理来建立自己的研究目标和需要通过研究来回答的研究问题，给读者一个研究的概况和浏览，以便清晰了解研究者的研究路向和意图。

第二章 文献研究及理论框架

概论

本章通过对以往妇女研究中关于妇女参政、领导学研究中关于女领导干部以及中外有关妇女参政的研究和理论梳理，呈现出了针对妇女参政多面向的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本研究的理论视角。

一、主流对妇女参政和女领导干部的研究

对女领导干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类研究中，一类是妇女研究，将妇女参政作为衡量妇女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进行研究，其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妇女参政途径、方法、政策、规律以及妇女个人的素质如何影响参政、参政的女领导干部为何没有为妇女参政的意识等等上，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妇女地位和实现男女平等的理想，多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社会性别视角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另一类从领导学的角度对女领导干部进行研究，研究主题集中在女性领导和男性领导的不同、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以及女领导如何发挥其优势避免其劣势等，研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女领导的领导效力。这两类研究各有侧重，但也有重合之处。尽管文献回顾中会关注到两者的研究状况，但本研究是从妇女研究的角度看妇女参政。

（一）妇女研究中的妇女参政研究

妇女研究中关于妇女参政的研究兴起于二十世纪 80 年代，其研究历程主要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兴起期。80 年代初到 90 年代初；第二阶段：高峰期。95'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简称 95' 世妇会）会前后时期；第三阶段：延续期。95' 世妇会之后到现在。第一阶段的研究主要是为了解释妇女参政率降至低谷的现实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妇女参政的比例、女领导干部成才的规律以及个人素质等方面；第二阶段围绕 95' 世妇会的召开，此时的研究不再满足于回答前一阶段的现实问题，而更从多方面、多层次、多视角反思妇

女参政问题。第三阶段延续期，此时已将性别视角引入妇女参政研究中，妇女参政的研究注重理论分析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尽管三个阶段的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各有不同，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参政的实质及意义、参政的比例、参政的政策、参政妇女的素质等方面，具体来说表现在从政策制定上保障妇女参政（制度层面），和提升参政妇女个人素质（个人层面），以及全国妇联作为代表妇女的组织对此的推动力上（侯志明，1991；徐伟新，1997；丁娟，2004）。¹

1、妇女参政的概念和参政实质

由于不同时期对妇女参政的认识不同，因此对妇女参政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侯志明，1991；徐伟新，1997；丁娟，2004），但比较一致地认为妇女参政就是指妇女作为一个群体对政治有意识地、主动地参与，而非个别妇女对政治的参与，妇女担任各级领导职务，掌握政治权力，则是妇女参政的高级形式（梁旭光，2000；李惠英，2002）。也有人认为妇女参政是一个过程，其中包括知政、议政、参政（民主参与）和执政（权力参与）（姜秀花，2001）。

尽管学者强调妇女参政的概念中妇女群体民主参与的重要性，但在实际的研究或者具体推动妇女参政的过程中，常常把妇女参政中权力参与的程度即妇女参政率定为衡量妇女参政的指标，重视权力参与而忽视了民主参与。有研究者提醒，将妇女参政的具体目标定在妇女从政，将其作为短期目标是正确的，但不能作为长期目标，否则将会把妇女参政变成女干部问题，关心“精英参政”，即女领导干部的从政问题，而忽视了妇女参政与妇女群众的关系，会导致女干部认为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妇女参政，不能充分代表妇女群众的意愿和利益，同时可能将妇女参政变成是关心比例问题而不是妇女群众持续的参与活动，更甚者会使妇女群众对其它的参政途径失去兴趣（杜洁，2001；李惠英，2002；梁旭光，2000）。

对参政概念理解的核心是对政治概念理解。上述对妇女参政概念的理解和讨论，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对政治的理解，政治即发生在公共领域中的事情，即无论是妇女群体的集体参与或者个体的权力参与，都是妇女参与公共事务。这个概念已经受到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挑战，认为政治不仅仅是一种活动、资源分配，更是一种权利关系（Randall, 1987），它存在于一切人类生活的领域，无论是公领域还是私领域，个人的即政治的，表明政治不仅存在于我们所说的“社会事务和国家管理”，也发生在“家庭”这一我们所忽视的领域中。

我同意上述的说法，但不会重点进行讨论公私领域的问题。本研究参与者是发生在公领域中、尤其是参与到官方决策的女性，。上面已经谈到，在中国大陆的妇女研究中，尽管

¹ 参阅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侯志明（1991）“妇女参政理论研究状况及趋势”，引自《1981-1990 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十年》；徐伟新（1997）“妇女参政研究综述”，引自《1991-1995 中国妇女研究年鉴》；丁娟（2004）“妇女参政研究综述”，引自《1996-2000 中国妇女研究年鉴》，详细综述了自 80 年代开始的关于妇女参政的研究，基本上围绕着妇女参政的内涵、意义、参政的渠道、比例、素质等方面进行研究。

认识到对妇女参政的理解不仅仅是“权力参与”，还应该包括民主参与，但我的研究仍将对象放在参与权力的女干部身上，这并不等于我认为妇女参政就是权力参与，也不等同于我忽视妇女群众民主参与的重要性，我选择权力参与的女干部与我的研究目的有直接的相关。

在中国大陆，官方主要有两个纲领性的文件提到妇女参政的概念，一是中国政府郑重向世界承诺执行的、95’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其中提出赋予妇女权利、妇女独立自主，改善妇女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是实现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政府以及在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行政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因素。妇女平等参与决策不仅是要求单纯的公平或民主，也可视为妇女利益得到考虑的一项必要条件。这个定义的发展将妇女参政与妇女利益的实现相连接，明确提出了妇女参政除了实现一般的公民权利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为妇女的利益而参政。另一个则是在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中将妇女参政定义为“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决策和管理”，其中没有提及妇女参政要为妇女的利益而服务。这两个官方的定义显示出对妇女参政的不同理解。

为什么妇女要参政？绝大多数的研究有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妇女参政的实质不仅表现为全社会的妇女能否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及对社会政治生活持积极参与态度（民主参与），更应表现为从政妇女能否自觉代表女性的整体利益（权力参与），并能通过努力对政府的决策发生影响，使女性的利益在政治领域中得到体现（为了妇女的利益参政）（梁军，1989；引自侯志明，1992）。研究者们特别强调妇女参政不仅要普遍地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的管理，更要为了妇女参政、关注妇女的命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参政（孙小迎，2000）。但研究者的呼声和想法在现实中似乎很难转换为女领导干部们的自觉意识和行动，在《女市长》一书中，很多女市长认为，为妇女利益参政是一种狭隘的参政观，妇女更应该为了民族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而参政。在一项对317位女市长的调查中显示，当问及她们进入政坛的动力时，她们都回答是为了“广泛地参与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为人民群众做好事”、“证明女性自我的价值和参政能力”、“对个人的成长和才能的展示更具有挑战性”等，没有一个人回答为了妇女的利益而参政，她们更多地抱着“为民造福”而不是为“女”造福（刘伯红，2001）。另外有学者指出，在分析绝大多数女领导干部没有为妇女参政的立场、不能在决策中更多地为女同胞争取权益的问题时，阶级/阶层视角同样重要，很多参政的妇女缺乏性别意识甚至可能压制其他的女性，不能仅解释为女人好嫉妒，或者为了求得生存从性别上认同男性，而是身为领导者的身份比作为女性性别身份更具重要性，是阶层意识压倒了性别意识，女领导没有必要为了妇女群体的利益和男性领导发生冲突（王小波，2005）。

妇女广泛参与社会事务和担任领导职务以及为妇女参政的意识及行动出现，究竟那种才算妇女实质性的参政？

思考关于妇女参政的概念和内涵，应该将话语还原于它产生的语境。不同的语境中，

意识形态影响和制造了让我们思考妇女参政的话语。对中国妇女参政的理解首先要将他还原到该事件是在怎样的一个历史语境下出现的，才能够去界定和理解妇女参政的概念、内涵以及意义。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境下，对妇女参政的概念也有所不同。

在西方，资产阶级争取人权运动的结果，并没有把权力给妇女，因此女权主义才举起争取妇女参政权力的大旗，其直接目的就是争取妇女权力参与（陆伟芳，2004）。有一针对国外 13 位高级女性领导的研究显示，尽管她们为妇女利益而奋斗的意识在其参政的过程中有早晚，但是她们都清晰地意识到参政的目的是要为改变这个世界和妇女的生活状况而奋斗（Hartman, 1999）。

在中国则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一方面，新中国建立之后，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指导下，妇女作为被压迫阶级的一部分，首先要把全面的权力也还给被压迫的妇女。面对几千年来把妇女的领域和活动空间限制在家庭内这一事实，新中国首先要把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而进入社会，全面参与到社会生产中去，参与社会生活和管理，这是具有历史性和政治性的，标志着一个历史时代的开始，因此全面参与社会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是妇女参政的第一层含义。同时妇女参与到权力阶层，担任一定的领导干部，也是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个方面，在中国这个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传统的国家，结束了几千年来妇女与政治无缘的局面，这也绝对是历史性的、更是政治性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的标志，也是中国妇女解放的标志和成果。这个年代，国家已经给了妇女参政的法律和舆论环境，党和国家以及全国妇联的工作就是大量鼓励妇女参政，因此妇女们无需再为妇女能够得到参政权力而斗争，妇女参政本身就是妇女利益的具体体现（陆伟芳，2004）。

另外，深受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影响的妇女解放或者妇女参政运动，从来都是把妇女作为阶级的一部分从被压迫者群体中解放出来，放到社会中和大家（男人和女人）一起去参加社会劳动，解放出来的妇女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和为人民服务的，如果解放了妇女只考虑妇女自己的利益，或者只为妇女参政，既不可能也不现实。那是一个所有人只有国家和社会不能有自己的时代。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当然也代表妇女的利益，全国妇联的设置本身也是为了保证党能够及时听到妇女的声音和妇女能够听到党的声音，而不可能主张妇女独特的权力（陆伟芳，2004）。

因此，从上述中国妇女参政出现的历史语境和发展来说，妇女参政的实质是指妇女广泛地参与到国家和社会生活事务的各个方面包括权力层面的参与，而没有发展出为妇女参政的语境。

为妇女参政语境的出现是在 80 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妇女也承受了改革带来的沉重代价。就妇女参政的比例来说，80 年代前后比较，妇女参政比例滑到低谷。而此时，随着对外开放，妇女研究者和全国各级妇联越来越接受联合国把妇女参政作为妇女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所给予的重视和推动，因此维护妇女参政权力的呼声越来越大。随着 95 世妇

会西方社会性别概念的引入，不仅是女性主体意识的启蒙，更是性别意识在全国妇联和妇女研究者中的启蒙和发展，对妇女参政的理解，逐渐从全面参与社会事务管理、推动妇女参政比例以及权力的参与，上升为推动妇女们出现为妇女参政的主体意识，参政的概念从一个民主参与和权力参与的内涵增加了为妇女参政的内涵（刘伯红，2001；李惠英，2002；王小波，2005）。

2、中国共产党针对妇女参政的行动

在中国，研究妇女参政必须要研究其与政党的关系。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妇女解放是谈论妇女参政的前提条件和语境，中国共产党是妇女参政的保障¹，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中国共产党自49年至今60年的历史表明，如果失去国家政策的支持和保护，在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的中国，在这个至今仍是男性主导的参政领域里，推动男女平等参政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妇女参政的历史进程中一直扮演了一个推动者、保护者和权威的角色（陈瑞生，1995）。历史发展表明，妇女参政的高低起伏和中国共产党对其的重视和干预程度密切相关。

中国共产党和妇女参政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二个时期，即80年代之前和80年代之后。其分水岭是80年代实行了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从保护妇女参政走向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到妇女参政中。

80年代之前（50年代——70年代末），在党和国家强有力政策的支持、保证之下，妇女参政状况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突破性进展。1949年10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宣告，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各方面，均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1954年的第一部《宪法》以及之后颁布的《婚姻法》、《选举法》、《继承法》等，进一步规定了男女平等的权利，将“男女平等”作为法律规定（刘东发，2003）。在法律的推动下，50年代地方各级政权中，都有妇女担任市长、行署专员、县长、州长和乡长；70%的乡村有女乡长，县处级女领导干部占干部总数的7%左右。在中央党政机关，也陆续出现了一些女性担任要职，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女代表占到11.9%。可以说，在50年代，具有一定规模的女性领导群体已经形成，彻底结束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陈瑞生，1995）。

8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全面实行改革开放，在政治领域中引入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

¹ 1951年，蔡畅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妇女”一文中说，“我们回顾以前的历史，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妇女的今天。中国妇女只有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才能获得彻底的、最后的解放”。1981年，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同志发表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妇女的解放”的文章。全国妇联的副主席顾秀莲在总结中国妇女50年的发展历程时说，中国妇女走出了一条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它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争取妇女解放的实践，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全面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组织起来，依靠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与男性携手并肩，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维护自己的具体利益，逐步实现事实上的男女平等（顾秀莲，2001）。蔡畅的原文原载《人民日报》1951年6月27日，引自《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第二册，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年；康克清原文刊登在《妇女工作》1981年，引自《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第二册，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年；顾秀莲，“在中国妇女参政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妇女研究论丛》，2001年6月。

争机制，党和国家对妇女参政的保障和干预力度逐渐退却，造成了妇女参政的大衰退（这一点在第四章详细讨论）。1982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女委员11名，占总数的5.2%，比1977年的十一大下降了1.5个百分点，比1977年的十大下降了一倍。1983年，全国女性领导层的比例急剧下降，全国仅有近10%的乡有正副女乡长，比起50年代下降了12个百分点。这种持续下跌的状况延续到80年代末（陈瑞生，1995）。

95'世妇会之后，在全国妇联和妇女研究者的推动下，党和政府也积极寻找策略解决妇女参政比例低的问题。如1995年中国政府颁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对妇女参政做了具体的规定。全国妇联、中央组织部以及妇女研究者针对妇女参政比例急剧下降的问题，探讨在妇女参政中采用竞争聘任制与保证比例相结合的路径和办法。中央组织部和全国妇联联合出台关于选拔妇女干部的一系列文件，如1998年《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培养选拔妇女干部工作意见》、1998年《1998——2003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等。这些文件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一定比例的妇女参政，但也导致了妇女参政的人数仅仅是比例所规定的人数，甚至有些地区也达不到所规定的比例（徐慧敏，2003）。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在中国执行情况的调查研究》中显示，各级领导干部中女性的比例仍然明显偏低（郭砾，2001）。

对上述80年代前后妇女参政明显不同的局面，中外学者有不同的解释，而我认为最具说服力的解释是国外学者郝韦尔（Jude Howell）用国家派生的女权主义（State-derived feminism）和另一外学者王琦（Wang Qi）用国家和社会互动关系来解释中国的国家如何对妇女参政实施干预。尽管他们采用了不同的分析视角，但所分析的内容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国家派生的女权主义（State-derived feminism）是指由国家生产了一个官方的性别意识、解决妇女受压迫的策略、以及组织了社会变革的过程并且对它实施了垄断（Jude Howell, 2002）。这个概念不仅描述1949年后的中国官方的性别意识，而且指出一系列用来提升妇女地位的实践策略和制度性安排。

国家派生的女权主义的核心思想认为，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和一套策略、制度安排保证了妇女参政。郝维尔所指的意识形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共产党认为妇女解放的前提是妇女要参与到经济建设中去，这不仅是妇女能够得到社会和经济平等地位的前提条件，也是平等参与政治的前提条件。第二，把妇女当作一个特别的需要受到保护的脆弱群体。这种官方意识形态根深蒂固地树立了妇女是弱者的形象，同时决定了妇女们从上（党和党的政策）寻求参政的合法性。郝维尔认为把妇女作为脆弱群体的看法源于对妇女生物性性别决定论的认同，忽视了后天社会建构妇女地位的成分。“妇女素质低”就是对妇女较低的政治参与率的一个关键性的解释，这种解释认为妇女自卑的心理导致低自尊和自信，与妇女体力脆弱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支持了妇女需要保护和政府需要介入的思想（Jude Howell, 2002）。

郝维尔（Jude Howell）认为，官方将其性别思想形成一套策略，如当时的全国妇联所采取的策略是开展了一系列提升妇女“四自”意识¹、反对在选拔和提升干部方面的性别偏见、建立妇女人才库、训练潜在的妇女领袖等活动，并通过一套的制度性安排去实现策略。

郝维尔把全国妇联当成是国家派生女权主义的代表者和执行者，认为建立全国妇联是一套的制度安排，把全国妇联作为党和国家联系妇女群众的代表，一方面全国妇联要代表国家主张妇女的权利，另一方面它作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又受制于党的领导。这种制度性安排不仅降低了全国妇联的权威性，更保证了它不会挑战党的权威，减低了全国妇联维护妇女权益的能力，使得它在妇女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只能站在国家的一边。因此国家派生的女权主义实际上不能真正为妇女的利益说话，结果就是妇女被动员进行社会改革而不能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改革。尽管妇联也在一些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妇女的政策上提供一些咨询，但很少直接地、权威性地影响政策的决策。

针对全国妇联没能阻挡改革开放之后妇女参政滑坡的局面，郝维尔认为原因有下面几个：第一，国家派生女权主义在计划经济和政府干预的时代有一个合适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力量，但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其核心价值观是竞争，公平和平等的价值观不受重视，也限制了政府去干预在政治、经济领域中的不公平的安排。第二，原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体现的性别观无法解释改革中发生的问题；第三，知识分子没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和空间进行妇女参政的学术研究；第四，全国妇联不得不再次地寻求依靠政府去解决问题妇女参政问题。

郝维尔（Jude Howell）用国家派生的女权主义比较深刻和全面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中国妇女的参政状况以及出现的问题的原因，但并没有指出解决困局的出路在哪里。她认为全国妇联不能在关键时刻保护妇女的利益也过于简单归纳，看不到全国妇联所处位置的复杂性以及全国各级妇联仍存在的争取妇女权益的工作空间。全国各级妇联直接接受同级党委领导，并接受上级妇联业务领导的状况，决定了各级妇联开展工作有很大的差异性和灵活性，决定了各级妇联有很多的发展空间。如最好证明就是借着‘95 世妇会’之后，在人们普遍将家庭暴力认为是“家务事”和“私事”的时候，地方妇联可以推动政府制定地方反家庭暴力条例。在‘95 世妇会’之后，全国妇联的工作随着社会性别意识的提升和国际、国内环境的推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争取妇女独特的权力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

王琦（Wang Qi）则将国家和社会互动的关系作为分析妇女参政问题的框架。她认为在毛泽东时代，通过国家力量逐渐地穿透社会和持续的变革让妇女参与政治。强国家不仅通过一系列法律推动妇女进入当地的领导结构中，还用不断的发动意识形态的革命把国家的

¹ 1988 年中国妇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关于今后五年的工作方针中明确指出，妇女素质低已经障碍了妇女发展，尤其是妇女的心理素质，因此今后的工作方针就是提高妇女的整体素质尤其是心理素质，对广大的妇女进行“四自”（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教育。

力量渗透到妇女的家庭生活和个人的价值观中，如三反五反、土地革命和婚姻法宣传等运动培养大批的妇女干部并把她们放到领导岗位上。为了解决妇女参与政治后和承担的家庭角色之间的冲突，全国妇联采取了一系列的策略，将一套好女人的价值观移植到妇女身上而达到国家的要求，典型的例子是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1965），带出了“妇女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什么是幸福？”的讨论¹，这个运动倡导妇女走出家庭参加革命作为一个好女人、好干部的标准，以及一个好女人就是看她的革命信念、革命热情和对革命应该承担的责任是否放在第一位。在一个具有封建文化传统的中国，对妇女进行意识形态教育是重要的也是必须的，但吊诡的是，当共产主义的政治体制成功地整合中国的妇女进入了新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同时，它也加强了妇女对国家的政治依赖性，妇女参政要依靠国家的结构，一旦这些结构不复存在，妇女的政治参与就会受到影响，改革开放后妇女参政滑坡就是一个好的例证，国家在妇女参政中引入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观念，并从原有的强势干预和保护的角色退位，把“能力”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将“素质低于男性”的女干部在政治参与上边缘化，妇女参政失去了国家强有力政策的保护和依赖（Wang Qi, 1999）。

郝维尔所指的意识形态是指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作为中国妇女解放的指南以及将妇女变成弱势群体，但王琦（Wang Qi）把意识形态具体化，如对什么是好女人和好干部的宣传教育上，表明国家的意识形态如何变成一种日常生活的常识影响着妇女的具体生活。

一些提倡西方妇女运动的学者强调指出，1949年以后颁布的有关妇女保障的法例，大多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并非真正着眼于妇女自身的权益。而且在不同的时段，由于经济上的需要，国家立法和对妇女角色的宣传，都是以繁荣国家经济为前提（阮新邦，1998）。这种观点和上述两位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从郝维尔、王琦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国家的意识形态、策略和制度都是服务于当时国家利益和动员妇女参与经济的需要，而不是从妇女独特的利益出发。

中国大陆学者提出妇女参政的“超前论”和“恩赐论”的说法。她们认为，在法律上妇女获得参政权力是“超越”现实的，是国家强有力干预了妇女参政的结果，没有妇女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妇女的解放就是形式上的解放，是立法上“恩赐”的权力，这些自然会强化妇女对国家和政策的依赖性。对妇女参政比例保护的规定，实际上导致了妇女参政的被动性（李小江，1994）。对此持不同意见的学者认为，“立法超前”是针对西方的参政模式来衡量的结果，中国和西方的妇女参政运动发展的历史背景不一样，中国为什么不能

¹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妇女领袖之一区梦觉在“怎样做一个新社会的新妇女”中说，“妇女必须积极参加社会生产实践，这是妇女解放的关键，只有这样才能享受与男子同等的权利，为此妇女必须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狭隘、依赖、感情脆弱等缺点，对孩子和家庭问题要合理处理，一方面要为人民服务，一方面要合理照顾孩子和家庭，要担负起这双重的任务，必须有坚强的事业心，不破困难，不破艰辛，坚决刚毅，把自己贡献给新社会”。原载《新中国妇女》创刊号，1949，引自《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第二册，中国妇女出版社。

有自己的妇女解放道路？（李静之，2001）

3、促进妇女参政的策略研究

促进妇女参政的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很多妇女研究者和妇联工作者关心的重点。最低比例制是中国共产党在保证妇女参政方面一个强有力的措施和机制，国内的研究多集中在最低比例制的研究上。

最低比例制，通俗的说即各级领导班子中最少要有一位女性。1983年在机构改革中，中央明确规定各级干部中要有适当的女干部的比例；1988年，针对妇女参政出现滑坡的情况，中组部和全国妇联联合下发了《在改革开放中加强选拔女干部工作的意见》的文件；1990年，中组部和全国妇联联合召开了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中组部和妇联负责同志参加的培养选拔女干部工作座谈会，提出“力争5年内实现县级党政领导班子中至少有一名女干部”的目标；1995年发表《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第一个目标就是提高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程度；提高妇女在领导班子中的比例。党的十五大报告和十五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1997）第六章第三十三条重申：“当重视培养、选拔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1999）第七章第三十条规定：“注意吸收优秀青年、妇女入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1995）第一章第六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除此之外，党政人事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选拔女干部的政策和工作目标。如1990年到1998年，中组部和全国妇联联合召开了四次培养选拔女干部的工作会议，制定了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的目标和规划，如制定《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培养选拔妇女干部工作的意见》（1998）、《培养选拔女干部工作座谈会纪要》（1990）、以及《1998-2003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1998）和2000年《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工作暂行条例规定》。

上述的文件中，除了1990年中组部和全国妇联联合召开了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中组部和妇联负责同志参加的培养选拔女干部工作座谈会，提出“力争5年内实现县级党政领导班子中至少有一名女干部”比例数字外，其他的文件都是一个笼统的增加妇女参政比例的说法，而没有明确的指标规定。

国家和全国妇联都把妇女参政比例高低，看成是一个最重要的衡量妇女参政水平的指标。但学者们对参政比例是否可以成为衡量参政的指标有很大的争议和讨论。1988年，妇女参政率出现低谷的局面，《中国妇女报》专门以“是优胜劣汰还是保证比例？”为题开展了长达3个月的讨论，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规定比例，因为女性承担着人类再生产的重负，几千年妇女的局面造就了妇女参政能力缺乏，保证比例可以作为一项临时政策，为女性参政创造一定的条件。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规定比例的做法是拔苗助长，是政治的“恩赐”，不利于妇女公平竞争，对已经参政的妇女不公平，保护上来的女性因为能力不足也很难发挥作用，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妇女参政素质的提高。一种中和的

观点认为，保证比例和优胜劣汰不矛盾，规定比例有利于政治机构中妇女参政的最低比例保障，优胜劣汰的原则则适用于最低比例之外通过同男子竞争取得参政权力。两者可以同时实施，并逐步减少按比例保证的部分，向公平竞争过度。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第三种较为中和的观点，最低比例制实际上是国家介入妇女参政的一种形式，尤其在目前不公平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国家介入可以减少强势群体和弱势团体之间的差异，对男女平等的实现更是如此，国家应该在实现男女平等方面起更积极的作用，通过政策的法律，直接促进妇女参政，不只强调机会平等而更强调结果的平等，最低比例制是通向结果平等的必经之路。在强调保证比例的同时，也要努力提升全体妇女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国家政策保护和妇女整体参政意识觉醒、自觉参政相结合。

在 95 世妇会的推动之下，纵观世界很多国家，他们通过宪法或法律制定以确保妇女参政的性别比例。如卢旺达政府承诺确保妇女在决策机构中占至少 30% 的职位；法国 2000 年通过的平等选举法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由任何现政党提出的全国范围的国民议会议员候选人中介于 48%-52% 的候选人必须是妇女。11 个拉丁美洲国家于 20 世纪 90 年代先后通过国家法律，要求在全国选举中女性候选人的比例最低比例为 20-40%。南非 1998 年的市政结构法规定：政党应当确保地方选举中妇女候选人为 50%。印度在第 70 号和第 74 号宪法修正案中规定，在所有地方机构中（村和市）为妇女保留 33% 的席位（张永英，2005）。有些国家则通过政党来制定和实施“最低比例制度”。挪威劳动党 1983 年决定所有的“选举和提名候选人中，男女两性至少有 40% 的代表”。瑞典社会民主党按照《社会民主妇女行动纲领》，1994 年引进了“下一位必须是女候选人”的原则，即实行男女候选人名单交替制（张永英，2005）。早在 1977 年，丹麦的人民党决定，在其所有的机构中应该采用对每一种性别都是 40% 的“最低比例制”。1988 年，丹麦社会民主党声明，在地方选举中，每一种性别都有权代表社会民主党候选人 40%，如果某一性别没有达到该比例，这种代表权就会完全失效。荷兰工党在 1998 年又规定，该党在全国大选中的候选人提名中，女性必须占 50%。德国社会民主党在 1998 年之后，在党内所有的机构中都采用每一种性别都是 40% 的“最低比例制”（张迎红，2003）。

我认为，对妇女参政最低比例制的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实际上处于两种不同的立场，即反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立场，如果我们承认在政治中男性主导，妇女处于弱势的位置的现实并且想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那么我们会想办法促进妇女的参政，最低比例制就是其中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这是女性主义的立场。如果我们站在反女性主义立场上，就会认为保证比例是一种不平等的做法，反对比例制也将变成一个抵制妇女参政的借口。

尽管我们把妇女参政比例的高低，看成是某种反映一个国家男女平等政策的落实情况的指标，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妇女参政的实质不只是争取与男性同等的参政比例这么简单。实践证明，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争取妇女参政比例上所导致的后果，就是这些按照比例上来的女领导干部们把参政当成是一种职业或者待遇而缺乏为妇女参政的意识，被男性

占主导的政治文化淹没，与我们理想中的妇女参政的目的相差甚远。所以争取妇女参政的比例并不能说明妇女地位的提高或者男女平等的实现，而比例和数字的后面蕴含着什么样的意义显得更重要（张李玺，2001）。

4、对制约女性参政因素的研究

国内妇女学者的研究显示，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制约了妇女参政：

（1）对女性性别角色的刻板、定型认识，是造成妇女发展潜能受阻的主要原因。

在“关于参政妇女需求的研究报告”中，研究者应用定性研究的方法，以全国政协女委员、全国人大女代表、中央党校女学员、女市长、国家经贸委女干部等 123 人为研究参与者，对妇女参政需求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大多数的女领导和女干部认为在选拔干部的标准上存在着性别歧视，并认为障碍妇女参政的最大原因是性别歧视和家庭负担（荣维毅，2001）。2001 年，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作了一项《中国女市长的调查》，对 317 位女市长进行的问卷调查中，也发现家庭和睦和支持成为影响妇女参政的重要因素，其中来自丈夫的支持则更重要（刘伯红，2001）。

性别定型的认识导致女领导承受双重的负担。一方面仍然要承受家庭责任的压力，女领导干部无法像男性一样全力工作。另一方面，女性大多数的职位都是副职或者关怀者的角色，而没有扮演关键的角色。

（2）“妇女的素质低”。

官方文件和大多数学术研究中，将“妇女素质低”作为对妇女参政状况不佳的核心解释。1988 年中国妇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关于今后五年的工作方针中明确指出，妇女素质低已经障碍了妇女发展，尤其是妇女的心理素质，因此今后的工作方针就是提高妇女的整体素质尤其是心理素质，对广大的妇女进行“四自”（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教育¹，并把提高妇女素质的重点放在提高女领导干部的心理素质上，一些研究支持了这种说法：认为女性参政之后，就会因为社会角色、家庭角色、性别角色混乱，不能准确地看自己和做自己，而出现“淑女症”、“假男症”、“恐夫症”的角色紊乱症（何仕林，2001），女性有对成功的恐惧感、寻求赞许、追求完美和慈母角色的心理误区，并导致女性身心疲惫（乔玉琼，1995）。女性的心理弱点还表现在双重角色冲突中的内疚心理、满足心理、顺从心理，对权力的拒斥心理和对同性的嫉妒、排斥心理，权力女性应调试好自己的心理（陈瑞生，1995）。

或许上述现象真的存在于女性领导中，但将妇女参政状况不佳归因于妇女个人心理素质并要求妇女们提高心理素质的做法太过单纯和简单。如果我们不去理会导致女领导干部们“心理疾病”的文化、制度等因素，如何从根本上去解决她们的“心理疾病”？国家论述和研究者的研究结论仍然用妇女素质低、把妇女作为弱势群体来看待妇女参政问题，从而导致对妇女参政群体的定型认识和误认。而此种误认，恰好反映出男权对妇女的排斥和

¹ 参看 1988 年中国妇女第五次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中国妇运》，1988 年第 10 期。

歧视。

“妇女素质低”的论述本身已经建构了妇女心理素质低的事实，建构本身可能就成为障碍妇女参政的重要因素。社会大众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有如此“差”的心理素质和“多”的心理问题的女领导，如何能够胜任领导职位？

国外用“玻璃天花板”现象（glass ceiling）解释为什么中层妇女被压制而不能晋升高级职位的种种无形障碍，表现在组织障碍、人际障碍和个人障碍。这些障碍统称为“玻璃天花板”，这个天花板成为一道设置在高级专业职位和高级权利职位之间难以突破的屏障（Heller, 1982；引自徐改，2005）。

5、对传媒中女领导干部的研究

文化研究者霍尔认为，只有通过意识形态理论，才能将媒体中的传播功能问题同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从而更深刻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高宣扬，2002，转引自 Hall, S. 1982），他认为媒体在传播资讯的过程中，总是向受众（观众或听众）灌输特定的“形式”（the 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定义，并从其形式定义出发，向受众灌输媒体所主张的意识形态范本。霍尔称其为媒体所建构的现实（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al' through the media）（hall, S. 1982）。群众总是被动地接受媒体的“形势”定义和“现实”概念。就在这些有关“形势”和“现实”的定义中，已经渗透了控制者所支援的意识形态。

大众传媒向受众所灌输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大众传媒是重要的建构女领导干部形象的一个场所，它对女领导干部形象的宣传和塑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反映出某种意识形态。

一项传媒对女领导干部的公众影响力和公众形象、以及公众对妇女参政的看法两个方面进行的调查显示，公众对女领导干部的知晓率比较低，女性公众对女领导干部的正面印象大于男性对她们的正面印象，大多数公众肯定女领导干部的管理才能和廉洁。被调查的男性更多认为女领导干部素质低、琐碎、可敬不可亲，看到的女领导干部在政治生活中都是配角，看不到政绩；认为女性行政官员气较大，官话套话多，马列主义老太太太多，缺少人情味，性格不那么可爱，看上去都是疲惫不堪，平淡乏味，忙忙碌碌不顾家庭的人（金一虹，2002；刘伯红，2001）。另一项对传媒与妇女参政的实证研究表明，传媒对妇女参政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一些女领导干部因着传媒的宣传被社会所认识，但是媒体对女领导的“不正面宣传”或者“很少正面宣传”也使得女领导干部公众影响力小。媒体报道带有明显的性别偏好，通常男性的言论常被关注和引用。尤其在商业的冲击下，传媒追求收视率以提高经济效益，而女领导干部的形象和素材恰恰不具备商业化要素。一些影视作品中塑造的女领导干部的正面形象刻板乏味，而其塑造的僵化、保守、琐碎平庸、素质不高的刻板形象不胫而走。同时新旧模式混载，即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对女人的要求也转移到对女领导干部的要求上，一方面要求“亲切”、“善解人意和善良”，不要权利欲强、咄咄逼人，

另一方面要求有现代的时尚、气质，注重女领导干部的外在形象，女领导干部生活在不同要求的夹击中，比以前更加艰难（金一虹，2002）。

6、对女领导干部主体性/主体意识的研究

在所有的对女领导干部的研究中，几乎没有针对女领导干部主体性/主体意识的研究，而对中国妇女主体性的研究比较多。本研究通过梳理对中国妇女主体性的研究，希望对研究女领导干部的主体性有一些参考意义。

中国大陆学者对妇女有无主体性的研究各执一词。占主导地位结论是，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里，妇女从来都是被动地存在，地位的卑贱造成心理上的自卑，行为上的被动造成心理依赖，其结果，女人自身在思想深处缺乏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赵小华，2004）。对其成因不同的学者有不同角度的分析。有学者从“传统文化的改造不利以及主体意识教育的缺失”方面寻找缺乏主体性的原因（王小波，2001）。还有学者尖锐地指出，社会制度的优越使中国妇女所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权力，几乎在新旧社会制度交替的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多数的中国妇女省却了诸多国家、其中特别是西方国家女权运动为获得与男子同等的权力、争取女性应有社会地位而经历了百余年苦苦追求的过程。这无疑使得女性缺乏独立性，也较少自主的主体意识（刘宁，1998）。也有学者认为，国家把妇女从小的“家”中解放出来，从父亲和丈夫的庇护下解放出来，却让妇女依靠“国家”和国家的庇护，国家代替了父亲和丈夫的角色，使得妇女再一次的成为依附（戴锦华，2005）。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性别盲的妇女观，只看见一个统一的“妇女”被国家需要，被动员和说服，被宣传和教育。中国的妇女运动与其说是“妇女运动”还不如说是“运动妇女”，妇女参政权的获得对参加了民族解放革命的妇女是一种恩赐（李小江，1994）。因为无产阶级解放了，革命胜利了，因此给了作为无产阶级的妇女一些无产阶级应该有的权力，自然包括参政的权力。妇女参政是社会进步和男女平等的标志之一等的说法，就表明了妇女参政仅仅是为了给某种形象和意义打招牌，妇女在任何时候都是国家的民族的，但就不是妇女自己的（李小江，1994）。

¹香港学者认为，讨论中国妇女的自主性必须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对其的影响。在中国的儒家文化里，个人的自主性通过“礼”来实现，其中特别是“五伦”，以及遵从徐良光教授所说的“父子轴”为中心的关系。特别在对待两性关系上，要按照中国的国情处理，而不能套用西方女权主义的模式。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家族主义孕育下稳定的社会结构里，二千年来，无论男性或女性，都缺乏了发展出个人独立自主性格的条件和机会，更遑论所谓女性的意识觉醒。1949年后的系列改革冲击了固有的观念，妇女的状况有所改善，但是1979年后的改革开放，以商品经济为主的市场经济，一方面带给妇女如下岗等很大的冲击，另一方面也给妇女创造了很多的空间，间接提升了妇女的自主意识。吊诡的是，一方面物质条件改善了，发展的空间增加了，但另一方面却在性别关系中出现了比其他资本主义社会

¹ 戴锦华，2005年4月在香港岭南大学“文化与性别”中的讲课稿。

更压抑和不平等的情况，如随着商品经济而来的父权式企业结构和蓬勃发展的色情业，女性被“物化”的程度已经到了极严重的地步（阮新邦，1998）。台湾学者认为，在中国强大的政党政治下面，我们没有强大的独立于政党和政府的妇女组织，在强大的党的领导之下，将贯彻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作为第一己任的全国妇联，能否代表妇女的利益、将妇女的主体性发挥出来是一个令人怀疑的问题，事实上，以国家认同、政党认同来定为妇女团体，正是丧失主体性的开始，妇女运动的主体性不容为国家认同或政党取向的政治正确所吞噬，妇女运动必须重视自身的自主地位（石之渝，2003）。

综上所述，我要问的是，如果中国妇女没有自主性和解放意识，那么妇女参政运动的推动者是否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即便妇女解放是“恩赐”或者“超前”，妇女就没有主体性吗？

（二）领导学中对女领导干部的研究

中国大绿研究女领导干部的文献不多，在我所查阅的文献中，学者的研究多集中在描述女领导成长规律和其所具备的优势劣势上，而国外的相关研究的焦点集中在男女领导的性别差异上。

大陆学者针对女性领导的优势和不足的研究结果显示，女性领导的思维方式长于经验思维、拙于理论思维；善于形象思维、敏于直觉思维（王毅平，1994）。也有研究者认为女性的母性如关怀等，这些思维和素质对女领导干部发挥领导作用是有利的。一项对女市长的调查显示，有一部分女市长认为女性领导关注的问题与男性领导有差异，女性比较关注社会公共事业和与老百姓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更注重女性的培养和选拔，而男性较关注政绩等，也有一部分女市长认为自己关注的东西与男性领导没有什么差别（刘伯红，2001），女性的这些特质使之在政治参与中创造出怜悯政治（石之渝，2003）。

国外学者对领导风格的性别差异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男性和女性是平等的，男性和女性领导他们的贡献是相似的，因此要为他们努力提供平等的机会。另一种认为两者的领导风格是不同的，是互补的，女性领导更注重团队（communal），男性则注重单独的行动能力（agentic）。女性关心福利、情感、帮助别人，而男性则以目标为取向，注重控制、主宰、独立、自我承担等；女性领导比男性领导鼓励参与、分享权利、提升自我的价值。男性则喜欢描述他们的工作，奖励下属；女领导比男领导更具有超凡的魅力，更可以利用积极的心态调整脾气；并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接受民主和非指导性的方式，男性更专制。

（Rosener, 1990; Werver & Lakussa, 1985; Deawux & lewis, 1993; Spence & Helmreich, 1978; 转引自 S. Irene Matz, 2001）。

上述的研究中，首先没有用性别的视角对男女领导风格的差异进行分析，更没有深刻讨论男女差异是建立在后天的文化基础上还是生物决定的，如果是后天的文化建构了男女

两性的不同，我们就不能定型男女领导的风格，要动态地看待这种优势，既然是后天的文化建构，那么后天的文化改变，仍旧可以重构不同的优势和风格。男女的领导风格有不同，但没有优劣之分，更不能抬高某种风格而贬低某种风格，尤其是贬低女性领导风格。

其次，无论是国内和国外学者的研究，都存在一个问题，即将女领导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忽视了女领导中的差异性。女领导风格有很大的差异性，不能笼统地概括之，否则我们将如何解释那些兼具男性风格的女领导和兼具女性风格的男领导，以及两者兼而有之的领导风格？

二、对妇女参政的理论研究

（一）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解放论述深受自“五四”运动引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影响，并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地吸收和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验以及中国的国情，形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男女平等”的国策，指导妇女解放的道路¹。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其核心思想主要被概括为下面几点：

（1）妇女被压迫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的社会现象。男女不平等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必将被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男女平等所代替。（2）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3）参加社会劳动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人们在社会上和家庭中的地位，归根结底是由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决定的。（4）妇女解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它不仅为生产关系所制约，也为生产力所制约，不仅受物质生产水平的影响，也受精神文明程度的影响。（5）妇女在创造人类文明、推动社会发展中具有伟大作用。同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应该具有同等的人格和尊严，同等的权利和地位，在人类自身再生产中，妇女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尊重妇女、保护妇女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江泽民，1990）²。

“男女平等”国策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具体体现（顾秀莲，2005），它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男女平等”的指导思想自建国之初开始，一直

¹ 全国妇联的副主席顾秀莲在总结中国妇女 50 年的发展历程时，高度概括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发展道路，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争取妇女解放的实践，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全面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组织起来，依靠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与男性携手并肩，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维护自己的具体利益，逐步实现事实上的男女平等。详见顾秀莲（2001）“有中国特色妇女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引自《半个世纪的妇女发展》，当代中国出版社；

² 1990 年 3 月 8 号，在国际三八妇女节的庆祝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发表题目为“全党全社会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讲话，从此这边讲话就成为中国妇女运动今后一个时期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作为一个官方所宣传的意识形态和全民接受的口号，更在 95’ 世妇会上宣称为基本国策。妇女参政则是男女平等思想的一个基本追求和体现，“男女平等”的国策为妇女参政提供了根本的政策依据。

对“男女平等”内涵是伴随着国际社会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解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在不同的时期被赋予不同的内涵。毛泽东时代对男女平等的诠释是“男人能做的女人也能做”，忽视男女性别差异、追求绝对平等；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开始强调“我们都是女人”，强调生理差异，凸现男女不同；90 年代提出“我们都是人”，强调正确看待差异，追求平等，从其发展过程中看到，“男女平等”已从宪法中所规定的“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家庭等各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演变到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力，处于平等的地位；交易的机会平等；人格、价值、尊严的平等；占有资源和机会均等的丰富内涵（全国妇联，2004）。“男女平等”内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也进一步为妇女参政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但为什么制度上规定的男女平等与妇女参政的现实仍存在很大的距离？是执行者执行不力还是政策本身就存在问题？

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男女平等”作为一个中国大陆妇女运动的政治口号，尽管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丰富，但忽视了妇女是不同的，其主体性是多样的、变化的，而且妇女的身份不仅是女性，她和阶级、民族、职业、地域、年龄等交织在一起，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经验，有不同的诉求，因此“男女平等”内涵中没有清晰说明是哪种女性和哪种男性平等？哪种女性追求哪种的平等？“男女平等”暗含着将男性的价值作为模范，在实践中强化了男性的价值和优势，妇女在争取平等的过程中仍然挣扎在不平等的“他者”地位上，没有自己的话语，追求平等也就是拥护男性的话语，为男性增权。如将一个领导的素质定位在刚强、果断、雷厉风行等素质上，如果女性领导的亲和、宽容反而在实际评价中就变成没有主见、优柔寡断等，女性的领导风格和经验被排除或者被贬抑；造成女领导干部在“领导没有性别之分”和“女领导应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等不同的论述中挣扎。在推动妇女参政政策的过程中，出现将参政平等视为比例平等，参政运动变成提升妇女参政比例的运动，忽视了为妇女而参政意识的培养和宣传（王金玲，2001）。

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和论及中国妇女解放道路时都强调，妇女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妇女利益要从属于国家利益。该论述淹没了和忽视妇女自己独立的主体需要，妇女若为自己的利益参政就会被视为是一种狭隘的参政观。95’ 世妇会之后，西方女权主义的性别分析视角引入妇女参政研究，结束了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单一视角研究妇女参政的局面，丰富了分析妇女参政问题的视角。但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仍然是主流的话语，尽管它在解释妇女参政问题时。

（二）西方女权主义对妇女参政的理论解释

西方女权主义和中国的妇女解放道路是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但妇女参政问题在中西方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在政治领域，妇女都是被边缘化和被排斥的，西方各主要派别的女权主义关于妇女参政的分析和实践策略对中国妇女参政运动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1、自由主义女权主义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认为男女不平等的根源是一系列传统习俗和法律使得妇女的潜能得不到发挥，只要给与同等的机会，女性的潜能就能发挥出来（Margaret L Andersen, 2003）。在妇女参政权的问题上，一方面认为应该赋予妇女与男子一样的平等的社会权利，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另一方面，根据国家应尽量少干预个人事务的信念，认为国家的职能就是注意通过增加“平等机会”使竞争公平合理，否认给妇女特殊的保护的必要，也不主张给予妇女以特殊的法律和政策（张迎红，2003）。事实表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淡化性别差异的主张，在实践中没有解决妇女参政问题，那些进入政治领域的妇女，因为性别依然受到种种的排斥和歧视，而这一点自由女权主义的理论无法给予充分的解释。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接受现存的社会制度，在制度内进行改革（Margaret L. Andersen, 2003），提出解决妇女问题的方案并不企图完全推翻现有的体系，而是仅限于改革（Evans, 1995; 周嘉辰，2003），甚至希望女性能够加入现有的体系，将男性已经享有的自由平等原则扩大到女性身上，忽视对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制度性歧视，认同公领域和私领域的划分，一方面鼓励妇女与男性独占的领域竞争，一方面仍然认为家庭是妇女生活的重心，走出家庭的妇女仍然要背负家庭沉重的责任和负担，造成妇女的双重负担。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因为其改革的温和性受到政府的欢迎，成为主流的一种女权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关于“男女平等”的主张以及中国在很长时间内所争取的妇女参政权力的路径似乎和自由女权主义不谋而合。

2、激进女权主义

激进女权主义理论质疑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所提出的主张，认为平等并不意味着等同，为了实践性别正义，反而不能忽视性别差异，应该在性别差异中寻求平等。此学派主张两性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女性具有生殖能力，妇女要解放必须以生物革命作为必要前提。而女人是拥有关怀伦理、宽容和合作特质的一群人，因此可以组成“姐妹联谊（sisterhood）”并且在政治中建立“母爱怜悯”的政治。传统被认为女性爱好和平、有爱心、宽容、利他和和谐与分享等的价值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¹，生物性的差异恰好成为女性价值的来源。激进

¹ 在 Gilligan 的著作《不同的声音》中详细论述了女孩和男孩道德发展的不同，女孩发展出关怀伦理，男孩发展出道德伦理，女孩的性别认同通过同性照顾者之间的连接而建立，男孩的性别认同则通过与母亲的

女权主义没有淡化生理差别，反而力图证明生理能力的社会意涵。

激进女权主义的另一个核心思想是“父权制”。凯特·米利（Kate Millett）在其《性即政治》一书中，用“父权制”这个概念（成为后来女权主义者的一个核心概念）指所有的男性统治制度。父权制是一种最根本、最基础、最普遍的压迫形式（Tong, 1996），认为父权制度加大了男女的差异，并保证了男性的支配角色和妇女的附属角色，让女性受制于“永恒的阴柔”，并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全面被塑造为被动的人（Greer, 1971），通过经济、法律等方式等方式让妇女附属于男人。激进女权主义主张必须发展出“以女性为中心”的价值，取代当前主流的男性价值，即主张用女性的特质化解父权体制，将女性的特质放进政治领域，使政治社群采纳女性价值，建议以女性为中心的政治理论（顾雁翎，2000）。

根据激进女权主义建立女性为中心的政治理论，就必须抛弃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观点，后者尽管赋予了女性公民的资格，但整个公民权的行使仍延续着男性的价值与想象，使得女性在参与政治时，面临沃尔斯通科瑞福特（Wollstonecraft）的困境，即要求平等就意味着必须接受自由主义式的公民观，必须像男人，但又无法抛弃有助于公民权行使的女性特质。激进女权主义认为如果要解决上述的困境，必须在政治领域内加入男性所缺乏的女性特质，赋予女性特质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提高女性在政治领域中的地位。这种以女性经验为核心的政治观，是由爱、亲密、对他人的具体关怀所引导，产生出怜悯的政治，把政治从一个竞争的场所变成相互了解、相互说服、用爱与关怀代替竞争与对抗。

但激进女权主义所要建立的“母性怜悯”政治观忽视了女人的复杂性，太过突出“父权制度”及“性别”作为性别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似乎人的生物性别（biological sex）已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被指为「生物决定论」（biological determinism）。太过强调「生物性别」的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忽视了社会关系与社会不平等的复杂性，除了性别外，阶级、种族、地域、宗教等因素都会构成妇女的弱势处境。如果将男女二分，将所有男性视为「压迫者」，将所有女性视为「受害者」，不断批评男性化特质的缺点，褒扬女性性格的优越性，有时并不能有效地解决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或策略上不利于发展另外一套平等的性别关系（Tong, 1992），反而激发了男女两性的对立，因此她们的政治主张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无法实现。

3、社会主义女权主义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吸收了激进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并在批判他们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所剖析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激进女权主义提出的父权制两者结合起来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并不是哪个优先压迫妇女，而是狼狈为奸、相互勾结起来的一种压迫形式。尤其是 Iris Young Jagger 提出统合系统理论，她们分别

分离来形成。

用性别分工和异化两个概念统合阶级和父权制两个分析方法。

Young 应用性别分工观念解释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认为性别分工是一种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存在的东西，资本主义制度在不同程度上显现和确保了性别分工制度，它规定了谁应该是主要劳动力和次要劳动力。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本身是合二为一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有性别偏见，是一种父权社会，妇女地位边缘化以及作为次级的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特色（Young 1986: 58; 顾雁翎，2002: 216）。Jaggar 则用异化的概念取代阶级分析的概念，认为工作应该是一项人性化的卓越活动，应该自己的身心和生产的结果、自然以及人联结起来，表达和发挥人的创意，但资本主义追求利润和分工，使工作失去人性，使我们和任何人、任何事，包括自己，呈现出残缺的关系。对妇女来说，资本主义社会让妇女的性、母职、养育子女、心智能力等方面与生产活动相分离。就身体来说，女人穿衣服为了取悦男性，身体对自己来说成了客体。对母职来说，女人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生几个孩子，与自己的再生产劳动结果分离；女人的心智分离，因为它无法肯定和讲出自己的想法。

基于上面的主张，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即第一，给妇女**再生产自由**。扩大妇女的选择，给产假、育婴假、加强公共责任及社会参与，使养育小孩真正成为一项工作，使男女都能参加，而不是逼迫妇女放弃或者因此限制参与其他工作或在经济上依赖男人。第二，**去除对男性化/女性化工作区分**。包括解除女性在家外工作的性别区隔。改变女性职业集中在低薪、或者从事服从性、服务性等低技术的行业，去除性别分工、资本主义的剥削。第三，**建立妇女独立的组织和妇女文化**。主张建立独立的妇女组织，其目的是保证单个或者集体的妇女的声音可以被听到。作为社会改革的一部分，主张发展出一套妇女自己看待现实的方法，建立妇女文化。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过分强调经济不平等是两性不平等的根源，忽略了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文化因素；追求的也是男性标准下的平等，从本质上说，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一样，仍没有摆脱父权制思想的束缚。而且过分强调结构性的问题，忽略了结构之下个人的能动性。

自由的、激进的、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尽管都在极力从制度和结构寻找压迫妇女的根源，认为性别分工、父权制以及公私领域的划分等都是造成妇女受压迫的原因。他们提出的政治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妇女的政治参与。但这些理论在对现今男女不平等的现实的解释显得乏力，难道是女性自觉遵守着这样不平等的制度和角色安排吗？参政到底是哪些妇女的需要？她们是否觉得自己需要？

4、后结构女权主义¹

¹ 在后现代理论中，主要有影响的有三派理论：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这三派有区别但也有共同之处。后现代理论主要关心的是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理论，人类学会社会学领域广泛应用，主要指以宏大的叙事理论，倡导差异性和多元性。后结构理论主要将焦点集中在权力对语言、知识和身份的影响。语言是主要斗争的场域，分析那些论述如何形塑我们的权力和需要等等。后殖民主义主要致力于去理解和回应欧洲殖民者留下的遗产，也就是如何重新记忆、质疑殖民的过去的学科，致力于分析殖民的遗产如何形塑了现代的对移民、种族、性别的理解。尽管他们不同，包括上述的来源不同、应用领域的不同，

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突破之前女权主义对结构和女性本质主义分析的局限，着重阐述语言、主体性、社会组织以及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深入阐释了不平等的性别关系是如何透过主流的社会论述及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不断被强化（Weedon, 1994），开启了一个解释和寻找妇女参政问题答案的空间。她们的主要观点认为：

（1）没有固定不变的性别和一样的女人

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1990；转自何培群, 1999）以及克莉斯·维登（Chris Weedon, 1994）对性与性别之间存在的差异的观念提出了挑战，她们认为固定不变的生理性别是不存在的，生物学上的性别也受到文化的约束，生理性别（sex）也是一种社会建构，“性”本身属于一个社会性别化了的范畴。

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深刻剖析了父权制，认为父权制是以生物学上固定不变的“性”做为权力的基础，将女性和男性的本质与功能归诸于一个固定不变的生物身体，而且生物身体独立于社会和文化因素之外，以此解释男性和女性具有不同社会地位和功能的必然性，把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正常化、自然化。也就是说，把“女人”等同于有生殖能力，以本质主义的方式界定了女人，女人基于性而有普遍性。她们对性和性别的颠覆性的解释，也说明了自由主义的、激进的、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从制度上、身体上找寻出路，都无法摆脱女性基于那个固定不变的生物性的特征，也无法摆脱基于性的父权制变相的对妇女的剥夺。

对巴特勒来说，颠覆性与性别的区分，是把身份概念从原因变成结果，也就是说，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身体并不能决定他/她的身份，是后天的论述决定了一个人的身份。巴特勒主张用“性别表演”取代性与性别两分的概念。她认为女人就是一个模仿的过程，通过各种包装——化妆品、服饰、吃饭习惯、与人交谈的姿势等等，不停地将自己装扮成“女人”，所谓“性”差异就是性别表演的结果（张小虹, 1995）。

如果没有了一个固定不变的“性”，性别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那么，“女人”也无法以共同的“性”特质一言以蔽之。无论是生理事实、母亲角色、情感特质、价值取向的具体内涵都随着种族、阶级、族群、地域、年龄等其它因素而改变。因此没有一个一致的“女人”，也不能有一个统一的关于对女人的政治主张。

（2）主体、论述、权力的关系

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最重要的是分析论述、主体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传统的结构分析都论及意识形态，将问题视为被压迫者受到虚假意识的影响而不能摆脱社会结构的影响，将人视为结构的产物，忽视了人在其中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及每个人对身处的社会境况都有自己的主观诠释，忽视了这种诠释会强化现存的社会制度意义，也可能成为挑战

但他们却有着相同的理论背景，即都接受福柯等人的思想。所以很多时候人们都统称他们为后现代。对此的详细讨论见 Agger (1991), *Critical Theory, Poststructuralism, Postmodernism: Their sociological relevanc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1, 17:105-31。以及 Caren Healy (2005), *Social Work Theories in Context*, by PALGAVE MACMILLAN。

现存制度的动力。后结构主义提出的论述分析，目的是透过了解我们如何思考、讨论和描述一个社会情境，从而去发掘我们如何去理解社会关系。透过解构论述背后的逻辑，我们才可以揭示一些迷思的不合理性（陈锦华，2006，p11）。

正如巴特勒所说（Judith Butler, 1990；转自何培群，1999），由于没有了性别的区分，妇女也就没有一个固定存在的、不变的主体，而是在一个不稳定的、矛盾的、在过程中的、在言说中不断地被重新组成的主体。法国女权主义思想家克莉斯蒂瓦认为“主体是形成过程中”的主体。女人想获得在历史文化中的主体身份，首先要使自身从被描述、被界定的状态中挣脱出来，获得语言的权力（Chris Weedon, 1994）。只有透过政治论述，我们才可以体验到自己是如何给放进社会结构里，也只有通过论述我们才能看到不同的人们如何在文化中被建构为主体（Smith, 1998:57）。

主体是由论述制造的，那么谁有权力制造论述？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进一步借用福柯关于权力的论述，解释主体、论述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任何一个主体的再现都是由权力体系所产生，权力通过其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变成标准化和正常化的思想和知识，通过话语来定义何谓正常、何谓反常，通过标准化或者正常化过程来要求人遵从规范，在强大的正常与反常的压力下，人们不仅要服从纪律、遵守规范，自己还制造出驯服的身体。

福柯所说的权力不是传统认为的宏观权力，传统的权力是指被占有的、从一个集中的源头自上而下流动的、是以镇压或者压迫的方式加以实施的，是一件工具。而福柯所说的权力是关系性的，在关系中运作、生产，是自下而上的、分散的（Bazilli；转自李银河，2004），只有被压迫者接受这个游戏规则，权力关系才可以成立。被压迫者甚至认为这种权力关系对他/她有利，并主动建立这个关系。将此引用到分析妇女问题，传统的权力观认为，男人是有权力的，是女人的压迫者。福柯的权力观认为，女人不仅受到男人的压迫，而且也在男女的关系中认同男性压迫的理据并进行自我管制、自我遵从和规范。如女人美容和隆胸，不仅是男人压迫的结果，也是女人自己认同的结果。正如福柯说，权力的压迫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止，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福柯，1999）。

（3）能动性/抗争

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妇女在权力面前并不是束手无策地成为牺牲品，而是在积极地寻找抗争的策略。论述对妇女个人身体和心智的建构和作用，总是在以机构作为基础的较大的权力关系网络里进行的，如法律、社会福利、教育、家庭与工作组织等。论述对妇女个人能产生作用，需要妇女个人认同此种论述，并且和她的利益相符合，她才会对这个论述所支撑的权力关系发挥最大的效应。然而机构本身就是各种论述竞争的场域，如全国妇联要求妇女“四自”的论述与广大妇女希望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利益是一致的，

广告中厨房等商品宣传的与妇女们当贤妻良母的要求也是一致的，因此这些论述都征召了一批妇女积极响应，并按照她们的样子形塑自己。然而“四自”的论述和“贤妻良母”的论述很多时候会产生自相矛盾，这也给很多妇女提供了自主的空间，也让那些主宰这些社会机构和实践的主流论述，总是处于不断被挑战的过程中，论述的这种不稳定性，部分原因是当一种论述提供它所偏好的某一主体形式之时，总是隐含了还有其它主体位置的可能性，因此也给了霸权的论述抵抗和改变的空间。

三、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多视角理论

综上所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和西方女权主义各派理论对妇女参政的解释，都是在其历史脉络下对当下问题的一种解释，各种理论都受到它所在社会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深刻影响和局限，因此我们看到的各种理论只能是解释妇女参政问题的某一种角度，而每一种视角都是对其他视角的补充。

（一）多视角的重要性

Best & Kellner (1991) 认为，一切关于现实的知识都来源于某个特定观察点，一切“事实”都是人们建构起来的解释，一切视角都是有限的，不完全的。因而一个视角就是解释特定现象的一个特定的立足点、聚焦点、一个位置，一个视角就是一个解释社会现象、过程及关系的特定的切入点，单一的视角并不能解释社会现实的全部。不存在可以作为社会理论之基础的真实的、确定的或者绝对有效的视角。每一种理论都要敞开胸襟开放给新的理论和视角，才能避免自己陷入狭隘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立场。鉴于此，Best & Kellner (1991) 提出了多视角理论，认为对一个社会现象进行综合性分析，从各种不同的主体立场来观察实践是很有用的。从不同的主体立场出发，往往能够提供关于社会和文化现象的不同视角，而多样的立场往往能提供较为全面透彻的分析。仅用一种视角就犹如管中窥豹，如果得不到其它理论或者视角的补充，就只能见其一斑 (Best & Kellner, 1991; 转引自张志斌译，2001)。

本研究题目的设定和问题的提出，就是受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影响和启发对中国妇女参政进行的思考。我所提出的三个研究问题中，核心问题是讨论女领导干部的主体性如何被塑造？她们如何看参政，参政对她们究竟有怎样的意义，她们为了什么而参政？能否出现为妇女参政这样的主体性？当我在梳理中国妇女参政的文献、西方女权主义关于妇女参政的各种论述以及在不断找寻答案的过程中，一些能够帮助我理解和分析本研究提出的问题的理论和概念逐渐清晰地浮现出来，这就是批判理论中关于意识形态对人的主体性的塑

造的论述，以及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中关于主体性的论述，这些视角所具有的强力的批判精神和我自己的立场有一种一拍即合的感觉，形成了本研究的理论视角，即借用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并把这两种理论视角有机地整合到意识形态与主体性、规训与主体性、抗争与主体性等三组概念中，希望用这三组互为关联的概念引导我清晰地分析我所提出的问题和收集的资料。二种视角相互补充，将宏观的批判理论和微观的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找到一种有力的理论武器对中国妇女参政问题进行新的解读。

一些学者对于如何将现代批判理论和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理论这两种不同范式下的理论有机结合而不至于出现混乱做了很多的论述（Fook, 1999; Healy, 2005; Laclau & Mouffe, Best & Kellner），我们将在下面给予讨论和说明。

（二）多视角理论

1、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

在第一章的研究缘起中提到，社会性别视角对我开始思考妇女参政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性别视角是女权主义理论的贡献¹。没有性别视角，我不可能提出我的研究问题和我的关心，如果我不立足于该立场，我也不知道的我的研究最后会落到哪里。性别视角让我明白，尽管中国经历了 60 年的男女平等历程，但性别歧视和传统社会性别的观念已经融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黏附在各种论述中，至今存在。

而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对解释妇女参政问题又开辟了新的解释空间和视角。首先，该理论视角把妇女从固定的“性”中解放了出来，揭开了几千年来压迫妇女、边缘化妇女的本质性的东西是一种文化和语言的建构，既然语言可以建构妇女的身份，因此也可以建立新的论述重构妇女新的身份，颠覆传统的论述。中国大陆对参政妇女的论述是基于生物决定的、一种不变的程式，已经假设了一个参政妇女的主体性的真实、客观存在，如她们是弱者，需要保护；她们天生具有关怀的特质，因此将具有关怀特质的领导岗位分配给女性，并多半是副职，一种依从的角色，将一套“男尊女卑”和“男主外、女主内”的固定不变的性别观念和分工模式复制到公领域中。无论在媒体的报道、学者的研究或者官方的论述中，我们都能看到一个定型的、对参政妇女的评价和认识，所谓对参政女性的“淑女症”、“假男症”、“恐夫症”的看法纯粹是基于生物性论述的结果。

其次，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对权力和话语的分析，深刻揭示了政治领域中“男女平等”和父权制两种相互矛盾的话语体系并行，父权制不再表现为一种赤裸裸的压迫妇女的

¹ 社会性别的理论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妇女运动的实践的关注，也就是说社会性别理论主要还是女权和足以理论。引自【澳】马尔科姆·沃斯特，《现代社会学理论》，p265, 华夏出版社，2000年。

制度，而是和男女平等变成看不见摸不着的，隐藏在文化、观念、习俗中的一种“潜规则”和经过包装似乎更合乎“人性”的尝试，变成一种日常生活中女人、女领导做人的行为准则，如因为女性天生具有关怀的特质，因此做副职更适合，既关照了女性的特质，又给予了女性政治位置。不仅男人接受这样的论述，甚至妇女也内化为行为准则，性别制度的目的就是让女性标准正常化，有利于将女性排除在某些领域之外。

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没有一个统一的妇女，妇女和阶级、地域、年龄、族群等联系在一起。所以女人的身体并不保证一定支持哪一种形式的论述，也不保证产生支持女性主义运动或者女性联谊（身体自然也不能成为限制发言的门槛），也就是说，即便妇女处于被歧视的地位和臣属关系并不一定产生压迫和反抗，也不一定和遭受压迫的人们联系起来，而是要在论述中先产生认同，才可能形成反抗（周嘉辰，2003）。也正是因为妇女在不同的机构和话语中，国家对妇女参政的论述不一定都产生同样的效果，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关心参政的“妇女”群体，谁在推动参政？是谁的需要？谁要参政？参政者代表了谁的利益？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妇女的大多数并不关心妇女参政问题。

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为我们开启了从另一个视角解释妇女参政问题的空间，同时为妇女参政运动带来了诸多的困扰，质疑的声音不绝于耳，如“虚无”、“相对主义”等等，就像哈索可（Hartsock）表达的愤怒，“正当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刚刚开始打破我们一直被迫保持的沉默，刚刚开始提出为我们自己命名的权力要求，刚刚开始作为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来行动，正当此时此刻，为什么主体的概念本身却成了问题？正当我们要形成我们自己关于世界的理论之时，世界是否能被理论化这种非确定性却被提了出来。正当我们开始讨论我们所要求的变革之时，进步的理念和系统的、理性地组织人类社会的可能性却变成不确定和值得怀疑了。”（Jaggar；转自李银河，2004）。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这些颠覆性的论述使得妇女运动者在解放的斗争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没有了固定的主体性，也就没有的了统一的政治目标。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视野里，当统一的女性不复存在，那么也就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女性主义理论，没有哪一类女性可以代表所有的女性，那么妇女解放运动到底如何开展呢？史匹瓦克（Spivak）认为，过分强调女人主体性流动、不确定性会对女性主义运动和抵抗殖民运动产生过多负面的影响。

从上述的分析看出，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本身也是一个保守的理论，它把女权主义从颠覆性的社会运动转向内部的看起来是一些精英的活动，批判话语霸权的同时它自己也变成了一种话语霸权（Bryson，2003）。因此，许多女权主义者为此大声疾呼，没有共同的政治立场，也就不能存在任何可辨的女权主义批评。鉴于此，本研究提出结合批判理论的视角来弥补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的局限。

2、批判理论的视角

虽然后结构女权主义给了我分析妇女参政问题的犀利武器，但该理论强局限性却乏力解决中国妇女整体性的被排斥在政治边缘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国家论述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

家，国家的主导论述对中国妇女整体的主体性的形塑起到主要的作用，因此如何弥补后解构主义解释问题的局限，批判理论关于国家和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则提供了一些洞见。

批判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但和马克思主义有所不同，它不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进行批判，而是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

批判理论认为，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经历了从暴力的强行灌输到人们“自由地同意”的过程，从而实现了对人的统治。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最终目的都是要维护和推崇某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也要靠自身运作的“合理性”。统治阶级将自己的道德、智力和信念、价值观等作为普遍性的价值观，通过灌输、教育、改造的过程，内化到人们内心深处和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结果这种意识逐步在人们的心目中变成“常识”，征得人们“自由地同意”，从而实现对人的统治。批判理论认为，统治阶级在把自己的世界观变成为“常识”的同时，也必须满足从属集团的利益和需求（Gramsci, 2000），这样从属集团才可能自由同意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巧妙地将人们建构和设定为一个自由的想象主体，从而使他们受制于主导的文化想象和社会霸权。当人们的自我意识通过其想象的臣服过程而形成后，“主体性”便随之产生了，任何意识形态的实践必然竭尽全力促成个人“自由地”对它臣服，不管个人对意识形态的召唤产生何种特别的反应（陈清侨，1997）。

批判理论清晰地指出了意识形态是通过一定的渠道如国家法律/政策、教育、媒体等渠道，通过灌输、教育和改造的过程来实现的。

批判理论中贯穿着“文化= 意识形成= 操纵性工具”的典型模式。他们认为,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发达工业文明阶段,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对人们的统治,已经转向一种技术性统治,并达到高度“合理”,这种合理性的实质就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直接成为统治阶段的意识形态工具。他们控制了人们的生活,使人变成物欲的追求者,把不属于人的本质的物欲追求强加给人,把人变成“单向度的人”,即被物质欲望奴化和工具化了的人。人们思想的独立性、自觉性及政治对立的权利正逐渐被剥夺了基本批判功能,人成了单向度的,即丧失了否定和批判的精神,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就是个人与现存制度的“一体化”(马尔库塞, 1988)。从部分程度上,批判理论也解释了当今中国改革开放中,当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影响和占据了我国一切领域的时候,正义、公平的社会价值退居其后,关于对待妇女的公正和公平问题提不到议事日程上,将妇女物化和商品化,不正视妇女作为人的价值和贡献,也是在参政领域中惨遭边缘的深刻原因之一。

正因为批判理论注重对现实的批判,唤醒民众的意识,对意识形态的霸权和对人的统治进行了深刻地批评。借助意识形态的分析理论,在本研究中,分析和呈现了中国国家父权的意识形态如何通过法律、政策、教育等等的渠道,灌输和渗透到人们的言行中去。呈现了中国妇女们对国家的意识形态怎样的认同并来确定自己的身份。

批判理论是希望透过对事实或者现实的批判与否定,来唤醒或转变群众的意识,也就是说社会学家对社会的分析、诊断能为群众所取用,以破除他们的假意识,从而唤起群众

自发性的行动来改革社会现状，迈向合理的社会秩序。因此对批判理论来说，对现实的批判、对民众意识的启蒙、以及采取集体行动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批判理论的目标就是改变现状（黄瑞祺，1986）。

（三）两种视角的结合

如何将批判理论和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理论有效整合而不会矛盾和混乱，一些女权主义的一些理论家和社会工作者（Fook, 1999; Healy, 2005; Laclau & Mouffe, Best & Kellner）尝试将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和现代批判理论很好地连接起来。他们对后结构主义理论对一切普遍价值厌弃的说法持批评态度，认为人权、平等、自由和民主这些历史地形成的普遍价值，对于争取解放的斗争来说，乃是非常宝贵的推论武器。即便是人权或者民主自由，都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坚持斗争的结果，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的建构物，如果我们要想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就必须确立某种诸如平等、法制、自由、民主参与普遍的价值。妇女的参政权是占据人口数量一半的妇女应该享有的人权，中国占据人口一半的妇女没有享受应该有的参政权力也是事实，在政治领域对妇女整体的排斥也是事实，如果后结构主义理论中对一些普世的价值观抛掷一边的做法正好是男权势力梦寐以求的事情

（Best & Kellner, 1991; 转引自张志斌译, 2001）。正好回应了很多男性出现的困惑，为什么妇女非得和男人争夺参政的权力，几千年来“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模式不是让那个时候的社会很有秩序吗？现今的妇女解放使得男女都出现了困惑，男不男、女不女（郑也夫，2000）。试想，如果没有对意识形态的质询，没有对公正公平意识的灌输，那么既定的不公平岂非牢不可破？人类的平等何时实现？我相信现在的社会，尤其在政治领域仍旧是男性主导的领域，流行的文化和意识对女性充满了商品化的扭曲，妇女得到的地位和价值认可预期发挥的作用不成正比，我们需要一个性别公正和平等的社会，需要通过抗争、抵抗而取得，但这种抵抗既是对整个意识形态的革命同时也是存在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关系的抗争。

批判理论关注意识形态如何形成霸权透过日常的生活召唤人的主体性，它忽视人在被形塑过程中的能动性，也没有论及个体是如何将意识形态的东西经过怎样的技术内化为个人的认同和理解，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则清晰地展现个体经过怎样的权力技术形塑自身、自我规训的技术和过程。但它又过分注重细致的具体化的技术，反而使个体的形塑过程如何和他人互动以及和意识形态扣联的论述不能凸现出来。因此两者联手，将让我们既看到宏观的意识形态如何霸权地形塑着人们的思想，也能看到这种形塑具体在个人身上时怎样发生的，个体对权力是怎样抵制又怎样复制的。

就中国的国情来说，中国仍是一个父权制和男权中心的社会，性别歧视不仅没有随着60年来男女平等政策减弱，反而在市场经济中以更加恶劣地形式存在，参政的比例不仅没

有随着国家的最低比例制的规定而得到改善，更不及 50 年代的参政局面。我们不能简单地罗列问题，但我们不能熟视无睹社会中严重的性别歧视问题，父权制、性别歧视文化与当今的商品经济相互勾结，在国家的机制运作中持续地起着作用，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控制着人们的思想。我们仍需要长期的时间、需要正义的力量争取妇女在社会中最基本的人权，包括生命权力和参政权力，需要团结更多的妇女，吸收批判理论强烈的关心社会正义和人类解放的主张。

在中国，国家主流论述强烈地左右和形塑着参政妇女的主体性和她们的参政观，如果我们不理睬这些东西，只关注微观权力运作，很可能陷入一些权力技术的关注上面，很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抗争的空间，而忽视了制度性的压迫和改造。但如果我们只关注制度的改革，看不见在日程生活中，权力的微观运作，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看不到政策在具体的微观运作中是透过怎样的技术走样的。两种理论视角相互借鉴对照，一方面批判和改变现今意识形态和制度性对妇女参政的歧视和排斥，一方面关注到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所提醒的，国家霸权的意识形态是如何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不仅自己遵守又在复制的状态，我们了解这一点之后，即能找到改造政策的道路，也能在日常生活的层面进行斗争的改变。

综上所述，将批判理论和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结合正是本研究尝试进行的地方。女权主义视角本身就是对现存社会的一种批判，它和批判理论有着相同的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关心，而女权主义则更强调社会公平和正义中的性别公正公平，一个公平和公正的社会一定不能女性主义的视角，但这并不是唯一的视角，后结构主义提醒我们在谈性别视角的同时，不要忘了同样也不能缺失民族、国家、阶级等等的视角。当我们在谈“妇女”的时候也别忘了妇女中有不同，不要打着解放妇女的旗号而对一些妇女造成压迫。

总的来说，微观理论与政治同宏观理论与政治之间的结合可以提供探索当代社会的最佳框架，有利于实现激进的社会变革，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之特色的微观分析为批判理论过于普遍化和总体化的观点提供了矫正，而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缺乏批判理论对当今社会复杂且矛盾的特征的辩证分析，两者的结合就为我们提供了多场域斗争的视野。

（四）理论框架

1、主体性是一种论述建构的结果

本研究中应用主体性的概念，不是要讨论哲学或者心理学上的主体性，而是希望借助于这样一个概念来谈中国妇女参政现象的主要载体——女领导干部这个主体她们在成长、参政和从政过程中又怎样的主体性。因此对本研究来说，只要简单说明我用谁的概念、为什么用、要达到哪种目的就足够了。在本研究中，我借用台湾学者翁开诚对主体性概念的简单解释以及中国妇女学研究的开创者李小江关于对中国妇女主体意识的解释，将两者结

合起来表达我想要表达的观点。

翁开诚认为主体性 (subjectivity) 可以简单地说是当一个人是自己主人时的人格或心理状态。当一个人是自己的主人时, 他可以在心理上自由、自主, 而“自由、自主”意味着要在人格、心理上“由得了自己”。翁开诚认为, 综合中西方的哲学, 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人的主体性, 不是单独形成的, 而是与群体、外在的社会结构, 甚至与历史、文化的沉积内化有着复杂的关系, 这种沉积也形成了对追求自由的自我的限制 (翁开诚, 2002)。根据翁的建议, 一个人的主体性, 则表现在下面几个层次: 第一, 我感受我自己的存在; 第二, 我知道什么是我想要的自己; 第三, 我可以由得了自己和做自己的主。

中国妇女学研究者李小江认为, 中国妇女的主体意识就是女人争取自我认识、自我实现、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 (李小江, 2006), 这一点和翁开诚对主体性即一个人是自己主人时的人格或心理状态的概念比较一致。

然而上述的概念非常笼统, 以此很难判断谁有或者谁无主体性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有和无主体性, 个体和群体的主体性如何区分? 个体有了当家作主的主体性如何能够转化为群体具有当家作主的群体性?

李小江认为主体性的界定一定要放到界定的历史和当下社会的语境中去, 否则很难有界定的标准。基于此认识, 她认为 49 年之前,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 女人消失在男人主导的家庭中, 没有什么主体性。解放后, 49 年到 70 年代末, 女人又在“男女都一样”、以男人为标准的国家宣传下, 丢失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 也没有主体性; 因此中国妇女主体性产生的标志是 70 年代末初, 那时出现“女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后, 发现自己和“男人不一样”而去争取做女人、争取自己去命名自己而不是总被人命名的局面 (李小江, 2006)。依据李小江对妇女主体性的理解, 她认为妇女主体性只有在 70 年代后才出现, 之前没有。

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认为, 每个人都有主体性, 只是该主体受到个人所在的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 主体拥有怎样的主体性是论述介入的结果, 而不存在一个本真意义上的主体性, 主体性是论述的产物。李小江当把 79 年以后的女人能够找回自己, 发现自己和男人不一样的论述作为主体性产生的标准, 因而就界定了 70 年代之前没有出现妇女的主体性, 或者准确地说, 1949 年之前“妇女在家”和 70 年代之前“妇女在社会”的那些阶段, 没有出现像李小江所界定的那种主体性——自我认识、自我实现、自己当家作主, 而不能说妇女没有主体性。

李小江关于妇女主体性标准的界定其理由是什么? 回答该问题, 就需要搞清楚依据什么标准、站在什么立场上去界定有和没有主体性。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对论述产生主体的分析, 给我们提供了解答题的思路。李小江所说的“妇女在自己、家庭、国家”的每个阶段妇女都有主体性, 只是没有出现她说的“自我认识、自我实现、自己当家作主”的主体性。李小江关于妇女主体性的界定就是她的立场的反应, 也是一种论述的产物。如果我

们不清楚自己站在什么位置和立场上，不借助于批判理论对社会公平和公正的讨论，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没有对人性的关怀，那么我们就无法来分辨哪种论述是一种解放的论述，哪一种是压迫的论述。这一点也正是巴西教育家保罗·弗雷勒(Paulo Freire)在其《受压迫教育学》中的立足点，他在全书的开头首先阐明自己对人性的关怀，基于这样的关怀，他的压迫与反压迫的立论才能成立。有无主体性的界定，界定的人一定要清楚自己立场，知道为什么要进行有无主体性的界定，将要达到何种目的。

基于上述的讨论，把翁开诚和李小江的概念综合起来，加入女性主义的视角就是我对主体性的概念的界定，并将此作为我研究的依据。我认为，女领导干部的主体性的不仅体现在翁开诚、李小江所说的三个层次，即自我认识、自我实现以及实现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的主体意识，同时也要体现出女性主义倡导的女领导干部要为妇女利益而参政的主体意识。

本研究中对主体性的定义，是因为我深受批判理论和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的思想影响，关注整个社会的性别平等问题，关注女领导干部政治权力的保障，希望不仅出现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影响下女领导干部们为人民、为改变自己作为妇女命运的参政主体性，更应该出现女领导干部为了改变性别平等和为了妇女利益而参政的主体性。什么时候女领导干部群体出现为妇女权益的实现和妇女解放的自主参政，而不被国家保护和恩赐，那才是我认为的妇女主体性的出现。

要区分开个人的主体性和群体产生主体性。当某些人出来为妇女争取权益的时候只能说是这些个体主体性的产生，并不说明她们代表的群体有了主体性，即当某些人为女工争取权益的时候，并不代表女工群体有了主体性，同样，某些人代表女领导干部为她们的参政呼吁的时候，并不代表女领导干部群体有了主体性。只有当女领导干部自己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权益的时候，这个群体的主体性才真正体现。

为了进一步理解我所阐述的主体性，我借用Laclau和Mouffe（1985）关于结构位置（structural positions）和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s)概念（Laclau & Mouffe, 1985:11-2）的概念并加以区分¹。结构位置是指由于受制于那些先与个人意志的力量，个人被结构性地置于社会阶层之中，这些社会阶层就是结构位置。结构位置形塑了个人的生活选择，它们把她置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权力关系脉络里，而这个权力关系则形塑了物质资源的分配。而个人只有透过政治论述才能体验到自己如何被放进社会结构里的。她对结构位置里的生活方式的回应，不仅起因于结构位置的形塑，更是因为她经历结构位置的这个主体位置。主体位置是论述和诠释结构位置具有何种意义二来（周嘉辰，2003，

¹Laclau 和 Mouffe 并没有对结构位置给一个详细的定义，而是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什么是结构位置。她们以阶级为例，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并没有拥有生产工具的人将可能成为工人，也就是说，由于受制于那些先与他个人意志的力量，个人被结构性地置于社会阶层之中，这些社会阶层就是结构位置。结构位置形塑了个人的生活选择，它们把她置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权力关系脉络里，而这个权力关系则形塑了物质资源的分配。所以，个人并没有完全的选择，他们经常感到自己总是已经被放置在结构情景之中。详细内容引自周嘉辰，《女人与政治》，p120，台湾扬智出版社。

p120-121)。女领导干部是一个被放置于社会阶层的结构位置，出现女领导干部要为妇女参政的政治论述，才产生了对该结构位置解释的主体位置。女领导干部这个结构位置，并不必然产生为妇女参政和解放的主体位置，只有通过一定的政治论述才可以从结构位置向结构位置转换。不搞清楚两者之间区别，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女领导干部没有为妇女参政的意识和动力。

在中国，妇女参政是一个政党政治论述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历史使命是解放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一部分的妇女随着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得到解放，也随着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而给予一定的政治权力，因此，新中国的妇女被结构性地放置在领导岗位上，她不是独立妇女运动的产物，也不是女权主义论述下的产物。但为妇女而参政的主体性的出现，必然是一个女权主义政治论述介入的产物。换言之，把女领导干部作为一个为妇女争取权益和实现妇女解放的政治范畴，必须与女权主义的政治论述结盟。认为遭受排斥和边缘的女领导干部被想当然认为具有一个为妇女参政的本真利益，如同无产的工人被想当然认为具有参与到建设社会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体系的本真的利益一样，这是想象的景象。实际上工人参与斗争是政治论述介入的结果（Laclau, 1990），因此如果让女领导干部的结构位置转换到参政妇女这个主体位置，必须有赖于一套的政治论述介入。49年至今的各种政治论述（包括马克思主义妇女观），都不足够将女领导干部从一个结构位置转换为主体位置，即出现为妇女参政的主体性。因此只有女领导干部们建立一个对自己结构位置拥有的共同的诠释，而不是具有共同的结构位置，才可以作为政治团结的原则（Smith, 1998），只有这样，女领导干部才能成为具有行动能力的范畴，才能到参政妇女这个政治范畴。

既然主体性是论述建构的结果，那么搞清楚论述是怎样建构主体性的过程很重要。当我们知道论述是怎样建构起一个压迫的主体性时，我们就能找到如何建构反压迫的主体性。在这里，批判理论则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

如前所述，批判理论认为意识形态作为特定阶级或族群的信仰体系、一套霸权论述在塑造人的主体性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49年以后到80年代之前，中国共产党通过一套强的国家论述和一整套的措施，将一个个普通的妇女力推到领导者的岗位上（这一点在本章中国妇女参政运动中详细论述到），当时的政治论述是将妇女作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国家的一部分看待，从来没有将妇女看成是不同的人或者有着独立需要的人，在“男女绝对平等”的论述下，尽量避免谈及女性的特殊性。妇女们面对两千年来被压迫的事实和新中国被解放的事实，从内心接纳和认同该论述，从而变成自己的自觉行动，不但自己努力同时也用该要求去要求所有的妇女。这就是国家意识形态对妇女主体性的形塑和建构。这一点将在第四章中详细论述。

2、主体与规训

意识形态通过法律、政策、教育、媒体对主体的形塑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人们

怎样把宏观的意识形态形塑变成日常的行为习惯自觉遵守，透过身体、语言、姿态和行为表现出来，并去规训别人。批判理论没有作进一步的论述。在这里，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进一步填补了解释的空间。该理论认为，意识形态透过语言形成常识，并将常识变成一些标准化和规范化的东西，规训人们的行为方式，规训和规范化是权力技术的核心，通过对人的肉体、姿势和行为精心操作的权力技术，通过诸如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等来训练个人，制造出只能按照一定规范去行动的驯服的肉体（陈炳辉，2002）。

福柯认为，人们之所以对论述自由同意和臣服，是因为有权力的人把一些论述建构为“真理”和“知识”，人们因此会受到煽动，依据这些知识和“真理”塑造成或构造自己的生活。如把女性生孩子这一生理现象建构为母性是天性的“真理”，把该天性运用到职场中就出现了让女领导干部放置在与照顾有关的岗位。这一“真理”实施的是依靠“权力”，没有权力即便是“真理”也无法实施。所以福柯认为权力和知识是分不开的，各方面制度的出现与成功，依靠的是权力技术，这些权力技术都是社会控制技术，都是“征服的”技术，将人客体化、物化的技术，将人的身体客体化的技术，包括对人的空间的组织与配置，以求最大效率与经济的技术，将某种身份赋予一群人，排除这一群人的技术，把人孤立起来的技术。只要设定一些状况让人根据某些制式“标准”进行评估，只要无法逃脱这些状况，只要可以把人孤立在这些状况中，他们就会变成看管自己的警卫，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一直评估自己的行为，对自己进行监管，把自己铸造成“顺民”。正如福柯的洞见，在自我形塑的过程中，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的一系列程序，它们要求或规定个体需要通过自我监控或者自我形塑的知识体系来确定、保持或者改变身份认同（福柯，1999）。

我们从小学习到“社会分工是基于自然的性别差异实施的”的一种常识，它在维系性别差异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告诉我们什么是自然的并用社会科学、心理科学来证明这个假设，经由教育、媒体等途径内化并通俗化。关怀是妇女的本质，在领导职务分工上给女领导较多与生活相关的职务。认为感性是女性的天性，因此一把手岗位就由理性的男性承担，将女性特性视为“真理”和知识推行的结果，就满足了男性利用这一特性将妇女排斥在权力中的边缘想法。当把意识形态变成常识的时候，常识就变成了大家都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东西，掩盖了统治阶级为自己特定利益服务的真实面貌。

3、主体与多场域的抗争

女权主义拒绝那些把妇女作为父权体制支配下无能为力的受害者和牺牲品的论述，认为妇女并不总是被动地接受某种的规定和规范，面对论述、支配的局面，妇女有能动性，会用自己的方式对此进行抗争。

传统对于抗争的研究多是关于社会运动的研究。社会运动是一种持续性的集体挑战，由一群彼此团结的人民所发动，共同的目的在于改变现状（何明修，2005，p3）。社会运动是一种常态的政治现象，用一套共同目的、团体与持续性集体挑战的组合，可以用来实

现各种主张，并日益成为一种政治生活的基本单位，有利于政治议题的多元化。就长期而言，政治体制总是成功地消解社会运动的冲击，使得他的影响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尤其是威权政体严格限制人民的集会结社，原因在于即使一场非政治的社会运动，也会导致政权的动摇（何明修，2005，p11）。

社会运动都起源于压迫，但不是所有的压迫都会形成社会运动，形成社会运动需要一连串的主、客观条件的配合，才能促成彼此的团结与共同目的的浮现（何明修，2005，p12），事实上，大部分被压迫者都缺乏这些有利条件，他们没有采取公然反抗的形式，只能采取象美国的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斯科特（Scott, 1985）所说的“日常生活抗争”（everyday resistance）。

斯科特（Scott）对底层农民“日常生活抗争”的系列研究已经把抗争从传统意义上理解的正式的（有组织的、集体的、革命的、有结果的），扩展到了那种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无组织的、分散的、没有结果）的抗争。日常生活抗争是一系列因地制宜的弱者的策略，其目的并不是推翻压迫性的体制，而是试着让他们在现有体制下的损失降到最低，以维持他们的生存（Scott 1985:301）。之所以称之为日常的抗争，原因在于这些生存策略是高度依附于生活情境下，被统治者没有逃脱统治情境的可能性，他们被迫要与压迫着直接周旋。换言之，弱者缺乏另一个独立行动的场域，例如工会、公共论坛等，无法公开表达对现有体制的不满。或者说即便有了这些公开的渠道，那些组织也不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

在斯科特看来，日常生活的抗争是一种具有高度戏剧表演性的艺术。斯科特认为农民有的“隐藏文本”就是对统治阶级“公开文本”的一种反抗形式，也是一种权力游戏。

“公开文本”的意思就是“下属和统治者的公开交往”，他们彼此心照不宣地作“不真实的表现”，表面的恭顺合作也许只是掩饰的结果或者反抗的策略。“隐蔽文本”则是衍生性的，它的言论、姿态、或者行为只是因为与“公开文本”相一致、相矛盾或相变化方有意义。即便是现代的民主体制，对权力说真话也是一种奢侈。要想抗争有效和有可能，伪装和欺骗的手法是必要的。

“公开文本”是统治者意欲创造的自我形象，其作用：第一是用比较文明、有风度的方式确认权力的威严和展示权力，独占公共舞台，以此长自己志气灭别人的威风；第二个作用是隐藏，控制了公共舞台之后，把自己装扮成任何模样显示权力的稳定和团结，不公开任何不利于权力稳定的信息，粉饰太平和冠冕堂皇。公开文本的作用无非就是让下属心悦诚服地顺从，即便不是心悦诚服的顺从也比不顺从好。隐蔽文本是一种面具文本、上层和下层都在使用的文本。凡是操纵前台表演的后台操作，都可以说是权势群体的隐藏文本，如内定协议，统一口径等，也包括暗中特权分配、收买分化等。而下层群体的隐藏文本则是反抗策略和记忆的形成和运用的场所。这种反抗不是直接对抗的造反或革命，也不一定具有与官方话语针锋线对的理念，它是自发和随机的（徐贲，2002）。

斯科特 (Scott) 明确反对这样的观点, 即把“日常生活的抗争”看成是无足轻重和毫无结果的游戏、只有正式的 (社会运动) 才构成真正的反抗。他认为“日常生活的抗争”的抗争是“弱者的武器”, 为了支持这种抗争, 他挑战了葛兰西 (Gramsci) 的“文化霸权”的概念, 认为霸权的概念忽略了大多数从属阶级能够在其日常物质经验的基础上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洞察和去神秘化的程度, 混淆“何为不可避免的”与“何为正当的”区别, 忽视了农民社会“隐藏的文本” (hidden transcript), 即底层群体在统治者背后说出的对于权力的批评, 是幕后、台下的恼怒和怨言, 其不仅可以阐明和解释行为, 还有助于建构行为 (郭于华, 2002)。

香港学者潘毅通过对工厂女工的梦魇和尖叫的分析, 提出了不同于斯科特所说的“公开文本”和“隐藏文本”的一种身体发出的抗争。把梦魇、尖叫、晕倒、痛经、自我的内部分裂本身也看成是一种抗争行为, 打破了个体行动 (通常被琐碎化, 并且未被视为社会变革的抗争力量) 与集体行动 (通常被浪漫化为唯一能够真正向现存秩序进行挑战的力量) 之间传统的二元对立 (Scott, 1990), 它们共同构成一幅抗争的图画, 向权利与支配发出挑战 (潘毅, 2007)。女性的身体能够敏感地反映外界环境的变化和所承受的压力。如我研究的对象中枫南的几次痛经, 都是一种对压迫的抗争形式 (详见第六章)。

仅有上述社会运动、日常生活的抗争和身体抗争等抗争形式不能完全囊括中国目前的抗争形式。

李连江和欧博文在《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的论文中, 提出了“依法抗争”的概念。他们认为, “依法抗争”即“以政策为依据的抗争” (policy-based resistance), 是农民积极运用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维护其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侵害的政治活动, 从其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看, 依法抗争兼有政治参与和政治抵抗的特点。就其过程和结果看, 依法抗争有可能通过促进国家法律或中央政策的落实而演变成完全的政治参与, 而且恰好是处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抵抗”和“政治参与”之间的灰色地带, 它在内容上基本属于“政治参与”, 但在形式上则明显地兼有“抵抗”和“参与”的特点 (李连江、欧博文, 1997)。

全国妇联常常提的是“依法维权”的概念, 主要是在国家政策和法律框架下, 通过呼吁、倡导、参与, 监督法律和政策的落实等手段达到维护妇女权力的目的, 但形式比较比较“依法抗争”稍温和, 是一种温和的抗争形式。在中国, 尤其是 49 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 多采用“依法维权”的抗争策略。

综上所述, 抗争的形式从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到“依法抗争”、“依法维权”、日常生活的抗争、身体的抗争, 多种抗争形式并存。正如香港学者潘毅提出的“多场域抗争”的概念, 是对多种抗争形式最好的概括和总结。她同意斯科特 (Scott) 关于抗争理论应该超越个体行动与集体行动、个人抗争与社会抗争、非政治冲突与政治冲突等传统的两分的说法, 提出“多场域的抗争”这一概念或许为实现超越两份呢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从身体的

抗争、日常生活的抗争到“依法抗争”和社会运动之间，是抗争的一系列点与线，构成了“多场域抗争”的图画（潘毅，2007）。

尽管斯科特提出的“日常生活的抗争”概念是对所谓社会运动概念的一种批判和挑战，但这并不是要低估社会运动对意识形态批判的作用，日常生活的抗争可以看成是个体所从事的抗争，他尽管有效，但不足以形成改变压迫的制度，很多推进社会改革和进步的抗争不是通过日常生活的抗争来完成的，把自发的、隐蔽的、即兴的抗争当成最有效的社会变革的说法与历史发展的进程不相符合。需要强调的是应该将隐蔽抗争的“微观政治”和公众社会的“宏观政治”（如民主、人权）结合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斯科特原本提出“隐蔽的文本”是挑战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控制理论，但他的展开却让我们看到结合这两种理论要比分离它们更有助于解释社会弱者的生存处境（徐贲，2002）。

简单地说，在无法采取社会运动的前提下，身体、公开文本/隐藏文本、依法抗争、依法维权等都是一种弱者存活的武器。抗争不见得要推翻压迫体制，但一连串的抗争武器的使用以及无所不在的抵抗也能使压迫者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另一个角度看，日常抵抗也可以被视为社会运动的预演，一旦时机成熟和有利，被压迫者就会利用他们累计的实践知识，从私底下的抗争转化为公然的抗争。

前面所述，个体主体意识如何变成群体的主体意识，必须有政治论述介入。而日常生活的抗争要演变为集体抗争和社会运动，也必须有一个政治认同的过程，认同可以促成一个强大的群体概念，将个人和群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当然认同不是唯一的促成集体行动的前提，需要组织、外部的环境和政治资源等等的条件（何明修，2005）。

小结

本章系统地梳理了自 80 年代以来研究妇女参政的研究文章和报告，同时也梳理了在《领导学》学科中对女领导干部的研究。前面的研究是在妇女解放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指导下的研究，看出自社会性别意识引入研究视野之后，对妇女参政的研究才有了很大的突破。而在领导学的学科研究中，更注重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女领导干部的优势和劣势。在对指导中国妇女参政的理论进行梳理得过程中发现，的确传统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对解释当今的妇女参政问题比较乏力，转而借用西方女权主义参政理论的时候，发现每个理论都由其长处和特点，但也很难对中国的妇女参政进行全面而透彻的分析，并提供解决策略。我尝试用多视角的理论，将女权主义视角和批判理论以及后结构主义结合起来，来进一步分析中国妇女参政问题，找到指导本研究的思想，是本章的最重要目的。综合本章的理论分析框架，我认为人的主体性尽管不是永恒不变的，也不是普遍适用的，

也不是本质存在的，就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地要受制于特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语境，而这种语境就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意识形态透过种种的手段——也就是说，以一整套的文化惯例、话语、信念和仪式为基础，征召人们自由地同意，旨在以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来塑造单个个体和整个社群。因此在某种语境下面所形塑的人的主体性仍旧有相对的稳定性的。意识形态在引导我们以某种方式解释世界的同时，就建构起来我们的主体性，亦即社会身份，它是权力和知识相关联结构的组成部分。单个主体在政治和心理上的社会化，有助于维持一种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和世界观赖于法律/政策、教育、媒体/书面语言、口头语言、视觉艺术、大众传媒、行为规范和礼仪规范（卡洛瓦拉，2006）以及个人透过一些微观的权力技术形塑和规训自身成为意识形态征召的个体，然而这些意识形态赖以生存规范不仅仅是压迫性的，更重要的是生产性的，人们既可以接收、内化、也可以生产和抗争。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概论

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不单是选择用定量或者质性研究方法的问题，而是和研究者对生活的世界、以及生活的知识的不同理解直接有关。研究者所崇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不同，采用的研究方式和方法也不同。在前一章中，阐述了本研究所采用批判理论和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相结合的多视角理论，该理论视角已经决定了本研究所要选择的研究范式以及相应的采用的研究方法，即本研究在批判理论—建构主义范式以及在解释性互动论研究方法指导下开展整个研究过程。

一、研究范式中的理论差别

研究者在从事于研究的过程中，一定带着研究者对该研究世界、人的一套信念而进行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范式。确切地说，范式是指由特有的观察角度、基本假设、概念体系和研究方式构成的，它表示研究者看待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基本方式（袁方，1997：p64）。范式主要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不同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就构成了不同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

本体论关心的是“现实的形式和性质”，以及“能被我们所知的是什么”的问题。比如，在一个“拐卖妇女现象”的研究中，诸如“是否真的存在、并等待我们发现的被称之为妇女素质低导致妇女被拐”这样的问题，就是一个本体论问题。认识论所关心的是“知者（研究人员）与被知者之间关系的性质”问题（Guba and Lincoln, 2000）。认识论问题和本体论问题具有相关性，因此，如果有人相信“妇女素质”是一种真实、独立存在的现象，那么，研究者的立场必然是客观的超脱的，或是价值中立的，以便发现“这些问题是什么？”、“它们如何使得妇女总是被拐？”。方法论关心的是人们发现那些他们认为能被发现的事物的途径。同样地，人们对方法论的选择，受制于人们对本体论与认识论提问的回答。就是说，研究者对方法论的选择不是随意的，而是他/她认为与其本体论与认识论框架相适切的那种方法才是可以被选择的。比如说，如果有人认为妇女素质低是一个真实的现实，而且可以通过客观和价值中立的途径被研究者发现，那么，研究者就必然应用操纵性的方法（可以是量化的，或是质性的），以便对那些容易引起混乱的因素加以控制，因为这些混乱因素将使研究失去效度和可信性（Guba & Lincoln, 2000）。本体论、认识论和方

方法论三者是相互制约和影响的，一个研究者选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一定和它的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研究者所采取的不同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立场，被 Cuba and Lincoln (2000)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分为五类，即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和参与式，并进行了简单的对比分析。我借用下面的一个分类表格，来简单比较五种研究范式的不同（对该表的进一步详细解释和说明请看附件四）：

种类	实证主义	后实证主义	批判理论	建构主义	参与式
本体论	朴素的现实主义——现实真实的，现实，而且可以被了解的。	批判的现实主义，真实的现实是存在的，但只能被不完全地、可能性的得到了解。	历史现实主义，——真实的现实是由社会、政治、文化、经济、伦理、性别等价值观念塑造而成，实在时间在结晶化而成的。	相对主义——现实具有地方性的特点，是具体地被建构出来的。	参与的现实——被主体和客体带着他们的思维和既定的宇宙观共同创造的现实
认识论	二元论/客观主义，研究结果是真实的。	修正的二元论/客观主义的认识论；批判的传统/研究群体；研究结果可能的真实。	交往的/主观的认识论。研究结果受到价值观念的过滤。	交往的/主观的认识论；研究结果创造出来的。	批判的主体性，在参与中与处理宇宙观；延伸的经验、陈述的和实践的认识论。研究结果是合作中创造的结果。
方法论	实验的/操作的方法论；对假设进行证实，主要用定量研究方法	修正过的实验主义/操纵的方法论；批判的多元论；对假设进行证伪；可以使用质性研究方法	对话的/辩证的	诠释的/辩证的	在合作行动研究中的政治参与，将实践置于重要的位置，语言的应用应扎根于一个共享经验的脉络中。

（资料来源：Cuba and Lincoln, 2000:p168）

以上五种范式可分为实证主义和另类范式两种，另类范式包括了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和参与式四种。

实证主义的本体论，是一种朴素的现实主义，相信现实是“真实的”而且是可以被理解。在知识论上，它持二元的/客观主义的知识论，认为主体和客体世界可以分开，关心证明或证伪现有的理论。在方法上，它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看成是社会科学研究典范，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是科学的、客观的，使用实验、观察、检验等方法对客观事物或现象进行研究，必然能保证所获得的知识是真实可靠的，其判断知识真假的标准是客观事实与逻辑法则。因此，实证研究的过程必然是操纵性的，通常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假设进行验证，采用中立的研究语言和标准化的资料收集程序。**避免反应 (reactivity)**，强调研究者（观察者）和研究参与者（被观察者）保持一种距离，这样可以不影响研究参与者的态度和立场。要站在世界的一边，面对一个“真实的世界” (reality)；强调**重复性 (relicable)**，即研究的工具在不同的情境和脉络是可以被重复使用的；强调**代表性 (representative)**，研究的代表性，相信通过研究可以归纳出普遍规则。

另类范式的主张者 Burawoy (1998) 对实证主义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研究者无法在调查中保持客观性，研究者在调查过程中必然带着性别、年龄、文化等自身因素的影响，这种身份必然对研究参与者带来的影响，如研究者的一个眼神、语气就可能改变研究参与者的态度。即便访谈的程序是标准化的，但研究参与者却不能标准化，他们不可避免地带着自己对问题的诠释和理解进行回答，所以研究者不可能得出标准化的答案，即便对同一个人进行重复的调查都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达到重复需要外界的条件稳定不变，但这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既然重复性的条件不存在，那么代表性也根本不可能实现 (Burawoy, 1998)。Burawoy 的批判正是我摒弃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而选用批判理论-建构主义范式的理由。

由于本研究不是要着力论述五种研究范式的不同，因此我会聚焦于我要选用的范式的讨论上，下面的讨论进一步说明我为什么摒弃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转而选择批判和建构的范式。

二、女性主义视角的批判理论—建构主义范式

在第二章中，阐述了将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视角相接合的多视角理论作为本研究的主要理论框架，与此研究视角相对应的是批判理论/建构主义的研究范式。尽管关于女性主义的认识论也有很大的争论，Guba and Lincoln (2000) 把女性主义也视为批判理论阵营中的一个分支，它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上所主张的核心思想和批判理论、建构主

义有极大的相似之处，被视为批判理论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个重要“伙伴”，只不过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焦点集中在知识和性别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关注性别文化，以社会性别为立足点（吴小英，2003）。

（一）女性主义视角的批判理论、建构理论范式的主张

批判理论和女性主义的本体论立场是历史的现实主义。对他们来说，现实是可知的，却受到诸如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的和种族、性别等因素的综合的形塑，从而形成那些我们视为自然和不变的东西——“真实的现实”（Guba & Lincoln, 1994）。对女性主义而言，社会中仍旧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性别观念，是在长期的社会中逐渐形成并沉淀下来的东西，至今成为人们理所当然、自然的一种科学常识，而这种常识形塑了人们的性别观念。从认识论角度看，研究者和研究参与者必然受到当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批判理论和女性主义者注重“知者”和“被知者”之间交往性的、主体性的关系，也就是说，研究得到的东西必然受到特定的研究者与特定的研究参与者或研究群体之间发生的互动的的影响，前者的价值观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后者，没有一个研究是价值中立的研究，研究者必然在研究过程中有自己的价值介入。从方法上来说，研究者与研究参与者之间的对话是不可缺少的，目的在于改变那种无知和误解的局面。即通过研究者和研究参与者之间的对话，改变研究参与者先前所具有的那种只是简单地接受其地位不可改变的意识，这种不可改变的意识，其实只是在历史中形成的结构而已。通过对话产生对自己不能改变的地位的批判意识，研究参与者了解到自己的地位有可能得到改变，并且能够理解影响这种改变所需的行动是什么（Guba & Lincoln, 1994; Giroux, 1988; Kincheloe & McLaren, 1994; Olesen, 1994）。

在本体论上，建构主义持相对主义的主张。在他们看来，所谓的“事实”是多元的，因历史、地域、情景、个人经验不同而不同，用这种方式建构出来的“事实”没有绝对的“真实”，而是在不同的建构下出现的不同“真实”。除了本体论上的差别之外，建构主义者在认识论上采取了与批判理论/女性主义者极为相似的立场。对他们来说，研究者与研究参与者之间是一个互为主体的关系，研究结果是由不同主体通过互动而达成的共识。研究者和研究的对象/主体是互动地联系着的，而所谓的“发现”，其实是在研究过程中的创作。与此认识论立场密切相关的，是建构主义的方法论问题。建构论者认为，只有通过研究者和研究参与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个人的建构才能得出，在理解不同的建构时，要使用解释性的技巧，去理解和解释人们对现实的建构。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具体研究方法选取上具体深入地讨论。

Kuhn 认为，研究范式有其优点和缺点，优点在于研究者一旦接受了某一套范式，就不

必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探索一些研究原则，而专注于对一些具体现象的观察和研究。缺点在于一旦接受了某种范式，研究就陷入该研究范式的框框里，范式便成为某种束缚（Kuhn, 1970:p10-11）。Kuhn 的提醒，让我清晰意识到每种范式对研究带来的限制。现今，研究范式也处在相互之间不断吸纳、交叉的过程中（韩晓燕，2004），因此，正如本研究采用多视角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在研究范式上，本研究也采用一种批判理论/女性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之间的“部分联姻”的范式。

（二）本研究的立场

在本体论上，本研究选择用批判理论/女性主义的立场，并修正性地接受建构主义的立场，是因为我同意批判理论的主张：现实是客观存在的，却被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性别所形塑（陈向明，2000）。社会现象是由文化意义和价值构成的，个人是透过文化意义下的社会化而建立起来对自己的认识 and 了解，这些认识 and 了解又反过来影响甚至构成了文化的意义（阮新邦，1999）。我也认同女性主义的观点：现实不仅被政治、经济、文化所形塑，而构成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是由男性主导的主张，这种父权文化持续地存在于历史中并具体化到一系列的制度中，构成了对妇女经验的排斥和边缘化。依据此观点，我相信本研究中女领导干部的生命历史被其所在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伦理以及性别所形塑，因着个体所处的环境不同，每个人都建构了一个不同的社会生活环境以及个人参政与从政的历史。本研究从她们不同的生命故事中了解形塑她们生命的那些文化意义和价值，也了解政治、经济、以及性别文化是怎样形塑了她们的生命，了解女领导干部们如何看待参政和建构她们从政生活的。最终，我关心是如何改变政治领域中的不平等的性别关系，这种不平等如何让女领导干部在权力结构中被边缘和排斥。我修正建构主义的本体论上所持有的认为不存在一个不变的客观现实的相对主义的立场，因为在一个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性别歧视，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和各种制度粘合在一起，长期地以不同形式存在着，并持续地发挥着歧视和排斥的作用，将女性定型在权力的边缘，这种长期的客观存在修正了建构主义的相对主义。

从认识论角度看，我完全同意批判理论、建构主义理论范式的观点，知识建构和认知的过程并不是客观的、无偏见的、非政治的过程，而是研究者和研究参与者之间交往、互动和理解的过程，学术也是一种特别意识形态的表达，研究发现一定是有研究者的价值作为中介的发现。事实也是如此，从我提出问题开始，到文献分析中找到研究视角并把这种视角带进研究、到用自己几十年与女领导干部们在一起的生命体验在书写，这些足以说明我的价值已深深地介入在其中。因此，研究的发现及其意义，不是价值无涉的，甚至是一种创作。

在方法论上，我部分地同意批判理论/女性主义理论所持的立场。我相信任何的研究过程不仅是对话的，也是解释性的过程，也必然是一个研究者价值介入的过程。然而，在本研究中，我并不认为采用“辩证”的对话研究模式是恰当的，因为这种模式假设，研究必定是“意识提升”（consciousness raising）的过程和平台。但在本研究中，面对官位很高的女领导干部，我作为一个教师身份的研究者，能和她们建立平等的对话关系已属不易，更遑论“意识提升”。在研究过程中，我与研究参与者的交往受到研究参与者身份以及时间的限制，我要优先考虑的，是那些能推动或有助于“理解”的活动，而不是去做“教育”工作，以便落实意识的提升。除非我和研究参与者之间有深刻的信任关系、或者有机会多次访谈，才可能产生意识提升的空间和可能性，而在本研究中，我与研究参与者建立信任关系和得到多次的访谈的机会比较困难，又怎么能把一个大学老师的身份转化为一个“教育者”的角色去提升她们的意识？本研究背后的动机，就是通过批判性地审视，确定那些影响妇女参政的种种力量，进而达到改变的目的。

三、解释性互动论¹的研究方法

基于本研究中采用女性主义视角的批判理论-建构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我选择用 Denzin 提出的“解释性互动论”（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作为本研究具体研究方法的指导。解释性互动论方法主要是对个人经历叙事的倾听与理解（Lincoln & Guba, 2000）。解释性就是对某种意义进行解释，或赋予意义。解释者就是向别人解释或者翻译意义的人，在本研究中指研究者。互动论则是指研究中研究者和研究参与者之间来回沟通相互影响的一种活动。解释性互动论即研究者从一定的观点出发，赋予所解释的现象/问题重重的交往行动以意义。解释性互动论者的主要意图就是解释者/研究者将普通人的问题、种种的生活经历展现在读者面前，去解释生活世界的种种意义与表象（Denzin, 2004: p15）。解释性互动论研究方法是与传统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有很大不同，它是建立在研究、表达和解释人类的主体感受（经验）之上的。它不是因果关系的研究，而是透过对活生生的经验的理解来确定导致结果的原因、路径、关系以及条件（Denzin, 2004: p49-50）。正如 Denzin 所说，

“我们想去搜寻人们的日常生活故事，倾听她们的喜怒哀乐，体会她们的成功，理解他们曾经有过的创伤、恐惧、焦虑、梦想与希望。我们想让更多的

¹ 台湾学者张君枚将此翻译为“解释性互动论”，参见台湾弘智文化出版，1999年。而大陆学者周勇则翻译为“解释互动论”，而我认为台湾学者张君枚的翻译比较准确，则用该翻译名称。

人知道这些平凡却意义丰富的故事。无疑，这是一项永无止境的解释计划，而我们所要面临的挑战也很清楚，这就是描述那些身不由己、没有选择的人们是如何度过各自的人生历程的，并将这些历程‘表演’出来。”（Denzin, 转引自周勇，2004：p7）

解释性互动论的研究方法和女性主义、叙事分析等各种的方法是相互通用的，且内在的逻辑是一致的，总括对解释性互动论的研究方法的理解和对女性主义方法论的理解，本研究强调：

（一）重视研究者的经验介入以及反思性

实证主义的研究认为，如果研究中加入了自己的价值和经验就会失去研究的科学性和可信性。然而在批判理论-建构主义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再也找不到一个“上帝的眼光”，能够保证某种方法绝对的不容置疑。相反，研究者的生活史和处境均深嵌于他们所研究的社会进程中，研究者所探讨的共同话题或者个人困境恰恰就是由这些情境中的实践构成。无论何种研究，它所反映的都是研究者本人的立场，也就是说任何观察都事先预设了某种理论，绝对不存在理论或价值中立的知识（Denzin, 2004：p5）。我们研究的世界是一个被身处其中的人诠释的世界，而我们的研究是一个关于他们和我们的世界“交会”

（betweenness）。这种新的研究取向，须将研究者自身整合进入研究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反省所处位置如何影响我们提出的问题意义、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书写。女性主义的研究方法的重点就在于“从女人的立场出发探索日常世界”（Smith, 1987；转引自吴小英，2003），强调“必须将之视为起点，并键入方法论和理论策略的一环”，将我们亲身的日常经验变成我们知识的基石（Smith 1990:22）。

从选题开始到研究结束，我一直带着自己对研究问题的理解、关怀和价值，这是活生生的事实，无法假装和撒谎说我在研究中保持着一个客观和中立的立场。正如第一章所描述的，我对妇女参政的关心和对女领导干部的研究兴趣来自于我个人与她们从80年代末至今一起生活和工作的经历，以及我个人作为一个女性感受到的性别歧视和排斥，我亲历和感受到我的母亲作为一名与新中国同步的女领导干部在家内家外的挣扎，十几年里我到处给女领导干部讲授《领导学》的课程而不断听到她们酸甜苦辣的故事的经历，我去挂职锻炼的时候与我的主要研究参与者朝夕相伴、同吃同住同工作的经历并建立长达十几年的友谊等等，这些经历和经验都构成我理解她们生活和诠释她们生活的一部分，缺少我的经历和经历就很难对她们有深入的访谈和同理。我的研究参与者的生命世界和我的生活经历、世界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我认为“唯有从自身的经验开始，我们才能理解他人”

(Jackson, 1989:17)。

从我的经验和兴趣出发的研究，强调的是“我的经验与他者的经验的结合，而不是如何使我们分离”。这不仅是对一个研究参与者的研究，同时也是关于我如何将我的假设、我的背景、信念、态度和价值带入研究场域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我的经验不仅能增进对现象本身的了解和理解，更有机会检视自身。需要警惕的是，我带进自己经验的同时，要保持对自己经验的反思性，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除了和资料辩证地对话、进行分析外，在研究过程中和部分研究参与者对收集的资料做进一步的磋商，与一些相关的人之间对话，以及与书写出的故事和观念不断对话，来保持对自己经验的反思性。如果在研究中，研究者不首先澄清自己的理解与价值，那么之后因解释可能产生的影响就无从谈起，而且更可能会遭受到人们的误解。

（二）重视研究参与者经验

女性主义视角的研究，强调研究从个人（无论是研究者或研究参与者）的经验出发，以及个人经验在知识构成中的价值，认为女性本身就是边缘群体中的一部分，可以从边缘者的立场出发，向外辐射到社会权力和统治中心。研究的目标就是通过日常世界活生生的个体经验来揭示组织现有统治秩序的社会关系，提供了一种从“个人的”走向“政治的”理解制度因素对个体生活影响的方式（Smith, 1986；转引自吴小英，2003）。因此研究的过程和所产出的知识是研究者和研究参与者一起参与并建构的过程。

女性的经验带有一定的共同性。本研究的资料主要以9名女领导干部们的生命故事为主，尽管故事和经验是有差别的，是一种特殊的经验（Jacka, 2006:p15），也不是一种客观的本质存在，但女性经验中确实存在着共同性。意识形态所形成的一定的女性经验，是女权主义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首先，无论妇女所在的种族、阶级、国家、宗教等社会境遇的差异如何，作为女性的性别身份是相同的。女性经验的共同性建立在女性生命过程和生存方式的大体一致性上，绝大多数的女性都会经历行经、结婚、生育、作妻子、母亲、祖母（外祖母）的经历，尽管这些经历到每一个妇女身上的感受或经验千差万别，但女人生命经验的形式共同性无疑会使女人和女人之间更容易沟通和理解。其次，性别压迫、性别歧视是一种可以共识的压迫形式。尽管压迫形式也因着种族、阶级、国家、文化的不同而不同，但这些不同境遇下的妇女都能感受到歧视和压迫，因此性别歧视和压迫是可以和其它形式的压迫分离而加以独立分析的。女性经验所具有的共同性，在于女性经验是建立在女性主体意识基础之上的一种生命体验、生活经历和心灵感受，这些共同性使得女权主义批判成为可能（张广利，2003）。具体到中国妇女参政率低的问题，在世界各地也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女领导干部的经验一方面成为我理解她们生活经历的基础，同时

也成为重新建构她们经验可能性的源泉。

从经验出发，抽丝剥茧地呈现社会结构以及结构对个人和群体的影响。通过故事叙述者自身的叙述活动，故事叙述者可以清晰地呈现解释、磋商、操纵、融入和抵抗那些影响其生活的真理及权力关系（Jacka, 2006:p16）。如果我们要清晰地看到个人故事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性别问题，以及她们在性别歧视文化中的挣扎、困难和能动性，就必须从当事人细微的日常生活经验出发，抽丝剥茧地呈现个人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如我的研究如果不是从女领导干部故事的经验出发，就无法产生第五章以及第六章主题中那些揭示参政中的“种种游戏规则”和充满灵性的“日常生活的抗争”的内容，那是生命的体验和经历，它们绝不会从定量的研究的大量数据中呈现出来。

在当事人呈现故事和经验的同时，研究者也有机会检视自己或者逼迫检视、反思一些先入为主的立场或者偏见，挑战研究者权威的角色。

（三）重视研究者和研究参与者之间的关系

女性主义研究强调平等、互惠的研究关系，这是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原则。互惠表现为最小限度和最大限度的互惠，最小限度的互惠是指研究者与研究参与者一起分析收集到的资料，最大限度互惠是一起建构理论（Lather, 1991）。对我的研究来说，我无法做到最大限度的互惠，却能保证最小限度的互惠。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做到让她们参与访谈大纲的修订工作，和她们一起讨论收集来的故事，和个别的领导一起讨论我的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并听取她们的意见。我知道，研究结果与她们分享带有极大的挑战性，但我清醒地意识到，本研究是为了寻找妇女参政的道路，而不是仅仅为了一个研究和一个博士学位。因此，只要对此目标有利，我愿意将研究结果和当事人讨论和分享。

由于本研究中研究对象参与者的身份比较特别，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即便做到最小限度的互惠也有一定的难度，这个难度在于如何和这些权贵的领导建立信任的研究关系。本研究中的研究参与者，她们深受官场上的官僚风气的影响，如为了收集资料开设的两个焦点小组中的女领导们，以及两个个别的研究参与者对待我的态度犹如对待下属。我们的关系不是书本的理论中所说的研究者居高临下，而是研究参与者居高临下，在某种程度上是很讨好地、甚至恳求她们接受访谈。她们常常接受各种的采访，司空见惯，带着走过场的心态。每一次访谈，我几乎都要用大量口舌说明我为什么关心这个话题，讲我十几年来来的关心，讲我听到的很多故事，告诉她们我的研究目的，从虚心请教的角度出发，带着真诚的态度。谈话到热烈和深入，她们才能放下高傲的、教育的态度转而开始进行探讨问题似的对话。研究资料分析阶段，我通过各种渠道再次寻找她们，希望就一些话题再询问

她们的想法和意见，但基本上以各种理由拒绝，或者敷衍。我分析原因，一方面是我没有建立信任的关系，另一方面她们都是在职领导干部，说话非常谨慎。

四、 研究过程和方法

解释互动论的研究方法分为六个基本的步骤：一是确定研究的主题。二是对现象前在的观念进行结构及批判性分析。三是把握现象，包括在自然世界中把握现象发生的地点和场景，获得现象多重的事例。四是现象的化约，从现象中提取基本元素，并对现象进行提炼，使之脱离原来的自然世界。五是现象的建构，在把握基本元素、片断及结构之后，把它们重新建构为现象。六是现象的深化，将现象重新置于真实自然的社会世界里。

每个研究方法中都离不开文献分析、收集资料、资料分析和论文撰写等几个基本的步骤，但不同研究范式和不同研究方法在这些基本的步骤处理上却不一样。本研究经过了下面的研究过程和方法，我将解释互动论具体研究步骤和研究阶段对应，制作出以下表格：

解释性交往行动研究步骤	对应的研究阶段
确定研究主题	确定研究主题
解构关于现象的前在观念	文献分析
把握现象	收集资料
现象的化约	分析资料
现象建构	发展主题
现象深入	解释

（一）确定研究主题

研究什么问题，取决于两个方面，研究者和研究参与者。正如 Denzin 所说，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研究者常常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作为探究的主题。如第一章中所谈到的，本研究主题的确定，和我个人的工作、生活经历为出发点的，即我从 1990 年上《领导学》的课程开始迄今为止、在不断听女领导干部丰富的故事中建立和不断丰富的，如我参与全国政协会议服务的工作的时候，接触和听到各种各样关于女领导干部的故事，我也关注新闻、小说中的女领导干部的故事。这些故事给我冲击、让我思考她们作为妇女中的佼佼者、有权力的人，为什么她们有那么多从政过程中的辛酸苦辣？为什么她们所说的问题和我的母亲以及我的挣扎有这么多的相似之处？为什么男女平等了她们却有那么多难言之苦？当我与其中的讲故事的人建立了深厚的姐妹情谊（日后成为我研究参与者的淑华、凤楠、李华）

的时候，当我通过听故事也接触到别人嘴里传奇般地人物（如秋菊）的故事之后，我个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把她们的故事写出来的愿望。1999年当我开始接受社会性别意识培训以及开始去培训别人的时候，我似乎找到了这些年来解释我的困惑和理解她们酸楚的钥匙。正是这些故事以及我所关注的这些人群带我走进该研究，形成了本研究的主题：“政治理想和现实冲突——女领导干部生活故事的研究”。而该研究主题的最终确立和形成是在我开始进入正式研究后，通过文献分析，通过我和我的研究参与者的对话（试访谈）过程中逐步清晰和明确的。

（二）解构关于现象的前在观念——文献分析

所谓“解构关于现象的前在观念”是指对已有的研究和理论文献作批判性的梳理，展现有哪些学者研究过本研究即将探索的现象，他们对该现象作了何种表述与分析。通过此工作了解之前对该现象的研究的基本主张，以及之前的研究是通过什么方式得来的，并对前人的研究以及对该现象的研究的理论进行批判性的解释（Denzin, 2004: p79）。在本研究中，我做了以下的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梳理和讨论。

我首先梳理了49年至今的各种对妇女参政的研究。在文献回顾中，我一方面通过历史性地回顾，对中国共产党60年来针对中国妇女的政策尤其是关于推进参政的主张有了深刻的了解，对中国妇女解放60年的历史有了整体性的把握。在文献中呈现了国家、媒体是如何建构一个新中国妇女的形象、如何建构了女领导干部们的参政观。通过文献分析总结出以往研究中的局限和不足。指出了理所当然地将妇女参政的定义为参政的妇女，却忽视两者之间不必然有关系、没有为妇女参政的政治论述出现；将妇女参政比例的提升与否的宝押在国家政策的调整和改革上，却忽视了对影响妇女参政多方面原因的深刻分析；将问题归因为妇女自身的素质；以及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解释妇女参政问题上的乏力；在定量方法下产生的研究很难听到参政的主体——女领导干部们自己怎么看参政；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和男女平等国策和西方女权主义关于妇女参政的理论的对话的过程中，我逐渐清晰了自己的理论分析视角，即本研究站在女性主义关怀的立场上借用批判理论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力和力主社会改革的主张，同时也借用后结构主义在权力的微观层面如何规训和复制着对女领导干部的性别歧视、在被形塑和规训的过程中，女领导干部们的抗争是如何展开的视角，来指导和分析我的研究。也通过文献分析认定了我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去从女领导干部的生命故事中开启另一扇解释妇女参政的路径。

第二，官方的文件、报纸、杂志。在众多官方的文件和报刊杂志上，对女领导干部有众多的论述，这些论述建构了大众对女领导干部的身份认同，也影响女领导干部对自己的身份认同。透过文献分析，可以看到谁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关心妇女参政和女领导干部？

宣传妇女参政到底为了什么？是否真的关心妇女的解放？宣传的结果到底谁真正受益？

官方的文件资料主要来源于官方报告，主要有三类，一类是中共中央关于妇女参政的重要政策和决议，一类是妇联联合中央组织部下发的关于选拔女领导干部的文件；一类是全国妇联一些关于选拔培养女领导干部的文件。媒体方面主要有对建国五十年来媒体的一些对女领导干部的报告进行分析；主要报刊杂志有：《人民日报》、《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中国妇运》。《人民日报》是党的喉舌报，它基本上代表着中央的看法和意见。其它三种报刊杂志是全国妇联的喉舌报刊，一个时期重要的指导妇女参政的政策、文件、主导性言论基本上会从这三家媒体中反映出来。

第三，关于女领导干部的专门书籍、电视和广告等，也是我重要的资料来源。如《女市长》（中国妇女出版社，1999）、《女检察官成才之路》（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走进市长》（上海书局，2004），《赖斯》（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以及电视剧《绝对权力》中被斯琴高娃演绎得淋漓尽致的腐败女市长，电视商业片《现代女领导的穿着打扮》等，尽管这些不是我的正式的研究文献，却丰富了我的研究资料和我的视野。

第四，一边梳理一边进行批判性解释，呈现出各种研究对解释本研究中的问题的相关、借鉴、不足，从而对形成我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

（三）把握现象——资料收集

把握现象是指在真实自然的社会世界中定位自己所要研究的现象，并对研究现象展开探索，包括收集与现象相关的多种案例和个人经历故事（Denzin, 2004: p81）。

第二个阶段文献回顾之后，不仅确立了我的研究问题，也出现了分析本研究的理论视角。在研究视角的指引下，围绕研究问题，制定出了本研究的访谈大纲。但在实际的访谈过程中，访谈大纲仅仅起到一个指引和提醒的作用，访谈并没有严格按照访谈大纲进行。因为我熟悉她们的生活，多年来和她们打交道，我很轻松地进入深度访谈，访谈变成了交流、对话和讨论问题，收集的资料丰富、有深度和内涵。

确定了研究目标和问题，也确定了我选择什么样的研究参与者才能符合我的研究目标。我选择经历了中国共产党 60 多年历史的厅级以上的女领导干部为研究对象，从她们身上可以展现从 49 年成为新中国妇女到女领导干部的历程，展现各个时期党的政策是如何影响着她们的主体性和参政观。熟人策略是我选取研究参与者的重要策略，因为我的研究参与者都是当下从政并有一定职位的人，参政话题本身就具有政治敏感性，没有一定的信任关系很难收集到深入的资料。

本研究的资料收集除了上面的文献资料收集之外，主要用生命故事、半结构性访谈、焦点小组等方法等来收集。

（1）生命故事

生命故事是一些发生在个人身上的事情，它覆盖了一个人从出生到现在或者以前和将来的整个时间，包括重要的事件、经历、情感（Atkinson, 1998）。选择用生命故事的方法与我的研究目标和提出的研究问题紧密相关。我所提出的研究问题是从女领导干部的生命故事中去考察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如何形塑了女领导干部的参政观以及这些形塑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运作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生命故事中去寻找。正如米尔斯（Mills）所说，任何一个社会研究，如果不将研究带到传记、历史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的过程中，都将不是一个完全的知识的旅行。米尔斯强调，人究其根本是社会和历史中的行动者，必须通过他与社会和历史结构的密切的、错综复杂的联系来理解他（米尔斯，p170）。（Mills, 1970:12）。使用生命故事的方法，不仅可以看到个人生命与社会、历史的关联，社会在如何型塑个人，更重要的是透过个人的生活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会所建构出来的常识是如何作用在一个人的身上。说明个人的意识起源于存在的文化意义和他们的经验以及这些意识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更能突出一个复杂的话语和实践在一个人的发展活动中复杂的存在（Henry D. Delcore, 2004）。

活生生的生命故事也是对之前文献研究中所建立起来的框架的挑战和解构，可以印证或者颠覆、甚至重新认识种种先前对女领导干部的认识和对妇女参政的理解。

生命故事的方法主要用在我熟悉和已经建立了深度关系的女领导干部中。当她们展开生命故事叙述的时候，我完全尊重她们的叙述，很少打断。

下面着重介绍的几位女领导，是和我建立了比较好和比较长久的关系的几位重要研究参与者，她们的详细资料将以附件的形式放在后面。

第一位，淑华，是我1990年到基层挂职锻炼的时候的领导，从那时起我们就已经有了长达20年的友谊。当时我吃住在她家，她的丈夫在部队工作，很少回家，即便回家也短暂停留，无意中给我创造了很多与淑华同吃、同住、聊天的时间。她走到哪里就带我到哪里，一路上我听了她很多很多的故事、事迹，让我动念研究女领导干部生命故事，就和这段与淑华的经历直接相关。当我博士资格考试通过后，我第一个采访的就是她。过了将近十几年后，我又在她家住了一个星期，那个时候正赶上她休病假，严重的关节炎走不了路，也给了一个让我白天、晚上都有整块的时间和她聊天的机会，非常难得。90分钟的录音带录了十几盘。这里包括和她的丈夫（我称之为大哥）的谈话，以及和她的儿子、妹妹等，从他们的角度怎样看淑华，有些资料尽管在这次的研究中没有用到，但对我理解一个立体的淑华很有帮助。我答应淑华的家人将故事整理出来交给她的家人。

第二位，秋菊，她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从别人讲述她的传奇般的经历中，我对她产生了好奇，并通过当地省妇联组织部部长——一个掌握着全省妇女干部情况的部门的领导的引荐下，我们认识。秋菊接受我的访问，主要是基于对引荐我认识她的那位部长老大姐的尊敬，她从政中遇到坎坷的时候，时任组织部长的这位大姐鼎力帮助过她。也正因为秋菊对老部长的信任和几十年好姐妹的情谊，加上她敢说直言的性格，我们很快进入了

主题，没有客气和寒暄，没有陌生感和距离感。我认为她的直言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她所做的事情可以昭然于天下，光明磊落。晚上，我和她的家人一起吃正月十五的团圆饭。之后，我又见了她两次，做了一些补充性的访谈。

第三位，风楠。9年前，她不知从哪里得到我的信息，邀我去给她们区的女领导干部讲《领导学》，那次见面，我就喜欢上了她的踏实和朴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正是这种好感，我推荐把一个妇女项目试点放在了她那里，开始了长达几年的合作历程。合作过程让我更加敬重这位女领导，她做事有原则有人情味，头脑清楚，雷厉风行，我们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和姐妹感情。正如研究中所说，她接受采访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帮助我这个好朋友，我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她也是我的研究参与者。对她的理解和认识，决不限于访谈的故事本身，这些年的交流和分享，已经让我对她有了比较丰富和全面的了解，不仅从她的访谈中，从她的同事、周围人、她的朋友中间都能都得到关于对她的认识。

第四位，李华，我们也认识十几年了。80年代末，她开始参与组建中国最早的妇女NGO、她发动她所在的媒体进行清理对传统妇女观的认识的辩论和讨论开始，她的名字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我认识她是因为她邀请我去她创办的一家为农村妇女服务的机构上课，之后多年来就一直有着良好的信任和合作关系。她个人的故事从媒体、报刊、杂志上都能看到，也不断地从她周围的人那里听到。直到我作为一家外国基金会顾问的身份，参与由该基金会资助的一个妇女NGO组织和妇女领袖一起交流分享的项目时，第一次听到她这些年为妇女事业奔波的酸甜苦辣，才对她有较深入和立体的了解。她身兼数职，既在体制内从政，也在民间组织内担任领导职务，她的故事让我深深体会到作为女性不仅在官场上不容易，做一个妇女NGO的领导人也十分不容易。

第五位，南小枫，我曾经的一个老邻居。我知道她曾在某高校当领导退休在家，我带着儿子在院子里玩，常常遇到散步的她，她很喜欢我的小孩，就这样认识了她。听到我研究女领导干部，她欣然接受我的访问。

第六位，清新，1994年我认识了她。当时我在一个专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的项目中接热线电话和作心理咨询师，她是我们的顾问，我们有很多的接触，常常去她家。该项目结束后，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不多，但常在不同的场合相遇。她作为名人和一个参政的妇女，听到很多她各种为老百姓维权的传奇故事。约她访谈很难，时间总是不凑巧。清新最大的优点是极其有民主的思想，对任何人都带着平和的态度，这也是她作为人大代表极受她的选民欢迎的原因之一。访谈是在她的家里进行的，她从作为名人的父母给她的教育谈起，她的参政经历充满了曲折、酸甜苦辣，但她的壮心未改，她执着地为民主制度和选民的权益斗争着。

第七位，荣爱，相识8年。我们不常见面，但见面就能谈得很深，见了面就很亲切，彼此无拘无束，也是我的深交。每次见面，为了本研究，我特意住在她家，我们俩就躺在床上，聊了一晚上。

本研究中我所描述的仅仅是她们故事中的一部分，无法展现我在访谈她们过程中所看到的丰富和生动，她们很多的痛楚是从身体中发出来的，如李华“真是的”口头语，好几个的“哎”的叹息声，从她们身体中发出的那种东西会让你觉得辛酸和压抑，当这些展现在文本里的时候，似乎苍白了许多。

（2）半结构访谈

主要应用关系比较陌生的两个女领导干部和两个负责女领导干部选拔的组织部门的负责人等。

采用怎样的研究方法，要和研究参与者的文化紧密地联系起来。在现今中国大陆的政治氛围中，女领导干部们都有很强的政治敏感度，大多数研究参与者或多或少带着一些戒备心理。同时访谈要考虑女领导干部的时间，她们工作很忙，接受访谈的时间很有限，而且分散在各省。生命故事访谈一次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可能需要几次，这对我与她们来说很难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对几个与我关系比较陌生的女领导干部用半结构的访谈方法，有一个访谈大纲，一方面可以节省时间，另一方面可以很快地进入我的研究主题。用半结构的访谈法收集的资料，也足以补充和丰富我的研究。之所以选择负责干部选拔和培养干部的组织部门的人作为研究参与者，则是希望从她们的角度，看她们对女领导干部的认识和看法。

采用半结构方法进行访谈的女领导干部有：

马海，和她认识缘于她的下属邀请我去讲课，她也来听。就这样认识了她，没有很深的关系，正因为没有建立比较信任的关系，所以访谈的时候她对很多的问题欲言又止，表现出她的谨慎，但整个访谈过程，她基本上很真诚和坦诚。

新梅和两位主管干部考核的组织部长（后面两位的材料也没有用）等几位研究参与者，仅仅是一面之交，每个访谈2个小时以内。她们官腔很重，说话很有分寸、滴水不漏，城府很深，也非常谨慎，不同意录音，因此听了很多，能回忆记录下来的很少，这些资料都算增加了对女领导干部们的认识。

我的研究设计中，希望有有几位主管妇联干部工作的领导作为研究参与者，希望能从她们多年来倡导妇女参政的这个角度谈谈妇女参政的问题，但都被一一拒绝，其中也有我多年的相识，我想她们都在职位上，要谈的话题比较敏感的缘故吧。

（3）焦点小组

对于本研究来说，采用焦点小组的方法，目的通过观察和记录不同参与者对一些相同主题进行的讨论，从中获得个别访谈中所不能得到的看待问题的多种角度，可以弥补个别访谈的不足，充分利用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相互补充、相互纠正，对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更重要的是，在焦点小组中，参与者不单独面对研究者，而是相互之间进行交流，借着相互之间的碰撞，可以激发个别访谈时不会产生的一些想法和感受，共同建构新的知识。

焦点小组可能放在个别访谈之前，以便寻找研究主题，为拟定访谈大纲作准备；也可以放在个别访谈之后，将一些分析整理出来，对一些为了改进政策的建议拿出来，希望大家给予一些补充和丰富研究资料；或者同时进行，可以将一些在个别访谈中不容易谈出的问题，拿出来进行讨论，有些时候谈别人或者与自己不相干的问题，似乎大家更愿意讲出自己真实的想法。这些方法目的都是为了收集到丰富的资料并产生相互补充和丰富的作用。而我的两个焦点小组一个是在个别访谈之前做的，一个是在之后做的。

第一个焦点小组是在个别生命故事访谈前进行的。参加者是某省三个高层女领导干部，一个省人大副主任（我研究中称她为雷西）、一个女副市长、一位大学女校长，这个小组是利用我为她们授课的机会在课下召集的。在讲课的过程中我给她们举了很多女领导干部的故事，她们颇有认同和感受，所以在课下的焦点小组中很自然地谈了很多。尤其是雷西作为这三个领导中年龄最长、位置最高的领导，她以自豪的心态讲述了她的参政经历，颇有点教育其余两个刚刚参政不久、资历不厚的女领导干部的味道。她的经验很正面，女人要靠能力堂堂正正参政而不能靠照顾和比例就是她强烈的要求，她认为自己靠着自己的能力赢得大家的尊重，她反对照顾的说法，这样会贬低了女领导的能力（实际上，没有80年代初选拔知识分子党领导的政策，她可能无缘走上领导岗位）。我不断抛出一些收集到的关于女领导干部的故事以及从报刊杂志中收集来的对女领导干部的评论，听她们的意见，她们一一发表了自己的主张，如为什么女人做事就要付出120%的努力？怎么看文章中写道女领导干部患有“恐夫症、假男症、淑女症”等，怎么看男女领导的搭配和处理和丈夫之间的关系等等。我的问题更多不是直接问她们自己经验，而是谈她人的看法，反而容易打开交流的局面和深入交谈，所以这个焦点小组尽管都是正面的经验比较多，但它的丰富程度弥补了很多个人故事中所无法涉及的问题。

另外一个焦点小组是在个别访谈之后进行的。参与者是5位省级妇联主席，她们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由中央党校的李教授组织，因为她是她们的带班老师。征得她们的同意，我参加了她们举办的专门探讨妇女参政问题的一个座谈会。事先，我把一些从个别访谈中带出来的问题作为访谈思路并写成大纲给了李老师，李老师也告诉了几位主席我参加她们座谈的目的。因为该小组李惠英老师是主持人，加上当时正赶上人大换届选举，主席们都带着保证最低比例的任务，焦点小组的焦点是如何提升女人大代表比例。小组尽管没有直接去谈论我设计的问题，但谈到女人大代表比例上不去的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妇女参政率低的部分原因，如各省没有硬性具体的性别指标规定，领导们不重视等等。对我理解为什么人大代表中女性少很有帮助，也进一步去理解体制中性别歧视不是表现在制度上，而是表现在执行制度的官员们，特别是男性官员的性别歧视上。因为没有录音，所以我的记录也比较有限，该小组的资料在本研究中用得较少。

每个访谈记录，都是我亲自撰录的。因为当下的访谈情景中，研究参与者什么表情、语气都能够说明她们一些隐藏在语言下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助于我再一次深入地理解她的

语言、情感，所以我在转录的过程中，也将这些我看到的表情和语气写了出来，以便我日后的分析资料中可以形象地回忆到当时的情景，增加对她们的深层了解。我很在意她们的表情和语言转化过程中发生的東西，因为如果我要开展解释性的研究，就要注意她们经历中的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因为解释必须是情景化的，情景变了意义也就变了（Denzin, 2004）。比如一位女干部，当我解释完我的研究动机和目的的时候，她就要求我不要录音，等访谈完了我才知道她所要谈的是她深深的心痛和伤害，她把我当成倾诉对象，根本不适合录音。李华说到副职的局限性时，多次用到“真是的”来表达很多想说却无法说的话。几个研究参与者每说到一些敏感问题欲言又止，表情都十分复杂。只有一个访谈是别人帮我撰录的，但我重新听着录音过了一遍以免丢失某些重要的信息，所谓重要的信息只有我自己诠释和知道，别人不能替代。所以亲自转录是一个非常好的保证资料相对准确的一个手段，避免资料和信息在撰录中流失。

（四）现象的化约——资料分析

现象化约阶段，就是将研究的现象从其发生的自然世界中提炼出来，从而对它展开分析，这里所需要的步骤是阅读和观察。

这个阶段，我沉浸在资料的阅读和理解中，我熟记每个故事，走进她们的世界，依靠我的经验和她们对话，尝试去理解她们讲述的生命中重要的事情以及她们对事件的反应，在旁边记下我的理解和看法。阅读的过程中发现一些漏访以及不深入的话题，我则通过电话或者再次回访来补充，也有一些问题因为个别研究参与者太忙，尤其是北京之外的不可能回访，而无法深入补充资料。

当我开始阅读资料的时候，我的观察就已经逐渐地浮现在眼前。通过观察将个人故事中的关键阶段与叙述提炼出来，开始将观察到的问题和文本中的证据作一个连接，然后与我之前的文献回顾或者理论框架作一个连接性的思考，比如故事中展现出来的“求学”经历，和关键时候“老师的帮助”分不开，而其求学的动机是看到“榜样”，这就会与我之前的文献分析中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妇女教育权利和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有关，由此得出了一组关于求学、老师/家人支持，成为女领导的必备条件等相关的一组解释。同时我也很留意哪些资料中出现的现象是之前的文献回顾中没有提及的，如女领导干部们抗争的故事，将这些观察记录在阅读文本的旁边。

（五）现象的建构——主题发展

现象建构以现象化约为基础。在这一阶段，研究者对现象进行分类、整理，并将它重

组为一个协调的整体。如果说化约是拆散的话，建构则是重新组织在一起，目的是为了将分析出来的经历（元素、片断）重新组合，从而再现经历。该阶段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将阅读和观察到的一些基本的元素（主题），反复寻找和分析元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主题。

首先必须从每一个访谈中形成主题，然后再看这些主题怎么才能共同形成论题（theses）。比如说，从资料中发现，对女领导干部既要求她的长相又要求她的穿着，同时也要求她不能因为生孩子等生理原因而耽误工作，长相、穿着和生理现象都属于身体的一部分，是一种主题，而将这些主题综合出来再给与提升就发展出“对身体的规训”这个论题。在这个阶段上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已经不再是某个女领导特定生活经历，而是本研究中对所有女领导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般性质的概括了。

（六）现象的深化——解释

深化从化约和建构阶段发现的基本主题就已经开始了，研究者将这些结构放入真实自然的社会世界，并在此基础上解释他们的意义。当我把对女领导长相和穿着的要求置于对她们的“身体的规训”中，并将该现象和社会世界中把女性商品化和物化的性别歧视联系起来，使得该现象回到活生生的个体交往世界，个人和社会环境联系起来。正如 McCracken 所说的那样：“现在，研究者已经不再像研究参与者那样谈论这个世界了，相反，他或她是从一个特殊的社会科学的分析视角在谈论这个世界”（McCracken, 1988:48；转引自丁慧芳，1998）。借助于深化分析，展现女领导干部们如何承受那些发生在她们身上的现象。

五、研究的有效性评估

我在本章一开始就阐述过，基于我对本体论、认识论的主张，我摒弃实证主义研究中用客观性、可靠性和重复性等的指标来衡量一个研究的有效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要交待我的研究态度、研究过程中的困惑和挣扎以及资料最后书写中的政治，因为这些都影响到这个研究产出的结果。

在解释性分析研究中回答有效性是困难的话题，但不是为了回答而回答，而是一个研究态度和研究伦理问题，回答能让读者清晰地看到研究者的思考和困惑。

我借用 Riessman 提到的几种探究叙事分析的有效性的方法，即说服力（persuasiveness）、符合度（correspondence）、实用性（pragmatic use）来探究性地

回答本研究的有效性问题的。

（一）说服力（persuasiveness）

说服力和合理性连接在一起的，即这个解释是否有道理或者能让人信服？这是我们每个人在阅读一些研究报告过程时的经验。研究报告能否让人信服，有赖于“分析者邀请、驱使、刺激、感动听众的能力……而不是依赖真实性的标准”（Gergen, 1985, p272）。说服力最终是要依赖于写作的修辞（文学的技巧）以及读者的反应，在某一个历史时刻里，一个有说服力文本在另一个时刻未必如此，文本本身没有不变的意义。

因此我的研究是否具有说服力，不在于我要说我的研究的可信度和有效性，而在于我的文本创作和读者最后的评判。从研究资料收集到分析和再创造的过程，都不是“事实”的真实呈现，而是一个再度创造和重构事实后加入研究者分析解释的再现过程，因此让读者来检验是否有说服力是最佳的选择。

（二）符合度（correspondence）

研究者能否把研究结果带回到研究参与者那里，是一个重要的符合度的检验标准。Lincoln 和 Cuba(1985)就描述了“成员检验”（member checks）的程序，认为“资料、分析类别、解释和结论都可以……由哪些所收集资料的原来群体……加一检视”（p314）。如果研究者的再建构被认为是适切的再呈现，Lincoln 和 Cuba 认为可信度（credibility）就会提高。

本着上述认识和本研究是为了探寻改变妇女参政状况的目的，在资料分析和书写过程中，我利用一些机会将研究的部分资料和结果展现给相关人群，包括研究参与者和一些和研究参与者紧密相关者。等我论文完成之后，我将来做的就是把研究报告和结果和被研究的人分享。尽管我知道有些观点是研究参与者不同意的，那我也要真诚地展现那些不同。

我检验资料和研究中观点和结论的方法是不断地将我的研究投入到相关的人群中进行讨论和丰富。

第一次，2008 年 1 月在全省妇女干部学校校长和老师的师资培训班上，将我的观点展现给大家。这些校长本身就是从政的女领导，她们各自培训的对象也是自己省内的女领导干部。此时，我没有开始系统书写我的研究，因此我主要分享了我的研究视角以及从资料分析中发展出来的几个主题。之后在小组讨论上，大家对该研究主题和看法比较认同，如职场上的各种规训，以她们的例子来丰富和佐证我的研究。

第二次，2008 年 7 月 25 日，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妇女干部培训班上，这个班的绝大多数

数学员是该区各个行业的女领导干部，也包括所有的妇联干部。我的演讲主题也是“妇女参政”，我将资料分析中第四章的一些研究发现如“80年代前后跟着党、组织走的不同含义”等、“国家政策是妇女参政的根本保证”等呈现给大家，在课下征求意见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我研究的东西不够深刻，官场的性别歧视和排挤比我书写的有过之无不及。

第三次，2008年11月，在河南与研究妇女参政、自己也参加过政、目前是一家妇女NGO的领导人交谈，她本人也熟悉我访谈中的几个女领导干部，也和她们是至交。我们一起讨论我其中的一些观点和结论，她也表示了极大的兴趣，比如“为妇女参政主体性的出现必须要有一套论述介入，而目前没有这样的论述”等的结论，她觉得对解释目前的妇女参政问题有新意。

第四，在我研究和书写的过程中，我不断打电话给淑华和风楠，就某些问题和观点和她们深刻讨论。她们对其中职场上的性别歧视有非常深刻的感受和体验。

总之，我如实展示上述从主题形成、文献回顾、资料收集、资料分析到成文的整个研究过程，也如实反映研究中的困惑和拉力，我认为就是在交代我的研究的可信度问题。也通过几次将资料放入相关人群中的讨论，验证了我的研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三）实用性（pragmatic use）

实用性，是指研究者要考虑研究最终能否变成其他研究之基础的程度，这个标准是未来导向的，具有社会建构的特点。简单来说，我们所做的任何的研究都是依赖前人的研究作为基础，Mishler认为，“如果我们评判一个研究的可信赖度够高，足够让我们愿意参与其中，这表示我们认可研究结果具有足够的效度，愿意投资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并且拿着我们自己的名声冒险”（Mishler, 1990, p419）。尽管这是一个检验有效性的方法，但不能解决所有使用该研究方法的研究者的问题，因为研究成果是否可以作为别人的研究基础，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有能力做到，更不能预期什么人可以采纳你的研究结果。

因此，在解释性研究中来谈论有效性有一定的难度。解释性研究中有有效性无法化约成一套形式规则或者标准的技术程序，就算在定量中都不可能做到。我们所说的故事最后都与我们的价值有关（Cronon, 1992, p1376），没有教条式的去向和固定的食谱和公式，对有效性的认识是很难的事情。

但无论怎样，作为研究者有责任提供相关的研究讯息，让他人来决定研究成果的可信赖程度，这就是我所描述的资料是怎么收集的；我的研究过程是怎样的；资料和结果回到被研究和相关人群去检验等，我也回答了说服力、符合度和实用性等问题。

下面，我要谈本研究中的局限性，尽可能给读者展现一个比较真实地研究的过程和研究者的思考，来解答关于有效性的问题。

六、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本研究是一个解释性的研究，每一个解释者都无法逃避他所处的解释情境。这就意味着解释必然带着解释者的限制。我自己言说的就是我身处的社会环境，尽管我借助某些视角去分析和看到某些研究参与者或者别人没有看到的東西，但我肯定，本研究有我身其中的文化识盲，即我都看不到的东西，我都生活在信以为真的下面，让我怎样能尖锐地看到一些深层的问题？即便我看到，能感受到，我又该怎样的言说？在研究过程中，我深深地浸泡在资料中，没有了对资料的兴奋和敏感，这非常不利于我进一步深入地发现问题，也是我在资料分析中的最大困扰，尽管我通过将资料放到相关人群中去讨论以及和导师讨论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困扰，但绝大多数时候，尤其一遍遍地看对访谈的资料，就发现越熟悉资料就越有盲点。

从女领导干部将近 60 年的生命故事中去她们的参政历程，这 60 年与新中国的发展同步，其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的研究内容，尤其是对 80 年代之前各种政治运动中她们所经受的东西。但出生于 60 年代，成长于 70 年代的我，对 70 年代之前的历史没有感性认识，因此在访谈中并没有将那段历史作为重点，没有细致地访问，收集的资料中这部分的内容很薄弱，而那段经历几乎是我的研究参与者们共同怀念的光辉历史，充满了一种作为女人的自豪。我希望将来我能够跟进故事撰写的时候，再去补访，来弥补对那段历史的缺失。另外，政治环境和她们仍在领导岗位上的敏感性，限制了她们一些经验的呈现，也限制了我的研究深入，如关于她们日常生活的抗争故事很少活灵活现地展现。

任何一种研究方法的选用都有其局限性，我的研究不是告知，只是展示，我没有考虑推广的问题，而仅仅希望给所有研究妇女参政的学者、女领导干部以及关心妇女参政的人提供一种不同的诠释视角。我不追求研究结果是否可以转移，我也知道我的视角和研究必然有我的局限，那就是几个女领导的生命故事不能涵盖这个人群的生命经历，我也知道不同的人的生命经验有着不同的丰富，我的研究无法穷尽。

我无论怎么证明我的研究的可信，读者依旧有自己的辨识能力，理解文本是一种读者和作者创作的文本之间的对话，以及通过对话产生的共鸣。正如 Denzin 所说，解释性研究需要“心甘情愿的读者”，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会赋予文本新的意义，乃至对文本进行重构，也意味着在读者那里，文本没有什么绝对的观点，读者会对文本作出自己的解释与理解，必然也会将自己的经验带进去。他们可能会觉得吸引也会觉得乏味，我能做的就是我忠实地交待我的研究过程，其中的困难都展现在读者面前，而最后可信与否、能否阅读就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最后，我个人深受女性主义书写方式的影响，我希望我能够将我写的东西深度描述，

让人们从我的笔下和我分析的人物中熠熠如生地感受到和领略到我所描述的事情，可以轻松愉快地阅读。但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做到这一点很难，我的写作和理论功力都不够，我写出的东西总是不如我的思想深刻，让我深刻地体会到对于我，博士论文仅仅是一个研究训练的开始。

小结

本章主要阐述了我选择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批判理论-建构主义研究范式的理由，以及Denzin(2004)提出的该范式下采用解释互动论研究方法指导下的整个研究过程。从确定所要研究的主题开始，对现象前的观念进行结构及批判性分析（文献分析）；之后把握现象，包括在自然世界中把握现象发生的地点和场景，获得现象多重的事例（资料收集）；对现象的化约，从现象中提取基本元素，并对现象进行提炼，使之脱离原来的自然世界（资料分析）；对现象的建构（主题发展），在把握基本元素、片断及结构之后，把它们重新建构为现象；最后是现象的深化，深刻解释现象，并将现象重新置于真实自然的社会世界里。将整个研究过程具体地展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回答资料的可靠性，研究结论的实用性等问题。最后，我指出本研究的局限性。

第四章 论述与主体性建立

概论

在本章中，我将透过浓缩的女领导干部的生命故事，重点分析研究参与者在其成长过程中，国家主导的论述是怎样将她们从一个普通的妇女塑造成为新中国妇女，再从新中国妇女塑造为女领导干部的？她们具有怎样的身份认同？通过描述她们在不同时期建立的主体性的内涵，揭示为什么在不同的时期会出现不同的参政观，为什么很难出现为妇女参政的参政观。同时我也会详细描述主导论述在建构人的主体性时所采用的种种技术。只有透过具体的技术，才能看清抽象的意识形态是怎样转化为人们信以为真的一种“日常生活的常识”来形塑自己。

一、官方媒体对主体性的建构

建国初，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建立共和国政权的合法性地位，解决建国初期的内忧外患¹，来稳定和巩固新建立的政权。因此他要用一套的意识形态来维护其统治的合理性，不仅从制度上、意识形态上要确立一套不同于旧社会（国民党的统治以及以往皇权的统治体制）的全新体制，更要全国人民从思想上认同和接受这样一种全新的体制，只有认同才可以实行有效的统治。

新中国妇女形象的确立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确立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一部分，也的确是中国共产党完成的最伟大的成就。中国历史拉开了对“新中国妇女”这个集体身份的想像和建构过程，这个建构过程不仅需要从法律上确立一个“新中国”妇女的意识形态，更要建构一个可见的物化模拟的“新中国”妇女形象。这个过程是在国家主导下，通过法律、教育、媒体等齐心协力完成的。其建构明显分为两个阶段：

¹ 中国共产党面对 1949 年建国时的中国，那是一个经过八年抗争和三年解放战争，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留下四亿人口，百废待兴，外来的侵略势力对新中国虎视眈眈，内部敌对势力蠢蠢欲动，国际国内的社会环境十分复杂。

（一）第一阶段从 1949 到 70 年代末

建国后 50 年代—70 年代，是中国妇女整体性被解放、被塑造的“社会性解放”时期。这一时期，官方主导的论述是社会主义建设以及“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并运用宣传、运动、树立榜样等贯彻论述的技术，让中国妇女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群体“社会化”过程。“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能干”是这一时期妇女的群体特征，建立了有别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新中国妇女”形象。这个“新中国妇女”是相对于“旧社会妇女”而言的一个形象，它用三种途径树立的“新中国妇女”的形象：

第一，首先确立了妇女们的法律地位。

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¹，这些法律的颁布和落实使得妇女获得了全方位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建立了新中国妇女的身份认同，并通过行政干预、持续不断的宣传、运动，深入贯彻和落实到人们的生活当中，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法律有着其严肃性和强制性，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和尊重妇女的价值观就这样依靠法律的强制性和严肃性在有着几千年封建文化的中国、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中确立起来。

第二，通过教育以及社会教育运动实现新中国妇女的身份认同。

批判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是教育这个机器，它“在现有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再生产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在学校，学生通过“学习由大量灌输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包裹起来的各种本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才被大规模地生产出来”（陈学明，2001）。

人的主体性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接受教育是培养个体成为主体的重要的步骤和过程，教育的过程是培植人的主体性的过程，也是意识形态具体化为人们的一种价值和信仰的重要教化手段（彭进清，2006）。当时的民主妇女联合或（全国妇联前身），在其工作方针和策略中，将教育妇女作为重要的方针和政策²。1950 年到 1958 年，全国掀起了三次扫盲高潮，推动全民和广大妇女学文化的热潮。各地农村举办了各种识字班、民众夜校等，

¹ 这些法律具体包括：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赋予妇女全面的社会权力。1950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使妇女和男人一样获得土地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土地权利的确立。195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颁布和实施，明确规定废除各种包办婚姻、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的观念，力求以法律的严肃性建立起和睦平等的新型的家庭关系，该法尽管不是关于妇女政治权利的法律，但它作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对提高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对妇女参政极为有利。1953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该法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妇女享有选举与被选举权，享有同男子一样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为妇女参政直接提供了法律依据。1954 年 9 月，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该宪法中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家庭五个方面同男子享有同等的权利，规定妇女和男子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力，并明确地表现出对妇女儿童利益的特殊关注和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扫除文盲工作条例》等一系列法规保证了妇女受教育的权利。资料来源：《新中国妇女参政的足迹》，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年。

² 引自“关于妇女宣传教育工作问题”，1953 年邓颖超同志在中国妇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妇女解放问题文选》，中国妇女出版社。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86369/87105/87275/5964635.html>

妇女学习文化成为一种新中国妇女区别于旧中国妇女的标志之一；一九五二年扩大了人民助学金制度以后，更增加了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在各种学校中，女生占了相当大的数量，据一九五二年西南区统计，在大学、专科学校中女生占了全体学生的百分之三十二，中等学校中占百分之三十八。在各地举办的民校、识字班中，女学员的数量增加更快，约占学员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左右。不论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均有大量妇女担任光荣的教育工作。¹普遍开展妇女群众中的教育学习运动，结合着生产技术的学习与文化的学习，加强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教育，提高广大妇女群众的政治水平。1958年—1960年的大跃进²运动以及1963年—1966年的“四清”³运动，都属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它在客观上产生了大量的妇女劳模并且走上领导岗位起了积极的作用⁴。

主张妇女的受教育权力，女童上学和大规模的扫盲运动，以及各个时期开展的大规模的社会教育运动促进了妇女走出家门，提升了思想认识，为成为新中国的妇女和日后成为女领导干部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正是在参与教育和社会运动当中锻炼自己，使之成为女领导干部。

第三，媒体宣传各种新中国妇女的榜样。

中国的媒体从来都是官方控制下的媒体，两者总是相互作用的，媒体几乎与官方的言论极尽一致地为意识形态的传播服务。树立典型、榜样，并透过媒体的宣传是60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采用并行之有效的灌输意识形态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不断把一些人树立为榜样。媒体在大肆宣传榜样的时候，就给了妇女大众一个想象的身份，这个身分不是虚拟而是实在的，当妇女们朝向想象的身份并逐渐臣服而形成自我意识之后，主体性便产生了。学习典型就是全力促进个人“自由地”臣服于意识形态的实践。树立典型、宣传典型和学习典型成为重要的征召人们“同意”意识形态的强有力的武器。

树立典型和宣传典型人物，从榜样中选拔干部，是一个强有力的征召女干部的手段。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特征的典型人物，成为国家领导人的郭风莲就是从山西大寨干出来的全国劳模；河北省委书记吕玉兰，是从一个普通的农民的女儿成长为高级干部，也是60年代全国著名的劳模。这些典型人物几乎都是热爱党和社会主义，全心全意、克己奉公、勤劳朴实、埋头苦干，敢说、敢想、敢干、无所畏惧的“铁姑娘”的形象，也被当时公认

¹ 《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妇女解放问题文选》，中国妇女出版社。引自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86369/87105/87275/5964635.html>

²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资料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8601.htm>

³ 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四清运动对于解决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作风问题和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

⁴ 资料来源：《新中国妇女参政的足迹》，p84，党史出版社，1998

为新中国妇女的形象。试想，面对当时社会资源匮乏和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国情，只有这样的素质才能满足当下的经济建设需要，支援前线 and 复兴战后满目疮痍的中国。

那些模范、榜样可以通过劳动从普通妇女成为国家领导，给妇女们的生活一种强大的动力。这些劳模的形象就是“新中国”妇女们的镜像中的我。她们趋之若鹜，纷纷效仿，这种典型不仅要求塑造高尚的灵魂，其身体上也要和过去的旧社会的弱女子形象告别，铁姑娘的形象是直接对传统社会话语中“弱女子”形象的直接否定。穿着朴实和单一，没有女性化的特征，一切向男人看齐。“获得了这个形象之后，变革与转化便在主体中发生了”，榜样成为妇女集体形象的记忆，对“新中国妇女”的身份认同，是一个积极争取的过程。

在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必然也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妇女”的国家主导论述下，国家不仅是建立法律和政策，教育和媒体的渠道，更是透过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围绕抗美援朝这一事件开展的爱国教育运动、妇女普选运动，各个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这些疾风暴雨似的打造，使得中国在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几千年都没有完成的事情，即把一个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旧式妇女塑造成了“新中国妇女”。

“新中国的妇女”的一个直接变化就是妇女担任领导职务，甚至比较高层的领导职务，成为解放了的妇女的标志。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作为无产阶级的一份子的妇女担任领导职务也是该阶级掌权的一个标志，所以妇女就这样也被搁置在这个领导岗位上，他们从一开始走出家门就是为了无产阶级整体和国家，走上领导岗位也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二）第二阶段从 80 年代初至今

8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成为一种主导的国家发展话语，给妇女带来了“双重冲击”，即一方面是市场发展中的“经济理性”的传统，它以利润为目标而漠视妇女的权益和需要，如拐卖妇女、妇女下岗、参政比例滑坡等；另一方面中国妇女在现代化带给妇女全方位参与社会经济的机遇，给了妇女们充分地发挥自主性的空间，找到了自我价值，重新开始自我认识（林春，2003）。因为各种论述的出现，也为出现不同的妇女主体创造了空间。

80 年代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出现了相互竞争的、矛盾的塑造女领导干部形象的话语，从而结束了一种主导话语指引妇女参政的局面。这些相互竞争的话语表现在：

第一，官方关于“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没有改变，但是在保护妇女权益方面国家角色远不如 80 年代之前那么主动和有力。国家干预减弱，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运作机制却充斥到各个领域，借着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说辞，在政治领域将妇女排斥到权力边缘。

这一时期，在国际妇女人权运动的推动下和国内妇女问题层出不穷的紧迫形势的压力

下，从 90 年代初专门保护妇女权益的《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出台、95 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1995-2000 年》颁布，到 90 年代全国妇联联合中央组织部联合出台关于选拔妇女干部文件等，说明国家通过法律和政策在持续地保证妇女参政和妇女的各项权益，而且比较 80 年代之前有了保护妇女的专项立法和政策，但国家在贯彻政策的过程中，却没有 80 年代那么强有力地干预。国家力量减弱，市场干预加强。

第二，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引入参政中，表现在妇女参政方面就是国家不再保证比例的差额选举制或者完全依靠“实力”进行选举，使得妇女参政的比例大幅度下降，甚至滑落到低谷，迄今为止也没有很大的改观。90 年代之后，国家政治民主生活不健全，干部选拔中潜规则的使用以及一些有利于男性的政治文化，使得妇女参政更是雪上加霜。父权制思想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卷土重来，和市场经济紧密地攀附在一起，将妇女商品化和成为消费品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些都影响到这一时期妇女们的参政活动。

第三，90 年代，社会性别视角引入妇女研究和工作，冲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局限，把妇女问题的思考引导到两性关系的高度。特别是为了迎接 95' 世妇会的召开，西方女权主义的论述和声音，尤其是社会性别的视角和概念被介绍进入妇女理论研究和各种国际发展项目中，近十年迅速地在各个领域传播和推广，将社会性别纳入决策主流的呼声和行动没有停止过（谭琳、刘伯红，2005），形成了不算强大但很有生命力的声音。

妇女研究者以及一些实际的妇女工作者借用社会性别的视角，开始反思传统的“男女平等”意识形态对妇女带来的益处以及问题（王金玲，2003），也在各个层面推动社会性别视角纳入决策主流，实际是社会性别视角总是走在民间和边缘，很难走到权力的中心。而那些排斥和歧视妇女的潜规则——根本拿不到台面上、你看不到却能心知肚明在运作着，成为妇女参政的障碍和阻力。

第四，面对社会对女领导干部们的不同要求，她们不知如何形塑自己的想象和提升自己的素质。1988 年代末的中国妇女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将提升妇女的素质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提出了妇女要“四自”。但同时，“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等声音随着商品走村串户，席卷了整个中国，相互矛盾的声音也撕扯着中国的妇女们。

从官方来说，树立榜样、以榜样带动妇女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三八红旗手”一直以来都是从妇女中评选优秀分子的工作，但到了 90 年代后，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荣誉而不能起带动妇女的榜样的作用，官方树立的典型不再发挥像 80 年代之前的作用，从原来的一心为公、吃苦、朴素的内在的要求，发展为对外在面貌的重视，甚至更加要求女性传统的家庭角色等，而市场消费下所塑造出来的女性形象如女影星等却成为女孩们争相模仿的对象，各种媒体对“女强人”形象的歪曲和“东方女性风韵”的宣传……这些相互竞争和矛盾的形象，让女领导干部更不知何去何从，身份认同发生危机。这个时期，很难确立一个“集体的身份”认同，主体性的确立面临着新的挑战。。

二、“新中国妇女”——社会性身体的建立

从研究参与者的成长脉络中清晰发现，国家法律/政策、教育和媒体/树立榜样等影响着她们成为“新中国妇女”主体性的建立。尽管单一的主导论述使得她们被“整体性”地塑造，然而主体性具有普遍性的同时依旧有很大的不同。表现出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强大的论述力量在人的主体性塑造中并不是铁板一块。

（一）接受教育

成为新中国的妇女，接受教育是第一步。在访谈中，所有的女领导干部都提到自己童年接受教育的过程。建国初，在四亿多人口中，有二亿三千多万女性，其中 90%以上的妇女是文盲（韦钰，1995），接受教育对新中国的妇女来说无疑是一件大事，而此时的教育为她们日后能够被选拔成为女干部奠定了基础。让女孩子读书，让妇女们识字，扫除文盲，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举，改变了之前几千年社会妇女没教育权利的历史。读书、成为有文化的人也成为新中国妇女“新”的标志。新中国不仅从法律上确立妇女受教育的权利，更要确保妇女能够确实受到教育，并通过一系列的全民的社会教育运动来确立教育所要达到塑造新中国的新人的目标。

女孩子能够上学读书，使得淑华她们看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和机会，对她们来说，响应国家的号召去读书，首先要与自己贫困的家境进行斗争，也要和父母“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进行斗争，注定了她们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就充满着艰辛和斗争，显示了她们与自己命运抗争的主体性。

A：淑华——读书可以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1945 年，淑华出生在经过抗日战争洗礼的华北平原一个贫困的农村。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守着善良和勤劳，靠种田过日子。淑华是家里的长女，兄妹七人，四个弟弟两个妹妹。父母日夜耕作，养家糊口，作为长女的她四五岁开始担负起照顾弟妹们的责任。到了上学的年龄，开明的父母让她上学了，小学三年，她都是带着弟弟妹们去上学的，带着弟弟妹无法进教室，她就在教室外面听课。到了小学四年级，去了离家 5、6 里地的完小¹上学，路太远，没法带弟弟妹妹们，她只能早起晚睡，帮助父母干完能干的活才去读书。正是这种艰苦的环境和求学的动力，发展出她合理安排时间的能力以及勤奋、吃苦、有责任心的品质。

¹ 一般小学 1-3 年级在本村的小学里读，都是一个教室里几个年级一个老师教，到 4 年级就到行政村的中心小学或者叫“完小”读书，这种学校就是公办的正规学校，前者则是民办的小学。

完小离我家有5、6里路，路太远，没法带着弟妹们上学，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完全要靠两条腿走路，但弟妹们依旧需要我照顾。那时没有钟表，就在墙角画个印，太阳升起来了，看着阳光走到哪里就这道时间了。每天天不亮、趁弟妹们没醒的时候，赶紧起床扫扫院子，扫扫屋子，给一家子做饭。弟妹们醒来之后，给弟妹们穿衣服，洗脸。等爸妈一进门，就往学校冲，5、6里路跑着上学校了。生活条件依旧艰苦，有时候连带的干粮都没有。有一个学期，正好赶上遭洪灾庄稼颗粒无收，家里实在拿不出学费，就劝我别上了。老师找上家门对奶奶说：“大娘你别因为书费困难，就不叫她上了，你这孙女学习特别棒，叫她上去吧，书费我给你拿。”

淑华是家中的老大，随着弟妹们长大，吃饭压力的增大，从小学到初中，淑华不断面临着中断学业的压力，也不断地与自己父母、贫困的家庭环境抗争，但实在上不了高中了，到公社当了社员。

1958年，我要去报名考初中。正赶上人民公社时期，家里靠劳动力挣工分吃饭、分东西，只有父母两个人挣工分，养活好几口人很困难。父母劝我说弟弟妹妹们多，实在没办法了，别上学了去劳动吧。我睡在地上三天和家里人抗争，斗争的结果就是迟上了一年，到第二年秋后，确实条件就稍好一点了，我又开始上学了。因为耽误了一年，两年要完成初中三年的课。上中学的时候，正好赶上59年、60年最困难的时候，家里没有干粮，就带个萝卜、山药什么的，没等到中午的时候就吃完了，大家吃饭我就躲到一边看书去，不想让同学、老师看见。尽管这样，老师还是看见了，就把他的干粮给我一点。我自己吃不饱肚子，仍要操心家里人。每天拿一个盛粮食的一个口袋，在回家的路上必须去挖一口袋野菜，这不是家长吩咐的，总感觉就是自己的一种责任，一边背着书包，一边背着一大袋野菜，整个初中阶段就是那么过来的。后来我又考上高中了，但是家里实在太穷了，缺劳动力，父母让我不要上学了。我又上村里的水塘边静坐了三天也没有用，实在没法，去当公社社员了。

B：秋菊——读书，为了成为知书达理的人

秋菊出生在中国西北一个非常贫困的农村。秋菊的妈妈思想守旧，她让两个儿子读书，却让两个女孩在家帮着干活挣点钱来补贴哥哥们的读书费用，秋菊的姐姐为了能争取读书都得精神病了。秋菊自己说，不知道哪来的观念，就觉得要读书，成为知书达理的

人。母亲只让她读到二年级，因为二年级以后就要到别的村去上，离开家就帮不了母亲干活，秋菊说破天，妈妈也不让秋菊去读书。秋菊靠着他们村生产队长的补课，完成了小学三年级以上到初中的课程，她只是到考试的时候去到外村参加考试，还是队长假借派工的名义让她去考试。秋菊说，妈妈要求的农活一点也不能少，规定每天纺二两线，但自己要写作业看书，只好叫来小姐妹帮助纺线，自己抽空写作业，或者晚上纺完线之后借着月光看书。不能烧家里油灯，看书被妈妈发现就会把书烧掉。总共烧了四本生产队长给买的书，这样也勉强地上完了初中。

C：南小芬——读书是为了改变自己女孩子受欺负的命运

南小芬因家庭贫困，从小被送到养父母那里。养父养母家里只有她一个孩子，所以到了上学的年龄就让她上学了，她的父母说去上两年学吧，回来能算帐就行。没想到她努力学习，不但读到了高中，也考上了大学。这对一个出生在 30 年代末的贫困农村女孩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南小芬所讲述的上初中、高中的经历可见一斑。

好几次家里因为穷让我辍学，但我都挺过来了。要去考初中，没有路费和学费，村里的人看我有出息不错，看着我跑到那么远考试，这个人给几尺布，给鸡蛋，给床单，给不了钱啊，就凑起来，拿到集上卖，凑了点钱，这就去了。我们县里没有初中，我要上省重点，我就去考去了，180 里地，走 100 里地，坐火车 80 里地，40 个男孩加一个女孩，吃了饭之后就走，背着小麦烙的饼，走一黑夜走 100 里地，到那里后再买个火车票。52 年的时候考 6 门功课，考三天。饼都长了毛，喝凉水，那个时候这么吃也不拉肚子，还考得很好。上到高中我就拿了二等助学金，一个按成绩，一个按照家庭贫困程度。一等助学金就是家里人数多的，二等就是 8 元一个月，那个时候 8 元就很了不起，留下 2 元给我的养父母，6 元吃穿用都在里面。

她们的求学故事中，展示了幼小的她们如何与她们贫困的家庭生活抗争的精神。从她们的家庭对待女孩子的读书的事件，也看到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并不是铁板一块，是可以松动和冲破的。她们和作为女性的命运抗争，在抗争中显示了自己的主体性。艰苦的环境造就了她们吃苦、勤奋的品质，也锻炼了她们既承担家庭责任又能把学习兼顾的合理安排时间的能力，这些品质和能力成为她们从众多的同龄人中脱颖而出的特质，并在后来的从政生涯中持续地发挥着作用。

我很好奇，她们的求学动力和勇气从哪里来？她们怎么可能和女孩子的身份以及家境贫困的命运抗争？在下面的故事中，她们都谈到自己动力和勇气的源泉来源于当时的环境

以及榜样的作用，也来源于父母对她们的支持和榜样作用。

（二）以榜样为镜，塑造自己的主体性

前面说过，榜样是意识形态征召主体和认同的手段，在秋菊和淑华她们成长的不同阶段，国家已经根据形势的需要塑造好了榜样，她们只要模仿，努力使自己成为典型的样子，就可以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这些典型不仅是英雄人物，也可能是周围的人、自己的父母。媒体在树立榜样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A： 父母的榜样

家庭是人的社会化的最初场所，是人从个体成为主体的第一步。父母对一个人的人格塑造中有非常大的作用（郑世仁，2000）。对本研究中的女领导干部来说，出生后的榜样首先来源于父母的言传身教。

淑华和南小芬都提到说父母（养父母）的善良、开明对她们的影响很深，没有父母的支持就不可能上学，和她们同龄的姐妹们很早就嫁人了。淑华说她的父母虽然一辈子都不能给女儿任何的物质上的东西，甚至带给女儿很大的家庭负担，但他们在最大限度内，用善良、开明支持淑华离家去参加工作。凤楠说，母亲几乎影响了她为人处世的很多部分。她对母亲的评价是一个小脚妇女，没有文化，聪明、勤快、能干，心灵手巧，家中只有父亲一个人挣钱，要养活五口人，锻炼出了妈妈勤俭的能耐，也培养了我勤俭的特点。说到母亲，凤楠的眼睛中流露出尊敬和骄傲。凤楠认为她个人敢说话的性格也是妈妈的遗传，妈妈甚至训练她们说话的态度和语气。

我觉得遗传基因挺重要的。我的性格脾气都特别学我妈妈，我妈呢就是特别敢说话的一个老太太。

我妈妈也让你说话，你越不说话越憋着她越生气。她也允许你跟她掰扯¹，但是你不能没礼貌，横眉厉目不成，你有话你可以慢慢说。

我妈的每一句名言，我都记得，到现在为止，都是如此，就是“过日子不得不俭省”。俭省到什么程度，没跟您说吗，一个大铜子，没有盐吃了才能破。

“待人不能不丰盛”，家里有什么好吃的自己舍不得，来了人就拿出来给人家吃。所以对于我来说，就好像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也处处就是老是替别人想。我现在说我儿子也是，时不时我就得敲打敲打他，什么事都得为别人着想，那不能光自己适合就做。

¹ 北京土话，顶嘴的意思。

凤楠最看重的是孝顺，她对自己的父母和公婆很孝顺，也教育儿子必须对老人尊敬和孝顺，因为父母给她们太深刻的教育和印象。

我爸爸，就是善待父母，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到现在为止，我们也依然把孝敬父母作为百德之首，孝字为先，就孝敬父母。我婆婆是公公的第三个老婆，前两个去世了，带过来两个女孩。结果我爷爷比我奶奶先死的，我爷爷死的时候让我奶奶说你怎么着，你是回你老家，回你娘家去，还是说跟着谁过，因为他四个儿子呀，结果就说跟着我爸爸过，因为我妈孝顺啊。我舅舅很早也过世了，留下表哥、表弟，舅妈家太穷，就喊着改嫁。结果也是我爸和我妈救济他们一家，好歹舅妈没改嫁拉大了两个孩子。父母都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我对我的公婆也非常孝顺，左邻右舍的人都说娶了个好媳妇，我也教育儿子孝字为先。

做一个好女儿、好儿媳、好母亲，这是她们的父母从小给她们的教育，母亲也给子女树立了榜样。这些教育深深扎根于她们的成长中，长大后。她们同样也教育自己的儿子孝敬父母，这就是家庭对一个人教育传承的结果。

B：周围人的榜样力量

除了深受父母的影响之外，周围的人也是影响她们成长的重要因素。

榜样也并不只是来自于那些劳模和典型人物，身边不经意的人或者事情或许也会影响她们的一生。我很好奇那个时代的淑华和南小芬为什么有那样强烈的上大学的愿望。淑华说，她的求学动力来源于她的一个亲戚。

我小的时候，我的邻居家、村子里有那么两家他们都是大学生，他们的孩子都在北京，他们穿的、住的、戴的、言行举止都和别人不一样，我就觉得好像文明程度很高，觉得他们很有出息，非常羡慕。另外我喊姑姑的人，也是大学生，他们是我的榜样，我也要向他们一样，上大学。那时候有一个信念，上学了就聪明，不上学就没有出路。我上学就是为了将来能考上大学，改善自己的命运，改善家庭的命运。

在整个求学的过程中，能够支持淑华和家庭困难抗争的动力是要上学、考大学、改变自己命运和家庭命运的理想。这个理想就是镜像——那个虚构的镜像，是一个强大的动力

源泉，淑华从镜像中看到一个上了大学改变自己命运和家庭命运的人，似乎也能想象自己的家庭可以和邻居家有大学生的家庭变得一样。淑华同时也发现，从现实中的我到镜像中的我的距离正在缩小，她付出了努力，学习成绩就好。读到初中，自己的学习能力被老师用支持读书的行动证明了，淑华深受鼓舞，反过来也更坚定了淑华读书的决心，增加了抗争的勇气和能力，因此她抗争的主体性被发展了出来。

与淑华不同，南小芬上学的动力来源于她对于家庭和周围环境中对女孩子的歧视的愤怒。

我们那个地方是孔孟之乡，很讲究男女有别、孝道，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我们那里男主外，也主内，原因是女的不敢在外面说一句话，家里的事情稍微大一点，就男的做主，像是过节给谁做件新衣服，都是男的做主，女的做不了主，吃饭大家都是半年糠菜半年粮，但是过了年就有饺子吃，也都是男的吃，女的就是年三十吃一回饺子，饺子还得参上些杂粮。男的饺子是有肉的，女的是素的。白菜瓢让男的吃，白菜帮让女的吃。女的动不动就挨打受骂，男的在外面有不顺心的事情，就把气撒在女的身上，我好像觉得那个时候家庭没有和睦的，男的都是横鼻子竖眼，我的养父对我的养母动不动就哼哈地，自己就觉得这个女的怎么了。女的生孩子，女的下地干活，干完活之后就赶快做饭，做完饭之后伺候着男的吃，女的又赶快洗锅刷碗，喂猪喂羊喂孩子，累得贼死，男的就休息一会，男的不如意就打一拳、踢一脚女的，自己觉得太不公平了，觉得自己将来结了婚也是这样？那个时候成立农妇会，儿童团等。我记得有一次开妇女大会，站在台上的是男的，大家都站在底下笑，那个人就说，为什么是男的当，因为你们这些老娘们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事情也不会做，你们怎么能组织妇女生产？斗地主？你们在底下坐的这些所有的人上来，谁给我讲上十句比较顺流的话，我就让谁当妇联主任，我这个大老爷们，做你们这些老娘们的事情，我不愿意干，是组织上强迫我干的。下面一片人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说话的，我那时9——10岁，觉得太丢人了，怎么能这样呢，一片人没有一个识字的。自己从心里对这种状态特别反感，为什么女的不行，自己在同龄人中不能让男的把我欺负下去。

南小芬说，当时感觉太难受了，就暗暗下决心，自己一定要努力学习，有一天自己站在上当妇女主任，不能让男人这么瞧不起女人。我很好奇地问南小芬，当时女的都不敢

说话，为什么她觉得自己一定就行？

南小芬说，那个时候，村里有一个地主家，他们家有个女大学生，女的上了大学在城市里工作，穿得都和别人不一样，说话有条有理，她说话就让人舒服，而且也是一个什么干部，很多男人很尊敬地称呼她，我就想成为她那样的。再说那个时候也容许女人上大学、当干部，自己的学习就比男孩子好，她就坚定了一个信心，女人也能行，我一定能行。对南小芬来说，学习的动力不仅来自对歧视女人的气愤，也是因为她身边有榜样可以模仿。女的可以比男的强，这不仅是理想也是现实，榜样就成为了南小芬很长时间奋斗的动力，后来就变成一种习惯，她带着一种不服输的劲头，硬是从小学读到大学。命运很有趣，南小芬从小就不甘于被男性欺负，她在领导岗位上站的最后一班岗是从事妇女教育事业。

榜样的作用是巨大的，榜样如同一面镜子，告诉你只要模仿她通过努力你也可以达到。最终是否能达到那个目标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路上你努力朝着她走过去的时候，你的生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我十岁左右的时候，看了一部《女飞行员的故事》的电影，这部影片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电影中描述了一些普通女孩成长为女飞行员的故事，这些人物形象在我脑海中扎了根，给我这个当时没人重视的女孩一种希望和鼓舞。给当时中国少年报的知心姐姐写信问怎样可以当上女飞行员。我羡慕她们穿着军装的神气，立志长大也要当女飞行员。之后我缝制了沙袋，绑在腿上，像电影中的女飞行员那样，每天早上练习跑步，锻炼和早睡早起的习惯就这样被养成。我没事的时候，常常一个人爬到房屋顶仰天躺着看着天上的飞机，让自己的灵魂跟着飞翔，想象着自己开着飞机将是怎样的惬意；那种看着天空神游的习惯至今仍是我放松眼睛和大脑的方式；我开始在没有父母的逼迫下刻苦学习，使我成为姐妹中、小学班级里唯一上了大学的人；这一系列现在看来傻傻的举动，却成为日后我发奋学习的动力，成就了我能够在 80 年代初从偏远的青海考上大学来到北京的梦想，我没当上飞行员，却一下子飞出青海飞到了北京。一部电影成为我努力的目标，从一个行为变成一种刻苦努力的习惯，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自己的命运。

尽管我们是不同时代的人（淑华和南小凤都是 50 年代上学，而我是 70 年代上小学），当我个人的经历和淑华、南小芬等对接的时候发现，榜样都成为我们成长的重要动力。

C：英雄人物的榜样力量

80 年代之前，各种媒体和各种场合中劳模、英雄人物一个接着一个的宣传和教育，形

成轰炸式的思想教育攻势，让你无暇反思。我自己出生和成长于 60、70 年代，那个年代开始学习雷锋精神，我们劲头很足，每天读雷锋的日记，学习雷锋做好事不留名，每天琢磨着做点好事，写关于学习雷锋的心得笔记。童年里有趣的记忆很多和学习雷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模仿榜样，慢慢锻炼了我热心帮助别人的品质，从帮助别人中也得到自己的价值的认同。

凤楠她们出生于 50 年代，成长于 60、70 年代，更是在英雄人物的熏陶和浸泡下成长起来的，凤楠说：

“我这辈子就是父母给予的，完了就是时代给予的，什么时候都有榜样。我就觉得我是英雄鞭策下长大的好孩子，我最崇拜的英雄就是江姐¹。文化大革命当中啥书都不让看，我能看的、印象里最深的第一部小说是《红岩》，没皮，前两页撕了，从第三页开始看的。看了后，我就被江姐感动了，我要学江姐，我就觉得江姐面对敌人宁死不屈的精神，坚持正义的精神就是我这一生当中做人的榜样。反正这一生，您说形成了什么东西，怎么形成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一个就是家庭的教育，一个就是真的学习英雄人物。妈妈让我有话要说出来，江姐敢于坚持正义，我觉得我那时学得太真了。从 63 年就开始学雷锋，后来什么王杰²多了去了，我都数不过来了。在他们的影响下，我 13 岁入的红卫兵，14 岁就写入党申请书了，而且特别郑重，就觉得要向更高的标准看齐。那时就觉得共产党员太棒了，太高大了。那种虔诚啊，我觉得我心目当中的共产党员就是江姐，雷锋，毛泽东，周恩来。所以形成了我这个人看不惯的事情就管，别人不敢伸头的事情我出面，好打抱不平的性格。”

凤楠说，在榜样的精神的感召下，自己热心地帮助同学，为了送没有拿雨伞的同学回家，自己骑车带着同学，同学在后面打着伞，雨太大，自己全身被雨淋透，那时正好来例假，结果导致闭经以至于后来落下病根，结婚后很长时间无法怀孕。有一个同学没有钱买一件打篮球的背心，其实只需要 2 元钱，凤楠就从每天妈妈给的两毛钱的生活费里抠出来 2 元给同学买了背心，结果自己很长时间只能吃一碗面条。这样的好事不胜枚举。凤楠说，她今天能够接受我的访谈也依旧是这样帮助人的心所驱使：

¹ 江姐是由罗广斌和杨益言 1961 年创作的一部小说《红岩》中的代表人物。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其中讲述了江姐为代表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被叛徒出卖后被捕在监狱里受尽各种酷刑，宁死不屈，表现出了共产党员的品质和气概。该书中所塑造的形象一出现就成为激励当时一代的榜样。

² 王杰，也是一个英雄人物，1942 年 10 月出生于呼伦贝尔市阿荣旗，19 岁入伍成为某装甲师工兵营一连的一名战士。不久后，王杰因为表现突出被任命为班长，并且连续 3 年被评为五好战士，两次荣立三等功，被授予模范共青团员和一级技术能手称号。1965 年 7 月 14 日，为保护 12 名民兵和人武干部的安全，他毅然扑向即将爆炸的炸药包，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牺牲时年仅 23 岁。

其实就是杨老师，我跟您聊会几天，我觉得也带有这个意思。我觉得您读博士，非常非常不容易，我打心眼里就很敬佩，因为您也讲过您的故事，您那么晚要孩子，带着孩子给我们讲课，那小不点，那么困难，我觉得您能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去读博士，我觉得打心眼里我应该去支持您。其实很多事我也知道，说出来以后，未必是件好事，也未必就一定对自己是好事。但是我觉得肯定对您好，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只要我和别人相处的时候，我做一件事，别人得到帮助了。我跟您说，我打心里，我觉得真是一种幸福感。我觉得好像我这个生命的价值就增加了一点。

我很感激风楠。风楠、淑华似乎都是带着同样的心境来帮助我完成论文的。她们觉得即便我的研究对她们来说带着风险¹，但如果冒着风险能够帮助我这个朋友（我和她们的关系中没有利益），能够对研究中国妇女参政起点作用，她们也觉得值得这样做。我相信！因为我从平时与她们的交往中能够深深体会到她们热心的品质，尽管她们深浸于名利的官场却能保持朴素交往朋友的品质，这与她们成长中各种积极正面向上的榜样形塑作用是分不开。我甚至很怀念我们那个有榜样的时代。尽管从今天的人们看来很傻，很幼稚，但是却对我一生怎么做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自己成为别人的榜样

从学习榜样到自己成为榜样，经历了一个学习和被学习的过程。在被学习的过程中，她们的一言一行放置于公众视线之下，者对于只有十几岁、正在形成价值观的青春期的青少年们来说，对其成长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项对女领导的调查显示，女性领导大多数在求学时期担任过学生工作、社会工作（指一些位同学开展的服务或者社会服务，不是专业社会工作）、当过学生干部，且都承认对她们的能力是很大的培养²。我曾配合别人的一个研究，当时我访谈过的6个北京个大学的女校长，她们今天走上领导岗位，与枫南、淑华她们一样，都是从小好学、好强、不服输有关，在学校里一路上担任班干部、学校干部，开始了“从政”的历练。

¹ 有风险的意思，我觉得就是她们都是在职的领导，她们和我谈及的都是一些在面上无法言说的东西，我的研究很可能出版，这对她们来说带着一定的风险，这个风险不仅是对个人的，也是对体制的。

² 来源：中国新闻网 <http://news.sohu.com/20081001/n259823143.html>.

南小芬说，在小学，因为我很爱念书，我也爱张罗事情，人家看着我能张罗事，比我年龄大的人也有，就让我临时负责，后来选举选上我当上班长了。到小学六年级毕业一直是班长。从初中到高中一直是学生会主席，大学是保送¹的。

上了大学之后，系里决定由让我当学生会主席，但前任是个男的，他不同意，因为那个时候女的当学生会主席的很少，担心我领导不了。他们商量了很久，决定让我当，但要参加选举。选举就是要当着大伙的面讲话，那个时候男女都抛投露面的很少，一到面上都说不出话来，我不怕，我就是敢冲敢打，很愣，我就去竞选。我的宣传鼓动能力比较强，加上我很爱好体育，打篮球、跳高等我都参加，我初中、高中、大学都是篮球队长，我在外面活跃，也到处讲，造影响，那个时候谁这样做啊，所以很多人认识我，这是我当选的资本。我个人就觉得，什么事情都要走在前面，否则你怎么让人家服你。

南小芬能冲敢打的个性，成为她之后从政路上的一个特质，在她整个从政的历程中，不能输给男人、我要各方面都比别人强等个性也暴露无遗，她善于制造影响和舆论的能力也成为日后她从政的一个特质。她常常语重心长地教育我，只埋头做事是没有用的，要善于造势和展露自己，这些都是她从当班干部开始积累的经验，她一路上当先进典型，官位也越来越高，如果用“女中豪杰、男中丈夫”来形容她一点都不为过。

凤楠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就当选为中队长，她总结自己总是被选为班干部的经验就是两条，一个是学习好，一个就是热心。她说自己从小学当干部的经历就预示了她将来政途的坎坷。有一次她和同学之间发生了点事情，她觉得老师的批评不对，就和老师顶嘴，结果从中队长²的职位降到小队长。文革开始后，她担任了学校红小兵的副政委³，后来到了红卫兵副连长、连长，最后是学生会主席，她说总是当头，没下来过。不过她敢于和老师冲撞的勇气和性格也带到她从政的路上，为此经历了很多的挫折，这一点我们将会在后来的章节中提及。

担任班干部，意味着她要担负起照顾同学的责任，她说很多时候她就是一个家长和班主任老师的角色（班主任也把她当成一个得力的助手），什么事情都起到带头和模范作用。老师给全班同学说，凤楠就是你们的榜样。凤楠说老师给我是多大的信任，我怎么也要不辜负老师的期望。

¹ 保送制，是从高中直接选送上大学而不需要经过考试的品学兼优的学生。

² 学生干部的层级划分。小学里的学生干部划分为大队长、中队长和小队长，相当于班长、学习文员和小组长。

³ 按照部队的编制，现在看来相当于学生会副主席。文革时期的特殊产物。

我就觉得我上学的时候，学习最重要，但是也没有我这个学生干部的工作——为人民服务重要，这学习是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而且是长大了的本领，现在这为人民服务是最直接马上的给同学服务。我跟您说，我做同学工作比老师都多，我们同学，我们初中班的同学，不仅同学跟我好，很多很多家长都跟我特好。

当头总是让人监督着，让人批评着，时时处处都得严格要求自己。凡是组织上要求该做的，没有不去做的。文化大革命当中，要学军吗，那不是要军训嘛，做枪，我把我们家的木头砍着去学校，把我们家的板凳弄到学校去。学农嘛，把我们家的粪，那个农场，一路捡粪，一边捡着粪上学，把那个粪筐搁在厕所后边，完了下学的时候再背着粪筐回家，沿路再捡，第二天再背来。就捡粪，因为在大沙滩上需要肥料。有个同学家里非常困难，大篮球都没有一件背心。我就省吃俭用，从我自己的牙缝里抠出2元钱给他买件衬衫，到现在他还记得这件事情。你是大队长、班长你就得带头，而且要帮助别的同学。

国家号召女孩子读书是为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对她们来说，国家的召唤给她们一个读书的机会，她们对读书有着自己的理解：读书是为了改善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女孩子不被人欺负等。这是真实的，而当她们进入学校之后，从她们担任学生干部、成为别人的榜样到她们学习各种榜样，慢慢发展出她们自身的一种精神，成为一种新的形象，这种形象就是新中国妇女的形象——吃苦、勤劳、善良，既有传统的美德，如孝敬父母、恪尽职守地完成传统女人的角色，又能走出家门工作学习，忘记小我、奉献给大我。她们的父母、老师、各种英雄人物、模范典型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的教育都起到了形塑她们成为新中国的妇女的作用，主体性在模仿榜样的过程中开始建立。她们身上具备的素质是国家需要的，是党致力于培养的，也只有具备这些素质才可以适应当时的社会极端贫乏的资源、一穷二白的社会状况，才可以在那样的困难的条件下建设理想中的社会主义。

（四）运动打造社会性身体

社会教育运动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塑造人们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渗透方面也是重要的一种手段。

社会教育在一个国家经过战乱后能够很快地让人民适应社会的公众生活、陶冶人的品质。社会教育很多时候为了满足政治目的，培养合格的“国家公民”，培养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让他变成具有使命感的人，能够自我唤醒，从而达到政治控制的目的（詹栋梁，

1988)。在中国建国初期的几十年中，运动是重要的社会教育形式。透过接连不断的运动，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意识形态迅速地深入到公民的意识和行动中。尽管各种运动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但评价运动不是我的研究目的。本研究中着重看运动对当时女干部的成长产生的积极作用。

新中国建立之后，不断开展的社会教育运动和正规的教育相得益彰。开展各种各样的社会教育运动，借着运动打造灵魂和身体，不仅确立中国妇女对自己的“新”的身份认同，更在全民当中树立了整体性的思想意识。正如前面所说的，党需要从基层、从劳模中大量选拔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些女领导干部们她们能够上学到初中、高中甚至大学，已经成为同龄人中有文化的人。加上她们一直按照党所要求的干部人才成长着——有文化、思想积极、实在、没有私心、维护集体利益、给大家干事特别热心，特别诚恳，这些素质已经让她们在女性中出类拔萃，自然地，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她们就成为幸运儿。那个年代，当官意味着“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能被党选中去做累活、苦活是一种很高的荣誉和成就。

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为她们提供了锻炼和展示自己能力的机会。她们的灵魂和身体被这些连续不断的运动所锻炼，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每一次政治运动不仅要塑造她们一心一意听党的话的灵魂，同时也将她们的身体打造得必须和男人一样。在运动中大力提拔女干部的政策，为她们参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男女都一样，男的能干的女人也能干”的倡导，也为她们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A：参加“四清”运动，对身体的锤炼

50、60年代各种政治运动不断，为她们创造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使她们从这些运动中脱颖而出。1958年—1960年的“大跃进”¹运动以及1963年—1966年的“四清”²运动，不管现在的人怎样评价这段历史，但在当时，从客观上产生了大量的妇女劳模并在她们走上领导岗位中起了积极的作用³。那些运动锻炼了她们扎根基层、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一定的领导能力。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也重视大量从基层劳模中选拔领导干部⁴。报刊杂志上树立大量从劳模起家成为高级领导干部的先进事

¹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资料来源：
<http://baike.baidu.com/view/8601.htm>。

² 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四清运动对于解决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作风问题 and 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
<http://baike.baidu.com/view/8601.htm>。

³ 资料来源：《新中国妇女参政的足迹》，p84，党史出版社，1998年。

⁴ 资料来源：《新中国妇女参政足迹》，P82，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

迹，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们纷纷效仿的榜样。淑华、南小芬的参政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淑华说，她成为正式的公社社员之后，很快就选为大队妇代会的副主任。因为吃苦、能干，不断被评为青年积极分子。6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4年，19岁的时候，县上为“四清”运动借调干部，从各公社推荐、县委组织部确定，公社就把她推荐去了。运动到了第二期的时候她被任命为组长，那个时候工作组长都是公社书记担任，而且基本上都是男的，淑华认为选择她是组织对她的信任。当把这些“四清”干部当作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来培养，所以给她们压担子。为了工作，她一年都不回家。工作就是在农民家里转悠，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农民建立深厚的感情。到了四清的第三期，组织就让她当了工作队的副队长，组员来自天津的、北京的、本地的一些大学生，她觉得领导这样的一群大学生压力挺大，但锻炼也大，他们有些知识、有思想，对她影响也比较大。因为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她锻炼也主动依靠他们、听他们意见，虚心成为成为日后她从政中一个重要的品质和策略，当她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的时候，她首先虚心向老同志请教，向他人学习，从而弥补她知识水平的局限。为了服众，她说在工作上事事要走在前面。她讲述了带头打井的故事，她当时带领都是男人，为了不受寒，他们喝点酒就下去了，她是小姑娘，没沾过酒，也害臊，就这么也跳了下去，一下去一干就是一两个小时，用两手刨，在水里泡着，工作很艰苦，付出的劳动强度也比较大，她现在的腿病就是那个时候烙下的病根。女人首先是从身体的反应开始回应带给她的压力。

“四清”工作期间，也是一个主张极端男女平等的时代。进入“四清”工作组，也是淑华第一次闯进男性占主导地位的领导圈子里，她没有意识到女人和男人有什么不同，她不仅和农民同吃、同劳动，实际上也和男同事一样同劳动。打井这件事情就足够说明了这一点，男人打井，女人也一样跟着下井；但男人喝酒暖暖身子再下去，女人就不敢喝酒，传统的性别文化不同了。这点身体的不同，当时决不能提，也必须克服，否则就会让男的瞧不起，无论怎样要和男人一样。在我们党所给的镜像中，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女性和男性一样工作，变成社会性的身体，却没有考虑到现实中的女人和镜像中的有很大的差距。

“四清”运动是要让大量的城市干部或者知识分子到农村中去，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塑造她们的身体和灵魂。的确在这场运动中，她们体验到了生活上艰苦和党的组织、纪律的严明，运动本身的目的是查干部的物质和作风问题，因此这些派去查的干部自然要以身作则，南小芬描述了当时他们工作队的一个故事：

我们一起去的同学住在老乡家，老乡很好，我们胶东有一种叫毛芋头，蒸了以后摆到桌上，也有饼子，我们两个人感觉毛芋头是最差的，因为带着毛，实际上这是很好的东西，我们规定吃东西不许剥皮，我们吃了几天之后大不下大便，急得直哭，因为肠子里裹缠着毛，大不下便来，其中有一个人就去队长那里告状

了，以为在农村吃不了苦，组织就找她谈话，她哭，就说拉不下屎，结果到了医院开刀了，肠子里的裹着毛的东西全拿了出来。

南小芬说，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人的思想特别朴实，特别简单，苦累差就是一个荣誉，共产党员就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党章说的，在刘少奇主席《论共产党的修养》¹中也是这么说的。”作为党员必须以身作则。

B：文化大革命对意志的锤炼

“四清”运动结束之后，很快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²。面对复杂的文化革命，对女领导干部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意志考验和历练。只有在文革中经受住政治冲击和考验的干部才可能在文革结束后依旧担任领导职务。

秋菊的参政是从文化大革命朦胧开始的。说朦胧是因为她是在文革冲击下被架着走的，她的参政经历十分有趣。

文革开始，学校全面停课，这个时候，一直教她读书的队长也被红卫兵夺了权，队长靠着自己的威信硬是把秋菊选为队长，每天负责给大家派农活。用秋菊的话说，之所以选择她是因为对她的信任，知道她是一个有主意的人，不会别人说什么她跟着跑。秋菊说自己的性格深受曾当过大队长的父亲的影响，十分正直。秋菊那年15岁，哪里懂什么派活，队长就每天把活写在一张纸上，每天被游街的时候，走到秋菊家门口时，把纸条塞到秋菊家的门缝里，到派活的时间秋菊就拿着纸条去派活。等到2个月之后红卫兵发现这个秘密的时候，聪明的秋菊已经很熟悉怎样去派活了，队长就这样当了下来。后来红卫兵要夺她的权，号召大家开会，那天正好是收庄稼的时候，眼看着天要下雨，秋菊号召大家抢收粮食，结果就他们队的粮食没有损失，其他队都开大会取了，粮食全部被水淹了，老百姓从秋菊为老百姓着想的行为从此在老百姓心里沉下了分量。当时，发生了一起红卫兵要枪毙一个支书的事件，秋菊和她父亲两个人冒险连夜把这个人救出去藏起来，那个经历真的在电影中才能看到，秋菊说她相信她父亲，相信这个支书为老百姓做了很多的好事情，所以就觉得红卫兵做得不对，晚上她爬到关支书的院子的树上，把绳子拴在树上，自己顺着绳子下到院子里带出支书，又把支书托着上到树上，再顺下去。整个过程中那个支书吓得腿都软了，而秋菊说自己一点都不怕。红卫兵知道秋菊一定参与了这件事，加上前面夺权没有成功而忌恨在心，他们就把秋菊捆绑起来游街、鞭打，把她身上穿的唯一的新花布衫抽碎了。老百姓听说秋菊被捆后，全队的人拿着铁锹来到关秋菊的地方向红卫兵兴师问罪，救下了秋菊。这些事件也深深扎根了为老百姓做事情就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的信念，

¹ 1962年，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写了《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成为党员们的学习和对照检查自己言行的镜子。

² 516文件：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也影响了秋菊的一生。秋菊说文革中的各种派别我都不参加，也正是因为文革中她哪派都没有参加，后来才被组织考察后进进了县革命委员会。

南小芬在文革中遭到了严重的摧残，文革开始的时候，她担任公社书记，因为是当权派被夺了权，遭到囚禁。每天被人看着除了去地里劳动，哪里都不让去。

当时所在的公社有两个派别，保皇派和造反派，保皇派保我，造反派斗我。公社两个中学，老师们就指派学生斗我，用高粱杆打我，打得我直吐血，都走不了路，好心的农民用火罐拔把身上的淤血拔出来。学生小的就用手掐我。冬天让我去除猪圈、牛圈里的粪，里面有水冰凉，膝盖都冻得不能打弯了，老百姓见看着我的人走了，就喊我上他们家暖和暖和。我的腿病就是这样落下的。

文革时期是高度灵魂塑造和高度打压身体的一个年代。秋菊和南小芬在文革期间其身心都经历了严重的摧残，然而她们依旧相信党、相信组织。在那种混乱、复杂、风云变幻莫测的文革中，能有自己清晰的政治立场并能坚持，表现出了她们的远见卓识。如果这些干部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以及在文革中能够选择一个正确的立场，也就没有后来继续在领导岗位上展示自己的机会。

C：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对城市里出生和长大的凤楠来说，上山下乡¹是一个踏上从政之路和从政前重要的历练。这段经历中，不但考验着她们的一颗“红心”，而且考验着身体是否可以支持那颗“红心”。

1975年，凤楠高中毕业后正赶上上山下乡，她就下乡了，下乡后，她被选为知青组的组长，半年后成为妇女队的队长。作为一个知青组的领导，她什么时候什么事情都要身先士卒，和男人、当地的农民干的活以及分量都一样，不仅如此，自己完成了割麦子的任务后，还要帮助身体弱一点的知青，因为这是一个团队，谁也不能拉下。期间她为了教育懒惰的女知青，和她发生冲突，气急之下打了人家一巴掌，她说这下把自己的党票（她正在被考察入党的过程中）也打飞了。那个时候记工分，男人干一天一样的活却记12分，女人记10分，作为妇女队长的她觉得十分不公平，据理力争，最后争取到了。知青和当地村民干得活全部都一样，但工分又不一样，她也去争，挣了半天就是不一样，她没有了办法。

¹ 上山下乡运动指的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资料来源：<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5748992.html>。

凤楠说我就是这样的人，觉得不公平的事情就据理力争，好像这就是自己的责任。因为这样的性格使得她格外有人格魅力，让下属喜欢和尊敬。这样的性格也使得她在当知青的时候没有入党，为未来的从政道路带了很多坎坷。一年后她结束了知青生活，被分到妇联，半年后就当选为妇联副主任，开始了曲折的从政生涯。

秋菊、淑华、南小芬本身就是农民出身，她们工作后一直在农村第一线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出生在城市的凤楠，也因为上山下乡的运动让她和农民艰苦的生活贴近，她们能够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感情和素质，不仅仅通是过宣传教育就可以具备的，而是各种运动让他们的基层艰苦的生活中经过千锤百炼而形成和扎根的。。

新中国妇女主体性表现在突破种种的困难求学、走上社会参加工作和劳动，在不断的锻炼中认同自己作为新中国妇女的形象，也在积极走出社会的过程中建立了新的身份认同，那就是一个全新的、奉献的、吃苦耐劳的、争取和男人一样的人。

三、成为女领导-----社会性身体的形成

新中国妇女所建立的吃苦耐劳、勇敢走出社会并在之前男人一统的天下开辟出一片天地，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这是她们抗争和奋斗的结果，这就是她们的主体性。而成为女领导是新中国妇女的又一个重要进步和伟大创举。从新中国妇女到女领导干部，是前面所说的在建构“新中国妇女”形象下的必然结果，是一个象征意义。其中必须有论述的介入以及有一套贯彻论述的技术。而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的政策、论述以及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则是新中国妇女能够成为女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80年代之前，相对单一的国家主导论述也导致了相对单一的、比较普遍化的主体性（尽管仍有能动性和抗争，这点在后面第五章中体现），然而在80年代之后不同论述出现了多样的主体性。

（一）党的政策保证新中国妇女成为女领导干部

5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民主妇联开展了“鼓励妇女参加普选”的运动，目的是建立全民的民主意识，保证基层民主生活制度化，保证新中国的妇女能够和工人阶级、广大群众当家作主。对经历了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上百年的资本帝国主义奴化渗透并且已经在心里有很厚的积淀的中国人来说，这次的民主建设可以说是大规模、全方位的一次意识启蒙，这期间许多妇女担任了各级人民代表和政府的领导职务，为全体妇女

树立了榜样。《在农业社和基层政权工作中，妇女骨干分子越来越多》¹中提到：“山西省有一千二百二十一个农业社有了女社长。据河南省九十一个县的统计，有89%以上的合作社有了正副女社长。贵州省90%以上的高级社有了女主任或副主任，平均每个社有二个到三个女社务委员。黑龙江省九百九十六个乡中有八百六十四个乡有女乡长。贵州省在去年基层选举后有二千零五十九个乡有女乡长，比选举前增加三倍多。如此高的妇女参政率，普遍提升了人们对妇女能力和作用的认识，疾风暴雨似地清洗着人们的封建思想，为妇女能够参与政治和成为女领导干部打下了基础。1949年建立了全国妇女干部学校，专门培养妇女干部。

60年代末到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毛主席“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等思想的指导下，妇女参政的工作进行的如火如荼，全国各地都积极地选拔、培养妇女干部，在选拔和培养妇女干部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妇女干部无论在数量还是在其发挥的作用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从1969年——1974年间，关于妇女干部培养工作的方向也发生了变化，主要关注的是妇女干部的培养工作，各地都总结了很多培养妇女干部的经验。到1974年，妇女干部的工作转向关注阻碍对妇女干部进行培养的因素以及如何消除障碍的措施等。女领导干部们在为党的事业而参政的主体性在不断的运动和对人们思想、身体的改造中确立。

到了90年代，中国共产党针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越来越严重的包括妇女参政在内的各种妇女问题，再次从法律上确认“男女平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并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²。在95’世妇会和国际社会的推动下，中国制定了更加明确和具体的保护妇女权益的各种法律，如92年出台的《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简称《妇女法》），是中国第一部专门保护妇女的法律，尽管很多条文比较笼统、很难操作，但再次规定了妇女在各方面的权利。在95’世妇会发表的《行动纲领》³，本身就严格规定了妇女在各方面应该享有的权力和为此行动的方向。借着95’世妇会的推动，中国政府把“男女平等”确立为国策⁴，国策就是立国、治国最基本的政策。95年7月出台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这是第一个政府专门对妇女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从此把妇女工作纳入政府的工作范畴而不仅仅是妇联的工作，促进了政府对妇女工作的重视。2001年《婚姻法》的修改版有了比80年代之前更加明确和具体的对妇女权利的规定。除此之外，90年代三次国家人事部和全国妇联联合出台的“关于妇女参政”的文件⁵，旨在从法律上进一

¹ 《人民日报》，1957年3月3日，第三版。

² 1991年3月8日，在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以《全党全社会都要贯彻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题的讲话，其中将马克思关于妇女解放的论述结合中国妇女解放实践进行了发展和高度概括。资料来源：《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³ 95年在中国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通过了《行动纲领》，是对全世界妇女运动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其中全面规定了妇女的各个领域的权力。

⁴ 1995年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时任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大会上向全世界人民宣布“男女平等”为中国的基本国策。

⁵ 参阅第二章中关于三次会议和出台文件的详细内容。

步确立了执政党关于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推动妇女参政，改变目前妇女参政持续低迷的状况。可以说，各个时期党的提拔干部的政策对妇女参政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无论是 80 年代前或者后，女领导干部们的升迁几乎都是靠着每个时期的政策而提拔的，没有政策的特别规定，女干部的参政状况就会滑落。60 年的妇女参政出现高峰和低谷，都与国家的政策息息相关。我访谈的女领导干部们的参政经历几乎都证明了这一点，没有保证比例政策，她们就很可能没有从政并参与到高层领导岗位的机会，当然保证比例的政策也导致她们走入到一个参政瓶颈中——那就是一个领导班子中只有一个。

A：靠政策被动提拔

靠政策被动选拔和提拔，在 80 年代之前和之后都是一个显著的妇女参政的方式。

50 年代到 70 年代，党一直重视和加强对女领导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工作，才有了淑华、秋菊等女干部成长为女领导干部。关于政策的文献在前面第二章的开头部分已经提及。在淑华和秋菊的故事中，1974 年她们两个人分别从副处级的位置（副县长、县委常委）被破格提拔为地委常委¹（副厅级）。用她们的话来说，做梦也想不到，好像坐了直升飞机。即便在今天都是女领导干部参政的一个瓶颈，很少有女干部上来。我好奇地想知道 1974 年是一个怎样的年代？是巧合吗？翻开历史的画卷，发现在那一年有很多关于女干部的参政状况的调查反映参政中出现的问题，其中有一篇比较典型的调查报告（人民日报，1974 年 1 月 16 号）写道：

这个县有五百多名妇女参加了各级领导班子。从县、公社到生产队，领导班子里都配备了妇女干部。但是，大批妇女干部被选拔到领导岗位上以后，其中有些人却被留在机关里守电话、当收发、忙接待。县委认为，这反映了在培养干部问题上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便组织各级党委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妇女工作和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系列指示，批判重男轻女的旧思想，使各级党委提高认识，积极组织妇女干部走出关门。

这篇报导暴露了当时女干部选拔和使用的问题，大量从基层选拔出来的女干部，被放在机关中做一些简单的服务工作，并没有放到重要的岗位上。借着正在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²，各地妇联将对女干部的忽视和儒家思想中对妇女的歧视联系在一起，大作文章，把女

¹ 地委常委，如果当选为地委常委，一方面从级别上到了副厅级干部，另一方面就进入了核心的决策层。

² 1973 年 7 月，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认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毛泽东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目的是为防止所谓“复辟倒退”，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江青一伙接过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口号，经过密谋策划，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1974 年 1 月 18 日，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

干部选拔和使用的问题出现和当年发动的批林批孔的运动相结合，类似“批判‘男尊女卑’谬论，积极培养妇女干部”¹这样的文章在1974年全年的人民日报中频繁出现，借着批判儒家思想中对妇女的种种歧视²而推动了妇女的参政局面。这种方法通常也是全国妇联惯用的一种抗争手段——借力发力，借着某种国家的政策和运动来找到争取妇女权利的途径。淑华和秋菊都是在这个背景下经过组织考察之后放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上，两人的经历有很大的相似性，秋菊说：

“1974年，省委组织部来考察我，是让我当常委这个事的。之前我一点也不知道。考察完之后，当年的二月份被任命为常委。”

淑华也经历了和秋菊相同的事情，事先不知道，被一下子提拔县委常委的位置上。她们这段被提拔的经历说明了党为了大力从基层选拔优秀的女干部被派到重要的岗位上的，采用坐直升飞机的方式，足见当时的舆论和国家倡导的意识形态对女干部的重视。

淑华说，老百姓形象地描述了80年代之前的参政状况：“50、60、70年代工农兵、80年代大学生”，她们那一代的女干部都是从工人、农民中大量提拔的，而到了80年代后，国家的政策变了，女干部的选拔条件也变了。

80年代初，国家把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知识分子成为国家需要的干部人才。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几年，国家需要大量有文化的年轻干部担任领导职务以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1983年7月6日—7月2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会议强调以改革的精神加速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改善领导班子的结构，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改革干部制度，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的。³该政策不一定要促进女干部的提拔，但当时仍在遵行领导班子中至少有一个女干部的政策，所以很多从事专业的、在自己岗位上比较优秀的女性就被突击提拔上来。

凤楠说，1983年她在27岁的年龄，也被破格提拔为妇联副主席的职位，这是一个副处级的职位。

这个运动从1974年年初至同年6月，历时半年左右。在这期间，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之机，到处煽风点火，大搞“影射史学”，批所谓“现代的儒”、“党内的大儒”，露骨地攻击周恩来；他们借批林彪“克己复礼”，影射周恩来1972年以来进行的调整工作是“复辟倒退”、“右倾回潮”；他们还极力吹捧“女皇”，为其反周“组阁”阴谋大造舆论。毛泽东发现江青一伙借机进行夺权活动以后，对他们作了严厉的批评，斥责他们是“四人帮”，使他们反周“组阁”的阴谋失败。这次“批林批孔”运动，不但在历史研究领域和社会伦理道德方面造成混乱，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而且在江青一伙煽动的所谓“反潮流”的冲击下，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出现的各方面工作好转的局面又遭到挫折。资料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193454.htm>。

¹ 1974年10月9号，人民日报。

² 详见《人民日报》1974年1月16日、3月8日文章。

³ 资料来源：<http://www.uname.cn/HisToday.asp?ArticleID=10045>。

因为那个时候提倡干部要“四化”，而妇联中大多数都是没有文凭，尽管我才上电大，但已经属于知识分子了，所以那么多在妇联工作很多年的女干部中就选中了我。当然我别的方面也很优秀。

在《女市长》一书所收集的52位女市长的故事中，大多数都是各行各业的技术人员，在她们的岗位上被干部“四化”的政策提拔到重要的领导岗位。现任某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雷西，曾是得到国家奖的科技人员，一夜之间突然被提拔为厅级领导干部，她的经历在当时这批知识分子干部中很有典型性。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我是不愿意从政的。我原来是一个很有成果的科技人员，而且很有造诣。我是64年大学本科毕业，就属于老三届¹的学生。到了83年，我在国内比较有名望了，拿了十几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奖，又评上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有很多光环带在头上。83年的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届人大会议，我被选上了全国人民代表，并且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应该说那是我事业的最高峰的时候。正在这个时候邓小平的“四化”政策下来了，要从有成绩的有才能的有造就的知识分子中要拨一批当领导干部。因为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基本上干部队伍都是老红军，老干部，懂经济、科技的不多。当时十二大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干部的四化政策成为热门的课题。那个时候就硬要把我放到领导岗位。83年上半年，组织部长就很意外地从试验室把我找去谈话，让我走上领导岗位。当时年轻知识分子从政已经是一股风，我很害怕。我不愿意从政，我那时候不知道从政是啥滋味，我就是想当居里夫人，所以就不愿意去，怎么谈都不愿意去。后来到了83年底，组织上就突然决定把我调到省经委²当副主任，从工程师一步就跳槽去参政，从政还不是一步一步来，叫做坐直升飞机。我们那时候一批知识分子都是坐直升飞机，因为不可能从科长到处长，已经没有这个忌讳了，那个时候一下子就到了副厅级这个位置。我不愿意去，最后是用共产党员来命令，一定要现在报到。当时我正在承担国家一个很大的项目，我是个科技责任人，我不愿意放弃事业去从政。就在

¹ 老三届：1966、1967、1968 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合称老三届。老三届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当时在中学的高中、初中的三届学生，这批人后来基本都当了知青，之后在文革后期还有继续从中学出去的学生，后面的几届也称为“新三届”，新三届中很多也下过乡，当过知青。老三届的下乡，基本都是到了边疆，东北的北大荒，西南的西双版纳，内蒙等。四人帮垮台后，知青上山下乡的运动也就停止了。这些老三届一般都当过红卫兵。资料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23707.htm>

² 经济贸易委员会的简称，主管经济和贸易。

84 年的 1 月 2 号，胡耀邦、王兆国¹他们到我省过春节，初一的晚上，胡耀邦和王兆国亲自接见我们几个年轻人，我一进去王兆国就找我谈话，我当时是不关心政治，不知道王兆国是何许人也，惹了很多笑话，当时闹着不想去。后来胡耀邦就跟我谈，他们一走没几天我的党案就调走了，就决定就去经委了。

上述的故事是典型的女知识分子从政的路线，也是典型的知识分子身份的女领导干部的心态，崇尚知识而不愿从政。没有从政的欲望一方面表达了自己既符合传统对女人的要求——不要有野心、含蓄和内敛，一方面也表达了自己的能力，没有野心却有能力被提拔，同时也表达了真实的境况，妇女参政很多时候都不是自己主动争取结果，而是一种被动安排。

B：靠政策竞选和竞聘，主动成为一名女领导干部

不同于 80 年代之前单一的靠政策和组织提拔的路线，80 年代后，干部选拔实行了新的选拔机制，引入差额选举制和竞争聘任制²，妇女参政比例措施基本废止。有些女干部靠着干部竞聘政策通过竞选而成为女领导干部，突破了以往被动安排和被动接受的局面，一种新的女领导干部的主体性显现出来。但也因此出现了参政比例直线滑落的结果。

从我成长的过程来看，我觉得主要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制度的改革，我走向了从政的道路。我原来一直也就是搞教育、学术研究。我也想一辈子做一个人民教师。从 77 年考大学、然后再考硕士、再考博士，都是通过考的。从政我也是通过考的。主要是干部制度改革，1998 年我们省公开向社会选拔厅级干部，我就参加了考试。如果没有这种平等的机会，没有这种制度的改革，可能我也没有这个福分。后来就成为大学一名女校长，在我们省的历史上，就我这么一位正职女校长（某省一女副市长³，焦点小组成员）。

¹ 时任国家领导人。胡耀邦为中央总书记，王兆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² 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正处于转型期，两种干部制度同时存在并运行，一种是委任制，一种是选聘制。委任制依然在我国干部选拔制度中占居主导地位，在正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的选拔中采取的基本是这一方式。选聘制是 1990 年代前后产生的一种新方式，一开始是小范围的试点，在副局以下的领导岗位上展开公开的竞聘，继而逐渐推向全国，成为一项选拔干部的新制度。所谓选聘制是上级组织的聘任与民主选举相结合的制度，其主要特点是：上下结合的权力配置方式，候选人要经过民主测评，超过民众 60% 的票数，组织最终决定聘用；引入公开的竞争机制，受聘人进行竞争和考试，按照成绩和分数决定名次；组织部门选聘干部的绝对权力受到限制，一是民意的限制，二是考核成绩的限制。民主选举制度是由选民来推选并经过多数人同意而选拔干部的制度。其主要特点是：选民直接行使选举权，根据自己的意愿推举候选人，选民可以对领导干部实行直接的罢免和有效的监督；上级组织部门只能根据法定的选举程序，组织选举领导小组做好选举工作，而不能提名或操纵选举，否则视为违法。摘自李慧英，“中国妇女参政蓝皮书”。

³ 该访谈资料来自我所做的某省的几位女领导干部的焦点访谈中，一个女市长的故事，不是我主要访问的对象，所以没有编正式名字，特此说明。

上述例子说明，“男女平等”能够在实际的得到贯彻和执行，只要有平等的政策和选拔机制，给女干部们创造良好的参政条件，女性中就一定有人才脱颖而出。不是妇女中没有人才参政，也不是素质的问题，而是一个平等的机会和参政环境的问题。正是因为没有一个常规的、良性运作的保障妇女参政的机制，妇女参政总是靠一些硬性的、突发性的政策保障，这可能是导致妇女对参政没有什么预期和盼望的一个原因，呈现出参政中的被动性。

（二）把自己的前途寄托给党和组织

从她们入党宣誓起，就决定把自己的一生和一切奉献给党，听从党安排。从她们从政的第一天起，她们就走上了一条信靠组织的道路。她们寄托的如此彻底，不仅把自己的思想、信念寄托，把自己的身体也完全交给党的事业。

把一切交给党，同样的话，其含义在 80 代前后发生了变化。80 年代之前，对女领导们来说，听不到她们对此有丝毫的怀疑，从她们的从政经历中证明了这一点，只要你个人努力，优秀，那么党组织就会主动寻找、提拔你参政，或者说党组织会用不断提拔的方式对个人的努力给予肯定和鼓励，即便一个时期会出现一些问题，党在一定时候仍能够改变和解决。正直的官场风气，形成了她们一切信任党、依靠党的信念。而 80 年代之后，参政中逐渐出现不正之风，比如干部用各种不正当的、违背民主程序的做法，拉关系、走后门，主动寻找“组织”去参政，很多干部们有点无奈地说：“反正把自己交给党了，党用你就用，党不用你就不用”（风楠）。

A： 80 年代前，个人完全信靠组织，组织寻找个人。

淑华、秋菊、南小芬的从政历程中，无论是升迁还是免职或降级，总之都是听党的安排。事实上一切听从党的安排，基本上是对每一个党员最基本的要求。

以淑华为例，从 1968 年“四清”工作结束后担任公社书记，到 1978 年担任地委常委（甚至 1974 年从县级干部直接提拔为地级干部）的 10 年之内，淑华几乎每两三年就晋升一个职务¹，她们埋头努力工作而不问前面的“官途”，在所有的晋升中，她从来不知道自己找组织，而是每作出成绩，组织就自动找上门来，每次的晋升都是党组织积极回报她们的努力，每次的晋升都更加坚定了她们信靠党的信心。

¹ 1964—1968. 县“四清”工作队队员，先后在三个县参加“四清”，任工作组组长、队长、指导员
1968—1971，县革委会委员、某公社革委会副主任；1971—1973，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委员、某公社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73—1974，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委员、县政治部副主任、县委办公室主任；1974—1977，某地委常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其间：1975—1976 带职任某县某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1977—1978，某地区地委常委兼地革委文办主任、党组书记；1978—1980 被免职为某县某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主任；

在十几年中，淑华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到地委常委和组织部部长的职位，这一路上的努力和升迁坚定了她跟着党和组织走的信心，也坚定了她只要扎根于人民群众中就能得到群众的拥护，群众就会认可和认同的信心。

在淑华她们的经历中，最难忘的是1974年被破格从县委常委（副处级）直接提拔为地委常委的经历，这次经历再次加强了她们对组织的信靠。

74年5月份，我成为甬志县县委副书记，没多久，地委来人把我调到衡山地委来。当时整个过程我一点也不清楚，后来知道是衡山地委报省委批的，因为已经是副地级干部，需要省里批才行。而在整个过程当中，地委派的人已经在我工作过的县、乡、村都考察过我，可我一点都不知道。那时候干部完全是靠工作事迹，靠你个人的素质修养，个人提拔什么的完全交给组织了，自己就是努力工作，而不会想着为了提拔等。

无独有偶，秋菊也在1974年被提拔到和淑华同等的位置上。秋菊被组织考察的经历说明了组织在考察干部和用人方面，的确是依据一个干部的工作成绩，显示了官场的风气很正。也表明了组织的可靠性。

人家组织部来考察我，我都不知道，人家都是变换一个角色。74年，省委组织部来考察我的时候，来的时候我当时是落实政策的工作队队长，负责给人定成分。这些人和我就几个人的成分怎么划定产生了争执和分歧，我觉得他们划的不妥，所以我这个工作队队长就是不给签字，那时候不知道害怕，不知为什么。我这个人得益于胆大也吃亏于胆大，胆量大没有后顾之忧，不管你是谁，只要你不对我就敢和你争论，后来知道这些人是来考察我的，故意和我争论。我给人家讲政策衡量是什么，就是落实政策的文件或者什么，划定富农成分的文件，在哪本书第几页中。他们说，我看你是吃了人家的，或者是人家的子女给你接触的多，你受他的影响，我给人家就辩论了，一没有吃他的，二没有收他任何的礼品，不受感情的影响，完全是有充分的证据的，他们是拿着这个事情来考察看我有没有政策性、原则性，当时咱不知道他是来考察我的，我就和他们展开了争论，争到最后我气得转身要走。我一走他们就开始笑了，这一笑我又扭头回来了，我说你笑什么呢，说笑你这个娃，人家下来是考查干部的，你敢跟我们这些人争论，你还敢出去走了，不和我们说话了。娃啊，我们是省委组织部的，来考察你当常委

这个事的。因为那时没有任何顾虑，正因为我和他们争论，他们才认为我有一定的原则，有政策性。如果不敢争论，他们就认为你这是个花瓶。

对她们来说，每一次的升官都是组织对她们的信任，认为信任就是把更重的责任交给了她们，同时她们也知道只要自己努力组织就一定能够看得见她们、承认她们。

淑华拼了命的工作，目的是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和培养，这是她常常说的一句话。在当时，干部们相信的工作逻辑是：干部是党培养和选拔的，是代表党的利益工作的，党的利益就是群众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就是个人的利益，当然也是妇女的利益。只要群众的利益、问题解决了，党的任务也就完成了。所以，组织满意就是党满意、群众满意，因为组织考察党的干部是走群众路线。在这个逻辑下，干部比较单纯，基本上个人的奋斗目标、党的目标都整合在一起，对干部们来说除了拼命地工作，还是拼命地工作，至于什么时候升迁一切都交给党、组织了。即便淑华在 80 年代初，被认为是“双突”干部而被免职，秋菊也因为自己主持正义而得罪了领导被连降几级官职，她们仍旧带着相信组织、依靠组织的信念去克服遇到的所有困难，并一如既往地党工作而没有怨言，希望再次用自己对党的工作和事业加倍的忠诚和工作换取组织再次的信任，她们仍旧相信党始终能够给她们一个说法。对她们来说已经建立了组织的认同就是自我价值被肯定的。事实上，党在后来又再次启用和重用了她们，她们一步步再次走到副厅级的职位上。当然再次启用之后，赶上 80 年代后期，她们的从政之路和之前一心为人民的那段从政路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一点我会在后面详述。

B：80 年代后，把一切交给了组织，但却没有得到期望的回报。

风楠不理解自己把一切都交给了组织，但为什么组织却不是自己期望中的那样来回报自己？

风楠开始从政的时候已经到了 80 年代初，她是在“把一切都交给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我采访她的过程中她几次都会提到“工作是党交给你的事业，你爱干不爱干都必须像雷锋似的，发扬螺丝帽精神”。如同她在学校和下乡插队的经历一样，她对工作全情投入，认真而执着。78 年参加工作，81 年入党，随后被评为区优秀党员，到 83 年，27 岁、正在上电大的她，赶上国家政策强调干部要“四化”¹的政策而被提拔为区妇联副主任（副处级）。为了筹备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工作，她耽误了看病的时间导致很长时间内分泌紊乱

¹ 1983 年 7 月 6 日—7 月 20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会议强调以改革的精神加速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改善领导班子的结构，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改革干部制度，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会议强调，“三种人”和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路线的以及有各种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人，犯有严重错误而又认真改正的或者思想品德不好、惯于闹不团结、没有责任心和事业心的以及那些毫无原则的“老好人”，德才平庸、无所作为的人，都不能进领导班子。会议要求，搞好对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搞好考察了解、培养教育、选拔使用，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弹劾、轮换等制度。资料来源：<http://www.uname.cn/HisToday.asp?ArticleID=10045>。

而闭经，吃了很多药才怀孕。从此开始了 13 年副处级、15 年正处级的坎坷的从政道路，目前她只有 51 岁，很早就作为区中青年后备干部准备进一步的提拔。她得到各种的荣誉，区里评选为“人民的好公仆”，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甚至是全国的三八红旗手的荣誉，但这些荣誉只能证明她的优秀，却不能和升迁挂起钩来。以她的能力和资历完全可以胜任更高的领导位置，然而她提拔缓慢、升迁艰难，政途的坎坷。这不是由于她的能力或者品质，而来源于她的认真和正直，也来源于从政路上越来越多地潜规则以及很多的官场腐败，在她的经历中，很少像淑华她们那样只要自己努力、升迁就交给组织的情形，也没有了像秋菊那样的坚持原则、敢和领导较真却能够得到重用的结果，她的不断努力和认真的工作态度换来的却是打压和刁难。她带着辛酸和自嘲的口吻给我说：

“我已经到了成长的末路了，我的心态也平和了，而且我常常自我安慰的就是我完全对得起组织上对我的培养。我说这 30 年不就交给党了吗，从小就立了这个志向，表了那个态，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是块砖就码在哪儿就算哪儿了，所以到时候你该拆迁了，我这块砖就独立了，就有点独立性了。”

她很难转变那个从小就受到“把一切献给党的事业”的信念，因为党仍旧是那个党，关于意识形态中宣传的男女平等、公平正义没有变，民主透明的干部选拔制度也在制度上越来越完善，但她越来越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不适应现在的形势了。那个依照党的标准塑造出来的女干部却无法适应依旧在党领导下的社会了，其内心的痛苦是深刻的，确切地说她找不到自己、无所适从了。

意识形态对女领导的强大的征召作用也表现在干部们努力朝向它的过程中不断给予的肯定和鼓励，用不断的提拔和给予重任、不断给责任的方式完成了让女领导干部完全跟着党走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她们完成了对自己作为女领导干部的身份的认同，无论在家里、单位，她们都只有一个身份——党的干部的身份。所有的角色都要依据党的干部的身份来定位，为了这个身份，恋爱是政治的，婚姻和家庭的角色都要让位于它，尽管各种身份角色之间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

（三）为谁而参政？

本研究对《女市长》一书中的 52 位女市长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和归类，其中 90%以上都会说到参政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如果女领导只为妇女参政那是狭隘的参政观。有少数的人认为女领导也要为妇女而参政并在实际中也是这样做的。从女领导干部们的生命故事中展现了多样丰富的参政观。

A: 为了“脸面”而参政

中国人最讲人情和面子，人情和面子是中国人际关系的核心（翟学伟，2001）。前面说过，80年代之前，女领导干部们都十分信靠组织，她们的想法很单纯，往往把继续参政的动力归结为人情和面子，是为了不给信任自己的组织丢脸，也是为了不给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脸上抹黑，她们就更加努力工作，为了报答组织和父老乡亲。为了“脸面”而参政，也符合中国人的行为逻辑，是中国文化中很突出的一点，比参政是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来的更具体和实在。淑华的经历和说法很典型地代表了我访谈的几个女领导干部的共同感受：

“74年，我29岁，就来到衢山地委工作，成为了地级干部，担任组织部副部长。我从一个农民干起来，没有当过正职，从副县级到副地级。这完全是组织的决定，自己一无所知，直到调过来我还毫无思想准备。我总觉得能力有限，自己素质也不高，就怕适应不了这份工作，觉得有压力。在离开县委的时候，大家开欢送会，我当着各位老领导说：我到那了会拼了命的工作，不能给组织上丢脸，市委省委人家选拔了我，咱们浦志县委推荐了我，我不能就给领导丢脸，也要回报老领导们对我的关怀和信任。但是有一条，我能力有限，我要是努力了以后，组织上还是不满意，要把我降职的话，我还回咱浦志县，我说你们还得接着我。惹得大伙都笑了。也不能给我老家的老百姓脸上抹黑，也常常想，如果不是组织、党的培养，人民的抚育，自己不能从一个贫困的农民的女儿成长为国家干部，所以始终抱着报答党和人民的恩情的想法，抱着这颗心忘我地工作。觉得如果不好好工作，对党和人民我无以为报，只能这么干，不管多苦多难。常常觉都没睡够，有点如牛负重的感觉。那个年代第一工作上不能和组织讨价还价，另外也没有待遇。”

新梅说自己到了妇联之后，也是为了给女同胞争光和不丢脸而努力工作的。

来到地委工作，让我第一次有我是一个女干部的感觉，因为在地委这个层面上，只有两个女干部。突然意识到我作为一个女干部，得给女同胞争气，咱要是不干好，女同胞脸上都没光。

在日常表达中，“争脸”、“争面子”和“争光”、“争气”同义；“丢脸”、“丢面子”、“丢人”、“丢丑”等意义相近。在汉语中，“脸”是身体的一部分，而“面”除了此义外，

还表示关系。林语堂认为，“面子”是统治中国人的三位女神中最有力量的一个，中国的是为它而活着（林语堂，1935；转引自翟学伟，2001），控制中国社会的五种社会力量（扩大家庭、政府职能、孝、脸面和道）中，脸面规定了中国人的社会及人际行为。脸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认同的形象，经过印象整饰后表现出的认同性的心理与行为，而面子是这一业已形成的心理及其行为在他人心目中产生的序列地位，也就是地理地位。两个定义的要点是（1）脸是指个人的形象和表现方式；（2）这种形象以其所处的社会圈为依托，即脸的争取和失去由该社会圈来认定；（3）一旦对脸的评定出现，也就是面子的出现；

（4）正向的评定就是有面子，负向的评定就是没有面子，给面子是指无论个体是什么形象，都给予正向评价，（5）一单位体无论有无面子，都存在程度的差别，如很有面子、有点面子，没有什么面子及很没面子，由此在他们的心目中产生地位上的排序（翟学伟，2001：p76）。

妇女们为脸面而参政是深层的一个行动逻辑，即我努力工作争脸，而组织就给了面子（职位），当我位居某个位置，就是有面子了，不断地升迁，不断表现我越来越有面子，而我越有面子就越要争脸。一旦我失去了职位，我首先感觉我很没有面子，丢了面子，那就是丢脸。而表面上的说辞是为人民服务，即便为妇女参政也不是西方女权主义的主张，而是为了给自己的脸上争光，为妇女们争光。对此我们将在第七章的讨论部分详细加以讨论。

B：参政是为人民服务

这是一种官称，表面上每个人都说自己在“为人民服务”。该话语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主张。如前所述，在中国妇女参政的历程中，教育妇女参政要放弃“小我”而投身于国家这个“大我”，这个小我既是我个人的家庭，更是我作为女性的自己。投身到大我，就是投身到社会，从根本上接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我。所宣传和教育的，包括典型人物和英雄人物的榜样作用，甚至前面所说的提拔那些大公无私的干部等，都是培养一个完全被国家征召的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培养出为妇女利益服务的观念，女领导干部自己也斥责“为妇女争取利益那是狭隘的参政观。”

马海说：我在财政厅当副厅长的时候，就主管妇联这个部门，但我从来没有把她们的事情摆到议事日程上，多年也没有去过妇联，也根本没有意识到有什么妇女被歧视的问题，自己从财政厅副厅长的位置到了妇联主席的位置，才深深体会到这个组织被忽略，有那么多妇女问题。从前我就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大局观，但现在看来那个全体人民的大局实际上也是依据权力和部门的重要性而划分的，尤其所有的事情都让位于经济。每天要见的人是各个主管市长，妇联我压根

就没见过。

马海主席从财政厅到妇联当主席后，才亲身体验到对女性的不公正的待遇，因此才有了为妇女争取权益的意识和行动。所访谈的女领导中，有几位都是这种情况，为妇女参政的意识是进入妇联的岗位之后才培养出来的，。

在 80 年代前，对这些女领导干部们来说，真真切切地参政是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回报组织的信任，不给父老乡亲们丢脸，这些观念都混在一起，这就是参政中的“大我”观。

C：在妇联岗位，为妇女参政是一种职业参政

对淑华来说，当女领导，要为女性争光，争光的概念主要指自己做好，不要让别人小瞧了自己，即便在担任组织部长的时候，意识到作为女性参政有很多和男性不一样甚至不公平的地方，但她压根没有性别敏感性，也没有专门为选拔女干部做点什么。1983 被委任到地区妇联担任主席的职务，专门从事妇女工作，淑华才觉得自己要为妇女做点事情了，她描述了在妇联所从事的妇女工作的内容：

到妇联一千就是 7 年，当时我去的心情，我还特别高兴，我想作为一个女同志，做好妇女工作是我的本分，为妇女同胞谋点福，觉得这是应该做的，我也拼搏了这么多年了，20 年的时间，我这才回了家，回到娘家了，是那种心情。进入妇联工作。进入后我搞组织、跑编制，把妇联的各个组织建立起来，该提拔的提拔。就开始赶上河北省妇联发起的“双学双比”¹活动，我们也干得热火朝天，我觉得妇女解放的途径就是靠“双学双比”，那时候也是讲发展经济，妇女是半边天，得在发展经济中大显身手，这就要靠自身素质的提高，几年来抓这个，我觉得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是妇联工作的本质；那几年，很忙活，也挺受妇女群众的欢迎。

从淑华所描述的，她所开展的妇女工作，也是围绕党的发展经济的中心工作开展的。如“双学双比”活动，该活动是为了适应时下党的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而开展，发动妇女投入到经济建设中的工作，从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争取妇女的各种权利。其工作思路在发展工作中归入“妇女与发展”的框架之下，该发展框架只关注妇女的经济利益，而缺乏性

¹ 双学双比，指全国妇联在 1989 年向全国农村妇女发起的一个活动，“学文化、学技术，比成绩、比贡献”，是为了回应当时的农村劳动力女性化、和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想。目的在农村妇女中掀起一场革命，推动农业的发展，同时也推动农村妇女文化素质、技术素质等各方面的提高，从而推进农村妇女的解放进程。

别平等的追求的局限已经被批判¹。即便在妇联专门从事妇女工作，但如果没有性别平等的意识，其工作也很容易变得在维护传统的社会性别而对妇女带来更多的压力和不公平（杨静，2004）。对淑华来说，做什么就吆喝什么，不做了也就不管了，所以妇联的妇女工作仅仅是一个工作而已。

D：为妇女而参政

李华是某官方某妇女杂志社的副总编，有 20 多年为妇女权益奔走呼喊的经历，为妇女而参政的意识和行动也是在她进入杂志社之后才有的，之前她在部队当兵的时候，不觉得女人和男人有什么不同。

我当兵的那时候不觉得我比人矮几分，我领导的那个宣传股，比任何一个股都大，在 11 股长里头就我一个女的。我领导的那个股，领导得非常好啊，我不感觉到自己怎么就比别人弱呀。那是时候没有性别的观念，但是我觉得凭实力啊。当我从男儿国走到女儿国的时候，谈参政的比例，我反对，我说的完全看实力不用靠比例。后来到了妇女杂志社，到了基层去报道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才知道对妇女有多不公平。

对李华来说，有几次经历让她改变了对妇女认识的观念和看法，第一次是 85、86 年三八妇女节前，评选了很多“好媳妇”、“五好家庭”之类的标兵，组织派她下去采访，在采访中她的意识渐渐觉醒：

我去采访一个妇女，她怀着孕，丈夫因公牺牲了，她为了照顾公婆，把工作辞掉了。生下遗腹子，一直到她退休，她就是这样照顾公婆、拉扯大儿子，最后给她评了一个什么文明家庭。这样的例子，我开始很还觉得感动，但看得多了，听得多了，我就开始想，要是我的话呢我怎么能够把公职都辞掉，我干吗不要再婚，为什么想着表彰这样子的人呢。我看中国的历史的一些书，我就发现那个时候怎么那个贞节牌坊，里面有那些女人，把自己的手割了，那自己的血作药引子，婆婆喝了。这样子的人在那个贞节牌坊里边都有名字的。还有那个男人不在，这个女人被男人摸了一下手，回去把胳膊就断掉。这些贞节牌坊里说的故事怎么和现在表彰的一样？我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批判封建的东西怎么变成精神文明的东西在宣传和表彰？为什么打着这个精神文明的旗帜，它跟封建的贞节烈

¹ 详细评述请看林志斌，李小云《性别与发展》，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2 年。

女的标准是一样子的。所以，我就在报刊上开始了“到底是精神文明还是封建糟粕”的大讨论。对“精神文明和封建愚昧”的大讨论，是在80年代比较好的舆论环境中发生的，在当时的确起到了清理思想的作用。换作现在很难讨论起来，因为女性越来越商品化，现在都是包二奶了、傍大款了，连我们的杂志本身也被商品经济所充斥和包围，为了经济效益和生存，整天把化妆品的广告、蜂腰肥臀商品广告充斥，宣传如何化妆和美容。

在现实和历史的对比中，李华的性别意识觉醒了，她利用自己工作之便推动了关于“到底是精神文明还是封建愚昧”的大讨论，从而在辩论中来清理和树立当时对“女人”的看法，看到推动妇女参政和制造一个舆论环境的艰难，李华选择了走NGO的道路，用项目推动基层妇女意识觉醒和参政的道路，尽管很艰难，但李华说，妇女参政总得有人去说、去呼吁，我不怕别人说我是女权主义者。

李华一方面仍在积极推动基层妇女意识觉醒和参政的工作，另一方面当有机会去推荐她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时候，她再三思考放弃了，觉得自己耿直的性格不太适合在政府机构里工作，宁愿选择当一个业务领导，在这个位置上她很想参与决策，因种种原因只能作为副职，实现不了为妇女做更多事的夙愿。但李华为妇女而参政的主体性推动她开始创办非主流的妇女杂志，让基层的妇女发声以及为推动基层妇女参政和议政的能力。为妇女而参政的事情是李华利用体制内的资源在体制外开展的。

E：参政是行使一个人大代表的权力，为选民而参政

清新是一个教师，某市人大代表。严格来说不是我要研究的对象，但我依旧采访了她，我希望从她的角度也看看作为市人大代表，她是怎样参政的以及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多一个角度看妇女参政的经历和看看女性参政议政的风采。

清新最自豪的就是多年来当人大代表全靠人民真实的支持和拥护，她说否则以她的个性和锋利，她早就不能在这个位置上。作为一个女性她，一直在为她的选民争取权利，同时致力于妇女事业。她从小生活在美国，十几岁跟着爱国的知识分子父母回国，从小深受父母民主思想的影响，在其性格中深深地播种了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意识。一个偶然的機會，1984年在大学里教书的她，被从天而降的人大代表选举的方式选中，她说：

“84年选一个人大代表，要一个非党、中年、人民教师，分配到我们学校，那就是我了。当了人大代表，我首先就学习宪法。宪法上说，人大代表就要与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

对清新来说，她是参政而不是从政，作为教师的她，没有任何的官职，仅仅是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参政。她的特点是走到哪里把宪法带到哪里。因为没有任何的官职、也不是党员，是名人的后代，为清新增添了更多的勇气。在我采访的女领导中，除了秋菊的故事中有了群众的利益不怕丢官的经历之外，就是清新了。她多此被群众选举和拥戴为人大代表，她争取作为人大代表的权力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和地位，她深知只有一定的权力才能为老百姓做事。

对我来说，权力从来没有恩赐，只有争取，我现在对我的权力非常注意，我也不侵犯别人的权力，这就是一种责任，我必须尽到我的责任来改变这个制度。

她给我讲述了她参政中的经历，让我感动和叹服！

凡是政府机关进人大的我都反对，运动员不能当裁判员。我当着 880 人我一个人举手反对，从那以后，我成了一个有争论的人。因为中国历来就是要一致通过，你不能有反对意见。我提了意见需要他们给解释，他们不作任何解释就选举，选完了，我就投了弃权和反对票。妇女参政不是因为你是女性，而是你要依法。妇女参政需要国家民主的大环境，否则太难了。

清新尽管只是为她的选民在争取权利，但她作为女性有非常强的参政主体性，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为什么做。

F：参政为了经营职位

女领导干部们在描述其参政经历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 90 年代前后的分水岭，前面无论她们代表谁在参政，我能更多听到她们描述自己是如何吃苦去完成各种的任务和工作，为老百姓服务，而到后面更多地谈论政治中的各种腐败以及升迁的艰难，更多谈到了权力斗争。

以淑华描述的参政经历来看，90 年代前后的参政经历和感受明显不同。80 年代之后，她一方面仍旧努力、勤奋地工作，并一步步被提拔。与此同时，她的兄弟姐妹、兄弟姐妹的家人不间断地在她的安排下来到城市工作、安家、学习。故事的主线多了职场上为了名利的争斗故事以及对家人的各种安置。如果说前半段的参政改善了自己的命运，而后半段她真的就为改善家庭中各个人的命运奔波。淑华仍旧算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干部，但 90 年代后多了一些营职位的动机和目的。

（四）从政的动力源——被认可

“喜欢”、“认可”、“满意”，“口碑很好”、“很优秀”等词语是访谈时在她们的故事中频频出现的词语，下面展示的是新梅的故事中不断出现的上述词语的频率。

家里的教育对我很有成效，班上我的学习是第一，那是中专，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应该说教课的老师非常喜欢我。

好像就觉得自己政治上有了前途了，自己尽管家庭受到压抑，但自己入团可以说是党团组织认可你了，我在班上老是这样，在班上认可，老师认可，组织上认可，对我确实是鼓励很大。

后来我在县的农机站工作了后，老站长，老技术员，特别喜欢我。

在推荐干部的时候，很多人送礼物、打电话，我老老实实没有做这些事情，但是还是被推荐出来了，几百人，先从县级干部，然后在市级干部中推荐，没想到最后我被推荐了，这是大家对我工作的认可。但是没有用我，因为只要一个女的。但是人家能把我推出来，我很欣慰。起码大家把你推荐出来了，大家认可你，组织认可你了，那次推荐组织用了我的，我还是很高兴。

我到巩县时，当时选的是市委委员全票，市委副书记是全票，市委常委是全票，剩下就是我的票数最高，我觉得大家对我个方面的工作是比较认可的。

回到市里工作的时候，也遇到一些波折，但是我觉得在市政府和妇联工作的这几年，周围比我年纪大的人也是挺喜欢我的。

我当时做副市长的时候，我管的那部分应该可是说是在市上还是强势的部门，我管的是城建、规划、房地产、公安、司法、交通，比较重要的部门。后来做常务又管人事部门、教育，就是在市长工作期间出来除了农业没有管，别的部门我都有管过，我在这方面的积累的经验也比较多，大家也比较认可。

我在那五年，大家很认可的，包括现在我回去，在市领导中我的口碑都是很好的。

如果中央政策里面没有刚性指标的话，女干部有如春笋般的成长很难，尽管你很优秀，也很难。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传统的男尊女卑的国家，对女性的认可度有问题。

重视别人的认可和肯定，是女领导干部从政以来的一个心态，似乎她们总是在被认

可、满意、喜欢中来确定和建立自己的价值和身份。正如新梅所说，在一个有着几千年男尊女卑封建思想传统的社会里，对女性的认可度是有问题的，在公共政治领域里更是如此，因此争取认同、满意、喜欢就成为女领导干部的一个从政的内在动机。只有认同、满意和喜欢才能在官场立住脚，扎下根。女性是在别人的认同中建立对自己的认同。为了别人的认同而规训自己的行为，那个别人不是别人，主要是那些用挑剔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男性领导”。

小结

从女领导干部的生命故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两条线索，第一条是贯穿于故事始终的单一的中国共产党对妇女解放和参政的论述。80年代之前是强国家关于妇女解放的论述介入妇女的生活中，整个妇女的生活被那个时代整体性塑造，这种塑造表现采用各种手段和方法使得她们走出社会参加到社会劳动中来。上学是走出家门的第一步，但上学的动机却不是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是为了改善自己和家庭贫苦的命运，为了不让人家瞧不起女孩子等。从她们成为新中国妇女的第一天起，她们所接受的教育就是一种忘我的教育，忘掉自己是女孩、忘掉自己是女人，像男人一样工作和生活，当她们开始踏上社会的时候，她们就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中接受着锤炼和忘私的熏陶。这种主体性的塑造造成了对身体的伤害，是一种男性性别优于女性性别的宣传和教育下的产物。意识形态的教育是要求妇女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她们成为新中国妇女是积极主动的结果，但走上领导岗位不是自己积极主动参政的结果，是自己表现优秀、被党和组织认可的结果，只要她们努力工作党组织就提拔她们，在不断的被认可/被提拔中其对党、对组织的信任逐渐建立起来。参政行为本身表现出的是一种被认同的结果，是一种政治荣誉，而不是主动寻求权力而达到某种目的的意识启蒙的结果。排斥妇女的身体而积极向男人看齐的绝对平等概念也使得她们不顾生孩子以及女性生理周期等，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了诸多的伤害。她们自己声称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主体性，而实际上则表现出她们很多是为了“脸面”而参政，既为了给组织争脸、给父老乡亲们争脸、给自己作为女人争脸而参政的主体性，和作为女人的身体抗争的主体性，在看似单一和具有普遍主体性的背后却表现出诸多的差别。

第二条展现80年代之后，国家主导作用退却和市场引入，市场越来越强地塑造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价值观。西方社会性别意识随着95'世妇会传入中国之后在一定范围内对妇女问题的看法和冲击，在这些不同的论述下就产生了多样的主体性。从女领导干部的生命故事中展现出来的就是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宣称随着官场越来越严重的腐败而逐渐减弱，表现出另一种在官场拼搏、为了经营职位参政的主体性；意识到男女不同和为争取回

归女人的主体性；也展现出一些参政妇女和女领导为妇女而参政的主体性。但我采访的绝大多数领导依旧宣称参政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视为妇女参政是狭隘的参政观。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依旧是官方的意识形态，社会性别意识没有主流化，没有整体出现为妇女而参政的论述以及系列有效的技术去把这样的思想传播到女领导干部们身上，官场腐败已经无暇为人民服务更奢谈为妇女参政的理想。关于这一点在下一章中我们会进一步阐述。

无论 80 年代之前或者之后，我们看到父权制的幽灵自始至终陪伴妇女参政的整个历程中并自始至终在发挥着作用，传统的基于生理性别而对妇女的定型认识没有改变，我们只倡导“男女平等”，却对男女平等没有深刻的解析，把平等视为女等于男，忽视了性别的差异性。导致身体的伤害而产生更多的不平等问题。它和市场勾结在一次对妇女参政构成了威胁，把权力领域当成市场。这一点在后面的一章中我会详细论述。

第五章 社会性身体——规训 认同 主体性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第四章中，我透过女领导干部浓缩的生命故事，描述了其成为女领导干部以及从政的过程中，国家的意识形态是怎样把一个普通的妇女建构为新中国妇女、再把新中国妇女建构为一个女领导干部主体性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法律/政策、教育、媒体等主要渠道，用榜样、被树为榜样、全民的监督、运动等具体的方法完成的。本章则从女领导干部的从政历程中清晰地展现出来的那种宏观的论述（如公开文本——男女平等、市场经济、性别主流化和隐藏文本——父权制）是如何透过各种“权力的微观技术”——领导空间的安排、对身体的控制以及一些选拔程序中的游戏规则等，形成全景式监督来规训人的主体性。这种规训下形成的主体的认同，进而依据认同去自觉地使用权力去规训别人。通过这些权力技术的展现，我们看到一幅女干部/女领导干部如何被排斥在权力之外或者被搁置在一个因为性别而设置的位置之上，限制她们有的权力和更大或者更广泛的能力发挥，对妇女参政难和参政率低有更清晰的认识和更明确的解释。

概论

在第二章，我详细介绍过自 80 年代初，国家促进妇女参政的力量减弱，市场机制逐渐引入参政中，妇女参政从原来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和严格的性别保障制度转变为引入差额选举制和竞争聘任制，性别保障措施明显弱化，女性领导干部比例直线下降，妇女参政比例相对 80 年代之前滑入低谷。自 90 年代至今，在全国妇联和研究者的推动下，一系列专门或旨在提升妇女参与政治的水平文件出台，也呼吁和加强妇女参政议政的素质，但种种的努力都没有让妇女参政的比例和形势出现令人鼓舞的势头，问题出在哪里？有的学者认为是对妇女参政的保障制度在实际过程中执行不力，也有人认为是中央的政策太过笼统，如至少一个女性的最低比例制实际上限制女性参政，因为从政的妇女没有决策权，参政妇女主要是非权力的外围参与，而被排除在权力参与之外，决策机构女性缺乏和边缘化等等（李惠英、2005；杜洁，2001）。很多人也谈到现在官场文化中的不正之风和男性政治文化如拉关系、吃喝、跑官要官等风气盛行，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妇女的参政（Howell，2007）。

从我 2003 年开始构思本研究到现在的这几年，中国的官场愈发腐败，政治环境的恶劣对妇女参政更加不利，妇女参政深受整体的政治环境影响，在这里所展现的权力技术就是伴随着整个官场的腐败加上性别的歧视的产物，是问题的冰山一角。

一、领导位置的配置——男尊女卑

一个人认同自己的某种身份，不是因为遗传、不是因为因果关系、也不是因为宿命的态度，而是由于特别复杂而精细的权力技术与策略。政治技术或政治管制的实施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自我——主体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将涉及到利用文化、权力等控制手段，或明或暗地影响并改变人的肉体与精神、行为与信念、姿态与习惯、态度与能力。另一方面，内化这些控制需要的是更加迂回曲折、痛苦甚至翻唱的自我形塑方式（潘毅，2007）。

社会控制是一种权力技术，它的实践常常包括将人置于与他人及他们的物质环境之间特定的空间关系之中，例如在工厂和监狱这样的现代机构中，监控者的权力和权威常常通过对那些被控制的人安置形式和行动限制得到行使和表达（Foucault, 1977；引自澳杰华，2006：89）。对女领导干部的控制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她们都是国家的公务员，在政府的机关中工作。单位与她们的身份认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单位本身就是她们身分认同的形式，同时也提供与身份认同一致的各种利益和福利，这些利益和福利反之更加剧了身份认同。

（一）副职的配置

正职、副职原本只是管理学中的一个层级位置，当它与性别和权力联系在一起，就显出特别的意义。用一套基于生物决定论的论述，当女领导干部进入领导层的时候，就把她牢牢地安置在一个特定的权力和纪律的权力格局——副职当中，而以发挥“女性独特的优势”话语使其合理化，规训权力开始向我们展示它的空间艺术。

据 2008 年最新的一项“女性领导人才规律”的调查¹显示：女性官员任职结构存在以下几大问题。

表现之一：副职多，正职少。调查中，在回答“您是否是一把手”的问题时，70%的女性领导选择“否”。表现之二：处级及以下多，局级及以上少。调查显示，女性领导群体仍存在明显的“玻璃天花板”现象，副处的男女比例相近，而正处级男女比例差距大，局级的男女比例更是相差悬殊。表现之三：业务型多，政界领导少。调查显示，女性领导中，

¹ 资料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le9c540100bio5.html.

业务型的领导较多，而真正从政的政界领导相对较少，女性领导的分布具有明显的行业特点，许多都是在专业业务领域从事领导工作。

在我国高层的决策机构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没有女性，女性正职部长仅占 3.4%，正职女市长不到 1%。¹中国女市长协会的主席陶斯亮说²，“中国有 600 多个城市，女市长只有 300 多个，而且大部分是姓‘副’的，担任正职的女市长仅 10 多人、这个比例是非常小的。”在一个妇女人口几乎占到一半的国家里，在男女平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六十年、成为国策也有将近十几年的今天，作为妇女解放标志的妇女参政状况却是如此！

该调查表明了在职场上女性的空间位置。在领导和管理学中，职位以及连带职位所安排的每个人的不同角色，是由该位置的作用、性质所决定的，但在官场上却和性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副职的安排意味着你没有最后的决策权，李华这么说：

参政你不能光说那个数量、比例，其实你如果不是一个决策者的话。就像我在我的单位做副职，从 94 年到现在，我干了十三年，十三年我根本没有决策权，就看着这个单位一天一天的亏损下去，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副职我用不上劲，有好多决策的事儿我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根本没用。你是一个副手，你就是一个干活的。在某一个方面你可能有个参与权，你表达了，可是没有决策权。当然只有决策权也是不够的，掌握决策权的妇女要有性别意识，能够自觉地主张妇女的权力。

李华认为决策权和性别意识是实现妇女实质性参政的重要条件，即便有了决策权却没有为妇女参政的意识，那也达不到妇女参政的目的。看所有关于妇女参政的统计数据，如果不去细致地分别统计在比例中哪些是正职、哪些是副职，都在什么样的岗位上，就很难看到妇女参政的深层情况。秋菊说：“如果我不到书记的位置上，我看不到选拔女领导干部的时候因为长相对女性的歧视，只有到了决策的位置上才看到。决策者没有女的，对女性参政也不利，选不上女的。”

秋菊举了一个在工作过程中，她作为一把手参与决策的时候替妇女说话的一个例子。有一次领导班子一起讨论关于《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如何在本地贯彻和执行的问题，该法规定处级女领导干部可以 60 岁退休，但实际中执行起来各地的差异很大，有难度，秋菊说，当时决策的时候，男性第一把手以及好几个领导都认为女的应该早退，我就站出来了，“男女处级领导干部的退休年龄一样，女的 50 多岁正是干事的时候，娃也大了家庭也没有

¹ 中组部、全国妇联“全国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工作座谈会纪要”，1995 年 3 月 28 日。

² 陶斯亮访问，2004 年第 5 期。

困难了，为什么叫退？”她冲着书记说：“我就说你先把你老婆退了，你老婆到了年龄了，为啥还叫你老婆上班？”她又冲着另一个常委说，“你老婆也到年龄了，你老婆到好单位就是因为有你，你也请退了。”秋菊说，大家听到这些话，气氛有点尴尬，这涉及到自己家里人的问题，书记出来打圆场地说：“就按秋菊的意见决定吧，因为咱们这儿不一样，有女市长给她们说话哩。”秋菊总结说：“只要是女一把手就能理直气壮给女的说话。为什么重要岗位上不能叫女的上去，是因为没有女的来说这个话。女领导干部掌权的太少，成为女干部成长的瓶颈，如果组织部长是女的，决策层是女的，女干部的成长就不是这样子的了。”

副职的空间设置，第二表现在副职如何和正职配合的问题。即你思考问题的时候必须配合一把手，你要有工作思路，但你的思路又不能超越领导的工作思路，即便想让领导同意你的思路，也最好从技术上做到让领导认为这个思路是领导的。副职就表明你的工作思路、能力不如正职，甚至你的服装、言行都不能超越正职，你不能让正职感受到威胁和不安全感。所以，做副职的难言之隐是如何配合正职的男领导或者女领导？权力的规训不仅要在空间位置上，更要从精神上规训你接纳和认可。

如何和正职配合？这个问题绝不是像领导科学或者管理科学所说是一个管理和秩序的问题，当和性别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就变得复杂而扑朔迷离。

“作为一个女干部，你当正职男的不服，当副职就有和男的配合的问题，配合的不好女干部就干不成，配合的太好也干不成。配合的不好，他们说女干部缺少配合意识，配合的好了也并不行，说你跟县长配合的那么好，谁知道人家两个什么关系吗，人们在攻击县长的时候又会把你当成靶子，两者都不行，你就得找到这配合的好与不好的结合点。”秋菊说，“配合到什么分寸又成为考验女干部的一个坎。”

我问，“怎么就算配合好了，怎么就算配合不好？这个分寸怎么把握？”

“这里面的学问很大，”秋菊说：

“无论上来一个什么样的女干部，你就是服从、服务、付出，这样的标准才能和正职配合好。服务就是我说你干，你不要有自己的主见。一把手咋定你就咋执行，这就叫服从。付出就是你光干活不要叫苦叫屈，这样才是一把手欢迎的副手。我找到这个结合点也是有过挫折的，度我把握的不好，就是原则性够，策略性不够，但是后头我也重视了，把原则和策略相结合，如把反腐败和力争和谐的结合点要找对，这样就和一把手配合好了。”

我点点头，似乎明白也似乎不明白，也许只有秋菊这样身在其中的人才能把握好

这一点吧。

有一篇发表在《领导科学》¹杂志上、标题为“男性部属如何与女性领导共事”的文章，该文章是站在男性下属如何配合女性上级而写的，细致地从另一个角度道出了一个道理，不管正职/副职是男/女或者女/男的搭配，只要遇到男女都会出现问题。文章的作者是某地区一个组织部部长，天天和干部打交道，文中所写的内容应该是丰富经验的积累和提炼。

文章中，他首先谈到男下属和女上级的沟通策略：

男性部署首先要加强组织观念，尊重女领导。即便你觉得女领导的水平低，但你依旧要用组织观念尊重女领导，给女领导面子，这是一个聪明的部署应该有的做法，因为女领导仍是领导决定着很多的事情，所以如果你不聪明你可能会吃亏。同时，以男性的宽广胸怀，适应并支持女性领导。容许女人的情绪化。如果遇到长远眼光欠缺的女领导，男性部署更应该弥补缺点。

我不清楚这位组织部长在谈个例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在这段话里，他首先把女领导想象为一个缺少战略眼光和心胸狭窄，甚至能力不足的人，带着强烈的同情心同情当下属的男人，希望这个男性部署可以原谅和宽容这个“情绪化”的女上级。

紧接着，他以很大的篇幅阐述如何把握男女之间关系的分寸。

最重要的是要“以同志式的纯洁感情，与女性领导保持正常的工作交往”，要注意的有：一是控制好相互之间的距离。在一般情况下尤其是在非公开场合，男性部属与女性领导相处时，应控制一定的身体距离，谈工作、作汇报，最好有个“第三者”，如果有些事确实高度保密，最好选择适当的场所以避嫌。在心理距离上，与女性领导交谈，最好将工作当作话语的主旋律，对工作以外的话题“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乃至避而不谈，如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间感情上的问题。要注意把握好与女性领导交往的言行的度和心理沟通的度。二是正确把握个人感情。上下级关系是工作上的关系，年龄相近的，要防止相互之间的恋情潜滋暗长；年龄相距较大的，也最好不要以家庭生活中的“亲情”来交往，更无须用亲朋好友之间的称谓来相互久，才有益于事业的发展。三是注意工作和生活中的日常问题。比如，上下班即使同路，也最好拉个“第三者”，避免两人长期同行；一般情况下，不宜与女性领导尤其是与自己年龄相近的女性领导一起长时间出差，也不宜单独与之外出游

¹ 中共湖南益阳市委组织部，《领导科学》，2000年第6期。

玩、跳舞或游泳；不宜承揽应由女性领导的丈夫做的私事，实在不得已做了，应向相关的人说明，因为这些事如果把握不好，极易引起公众的议论，到时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

我一边读这篇文章，一边想像如果我是一个女领导，怎样按照他的提醒去处理和男性下属的关系，我想象着自己如何从表情、态度、语言上表示不近不远的关系，不能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以免引起误会，不能和男性下属一起出差，即使需要也不行，上下班要拉个“第三者”同行……这样，岂不是每天要把很多的心思花在和这位男下属如何相处上？我担心的是，即便严格按照这位组织部长得提醒做到了，难道人们就无事可非了？会不会说这个女领导古怪、不近人情？没有亲和力、不亲切？

文章通篇充满了对女性领导的和对男性作为副职的同情和担忧，如果把文章变成女性部署如何和男性领导相处，出现的情况是否一样？难道文章中一一列举的情形（情绪化、欠缺长远目光等）在男领导中就不存在吗？在现实情况下，即便出现上述作者所担忧的问题，这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为什么男女在一起就一定会出问题？为什么80年代之前的女干部们没有这样的担心？

女人做正职或者副职，与正职/副职配合得好与不好，表面上看是技术问题，如你配合的经验不足等，实际上根本目的就是一个，用各种名目把你边缘到一个位置上，边缘群体就是这样产生的，它是权力和利益斗争的结果，性别总是在这一斗争中首先被利用的武器。

这篇文章也反映出，无论女领导是正职或者副职，从政都是艰辛和不容易的。

（二）依据性别而划分岗位

副职的设定，是依据对性别角色的定型认识而设计的。权力安排下的位置设计是那样的处心积虑，即便是副职也有很多精心安排，让你在这个岗位上只能参与在某些特定的、认为适合女性的岗位，而不能全方位地参与政治权力，其所遵循的依旧是“生物决定论”。在第二章文献中我们提到的很多研究支持了这一说法，认为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领导风格，男性注重单独的行动能力，女性领导的优势是关心福利、情感、帮助别人。男性则以目标为取向，注重控制、主宰、独立、自我承担等。女性领导比男性领导更注重鼓励下属参与、分享权利、提升自我的价值。女领导比男领导更具有超凡的魅力，更可以利用积极的心态调整脾气。

浏览女性担任领导职务的领域，就可以清晰看到对女性传统角色认定是怎样在公领域

中复制的。女领导干部多集中在科教文卫、妇联、计划生育等认为适合女性的职业中，除了妇联（领导全部是女性）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一把手多数是女性）被认为是女性当政的领域中女性担任正职外，其它的职业领域女性多数担任副职。话语总是为权力服务的，为了认定划分的合理性，生物决定论的话语就为该权力提供了服务，男性自然合时担任正职、重要、对全局发展有决策权的领导岗位上，女性被搁置在决策权的边缘。将女领导放在一些特定的领域里，美其名曰是“人尽其才”，实际上是“男尊女卑”性别歧视文化在不同场域的体现。

有研究指出，中国的妇女参政率居低不高，其中的原因是妇女的政治参与表现为非权力的外围参与。在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机构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中央机构，如中组部、中宣部等，它的政策和措施对于政府决策具有权威性和指导性，处于权力的核心地位。第二类是政府机构，国务院及各个部委，如劳动保障部、人事部等，针对其所分管领域的现实或者潜在问题制定政策措施，形成国务院和部委的政策法规。第三类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订国家法律并监督其实施。而在这些决策部门中，女性的比例非常低，1995-2005 年间，公务员中的女性负责人一直在 8%左右徘徊，全国人大女常委占 13.2%，可以说男性主导了决策层的 90%左右，大多数从政的女领导在一些决策权的外围参政（李惠英，2005）。下列图表显示了我访谈过的女领导们所在的岗位，她们的岗位都不是核心权力部门。

姓名	职务	岗位
淑华	副厅级	某市人大副主任，分管机关事务
秋菊	副厅级	某省统计局副局长
李华	副厅级	某杂志社副社长，负责业务
凤楠	正处级	某市（县级）政协秘书长
新梅	副厅级	某省统战部副部长
马海	正厅级	某省妇联主席
荣爱	正处级	某旅游局副局长
南小芬	正厅级	某女校校长

女性只能在权力的外围参政，一方面交待了“男女平等”中男人和女人都有参与政治权力的国家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保证了“男权社会”中男性的霸权位置，使得”男女平等”和”男尊女卑”两者巧妙的结合，父权制就以这样隐蔽的形式和“男女平等”隐秘地勾结在一起，不仅用空间位置——副职，更是在副职发挥作用的领域里将女性排斥在重要权力之外。

（三）不知足/有野心和不求上进

如何能把女性固定在她的岗位上而不能越雷池半步，除了位置上的约束之外，心理上让你产生胆怯也是重要的手段之一。

实际工作中，如果女干部开始“积极进取”，就会被认为有“野心”、“不知足”。当一个女人被冠以这些名称时，就好像说这个女人不像女人这么严重。女人不能有野心，不能不知足。你要安分守己，呆在你该呆的位置上，这样让你周围的人感觉很有秩序、很安全。然而你真的安分守己，别人会说你不求上进，又把“积极进取”列为女干部们提升自身素质的重要因素（周松梅，2005）。不知足/有野心和不求上进的说法，把妇女置于一种必输无疑和进退维谷的境地。到底谁是法官、谁有权力或依据怎样的标准来判定不知足和野心呢？判断它的意义又在哪里？

我所采访的女领导干部中，副厅级职位是妇女参政的一个瓶颈，调诡的是，能上到这个位置和不能上到更高的位置都因为女性的性别。

凤楠，我认识她将近8年了，以我之前对她的认识判断，她这个年龄和资历应该升职了（从处级升到副厅级），但凤楠告诉我是平级调动，即从这个处级的岗位调倒另外一个处级的岗位。我很惊讶这样的安排，按照她的能力，当个副区长（当个区长也绰绰有余，只是现实中根本不可能）的能力和资历都足够，为什么没有升迁？凤楠对我流露出来的惊讶表示理解，语气中带着酸楚，给我讲了她为什么今天到了这个位置上的经历。

“我也处在一个成长到了末路的时候，我现在再说什么呢，我觉得也应该说也不至于显示说这个人怎么那么有野心呀，好像那么不知足。我说我不是了，我现在已经到了心态非常平和、该做今后的打算的时候了，再过两年，我也可以退居二线了。所以这两年多，对于我来说就是很认真地把我现在这点儿任务完成好，在我们祖辈里，就我这么一个当官的，我工作上对得起组织、上对得起老祖宗、下给儿子也做出了榜样，想想也就算了，知足吧！”

看得出，凤楠仍想做最后的努力，今后的两年是职位能否上一个台阶的关键的两年，上不去，只能处级级别上退休了。尽管她嘴上说不是不知足之类的掩饰自己内心痛楚的话，实际上她的确无法知足，在初级岗位上已经工作了15年的她，根据能力和资历也应该提拔了，怎么就不能提拔？

凤楠很进取，在她成长历程中，她的“进取”是被很多的荣誉证明了的，就是这些不断给予的荣誉，使得她更加意识到要努力“进取”。

副处我干了十年，这中间经历了若干茬，最后解决正处了，这正处现在又13年了。作为后备干部参加市里的中青年后备班，早就学习过，97年我就是中青后备干部，就上那儿学习去了，到了现在仍在处级岗位上。但是在这个期间，我觉得我始终都在努力的工作，都去开动脑筋在自己的岗位多为党干点事，多为老百姓干点事。我当过区的“人民好公仆”，这可是全区党员投票推选的，共10个，我是其中的一个。市里的优秀工作者，整个妇联系统两年就一次嘛，那一年就两个，我是其中的一个。我都离开妇联了，还评我为“全国三八妇女红旗手”（呵呵）。我81年入的党，85年我就是区的优秀党员，区机关的优秀党员我当了无数次了。作为公务员，立过二等功，立过三等功。要说就是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够多了吧，或者是组织上我的同仁们对我算是够认可的了，我应该很满足很满足了，我也确实很满足很满足了（无奈和辛酸的表情）。也有很多人觉得就你的能力，就你的水平，就你那个阅历，你的资历，应该不是这样的。其实有时候我隐隐约约觉得人家说的也有那么点道理。而且，我们党有很多提拔干部的规矩，也没完全按这些规矩做，你比如说，什么后备干部要经过培养，有的人根本就没有列入过后备干部，一家伙就起来了。说干部要在几个岗位上经过锻炼才能提拔，人家就在一个岗位上就提拔了，让人心里怎么想。

风楠在说上述话的时候，表情很复杂，眼角湿润，我感受到她心里的酸苦和担心我误会她是不知足的人，因此说的话很谨慎。让风楠难受的是自己“上进了”，组织的确给回报给她各种荣誉，让你无话可说，但关键时候也没有提拔她，风楠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风楠很明白官场上事情，让你干活的时候，你要舍得花力气，积极进取，但看到荣誉或者升迁的时候你就该“知足”。你是否该进取和“知足”全权得“党和组织”说了算，由他们来决定和评价是什么时候“进取”和什么时候“知足”。这和我们党一贯要求干部要具备“见到困难就上，见到荣誉就让”的素质相一致，更进一步说，就是党告诉你“需要你的时候就上，不需要你的时候就让”。

一个女领导干部是否知足以及有“上进心”，不是心理素质问题，而是一个环境问题。正如前面我们所说的，将你安置在一个副职的位置上，而且放置在权力的边缘，如果你突破这些“积极进取”，那你就是“女强人”、“有野心”，“不知足”。如果你不积极，那就是不求上进。总之那种理由都是让你安分守己，将你牢牢地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动弹不得。。

二、领导角色与家庭角色的平衡

女领导干部要在家庭角色和领导角色之间寻找平衡点，而且无论你是在领导岗位上或者在家庭里，你都要保持传统的“贤妻良母”的形象，这也是对女领导干部的又一种规训——角色规训。大量的研究表明，虽然这些女领导干部都是解放了的妇女，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解放这么多年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最终仍然是由家长制和男权铺就而成的，传统的女主内的家庭制度得到了延续和强化（Johnson, 1983; Andors, 1983; Stacey, 1983; Wolf, 1985）。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积极推动家庭改革，也未能针对女主内的婚姻制度开展任何的反思和行动，贤妻良母仍是评价女性的重要指标（张李玺，2006）。

很多的女领导担负着传统的家庭角色，这一点和男领导不一样。在《女市长》¹一书中记录了52位女市长（几乎90%多是副市长），在描述她们的时候，没有一篇不写她们家庭幸福或者夫妻和睦的故事的。每个故事都是一个模式，选择其中一位某市副市长的自述，其言论典型地代表了这些女领导干部们的共同的身份认同。

社会对女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女性不仅要有传统的贤妻良母的美德，而且还要锐意进取，追求自己的目标……作为女性，我始终推崇的是：既为人妻就做贤妻，既为人母就做良母，为官者就应造福于民，不辜负历史的使命。（《女市长》，p125）

与男性不同的是，几乎每位女性高官就任后，都会对自己的政治身份与家庭身份之间的关系进行诠释。某女领导当选为某省省长，她就任之后就当即对传媒表示：“作为女性来讲，与男性相比，对家庭有着更多的一份责任。我既是妻子、母亲，也是女儿。从社会角色讲，我又是人民的公仆，所以我既要竭尽全力为人民服务，同时也应该尽一份女性应尽的责任。”²似乎不宣称自己对家庭尽责就不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女性和女领导。无论你在外担任何种官职，你永远也不要忘记为人妻和为人母的角色。我的问题是为什么男人做领导时从来不会有这样的宣称？

无论女领导干部官有多大，你要在做官、为人母、为人妻的几种角色中找到平衡点，哪样都不能缺失。缺失哪样你都很难做人，也就是很难做女人。一个参加工作的女性，意味着你的一切是党的、群众的、丈夫的、孩子的、家人的，那什么是自己的？

秋菊说：“在单位是市长县长，家里需要的是妻子母亲，回到家，赶快转

¹ 吴仪主编，《女市长》，中国妇女出版社，1999年。

² 来源：南方周末，<http://news.tom.com/1002/3291/2005127-1806492.html>。

位，你不能回到家里还当市长，还当书记，把你的官位带到家里来，不要忘记中国是几千年封建社会脱颖而出的，封建的秩序还没有完全的改变，如果你在单位当市长回到家里还当市长，你这个家庭就好不了，造成家庭破裂了你就是个弱者；孩子学坏了，你是个失败者。在这个家里，老人需要的是儿媳，丈夫需要的是妻子，孩子需要的是母亲，你回到家里赶快把你的位置转过来，如果你把事情搞不好，你夫妻分离了，你连家庭都处理不好，你怎么教育社会、怎么教育妇女，你连家庭都处理不好，你能处理得了复杂的社会？人们会小看你，如果你的孩子学坏了，成了犯罪分子了，你连你自己的孩子都教育不好，你怎么教育干部？咋能叫人来服你”。

这番话是秋菊在一次女干部培训班上讲的，据她说得到了组织部领导以及下面女干部的喝彩。这话听上去很政治正确，讲的是一个女领导干部的各种角色转变以及各种角色的平衡问题。角色的平衡又是一种对女领导干部的规训，这种规训的根本目的是不让你忘了你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责任，人们对女领导干部素质要求除了文件规定的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印象要求，那就是你是否是一个“贤妻良母”，工作好和家庭好、教育子女好、家庭能够和睦都是评价女领导干部的时候的参考指标，工作和家庭两个指标并驾齐驱。对男性领导则没有如此的要求。

我们觉得我们比男同志做得更辛苦，也做得更认真，可能你了解到所有的女干部都是有同感的，不仅要把外面的事情做得跟男同志一样好，比他们做得还好，回去后，到家里头，你外面再累，回家家务事多多少少你还是要做的，男同志就是给你把饭弄好，家里他也不会给你打扫、给你收拾，你回去还得要弄啊，你不可能说我回去跟男同志一样，累了往那一坐，不想动，我啥也不想干，也有那种时候累是累，但是你还得要去做，不做家里肯定要去闹意见的，这里要比男同志付出多得多。多年来，都是男主外女主内，你女的外面强了，男的他表面上也觉得过不去啊，所以一定场合上还要把他弄出去，除了你在工作岗位上，你是一个厅级领导，离开这个岗位到了任何地方，还得是男同志你在前，我是女的，我在后头，所以我说这要比男同志付出多（某女市长访谈录）。

女人该把自己放在怎样的位置的问题，不仅表现在职位上，家里也是如此。女人你要认定自己的位置，这样才能让男人安全、让自己安心。你在单位上，你是副职，这是你的位置；在家里，你是母亲、妻子，你应该认定你的位置，解放归解放，解放只是让你参加

了工作、担任了领导，无论在哪里，提醒你别忘了自己的性别，别忘了性别中的优先次序。解放了的妇女，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但很多事情上你记住你的性别，然后知道你要站的位置，总是在男人的后面。

王婷是唯一不同意我录音的女领导，也是在所有的采访的女领导中唯一一个没有孩子的领导，也是唯一一个丈夫仅仅是中学的老师比自己职位低、目前病休在家的领导，也是唯一一个对我痛哭的领导。她本人也是从铁姑娘式的劳模被提拔上来的，20多岁就担任了副厅级干部，至今没有再被提拔过。近40岁在别人的介绍下和一个中学老师组成了家庭，40岁怀了第一个孩子，但由于工作需要下乡，她在下乡的途中流产了，之后再也无法怀孕，对她打击很大。这个期间领导安排她担任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她说她看着那些妇女白白地刮掉孩子，简直就像挖她的心头肉，这个工作给她精神上沉重的打击，多次提出换个岗位，但她的级别上很难换到合适的岗位。自己的丈夫有了病，她白天上班，晚上伺候生病的丈夫，她的状况使得她总觉得比别人矮半截。她自己的说法就是某些男领导好像因为她的家庭状况瞧不起她，甚至有点故意欺负她，比如她要求了多次换换岗位，但领导都没有考虑，没有合适的岗位是给她的唯一理由。

王婷的痛是深层的，我感受得到，那是一种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痛，她的痛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家庭和孩子是衡量一个女领导干部身价的重要成分。我访谈的几位女领导干部都以自己的丈夫在某某岗位上显得优越和满足，唯有王婷从身体到表情缺少那样的满足和优越感。女领导干部在家庭和工作之间找不到平衡点似乎就觉得从政的道路上瘸着腿走路，不谐调和不完整。无疑，这样无形的要求和规训，加重了女领导干部身心负担，很多人为了取得平衡，就舍去“上进”的机会而成就家庭和丈夫的事业。而男人则没有这样的规范，他可以全心全意“上进”，成就事业。角色的规训，也是一种权力的安排。

三、对身体的规训

福柯把身体视为探讨权力运作的首要场域，现代的权力不再是由上而下的压迫，而是透过纪律，运作在微观的身体层次上，要探讨不同的主体性，如何透过权力的纪律论述被建构出来，并成为真理，身体是一个很好的起点（Frank, 1991:40）。

政治学家艾利斯杨（Iris Marion Young, 1990a, 1990b）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探讨女人如何在自己身体的关系当中，协调她们的自我观感。他引用存在主义现象学关于“体现”（embodiment）的看法，探讨女人在企图成为体现的主体而不再“只是身体”时，所遇到的典型的张力，一方面，生活在性别化的社会秩序下，女人总是根据她们的身体来定义自己。长久以来，女性的身体一直是别人眼中的客体和操弄的对象，而女人往往也接

受这种态度，从别人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身体。女人很容易被外形所困，把自己的身体仅仅视为物体，或实现理想的障碍（Young，1990b:155）。另一方面，和男人一样，女人也会觉得身体是她们实现欲望与探索世界的媒介，尽管理论上，她们不像男人一样可以超越自己的身体，但身为主体，女人也不可能甘心把自己只当作一个身体。于是，矛盾产生了，女人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感受到自己作为客体——被评价、被认定和自己作为主体——想超越自己身体的局限之间在进行着挣扎和斗争。“进退维谷”就是挣扎的形象比喻。“进退维谷结构”常为社会和政治宰制所使用，建构出女领导干部群体“尴尬的境地”，它牵涉了两个互相矛盾的负面形象，而被描述的对象几乎无法逃脱被刻板印象化的处境，因为当他们与其中一形象相斥时，立即陷入另一对立的负面形象（夏晓娟，2002）。

（一）生育与工作

五、六十年，由于国家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和自然灾害，人口锐减，加上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才，因此大量动员妇女出来参加社会劳动，象淑华和南小芬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并成为佼佼者的妇女不是很多，因此对她们来说全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完成女人的责任——生育的压力两者之间的拉扯就更大。她们要全身心交给她，但党并没有处理她们生育之后的后顾之忧，照顾她们生养孩子的艰辛。她们以超乎寻常的毅力和艰辛保证了革命工作，却导致自己身心憔悴。

淑华、南小芬等都谈到她们生育那一段艰难、心酸的日子。

淑华说，怀老大的时候，我是公社书记，工作很忙，根本也不知道保护自己，怀孕期间吃点什么啊，喝点什么啊，注意点什么全不知道。走哪里都骑车。有一次下大雪，连人带车翻进沟里，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大人孩子都没事，骑上车又上班了。孩子生下来，出了满月送去奶奶家我就开始工作了。生老二的时候，我一直到快生的那天仍在工作，晚上我觉得要生了，就和我姑姑两个人，自己两个手里拎个包袱一路走到医院，疼得不行就在路边休息一下。到了医院差不多晚上十二点了，1点钟孩子就出生了。

生完孩子后，我生病了，打了青霉素后晕死过去了，我的单位才说发个电报让他回来。那个时候部队上纪律非常严格，没有人性化的东西，都是革命化，就不让他回来。照理来说他们一年有探亲假十五天，但他是连指导员，他带着一个连队一百多人，连队的事情也放不下。顶多回来呆几天就走了。因为要求革命

化，孩子满月后，我就赶紧开始工作。一般干部都是那么做，何况自己是个地级领导干部，更得要求自己。可房子太小，孩子也拖累我的工作，就想把孩子送到我妈家去。当时真的憋得我没法，我喜欢这个孩子，感觉把孩子送走了，等于把我的心也抓走了。

男人归根结底是属于革命的、属于工作的，而女人不仅要属于革命、属于党，而且要属于家庭，尽管她十分向往自己和男性一样工作，不要为孩子所拖累，但自己的身体现实就是这样，所以，只能压抑自己的心情和感受，将孩子出满月后就送走，以便证明自己革命的坚决性。想念孩子和不耽误工作矛盾地存在着。

南小芬说到自己生孩子的这段经历，坚强的她也禁不住哽咽起来：

生第一个孩子你知道吗，很苦啊，我在农村搞“四清”，本打算到外地姐姐家去生孩子，但突然提前就生了。那天晚上，下着大雪，村里的一个地主的老婆说没有粮食吃了，我解决了这件事情都到夜里一点钟了。我往住处走的时候，我的血一下子就下来了，这就是先兆性出血。回到房东家后，那里一个以工代干的小姑娘扶着我休息，我疼得不行，我说是不是我快生孩子了，她困的不行，嘴里说是啊是啊，就是不睁开眼睛，我实在叫不醒她了，就自己爬起来就到市里找个医院生孩子，那个雪路很难走，要走三里地，到了医院，人家不收我，因为在农村搞四清不能穿好的，我穿了件破大衣，头发也是乱的，人家医院一看以为来个不正经的盲流，说没床位了，你到别的吧，怎么哀求也不行。只好走了，离这家医院近得地方就是中心医院，到了那也不收，也说没有床位了，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要生出来了，破了羊水，在走廊里动不得了，他们就查我是从那里来的，我就说我是搞四清的，工作团的团长是谁，让他们打电话核实，他们打完电话之后，赶快收进去了，四清工作组他们不敢惹，第二天我就生了我的姑娘，危险到了一定的程度。生完小孩之后一个月，就把孩子送到一千多里地之外，孩子的奶奶家，我就回来上班了。不能让人家说出来，生出孩子之后你的革命意志减退了，绝对不能这样，回来后一个月身体很虚弱，你知道搞四清很苦，吃的很孬，就是顶着也要搞，人家下地我也下地、人家浇地我也去，想孩子就晚上偷着哭，白天什么也不能让他们看出来。

生了孩子十天后，孩子的父亲从外地回来，只呆了一天半，放下10元钱，他转身就走了，那眼泪直往肚里流。生完孩子赶上唐山地震，抱着十几天的孩子

到处躲，落下了一身的病。有了第二个孩子之后，我带着两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回来给他们缝衣服、洗衣服等，每天只睡几个小时，还要养活家里的老人和自己一家，我的眼泪都哭干了，以后什么事情也不能让我掉眼泪了。

南小芬和淑华的辛酸不仅是自己生育带给自己的苦，也是丈夫的“无情”，在那个革命的年代，“无情”——不能被家庭和儿女情长所拖累，可能被看作“最彻底革命”的榜样。对女性生理差异的忽视和压抑是那个绝对男女平等年代的产物。也是在平等的旗号下制造的最大的不平等，正如 Young 所说，女人把身体当成一个物体，想超越自己身体的局限，但生育就是一个实在，如何超越？只能忽略身体、压抑身体，使身体与灵魂分离，追求革命的理想，这是女人面对身体——生育上所表现出来的进退维谷，你要关注身体、孩子你就托革命的后腿，你要革命就要放弃儿女情长和对孩子的思念。

好在淑华和南小芬都是两个孩子，我没敢问这方面的事情，他们是自觉计划生育或者自然就是两个，结果对她们两个人的成长是有利的，生育孩子少，让她们有时间一心一意革命。

（二）长相漂亮与不漂亮

80 年代初，一些报刊杂志开展了关于认识性别差异的重要性和男女两性都要培养自己性别特质的讨论，这些讨论结束了 80 年代之前无性化的时代，拉开了人们关注“性别”的序幕。进入 90 年代，随着现代媒体和不断增加的以形象为导向的大众文化的普及，女性话语的表现越来越以外表为主要内容，入时的外表等同于“女人味”，并成为“现代化”标志。在日益增长的形象导向的大众文化中，中国妇女的位置究竟在哪里？难道只有完全否定过去才是保持自我价值的唯一可行的选择？在转型时期，我们怎么理解男女在政治经济权利结构变迁中的角色，即一方面妇女们被鼓励作贤妻良母，作为稳定家庭和社会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又刺激着她们去做好的消费者，为得到美的承认而竞争，去当秘书、公关小姐或大款的情人。如果希望中国妇女以“性别差异”作为自我身份认同的途径，那么我们该怎样理解这种身份认同表达出来的一些矛盾心理，即如果妇女形象中充斥着“性意味”，就存在颠覆官方意识形态中树立的那种“四自”的妇女形象的可能，但另一方面这种颠覆本身又不断地被市场经济所支持翻转过来再次变成对妇女的限制。现代化进程不仅仅以高耸的楼群为象征，也以被生产出来诱惑（妇女）渴望消费，美丽的、有现代风貌的年轻妇女的形象为特征。与此同时，当性别歧视的事实以性别差异的名义而被合理化时，妇女就会在服务于“国家”现代化的进程的名义下，被遏制在她们“天然的”位置上。

90 年代后，人们对女性身体美的追求和渲染到了一个极致的地步，对妇女们来说，似

乎给了一个普遍很清晰的概念，那就是“你长得什么样就说明了你是谁”（艾晓明，2002），有人把美貌视为一种“政治现象”（Politics of appearance），称之为“外貌的政治”，广告、媒体和美容工厂等合成一起，构成了一个全球文化机器，向全世界宣传西方式的美貌典型，即赐给女人幸福观。女人对身体美的追求使女人一生与自己的身体为敌（姜秀华，2005）。在这样的氛围中，长相居然成为选拔女领导干部的一个指标。

“这决不能拿到台面上说，只是意识形态中的问题，长得好了也提不起来，差了也提不起来，长得好坏不是政治条件，但也是提拔女领导的一个条件。”秋菊这么说。我访谈过的几个女干部都说到关于女干部长相和提拔之间关系，但只有秋菊这么坦诚透彻、一针见血。我很诧异，在我印象中长得好点才能有机会提拔，但为什么长得好也不被提拔？秋菊道出了其中的道理：

不到决策层，我看不到这一点。长得特别漂亮的一提起来，对女干部来说就有了一个对立面，马上成为女干部攻击的对象，她凭啥呢？就凭长得漂亮一点？女的嫉妒。提拔难看的，男的骂，说长得跟猪八戒似的。所以提拔干部我觉得长相不特殊又不难看的容易提起来。”

选拔干部不是有很多依据的标准吗？如德才兼备等等，其中的“才”指的是能力而不是相貌吧，这条标准是怎么定的？选拔干部不是选美，干嘛看女领导的相貌？

秋菊说，自己到了决策层、参与决策后才看到这一点，担任副职的时候或者从事的与人事无关的工作时看不到。为什么漂亮成为选拔女领导的一个瓶颈，秋菊进一步剖析道：

“特别漂亮的女的，如果被男的相中，不敢开口，他觉得一开口就会给自己惹上麻烦，为了保住自己的一官半职，宁可我不提你，也不能带来杀身之祸，成为人家攻击的对象，这男干部就把长得漂亮的女干部扼杀了。长得难看了，哪怕政绩好，一把手就不把你瞄一眼，长得跟猪八戒似的，看着就恶心。这个不用明说，一般都是在干部中间，从谁的一句话我就能听出来，唉，把她搁下。他不会说太难看了这句话，但唉一声我马上就知道他是啥意思，太难看，不提拔。”

秋菊说到前两年和一位女副总理一起吃饭的对话。总理问她：“秋菊啊，你说当领导干部遇到困难是啥呀？”我说是配合好和配合不好都不行的问题。总理说，“还有一个你没有说出来，提拔了漂亮的不能用难看了也不能用。”连总理都知道这里面的道理。

我想因为总理也是女的，在她从政的历程中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吧。

有学者说，现在是一个“眼球经济”的时代，人们在评价一个女人的成就的时候，前

面会加上“美女”的字样，这个人被关注不是因为她是什么的官以及官职后面所代表的她的能力，而是前面的“美女”字样（姜秀华，2005）。官场这个“先进文化”的领导者和执行者的头脑中，几千年来把女性作为其审美对象的封建观念仍没有改变。他们仍然把相貌作为衡量女性价值的标准，照此下去，国家保护女干部参政的政策中至少一个女性的政策，岂不变成男领导选美的场所？以长相为借口，变相的压制有才干和优秀的女性进入到权力阶层，是一种排斥女性参政的权力技术。

既然领导们看着姿色挑选干部，那么，这就为一些有姿色的人创造了从政的机会，现实中就出现了美女升官的故事：

“中国官场第一美女”之称的刘光明，原是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直属分局下辖税务所的一名普通女税管员，为了+

--讨得官员们的喜欢，她不惜花费 500 万元巨资，先后多次到韩国、澳大利亚、香港等地做面部整容、隆胸术、臀部整容，仅屁股整形一项就花了 52 万余元，整成了鞍山市“最美的屁股”。凭此资本，她周旋于那些握有实权的领导干部之间，短短几年时间，就从一名普通的税管员，一步步升迁至税务所副所长、所长、税政科副科长、科长，直至攀升到市国税局局长的宝座。¹²

“美人政治”，无论是漂亮女人拿自己的漂亮脸蛋做权力交易或者男性领导对女干部长相的变相关注，就给所有被认为漂亮的女领导干部戴上了污名，以为她们的权力一定是交易的结果。从武则天到慈禧，到今天的美色交易说，对女领导的规范不仅来自空间位置，而且受制于男人们“红颜祸水”的话语操纵，使得多少女人远离政治或者为了掌权而不得不玩起“美色政治”。因为美色让女人相信，控制自己的身体就可以分享男人的权力——一种掌握自我的权力，于是美貌的规范和实践原本是控制女人，女人却从中感受到权力与解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仅靠红颜就能当上女领导，是不是对现今政治的极大讽刺？能不能算是一种对男权政治的抗争形式？

听秋菊说的时候，我下意识再次打量一下她的长相，事后我为自己下意识的打量而感到难为情，因为我想看看这个女领导是否够漂亮？我发现她五官搭配的很好，圆脸大眼，个子不高，但整体上一眼就能看出是从农村出来的人（似乎农村出来和城里的人有一种不同的感觉），穿着不时髦却也符合她的身份，烫的短发很自然，里面穿着毛衣，外面一件呢子外套，色彩搭配不艳不俗。脚面很宽，把皮鞋撑成扁的，一看就是从前劳动铲铁锹的

¹²资料来源：“官场情人成为贪官腐败动力 疯狂吞噬社会财富”，《现代快报》，2007 年 04 月 02 日

脚。总之朴实的穿着和她坦诚爽朗的性格很相称，不漂亮也不难看，属于长相争议不大的那种。我在想，如果换作今天，她这样的长相即便有令人刮目相看的经历和资历，她能否坐在这个位置上？看着眼前这个有着传奇般参政经历的女领导，我心里生出一丝丝的悲哀！悲哀在于在毛泽东时代锻炼成长出来的这些女领导在这个时代生存的艰难，靠能力奋斗了一辈子，怎么也没有想到长相成了能否参政的问题。

女权主义者常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女人对美貌的追求，认为这是一种苦难与压迫，女人不仅是美貌的受害者，更受了男尊女卑意识形态的毒害，正是这种意识形态，促使女人不断地保养和改善她们的外貌，美貌文化的规范要求女人青春永驻、苗条和丰满，脸上不能留下岁月的痕迹，美貌是哄骗女人守本分的最高手段——让女人相信，唯有战战兢兢地装修她的身体，才能控制自己的生命（Davis, 1997）。女性主义最关心的是美貌实践如何控制和规训女人，美貌是女性特质的核心，女性被视为躯体美的化身，大多长相平凡的女子被嫌弃，对女体的爱恨交加，有助于复制两性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把女人的精力导入完美肉体的绝望竞赛当中。在这个游戏规则中，男人是裁判，来审定谁合乎标准和规范。外表变成是建构性别差异的主要方式。

四、参政机制中的游戏规则

国家有一套选拔干部的机制，建立机制的目的是保障公正公平地让优秀的干部可以选拔到领导岗位，也保证领导的权威性。一般来说，干部选拔的程序基本上分为民主（群众和组织）推荐，组织考察、张榜公示，组织任命。实行这套程序的目的是保证所选拔的干部是群众和干部中有威信、认可的。领导根据大家推荐的干部的票的多少、意见和各种因素综合考虑之后，确定候选人。之后组织部派干部考察这些候选人。所谓考察就是去到该候选人所在的单位去调查群众的意见。根据考察结果，由领导决定哪个干部当选，之后公示（参考资料）。表面上看这套机制有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大的学问，下面的资料显示，女性是怎样的干部选拔过程中被过滤掉的。

（一）推荐干部中的游戏规则

推荐干部是民主推荐程序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干部选拔中的第一步。这一步非常关键。就在这一步里，已经出现了问题。民主推荐变成了关键是领导推荐，民主成了幌子。领导在关键时候给你说一句话也能决定你是否被推荐，一次不行多推荐几次等等都是你能否进入第二个干部选拔程序的关键。

A：推荐几个与一个都不推荐

在干部的选拔过程中，提名和推荐是第一步，在这一步女干部就会面临很大的难堪和挑战，很多女干部就是在这个阶段被拒之门外而无缘领导岗位或者更高的位置：

“要么推荐几个，要么一个也不推荐，否则就说不清楚”（秋菊）。

也就是说组织部门或者领导们在推荐女干部的时候，要么就推荐几个女干部，要么就一个都不推荐，因为推荐几个没有“跟谁有关系”之嫌，而推荐一个就有“关系”之嫌。如果恰好遇到只有一个女干部可推荐的时候，这个女干部就因为该关键领导的顾虑而失去了被推荐的机会，成为“避嫌”的牺牲品。

B：给男干部说话和不给女干部说话

假如这个干部被推荐上来，但在推荐会上大家要对被推荐的干部说话，又有学问出现。新梅说：

“推荐的男干部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说优点，如果提的是女干部，大家先会冷场，大家不会积极来评价，即便有人说话，你各方面的综合分可能是90分，但说话的人只能说到60或者70分，这不是说话的人只了解这么多，而是说话人的性别决定了他只能说到这个“度”上。”

我问，为什么是这样的状况？

新梅说：就怕我说了十一分，说我俩有关系。

我问：那能不能这样说，提男的时候，就认为他俩有受贿关系？

新梅：那他不在乎这个。男女作风的问题经常能打倒人，这就是咱们的传统社会。

言外之意，只有“男女关系”、“性”可以打倒人，而受贿一般打倒不了。为什么就是这样呢？官场上似乎就在玩“性”。对“性”的恐惧，又一次牺牲了女性。

C：男干部可以多推荐几次，女的不敢推荐第二次

在推荐干部的时候，推荐的男干部组织没用，我可以推荐两次三次，但是推荐女干部的时候，推荐一次我就不敢推荐二次，你要是推荐二次，三次，人家就

会怀疑你和她有啥关系（新梅）。

所有针对“女”的游戏规则的后面都是一个“性”的问题。总之，一句话，“女人是祸水”，不可沾。什么时候男女都怕沾上“性”。

D：女的先搁起来和男的先用起来

“如果一个男干部有争议，但领导想用他，就说先叫通过，如果是一个女干部，就先搁下”（新梅）。

新梅说，有争议的男干部可以在使用过程中改正他的不足，但对一个有争议的女干部就会说先放下，再考察考察再说。这一搁下那就没有消息了。

怎样对付这样的游戏规则和局面，女领导们也提出了一个共同的治理策略，即关键时候如果有一个女领导在其中，她能替这个被推荐的女干部说话就算解围了，很多时候也不是男领导不想提拔女干部，而是没有人站出来替这个女干部说话。以此可以看出在选拔女干部的时候，在决策层或者女干部选拔的过程中女领导干部参与的重要性。

但也有女领导干部说，有时候这个女的比男的更有嫉妒心，她关键时候就不给你说话。推荐干部似乎都变得和个人有关，和机制没关系。看上去我们有着很完善的干部选拔机制，实际上有一套下面操作的游戏规则。没有被推荐的干部，领导肯定有一套很冠冕堂皇的说辞，让你觉得就大家没有推荐或者有更优秀的人被推荐等等。

推荐和不推荐、推荐一个和几个或者一个都不推荐，女的就没有人站出来说话，女人的身体已经成为进入领导层的障碍。选拔女干部首先要考虑别和绯闻沾上边。说白了，官场上可以将女性这样对待和搁置，这就是典型的“性别歧视”，“重男轻女”的具体表现，是对妇女人权的践踏和轻视，只能证明男性霸权的政治领域离真正贯彻男女平等的目标相差甚远。

（二）规定比例的游戏规则

为了保证各级领导班子中女干部的比例，我国采用了最低比例制，也就是说“在各级领导班子中至少一个女性”的比例规定，然而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模糊不清的名额规定等于给妇女代表罩上了一个“玻璃天花板”，给女性创造了一点进入高层权力机构的机会，同时也阻碍了大量的女干部进入实质性的领导和决策位置。

A：至少一个变成只有一个

国家规定各大领导班子中至少要有一个女性，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就变成了只有一个女性。新梅在她从政的路上遇到过几次只要一个女的而没有被安置在自己希望的领导岗位上的经历。新梅说道：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票数，那十几个男的都用了，用了一个女的，就剩下我，没有岗位了。人大要一个女的，已经有一个女市长了，班子配备至少有一个，已经有两个了，所以他不可能再要你了。已经有个女的，只有她走了我才能去。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地方与组织玩着一个叫做“土政策”的权力游戏，该“土政策”就是指地方政府或者组织根据上级的方针性政策或者自己的需要，结合本地区组织的实际状况和利益而制定的一套灵活、可变、可操作的社会资源的再控制与再分配准则（翟学伟，2001）。土政策是高一层方针和政策具体化的表现，其目的是使高层的政策更适用于具体区域，也为了调节地方利益，以补充总政策的不足。然而，土政策不仅具有上面的显现功能，更具有潜功能。也就是说在根据自身需要制定土政策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出现所谓“混合型”的土政策，看起来不违背上面的政策但也保护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制定出来的政策表面上看起来很公正，实际上容易产生某些人受益，对某些人的利益有一种相对剥夺（翟学伟，2001）。因为是土政策，所以是合法的，其内涵可以转化为一种对策，上对付上级，下对付百姓，其贯彻执行过程就是一个滥用权力合法化的过程。各个地方政府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将“至少一个”的宏观政策执行为“只有一个”的土政策。其根本目的是权力和利益的争夺。

B：“无知少女”集于一身

国家有政策规定，在领导班子中配备干部的时候，要注意领导干部代表各种不同界别，提出要加强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的比例，如果没有这样的界别代表，这个班子就不批。本来是一种民主政治的姿态，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却又和性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出现了“无知少女”现象，即把上述的四个界别代表都放在一个个人身上，都放在女的身上，既满足了注重不同界别的政策要求，也满足了至少一个女性的政策。

在选择“无知少女”的过程中就出现了“一夜之间掉馅饼”的情况，即符合条件的一个普通女干部或者女教师（知识分子、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女性）一夜之间被提拔为领导干部。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刘伯红在接受《瞭望》周刊的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无知少女”现象的出现，是为了能尽量少地占用领导干部职数，往往提拔妇女干部的时候，都是尽可能找集这四种特点于一身的女性进入领导层。这种较为片面的选拔结果，就造成了

这些特点集中的妇女干部进入领导岗位以后，有的人管理和决策能力不尽如人意。¹这些情况说明妇女只能作为性别身份参政而不是阶级和意识形态的代表参与政治。

文化理论的研究者霍尔认为（Hall, 1996b），接合是一种连结，在某一种情境下，将两种不同成分接合在一起，认同的接合就是将不同的成分重新接合，因为认同、阶级、性别、种族、年龄等的论述并不是自动连接，他们还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组合（Chris Barker, 2002:p212-213）。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本来是没有四种身份，但是经过一种有意的连接，就变成了歧视和排斥。

C：将女领导和一些特定的性别岗位联系在一起

2005年8月28日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章关于政治权利第九条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政治权利。”第十条规定：“妇女有权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强调了各种途径和形式的参政。然而，在实际中，女领导只能做与性别有关的工作就把从政的妇女限制在一个或者几个岗位上而不能广泛参政。江苏扬州市妇联对扬州市妇女参政状况的调查显示，机关部门和县处级现任女领导干部还存在“四多四少”情况，即表现为年纪大的多，年纪轻的少；副职多，正职少；虚职多，实职少；群团部门多，党政主干线和经济主战场少。²

新梅原来在妇联当领导，妇联规定只能连任两届，当她任期满了之后，就为自己下一个岗位去哪里犯愁了，她说：

“我不能选择我能够胜任和喜欢的岗位，我必须要看哪个单位没有女领导，因为一个领导班子中只能有一个女的。从我的内心我当然希望自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岗位，但如果我喜欢的岗位有了女领导我也不能去，正厅的岗位适合我的，（适合女性的）都有一个女的了，而我又必须挪位置，所以我从副厅级的位子又到了这个副厅级的岗位。统战部的位子也比较适合女性，我也打算在这个位置上退休了，没办法。”

马海自己从财政厅副厅长的位置上安排到妇联当主席，她非常不理解，她认为自己是业务干部，长期以来一直负责经济，怎么把自己放到妇联的位置上了？这些年她苦心钻研业务，认为自己完全可以胜任业务部门的领导岗位，也应该到那里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可组织说，她作为一个女同志到妇联工作很合适，况且到妇联工作也算提拔了，从副厅级

¹ 资料来源：《瞭望》周刊，网址：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2/14/content_5737094.htm.

² 资料来源：《瞭望》周刊，网址：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2/14/content_5737094.htm

到了正厅级，对很多女性来说可望不可及。

不说其中的缘由我也能够理解她为什么到了妇联的岗位，因为从副厅到正厅的岗位，适合女性的岗位非常有限，竞争也非常激烈，只有妇联的位置男同志是无法竞争的，作为马海的确到了必须提拔的时候了，妇联就成了安置像马海这样的女领导最合适的位置。安置的理由也极为充分，政治正确。把你安置在妇联岗位说明组织对你的重视，你的能力足以把工作搞得更好，你工作出色所以提拔了你，从副厅级到正厅级，很多人求都求不上呢等等。被提拔的女领导干部在面上也会这样对别人解释，以便维护自己的尊严，但私下里谁都说这是个安慰岗，或者说是一个养老岗、过渡岗，很多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妇联这个位置是靠生理性别来安置的而不是根据被安置的人是否具有性别敏感性和为妇女服务和参政的意愿和能力。

女领导干部只有很少的岗位可以安置，只有一个人可以到领导班子，只有一个机会和职位，怎么能不形成相互竞争的局面？有限的位置造成了残酷的竞争环境，使得一些愿意从政的女干部不再是一个被动地、等待被组织安排，而是积极的利用参政游戏规则争取权力。前面谈到，女人参政女人也嫉妒，认为这是女人的素质问题。把嫉妒归结为个人的素质而不去看女领导参政环境的残酷性，不看一个岗位竞争的激烈性，其实就是再找一个藉口来贬低女性从而提高和保证男性上岗的机会。难道依靠性别设置岗位和只有一个女干部的操作，不是男性嫉妒女性和并与之竞争的结果吗？竞争和嫉妒只有在资源有限和奇缺的情况下，才能发挥最大效力。当男性用这样的技术把女性排除在圈外或者放置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之后，他们之间的残酷竞争就开始了，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只要打开互联网浏览一下，所有倒台的贪官都在干着色、权、钱交易的勾当。

（三）女干部的提拔年限和退休年限的游戏规则

任职年限是另一个排斥女性的政治游戏。从50年代起，城市职工都执行男性60岁退休和女性55岁退休的退休政策。关于女性公务员的退休年龄问题，2000年9月，国家人事部工资福利与离退休司副司长王文波解释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男、女公务员的法定退休年龄分别为60周岁和55周岁，这是以我国男女不同的生理特点为科学依据，从保护妇女权益的角度出发研究制定的，有利于保护在基层工作的女性的身体健康。同时，国家为充分发挥女性人才的作用，还对国家公务员中担任县处级以上职务的女干部的退休年龄作了适当延长，规定凡担任县处级及以上职务的女性公务员可以到60周岁退休。¹

现实情况是，很多地方执行了女性县/正处级公务员60岁退休的政策，但是却规定了任职的年限，到了50岁出头就不提拔了。而男性到了55岁，仍可以有晋升的空间。有些地方

¹ 资料来源：《领导文萃》，2000年12期。

依然执行55岁退休的政策，各地的差异较大。实际上，针对女性的任职年限和提拔年限一般仍按照女性55岁退休的年龄而执行，导致了女领导很难晋升高一级职务。一篇登在《领导文萃》中名为“女干部就该早退休”的文章写到：

据《中国妇女报》报道,2000年4月以来,重庆市直属机关等女干部不断到妇联上访,就重庆市机构改革工作中先后出台的涉及女性权益的两个文件提出意见,尤其对女性比男性提前至年退休的规定反应强烈,认为男女退休年龄不平等直接导致女性政治权利受到损害。重庆地方有关文件规定“换届时,区县党、政领导成员和纪委、法院、检察院正职女同志50岁以上,一般不再继续提名。新提拔担任上述职务的女同志一般不超过45周岁。区人大、政协班子中的中共党员女干部年满53岁的,一般不再继续提名,新提拔担任人大、政协领导职务的中共党员女干部,一般不超过50周岁”。¹

女性45岁正是年富力强、经验丰富、施展才华的时候，却不再有机会担任正职领导职务,这违背了“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

该篇文章所反映的事实其实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凤楠自己的参政经历也说明了这一点，她说：

到今年年底，我就可以申请退居二线了，为什么呢。我15年正处满了，按公务员法呢，到15年，还在一个级别上，不能再提拔的，就不应该再担任此职了，就应该退下来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按我们区女的正处的最高任职年限是53周岁，那我现在马上就51周岁了，还有两年多，也就到后年年底，到09年的时候呢，我也就正好到53周岁了，我也可以退居二线了。但在这两年内，也有可能再上一个台阶的，到副局级，现在看来有点可能性。哎，就是这么一个希望而已。

关于任职年限的规定严重限制了女干部向高层发展的路径，是造成女干部高层参政比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2003年，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专门召开了关于“男女公务员任职年限”的讨论，分析产生任职年限规定的原因，有学者解释是因为尊重妇女独特的生理特点而制定的，也有学者分析是因为面对就业市场的压力，这些人退休后可以let出位置让更多的人提拔和就业（叶边，2000）。问题是，无论什么理由，这些代价和牺牲不能总是让妇

¹ 资料来源：叶边，“是女干部就该早退休？”《领导文萃》，2000年12月。

女来承担。

（四）女领导培选——差额选举制的伴生物

1979年前，我国实行等额选举制。鉴于等额选举的种种弊端，1979年7月1日通过了新《选举法》，新《选举法》对之作原则性的重大修改，规定了差额选举制。该法第27条明确规定人民代表无论是经直接选举产生还是经间接选举产生都必须实行差额选举。与《选举法》同一天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地方组织法》）规定对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组织人员、政府行政首长的正副职、法院院长和检察院院长等“一般应”采用差额选举办法。尔后，1982年根据新宪法重新修改的《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均保留了差额选举的规定。1986年12月2日颁布了第二次修改的《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两个基本法总结了几年来实行差额选举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我国的差额选举制（邹平学，1998）。

实行差额选举制后，官场就在围绕谁能够被差下去而保证谁能够上来就做起了文章，玩起了游戏。所谓“陪选”的说法就是这个游戏规则的表现形式。

秋菊讲述了她当“陪选”的经历。秋菊由于给领导提意见，得罪了领导，结果借着清理文革时期的干部队伍的名义，把秋菊从县委常委免职到机关党委作副书记，降到副科级。后来秋菊去党校学习完之后，被派到计划生育委员会当主任。秋菊是人大代表（有资格培选），因此当时要选举副县长，让秋菊去做“陪选”，也就是说让她当“差额”，在选举的时候保证差下去。秋菊说，叫我当差额，就是为了能保证别人当选，她给当时的县委书记说：

“我是常委免下来的，你不要再给我伤口上洒盐了，我不当这个差额了，他说那不行，当差额也必须有资格，这就表示你很优秀。这是党性，你必须当。”

秋菊说，她知道自己的群众基础和在干部中间的威信，如果让她当陪选，她一定能够当选。如果当选，岂不是让书记很尴尬，要让另一个人保证当选的意图就不能贯彻。事实正如秋菊所说的，在几次的投票中她都名列前茅，但选举的结果中没有她，代表们鼓倒掌，对选举结果不满意，人大会闭不了会，急坏了书记，找她谈话让她亲自上台给代表做思想工作不要选她，她不得不亲自上台给代表做思想工作，代表在她的恳求下才接受了这个结果。秋菊说：

“我没做违法乱纪的事，老百姓衡量干部不是你当官不当官，就是你当官的

时候给老百姓干事了没干事，人民代表是这种感情，尽管你把我的职位免了，老百姓认为我当官一不贪二不沾，由二十多岁的一个年轻娃当常委期间给老百姓干了那么多的实事，我的事迹广为传颂，我二十多岁当书记修了三条路，修了几个水利，到现在人民他不计你当官他记你的事。你男的领导给老百姓干了几件事啊，人家一个女娃给老百姓干了这么多的事啊，老百姓都认为咱廉洁，连中层干部都认可，所以到这个时候，老百姓都认为我是个好官，再加上中国同情弱者，你把一个好官连降两级。你让人家当陪选，这么欺负人家，非选我上来就是斗气。”

斗气，也是普通代表对现在选举制度走过程的一个抗争，这种游戏明摆着就是拿人民代表的神圣权利和尊严当儿戏，什么事情都私下里定了，却要这些代表来做秀，难怪他们斗气。

我问秋菊，这个和性别有没有关系？秋菊说当然有关系，她陪选就因为她是一个女性，为了保证那个从上面意图而来的女性当选，在只能有一位女性的前提下，她就作为牺牲品了。如果不是看我是个女的，他们这样做也要掂量掂量。

当秋菊再次提拔到副县长的职位的时候，她描述当时的感受：

“当副职，二次宣布上来的时候，我落泪了，我走了一路，哭了一路，不愿意再当，真不愿意再当了，实在不愿意当这个干部，当这个领导干部，这个领导干部岗位上太艰辛，太风险。”

榕爱也讲述了她陪选的经历，和秋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她是从县妇联主任的位置去作为副县长的陪选人。榕爱说，陪选就是组织定的，不能让你选上。我不愿意当，也告诉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和秋菊的书记说的话一样，“你不愿意当也得当，你人品好。”当时我气得从县委书记那里出来，丈夫给我说，不想当那个陪选你就写一张声明贴在代表大会的门口。我斗争了很久，我这么做就把县委书记给得罪了，我不当，我还得生存，我能离开这个地方？你没办法改变自己的这个结果，我就硬着头皮去参选，我也是威信很高，如果不是压着我，肯定能当选。结果两个乡的干部选了我，还给人家处分，说不和组织保持一致。”榕爱说：

“选举过后，我很难过，我觉得见不得人了，有两个月都没有上班，最后我想出来一个道理，我说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事情，组织上就是排斥你当选，

并不是你没有威信，并不是你没有能力当，压住不让你上。后来我就想，一大群男人为了对付我这女人，合伙来做工作压抑你的选票，就是我的能力高于他们，他们又没有比我高到哪里，又没有比我高贵，我有啥丢人的，我又没有偷人家抢人家的，我又没有做违法的事。想到这，后来大家都上班，这个喊我那个喊我，后来，我感觉就是，理直气壮上班了，又去干了一年多，最后我就提出我不干了，在妇联一共干了十一年。去了另一家单位，在那儿，我说歇歇吧，我也不想干了，也不生这气了，不在这县委大院干了。”

作假也要做得跟真的似的，把表面文章做足了。作为差额选举制，本来是一个优中选优的策略，在实际中却变成了上面的结果。必须要差下去一个人，但很多时候落在女人的头上。在保证一个班子中“只有一个女性”的前提下，放两个女的而差下去一个女的，保证领导班子中有了一位女性，而候选人的名单中有两位女性，对社会、对上号表示执行了增加女性候选人比例的政策，对代表们来说也都是一个交代。而这样的方法损害了干部选拔的公正性、损害了党的威信和干部的自尊心。他们不会顾及这些后果，因为早已拿捏好这些干部不会怎样，尤其是女干部们能怎样？正如荣爱说，“我斗争了半天，我要在这个地方生存，我能去哪里，我就认了吧。”利益的考量更让他们明目张胆。社会上不知道女干部被差额的实情，但差额下去，给大家一个事实，宣告了女干部的素质不行。妇女素质低的口实就这样一点点地被宣告。经历这样打击和屈辱的秋菊和荣爱，怎可能带着满腔的热情去积极参政议政？她们都说：政途让她们太艰辛、太伤心、太风险，实在不愿意当领导了。

小结

从本章的书写中发现，当我把从女领导干部从政中各种规训她们的“微观的权力技术”概括出来的时候，就清晰地看到了一幅福科所说的“全景式监狱”图，在这幅图像中，从安排女领导干部的空间位置，将你用种种的理由和借口限定在副职的位置上，遵循“男尊女卑”的千年古训，用性别角色刻板定型认识——无论你官位多高，你也要在家当好“贤妻良母”，找到工作和事业的平衡；对女领导干部的身体更是有挑剔和刁难。你的长相漂亮了不行，不漂亮也不行；你既要工作也要完成生育的功能，而且不能因为生育耽误工作，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并用种种的游戏规则限制你参与政治，如“只能一个女性”、“执行 55 岁的退休政策让你无法培养和提拔”，其实现实生活中远比这多得多，如你付出的和得到的不成正比、你的能力和对你的评价不符等，如此的“全景式”的监控，妇

女参政比例提高如何可能？

这些全方位的具体的规训技术，一方面交待了“男女平等”中男人和女人都有参与政治权力的国家意识形态，保证政治领域中有一定数字的妇女，另一方面用角色、退休、选拔等一系列的制度画地为牢，牢牢地限定了女领导的参政范围和数量，保证了男性参政的绝对利益和霸权位置，父权制就以这样隐蔽的形式和“男女平等”隐秘地勾结在一起，至今持续地发挥着作用。虽然“妇女解放”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革命目标之一，但是 60 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并没有真正实现“妇女解放”，规训的目的就是让女领导干部们从心理上认同，并且觉得这就是合理的，由该认同变成自己的一种思想认识和自觉行动，并去要求别人和规范别人。

只要设定一些状况让人根据某些制式“标准”进行评估，只要无法逃脱这些状况，只要可以把人孤立在这种状况中，他们就会变成看管自己的警卫。在这种状况下，人会一直评估自己的行为，对自己进行运作，把自己铸造成“顺民”。该评估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控制的主要机制。

第六章 主体与多场域抗争

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我们分别谈到霸权的论述和各种权力技术是如何影响女领导干部的主体性的形塑，这不能说明她们完全被论述所控制而没有丝毫的反抗的能动性。本研究显示，无论是在 80 年代以前强大的霸权论述的控制或者在 80 年代后出现相互矛盾的论述（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和市场的意识形态）下，女领导干部们在日常的生活中用自己身体和在参政过程中与性别歧视和排挤进行抗争，全国妇联代表妇女与国家制度、政策抗争——依法维护妇女参政等权益、争取男女平等和实现性别平等，展现出了女领导干部们和妇女组织的抗争的不同形式和能动性。从研究资料出发，本章则把抗争主要概括并展现为三种抗争形式——“依法/政策抗争”（Policy-based resistance）、“日常生活的抗争”（Everyday resistance）和身体的抗争。

概论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¹，这句话意味着如果不起来抗争，那就选择灭亡。批判理论认为，现今不再爆发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是因为被压迫者不仅认同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且把它变成自己的意识和行动，甚至被压迫者也成为压迫别人的人，受压迫者既没有“在沉默爆发，也没有在沉默中灭亡”，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进行着斗争（陈清侨，1997）。斯科特（Scott, C）的弱者抵抗学说对当今广具影响的意识形态霸权理论提出了批评和质疑，该理论认为受意识形态的控制，弱势群体都是被动地接受强势群体的牵制，全无反抗的意愿和途径，而斯科特的研究发现，各种下层群体反抗的历史事实证明，弱势群体公开接受统治者为他们描述的合理现实，并不等于他们成为了丧失能动主体意识的傻瓜，尽管他们为了保命而在权力面前装傻，但自有其精明的想法。斯科特认为，不论公开舞台显得多么和谐，强势统治并不能彻底控制弱势群体，反抗依然存在。这种反抗并不限于游行、抗议、示威等公开斗争的前台戏码，而是表现在日常生活的行为中（徐喷，2002）。

自 1949 年中国妇女参政的历史进程表明，尽管 80 年代之后妇女参政状况相比之前降至低谷，至今也没有根本的改观，但妇女们或者代表妇女的全国妇联从来没有组织和进行

¹ 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中讲的一句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

过大规模的、结构性变迁的、集体性的政治运动，如示威、游行、集会。其原因有几点：

第一，无法确定抗争的对象。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男女平等问题，并把男女平等视为己任。无论是 80 年代之前或者 80 年代之后，国家不断出台政策和法律来维护妇女的权利。因此，妇女参政局面的低潮状况你无法归因于国家和政府不重视，只能归因为法律不够健全、机制不够完善、执行力度不够、一些领导的观念中仍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将原因归结为妇女个体的素质差，这种归因就决定了解决妇女参政问题的路径只能在呼吁、宣传法律和加强执法人员的观念以及提升妇女的素质层面，妇女或全国妇联自己成为需要改进工作以提升妇女参政率的对象，也就是说运动的对象变成了自己。

第二，长期以来，没有培养为妇女争取利益的抗争意识。

在第二章中我们详细讨论过，正是因为中国妇女参加革命和争取解放的道路从来都是和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过程中已经带着妇女解放，妇女解放从来都是国家、社会解放的一部分，国家解放了、社会解放了，妇女也就解放了，我们从来没有培养出独立主张妇女自己利益的主体意识，也不可能出现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

第三，国家接二连三地发动各种政治运动，妇女没有可能有自己发动的独立运动。

80 年前的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已经将妇女身卷入其中，社会的改变裹挟着妇女们改变，女人唯恐害怕自己是女人，女人极力地淡化和消除女性特征，那时候都没有单独谈妇女问题的意识，更不可能产生出专门的妇女运动。80 年代之后，尽管妇女的主体意识渐渐苏醒，社会性别的引入，研究者和行动者也逐渐意识到结构性和制度性造成的妇女的参政问题，但市场经济和众多妇女问题的出现，如打工妹权益受到侵害、家庭暴力、拐卖妇女、下岗等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地出现，使人目不暇接，女人们忙着外出打工、束腰丰乳、争着“嫁得好”、关于妇女解放和参政依旧只是妇女研究者和妇联关注的事情，不同的主体呈现出来，也很难在一个大旗、口号下去组织人力去进行争取妇女政治参与权的政治运动。此时正赶上国家全力发展经济的时候，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经济需要、“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大局”的环境下，任何大规模的争取权利的运动都不可能。

第四，全国妇联就是专门为反映和争取妇女利益而设立的工作机构，不需要用运动的形式反映妇女利益。

全国妇联作为全国妇女利益的代表机构，它作为体制内的设置，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名正言顺地进行着维护妇女权益的工作，积极进行政策倡导和宣传、培训女领导干部，积极想办法推动妇女参政局面的改观。也正是由于全国妇联是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和它本身在体制内定位，它不需要发动一个政治运动去争取妇女权益，维护妇女权利也是她名正言顺的工作，也决定了她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领导妇女进行大规模斗争。

第五，有各种反映意见的渠道，消减了运动争取权益的意义。

政府已经建立了各种人们解决问题的渠道——依靠当地政府、信访局、纪委、监察局、群众团体等来解决问题的模式，这些是合理合法的渠道，从而消减了集体斗争的可能性。

第六，法律的一些规定也消减了社会运动的可能性。

如1989年10月31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集会游行示威法》等等，严格规定限制了大规模游行、聚会的形式，因为其严格的审批手续及各地严格的监管，使得这些大规模的反抗形式几乎很难发生。在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的情势下，对抗性的集体行动根本不可能出现。

上述分析说明，公开、大规模的斗争和运动在中国几乎成为奢侈品，当社会运动很难形成气候的情况下，各种温和的上访渠道又解决不了问题，那么各种反叛性的行为就会产生和蔓延，就会产生斯科特所说的日常生活的抗争（liu, 1996; lee 1998b; Blecher 2002; Perry, 2002）。以及“依法抗争”等。

各级妇联、研究者和女领导们并没有迷失在“男女平等”的话语下面，也并没有束手待毙或者以为等待天上掉馅饼、让党和政府来解决问题。她们依旧寻求抗争的空间，这种反抗不是示威、游行等公开的斗争的前台戏码，而是在利用已经制定的法律和政策展开抗争。

一、妇联组织的依法抗争——改变和修正不完善的制度

我用李连江和欧博文在《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一文中提出来的对当代中国农民抗争的解释性框架——“依法抗争”（Policy-based resistance）的概念，斯科特在其《弱者的武器：农民日常生活反抗形式》中提出的“日常生活中的抗争”（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的概念，来概括为争取妇女参政权力而采取的抗争策略可能更为合适。

在李和欧的文章中，他们将“以政策为依据的抗争”定义为“依法抗争”，是指农民积极运用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维护其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侵害的政治活动，包含有政治参与和政治抵抗的特点，即有可能通过促进国家法律或中央政策的落实而演变成完全的政治参与，一旦法律不落实就去斗争和争取。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在内容上属于政治参与，但在形式上则明显兼有“抵抗”（李连江、欧博文，1997）。

全国妇联常用“依法维权”的概念，是在80年代之后提出的，之前没有这个概念。在第二章中我们详细论述过，80年代之前我们说“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是把法律上所规定的男女平等贯彻下去落实到妇女们身上，那是一个动员妇女去享受妇女权益的时

代。而 80 年后，各种侵害妇女权益的事情出现，并屡禁不止，提出“依法维权”的概念，是指依据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来维护现实中妇女的参政权利，依据法律和政策的规定来纠正事实上的不平等。其方法采用倡导和呼吁制订专门的有利于妇女参政的政策；利用各种的机会如换届选举等来呼吁和增加妇女的参政人数；召开各种的研讨会、利用媒体形成舆论环境和社会压力等等是要维护妇女在法律上应该享有而在现实中可能被侵害了的权利，出现了明显的抗争的内涵¹，而不仅仅只是依法维权。

所以在本研究中，我将妇联的“依法维权”改为“依法抗争”。依法抗争的方式是一种迂回的、在国家法律和政策规定的渠道中进行合理的抗争策略。

全国各级妇联所进行的“依法抗争”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借着国际社会的力量推动中国政府制定推动妇女参政的纲领性文件

借着 95’ 世妇会在北京召开，全国妇联推动中国政府在 1992 年制定了中国第一部专门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该法中明确规定保障妇女的政治权力。同时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²推动中国政府在 1995 年 7 月出台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在妇女发展目标中第一个目标就是“提高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决策及管理的程度”，具体指标是：积极实现各级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中都有女性，政府部门负责人中女性比例有较大提高。女职工比较集中的行业、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中，应多选配一些女性。借用这个法宝，各级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协同各省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制定《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的时候，就把这一条积极落实，推动当地政府把规定妇女参政的比例写进各省的发展纲要中，在 1998 年全国妇联就《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实施三周年的时候发布的数字表明，妇女参政程度明显上升³。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尽管贯彻《纲要》中规定很难，但《纲要》毕竟是第一个由中国政府发出和执行的关于妇女发展的指导性政策，突破了传统由妇联独揽妇女工作且无权无钱的局面，使推动妇女参政从体制上成为了政府

¹ 我查不到关于“依法维权”的概念界定，因此根据全国妇联实际的工作做法，我做出了界定和阐释。

² 1990 年 2 月 22 日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的前身——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协调委员会正式成立，取代了原由全国妇联牵头的全国儿童少年工作协调委员会，成为国务院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协调议事机构。1993 年 8 月 4 日，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协调委员会更名为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务院妇儿工委，是国务院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协调议事机构，负责协调和推动政府有关部门执行妇女儿童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发展妇女儿童事业。其办公室设在全国妇联，其各省的办公地点也在设在各级妇联，其领导由妇联主席兼任，因此，该工作与妇联工作密切不可分，甚至在全省也把它当成妇联工作。

³ 目前，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领导班子中，都已配备了女性领导成员。其中 1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各有 1 名以上女领导干部。有 4 个省、市已经达到省、地、县、乡各级党政班子中 100% 地配备了女性；有 1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100% 的县（市）和 50% 以上的乡（镇）都拥有女领导干部。资料来源：《人民日报》1998-08-31 第 3 版。

行为而不是群众团体的行为¹。

（二）推动中央组织部门制定有利于妇女参政的政策

全国妇联积极推动中组部专门召开会议，制定有利于妇女参政的政策。1988年，针对妇女参政出现滑坡的情况²，中组部和全国妇联联合下发了《在改革开放中加强选拔女干部工作的意见》；1990年，中组部和全国妇联联合召开了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中组部和妇联负责同志参加的培养选拔女干部工作座谈会，提出“力争5年内实现县级党政领导班子中至少有一名女干部”的目标；从1990年到1998年，中组部和全国妇联联合召开了四次培养选拔女干部的工作会议，制定了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的目标和规划，如制定的《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培养选拔妇女干部工作的意见》（1998）、《培养选拔女干部工作座谈会纪要》（1990）、以及《1998-2003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1998）和2000年《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工作暂行条例规定》。³这些规定对促进女干部参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很多女干部正是借着这些政策脱颖而出参加到各级领导岗位上。

（三）各级妇联借着各级领导层换届呼吁和推荐女干部

在每5年的人大、政协、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的换届选举中，如何借此机会促进女干部参政，对各级妇联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即通过努力有可能提升女干部在各级领导班子中的比例，但要想提高比例也是难上加难。下面介绍北京市妇联和辽宁营口市妇联在换届选举中推动女干部参政的案例，藉此展现妇联在换届选举中推动妇女参政比例的工作流程。

辽宁营口市妇联在换届中女代表女委员比例提高的案例⁴

去年底开始我市进行市、县、乡人大、政府、政协换届选举工作，我市各级妇联抓住这一契机主动参与，积极配合，并密切关注女干部参选情况，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工作，目前换届工作全部结束，本次换届我市人大女代表、政协女委员比例均比上届有所提高。

¹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是由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负责制定和贯彻落实，实际上该机构的办公室设立在全国妇联，各省的妇儿工委和妇联合署办公，领导由妇联主席或者副主席兼任，所以实际上仍是妇联在执行和操作，折扣了推动政府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² 出现妇女参政滑坡的局面的原因，在第二章详细的论述过，请参阅。

³ 详见杜洁“我国培养选拔女干部政策措施评估和社会性别分析”，《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第2期。

⁴ 资料来源：中国妇女网 <http://www.women.org.cn/allnews/0704/734.html>。

一是向市委及市委组织部做了《关于我市市、县、乡领导班子女干部配备及市、县两级人大女代表、政协女委员比例情况的汇报》；向市委提交了《关于在换届中提高我市女性参政议政比例的报告》（营妇发[2007]16号）。对我市市、市（县）区、乡（镇）街女干部配备及市、县两级人大女代表、政协女委员比例情况进行汇报，并就在本次换届中提高女干部参政比例提出了具体建议。

二是给各市（县）区妇联下发《关于做好在县乡人大、政府、政协换届中推动妇女参政议政工作的通知》（营妇发[2007]17号），要求各级妇联组织积极参与到这次换届选举工作中来，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总结本地区在换届中推动妇女参政议政工作的好经验、好作法，积极探索推动妇女参政议政工作创新发展的新途径、新措施，为圆满完成这次换届工作任务做出应有贡献。

三是做好优秀女性人才宣传、推荐工作。一方面向妇女宣传参政的目的和意义，帮助女性树立性别意识和参与意识，另一方面，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广泛宣传优秀女性的先进事迹，提高优秀女性知名度；向各级党委、组织部、统战部、人大、政协等有关部门推荐女干部、女典型、女先进人物，优化女性参选环境。

经努力我市市、县两级人大、政协中女性比例较上届均有很大提高。营口市第十四届市人大女代表65人，占市人大代表总数的19.9%，比上届提高2.7个百分点；县区人大女代表共239人，占县区人大代表总数的20.8%，比上届提高3个百分点。营口市第十一届市政协女委员96人，占市政协委员总数的27.1%，比上届提高4.3个百分点；县区政协女委员共330人，占县区政协委员总数的24.77%，比上届提高6个百分点。

此外，北京市妇联的案例展示¹：

1994年-1999年全市区县人大、政协及乡镇人大分别各有一次换届选举。无论是哪一级人大、政府换届，我们都高度重视，提前介入。首先以书面形式向人大和组织部门提出做好换届选举中妇女工作及提高女代表、女干部比例的建议。其次向各级妇联发出通知，提出具体要求，及时召开区县妇联和女性团体负责人会议，详细部署。随后，市妇联主席、副主席分头深入区县了解情况，督促检查参政指标的落实情况。由于市委、人大的重视支持和各方面的努力，我市各级女

¹ 资料来源：<http://www.women.org.cn/zhuanti/2002quanyi/beijing.htm>。

代表、女干部比例不断提高。1999年，区县班子换届后，各区(县)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五套班子都分别配备了女干部，有的还配备了2-3名。2000年乡镇人大换届后，全市223个乡镇党政领导班子有99.14%配备了女干部，并有21名同志担任了乡镇党政正职。

全国各级妇联的在换届选举中推动妇女参政的做法很相似，都是上级妇联推动下级妇联，同级妇联推动本地党政部门进行“依法抗争”，即依据国家相关法律的规定，积极呼吁、倡导、宣传、推荐、培训等，这些措施表明，面对妇女参政率低的局面，代表妇女的各级妇女组织利用各种的机会在积极抗争妇女参政比例低的局面。

综上所述，全国各级妇联都在“依法抗争”，通过制定政策、法律，监督贯彻落实政策和法律、利用各种换届选举等机会，和“男女不平等”的妇女参政现实在斗争。

（四）“依法抗争”的灰色地带

借力发力，借着各种针对妇女权利的国际和国内政策来推动妇女参政，是80年代以后全国妇联代表全国妇女非常明显的“依法抗争”的策略，在实际执行的时候，常常出现维权的灰色地带，即“依法抗争”很难根本性地突破参政比例低的困境。因为依法不仅是依照国家允许的表达自己的意愿和主张的方式，而且依据男女平等，妇女享有平等参与政治的权力的法律通过如倡导、呼吁、宣传、推荐等合法的渠道来争取，尽管这些方法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实际上决策层没有根本性重视和采纳意见，造成雷声大、雨点小的困局。全国妇联一方面要妇女维护权力，一方面要作为党和政府政治稳定的核心力量，在两者中间只能找平衡，。

如上面两个妇联维权的案例中，所显示的比例很有学问：妇女参政的数字前后没有对比；不说总体从政的人数，仅仅是一个笼统的数字，看上去妇女参政的比例比较高，如北京市的案例中提到，全市的乡镇中有99%配备了女干部，只表明每个乡镇有了女干部，但没有说通过你的努力争取到了几个，这99%的女干部都在什么职位上，是正职、副职；女干部中有多少是妇联干部占据的名额等等，这就是李和欧所说的在民主参与和抗争之间存在着灰色地带。这种做法一方面交待了作为代表妇女机构应该为妇女争取权益的工作，如妇女参政的比例在保持去年水平的基础上略有提升。一方面也在决策者可以接受的妇女参政的数字里，而有没有太侵占既得利益者们（男性的）的位置。双重的依法（依据国家规定的抗争形式和规定的妇女权益）则产生了双重的后果，无法真正触动男权政治，也无法真正达到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平等参政的目标。

处在全国妇联的位置上，它所采取的立场和它的位置、利益是相一致的，也正如斯科

特所说的受制者不公开表示反受制，才是符合自身利益的（徐贲，2002）。全国妇联作为代表妇女进行“依法维权”的机构，尽管对它有诸多的批评，认为它在体制内的身份限制了它的作用的真正发挥，在国家利益和妇女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妇联常常站在国家的角度（Howell, 2007）。但中国的现实是，妇联的确是一个名正言顺在为妇女做事的机构，妇联干部也是名正言顺为妇女做事的人，妇联特殊的设置——党领导下的群团组织只能发挥现在的作用。妇联的作用和定位在 80 年代前后发生了很大变化。80 年代之前，妇联尽管存在，但她的作用和党和政府部门几乎没有分别，其立场和视角是“为党做事”。那个时代遵循的逻辑就是解放了的妇女根本不需要妇联去为她们争取特殊的权益，妇联的作用就是如何更好地动员、宣传、组织和服务于妇女，使她们尽快成为国家需要的人。而到了 80 年代之后，改革给妇女带来了很大的困境，全国妇联在改革中日益凸现的妇女问题的压力推动下，在国际社会的推动下，转变了自己的视角和角色，从动员妇女参与社会转向呼吁社会关注女人，比较鲜明了“为妇女做事”的立场（李小江，2001），从维护既定妇女利益以及对不断出现的侵权行为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呼声的角度出发，全国妇联参与国家事务和倡导政策、维护妇女权益方面发出的声音逐渐增强，其作用也逐渐增强（金一虹，2005）。

鉴于上述的分析，全国妇联这种团体代表妇女所进行的在制度内的集体性的抗争，也是一种在中国的环境下重要的抗争，这是中国的历史造成的现实。

二、日常生活的抗争

斯科特将“日常生活的抗争”定义为平常的持续不断地与那些压迫他们的人之间的斗争。这种反抗形式包括偷懒、开小差、假装顺从、诽谤等，被称为“弱者的武器”

（Weapons of the weak）。这些斗争的共同特点是：不需要实现的协调或者计划，他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

我相信无论在 80 年代之前霸权论述下的主体，还是 80 年代后多样论述、任何一个在规训中的主体，都有其能动性，存在着“日常生活的抗争”。

除非我身临其境，我的访谈很难丰富地展现女领导们充满灵性的抗争斗争。有些“隐藏的文本”无法也不会公布于众，因为公布将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在本研究中展现的一定是零星的、不成系统的抗争，不足够表达她们充满智慧和艰辛的抗争艺术。

这一部分将展现女领导干部生命故事中为了争取读书、恋爱自由、工作中与男权文化斗争出现的、身体抗争日常抗争的策略，尽管是零星的，但依旧是有是力量的。我着重描述的是女领导们在一个男性占据主导地位 and 男权思想依旧统治着官场的文化中抗争的故事。

（一）我要读书

秋菊一开口感慨地说道：“一个女孩子要读书，首先你要面对几千年的封建思想。”解放了的中国和中国妇女，尽管法律已经赋予她们和男性一样平等的权利，但她们仍要和几千年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以及贫困的家庭生活抗争，才能在争取自身的解放中迈出艰难的一步。在第四章中我详细描述了淑华、秋菊和南小芬为了读书，和贫困的家庭生活以及女孩的身份抗争的故事。淑华、秋菊出生于农村贫困的家庭，她们为了改善自己的命运，为了求学，首先要和自己的贫困的家庭环境抗争；秋菊要和自己母亲重男轻女的思想抗争；南小芬要和女人被人欺负的命运抗争。

上述的抗争我在第四章中详细地描述过，这里不再赘述。

（二）恋爱的抗争

对一个女孩子来说，到了年龄结婚生子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解放前，婚姻基本上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妇女没有作主的权力。解放后，妇女解放了，婚姻可以自由了，可是把妇女从家里解放出来交给了党的同时，妇女的婚姻也从父母手里交给了国家，从“父母之言”变成“国家之命”，政治侵入了私生活的领域。她们要抗争的不仅是自己作为女孩子的命运，抗拒父母之言和国家之命。

在我的经历中，给我说对象的不少。搞四清的时候，县委宣传部的一个领导干部就偷偷托人帮他儿子给我说媒，我那年才19岁，以奶奶已经给我物色好了为由推辞了。后来，很多领导都给我介绍对象，那个时候，很多工作的女孩、有点姿色的都被单位领导介绍给自己儿子或者亲戚，女孩子早早一结婚，什么工作事业啊就全都没了。女孩子一结婚就完事，势必就陷到这个家里了，我有好多个伙伴的命运就在那儿摆着呢，赶上60年的时候都已经一袋高粱换着就给人（嫁人）了。我比起我的同龄人已经很幸运了。我这么大（25岁）才嫁的只有我一个，要不说不我父母明白事理，要不拿我也换了吃的了，哪有今天。起初，参加工作，是为了改变自己和家里的命运，随着思想觉悟的提高，就想着什么为人民服务，解放全人类等都在我的脑子里，我好长时间就说我不结婚，女孩子为什么就不能在家呆一辈子，我愿意结婚我就结，我不愿意你谁也别逼我。

80年代之前，婚姻生活基本上也为政治所侵入，没有私人的空间，尤其是女干部们的恋爱、婚姻基本上都要由组织过问。而且那个时候尽管实行了恋爱自由，但实际上很多姑娘在20岁出头就早早嫁人了，一些参加工作的女孩子，也早早被别人介绍了对象而结婚生子，很难有大的发展。而淑华为了工作，为了能多帮助自己的家人而推迟谈婚论嫁。淑华25岁才结婚，顶住领导们给介绍对象的好心，在那个年代算是大姑娘了。能够拖到这个年龄一方面是自己的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开明的父母的支持。

（三）不能当花瓶、怕丢官，要敢于说话

前面第五章我们讲到，很多男性领导把女领导看成是摆设和花瓶，不给实际的权力岗位，作为副职、配衬等，很多女领导干部在这样的参政环境中，不敢直言。秋菊说，“我觉得在领导层里，任何一个女干部充当花瓶好干，充当一个有作为的、能够参政议政者就很难，坚持原则就更难，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就难上加难”。而秋菊要抗争的就是这样的险恶环境。

她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得出如何对付参政这个险恶环境，一个女领导干部一定要做到三条：

第一，不要为自己争光，要为女性争光；第二，要敢于说话，不要当花瓶。当花瓶没有人重视你。第三，要有毅力，无论怎样的挫折，自己不倒别人打不倒。

从秋菊文革时候救公社书记到现在，她“可以丢官，不能丢良知，不能丢真理”的信念一直没有变，中间经历了若干的挫折和磨难，增加了她应对各种困难的策略能力，却没有改变她的信念。秋菊曲折的抗争的故事可以写一本书，这里仅仅展现一个经历。

1978年，从反极右开始，风气就不正了，浮夸，不为实了。我记得在常委会上，省上的一个工作组几个人到下面来，批右倾反案风，就批当时的县委书记，我就站起来说话了，我认为党内生活不正常，人家在发言，为什么人家一发言就把人家话打断呢？为什么要用强权来压人家呢？为什么不允许人家说真话呢？我发炮似地发问。就在这个会议上，我和当时的一些人发生了矛盾，我就嫌他批判县委书记是以权压人，我就认为县委书记是对的。在我的概念上，没有害怕丢官这个想法，我当时是副县长，是革委会的常委，丢掉它我觉得不是那么珍

惜，不干了我还回去当我的村支部书记，当我的村长，那时候也是没有后顾之忧。我和省上来的三个人发生了矛盾，当时有个也挨批的副书记晚上找我谈话了，说秋菊啊，我告诉你，在批判右倾反案风的时候，我们这一批的人可能都要被免掉，你年轻，你应该保护自己，你救不了我们，你怎么不知道保护自己？明天你就不发言！我说行。但是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又开始批判的时候，咱又忍不住了，又起来给人家辩论。会下，省里的一个领导给我说，只要我能够批判这些领导，就能推荐我到省里工作，我说我不去，我不要这官，书记我决不会批判，我认为他是对的。我想我得罪了省里的领导，不用你们免职，我自己辞职吧，我自己亲自去组织部递交辞职报告书。那一阵我说傻就傻到这儿了。我当时就想这不仅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觉悟，更是一个人的良知。

秋菊敢于说话的结果就是她真的被派到基层去锻炼了，这一次是她主动提出辞职的结果，领导将计就计把秋菊下派到基层，这样既不能说明领导们小心眼，容不得下属提出反对意见，也在公众的面子上过得去。秋菊说我早说了，大不了我回家当农民，我从来就不看重官，所以我什么也不怕，只要人民接受我。秋菊在官场上始终奉行“可以丢官，不能丢良知，不能丢真理”的信念，不怕免职也要说话，坚决不当花瓶，和官场的恶习和男权斗争，也因此赢得了群众和很多同事们的尊敬，也就有了她作为陪选却人大代表非得选上她不可的事件（第五章中描述过）。

（四）赢得别人的尊敬，靠实力不是靠姿色

第五章中谈到，在选拔干部的时候，很多男领导将女干部的长相作为一个推荐或者不推荐干部的潜在标准，但很多女领导干部依旧靠自己的实力证明女性的价值。

“女干部自己不倒，谁也不能把你弄倒了”，这是淑华的说法，“这辈子咱也不是靠姿色上去的，是靠实力上去的，尽管没有上过正规大学，但学习能力和解读政策的能力比谁也不差，我靠着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干事，为人民服务练出的本事，所以到哪里都不怕，都立得住。用人的风气多坏，他能对我怎样？我没有姿色但我的阅历和能力在那里摆着”。

雷西讲述了自己从政以来和对女领导的偏见斗争的一个故事。她说，94 年大暴雨，把她们当地的一个城市淹没了。时任的市长已调任，雷西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个调令就落在她身上，调任她去担任该市委书记，她是当地历史上第一个女市委书记。那年正赶上 95 年的宏观财政调控和金融危机，资金方面十分困难，被水淹没的城市在本省的经济情况又是最差的，当地群众和干部听到调来一个女的一把手，很多的流言蜚语和议论都来了，说什么的都有，大家都认为来个女的就意味着这个省要放弃这个城市，干部和群众都不信任她，一大堆人闹事，说男的都搞不定，为什么来个女的，当时整个城市上空弥漫着一种悲观无望的情绪。雷西的家里人也不同意她去，担心这么重的担子她挑不起来，离家远，家里人照顾不了，儿子担心妈妈出危险和意外，执意要跟着妈妈去。

当时雷西接到通知的时候，她找领导谈话，说我自己不会“游泳”，而这个地方连年洪水我怎么行，其实是担心自己的能力是否能够胜任。但组织已经决定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她了，雷西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走马上任的。雷西说，之所以组织将这样的重任交给她，不是因为她是女的，而是她的资历、能力，以及对她的信任。

“领导是希望利用我的优势，即经济、科技，懂外经，也已经认识很多外商，这是我之前的从政经历，在这些单位都担任过领导。省委书记找我谈话的时候，说的三句话刺激了我，。他说你虽然是个女的，我们省党委相信你有能力去做好工作，我们会支持你去做好工作，我们信任你。这三句话对我的刺激非常大，我觉得，党那么信任你，你们男的也是一个脑袋，我也是一个脑袋，你们能做的事我也能做，你们不能做的事我要做的比你们漂亮，当时就想这个，就是这口气让我横下心来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在领导的信任、自己想证明女人也能行的信心的支持下，她上任后，招商引资、修建桥梁、建电厂、筑防洪堤坝，几年几乎没有照顾自己的家庭……很快扭转了低迷的经济形势。98 年的洪水比 94 年都要大，因为防洪设施、经济的改进等顶住了，城市没有淹没，她自己的工作实绩赢得了当地群众和干部们的信任和支持。

然而想证明自己和男人一样（男人未必干得就一定比女的强），抗争大家对女性的歧视，付出的代价是大的。雷西说，

“我觉得没有一个市委书记像我这样的，我去到那里定了几条，第一让我住宿舍不要让我住招待所，安排在招待所就会有人来找我。我在位差不多有四年，就没有一个男人上过我家，包括女的，你要有事找我，到办公室，我到办公室等

你们。我就不要你们拉关系、说出是非。第二，所有的朋友、同学、亲戚来找我，我一律在办公室里接待。你只要有一些件事做不妥很快就风言风语传遍全城，要时刻警惕，杜绝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的窗口。男的你可以喝酒、洗桑拿，作为女领导，你就不能，你就要失去很多常人可以享受的东西。抗洪以后我就得了一场病，病的很厉害了，透支太大了，但是毕竟作为事业的一个部分，人生呢总要有一些轰轰烈烈。

这一幕一幕的都是女的做出来的，男的你不得不佩服。我的经验就是给妇女的自强自立自爱给逼的，你们男的说我们不行我就偏行给你们看。我觉得女的从政如果能成功的话，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一个就是机遇，第二个就是自己的素质、才能、意志、毅力。”

雷西是从一个知识分子和专家被提拔到领导岗位的，从政以来她靠着自己的实力赢得尊敬，因此她格外反对对妇女参政的照顾政策。她说：“不要讲是照顾女的，大家都是凭本事，你越讲配备一个妇女干部，就让男性们越觉得这些女的都是照顾上来的，结果反而贬低女的。我就是靠实力上来的，不是照顾的，这对我不公平。”我理解雷西的想法，但雷西自己也深深知道女性参政中机遇的重要性，如果不是83年大量提拔知识分子到领导岗位的政策和机遇，雷西至今也无法发现和表现她卓越的领导才能，机遇和实力是同等重要的，缺一不可。

抗争的道路是艰辛的，在我采访的女领导干部中，全部都是靠自己的实力和打拼、也都是靠着中国共产党的对女干部的选拔和保护政策上来的。这些事实本身表明，只要这个政策给与女性平等的参政机会，女性就有实力参政。

（五）想办法应对男领导对女领导的刁难

被刁难也是一种官场上排斥和歧视女领导干部的策略，这一点在前面第五章也谈到过。被访谈的女领导干部都会谈到男领导刁难女领导的事情，但很多人有顾虑，也只是淡淡一提而不会多说，不知道我的研究会对她们产生怎样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这些事情很难启口，如果不处在当事人的脉络里很难理解也怕产生误会，更何况被人欺负有自己窝囊的嫌疑所以我得到的资料少之又少，秋菊所提供的故事难的可贵。从秋菊所讲的故事中，能够看到她抗争刁难的策略。

秋菊说：“男人最不舒服的就是让一个女的把他管住了，他不舒服就刁难你，第一，工作不给你配合，你要决策的事，他不出点子，二是你决策了，他有意刁难你，使你的决议形不成，第三，就算是形成决议，他不执行决议”。

74年，我当了常委以后，又到基层兼着书记和乡长，等于三个职位在一身。这种情况就是把原来我的老领导们都变成我的副职了或者归我领导了，有些领导就感觉人格上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无论我提出来关于班子的调整还是一些重大问题的商量，都不发言。其实就是刁难你，看你一个女子娃有什么样的水平，你能出上什么样的点子。你的决策对了我就刁难你，出错了就批判你。

秋菊就是不服这个理，她说：

“我当时23岁左右的年龄，其他都是50多岁，他们几个联合起来刁难我。你说我能回到县上说底下人不服从吗？常委、书记怎么看待你，作为一把手，你反映副职的问题说明你无能，对上不能说，对下不能说，对下面各村支部书记说你的副职反对你，人家会说你没水平，再说一个一把手老说你的副职不好，那你怎么工作啊。当时开会如果要形成一个决议，他们就把你逼得形不成决议，就想看我哭，我就是坚决不哭，女干部坚决不能哭，女干部一到会议上就哭鼻子，就说明你没本事，一般女干部都爱哭。当时我是真想哭，但不能叫他们看不起，非常生气也不能发火，实在忍不住，我就去我的房间有个长条板凳上睡觉去了，躺这边睡，再躺那边睡，翻来覆去等发泄了10多分钟，睡够了发泄完了，情绪也调整过来了再过去开会。就不能让她们看见我哭。

秋菊觉得不能让他们这样下去，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让男干部们服了你，不能让人家就这样一直刁难下去，哭和发火都没有用，你就要找点子，动脑子，想怎样感化他们。秋菊说，男干部不服无非就是两点理由：嫌我是一个女娃身兼三职，看你有多大的能耐。本来其中一个人要当一把手，结果让秋菊兼了，人家带头不服气她。

我觉得在那一阵我也确实想到一些办法，用感情去感动他，你发了火以后开不成会就暂休会，休完会我进房间亲自向你求教，你想那个副书记，会上我是领导下去我就叫叔，我要靠你帮助呢，你给我说这个咋办？我向你求教了，虚心降辈，按照年龄吧也该叫叔，你换一个角度去感化他，慢慢的，时间一久

他就和你的对立情绪消了。再一个我就是关心他照顾他，那时候咱是常委还有一定的权啊，当时我就从县上要点粮食，要下来以后，我就每天晚上骑着自行车每家每户，跟着武装部长去家访，发现谁家有困难，就一晚上不睡觉把面给他送到家，那些干部我都把他们困难给解决了，他回到家他老婆就开始给他说了，你看人家女娃娃，人家还是一把手，你把人家难成啥了，人家带着面给咱半夜送来，你们这些老蒜（陕西骂人的一种方言，意思是老东西）别再难为人家了，家属起来成了解开疙瘩的环节。换个男领导不会有这些事情，也不会这么做。我对待那些领导干部都一样，谁家有困难谁家在哪里住，我都知道，谁家有的困难我都给他解决了，我虚心请教，尊重他们，他们在感情上就慢慢地开始改变了。

秋菊用了以情动人和虚心请教的方法，来打动这些人，团结这些人的家属一起工作，使得他们慢慢从感情上开始接受秋菊。不仅如此，秋菊也用自己的胆识和勇气来赢得他们的由衷地支持。

我遇到了一个他们考验我的大事情。当时一个反革命集团出来反攻倒算，抓了一个副乡长差点打死。这个时候我叫其他副乡长带着一些人去，没有一个人敢去，我派出去第一个人骑车不到两公里就回来了，说他心脏病犯了，第二个人走了不到一里，他说也不行了。他们都是找借口都不想去，你不是一把手吗，这遇到危险了，看你怎么处理。

遇到艰难风险的时候，你直接闯到一线，你把这些一个一个摆平了，他不服你也不行。我想我能让你们刁难我？我亲自上阵，到了那的时候，那么多的反革命子女都起来了，那时乡上有民兵小分队，第二天开大会，三千多人的大会，我就安排了二百人的小分队，我指挥调遣，我就分析到这些人要搞事，结果一开会那些人就站起来要闹事，我就下令一下子把那些人抓了，抓了二十个人。我也知道他们不会善罢甘休，之后会找我报复。我就给县委汇报了，县委知道后就派公安跟着我。果然，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唰地冲进来了，警察们拿出枪，把那些人身上的刀子什么的都没收了。你把一个一个问题和困难都摆平了，他们也不得不佩服你。我就觉得一是要虚心，二是干活，三是你确实要有点政绩水平。”

秋菊面对危险和困难冲在前面，这些危险男干部也不敢面对，而秋菊面对了、战胜

了，男领导没话可说，用自己的胆识和勇气赢得了大家的认可。

刁难是一种让人难堪的手段，也是一种排斥的技术。这种技术不是斯科特所说的公开文本，而是隐藏文本，不能公开说，却再背地里运作着：参加班子开会，但他不发言；决策了他不执行，他也有各种的理由；如果你哭、你发火更给他造成了刁难的口实，以此证明你的无能，更加找借口排斥你，他们可以找各种借口和理由离开危险的地带，你一把手却不能逃，秋菊深知他们使用的这套排斥技术（秋菊称之为考验技术），所以她的抗争对策首先就是不哭也不发火，哭也不能让他们看见，以情感人、虚心请教、以行动说服人，危险冲在前面，靠自己的实绩赢得大家的尊敬和信任。

（六）不想当官了

研究显示，妇女参政的积极性不高，呈现被动的状态，一方面体现在第五章中所提到的规训的作用，在全景敞式的监控下参政的艰难，另一方面体现在很多妇女没有参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被看成是对目前腐败和排斥、歧视妇女的政治的一种抗争。李华放弃了角逐更高位置的机会，转而成立了草根的 NGO，创办了为基层农村妇女服务的杂志，推动基层妇女参政，她意识到，只有推动基层妇女参政和议政的意识和行动，中国妇女的参政行动才能形成气候。

淑华、新梅、秋菊等大多数女领导干部都由衷地说，真的不想干了，仕途太险恶，不适应了。这些从政几十年的干部，最后都“不想玩了”，以她们的品质和经历，这就是她们能够做到的思想意识中的抗争。她们身在官场，心已经疲惫不堪。她们这一代女人以自己的生命经历证明：真实的生命感觉可能是颠覆作为武器的话语的最有效的武器，在丧失把握语言的能力乃至丧失自我思维能力的时候，生命体验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话语，它会冲破封建思维的语境，向已成为规范的意识符号质疑，以真实的生命感觉向企图塑造生命的话语说“不”。“不”就是女人的觉醒，它无需建构什么新的话语，只需一个“不”就足以激活全部的思路，导致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场革命——但他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调整人与意识的关系，无论什么性质的意识形态都不能凌驾于人的行为思维之上，而应该服务于人的生活和真实的生命的感觉。

三、身体的抗争

潘毅在其《打工者的呼唤》一书中对抗争进行了新的诠释，提出了“多场域抗争”的概念，她认为，抗争理论应该超越个体行动与集体行动、个人抗争与社会抗争、非政治冲

突与政治冲突等传统的两分法，“多场域的抗争”这一概念或许为实现这种超越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她通过对工厂女工的梦魇和尖叫的分析，发现了一种抗争的次文体，认为梦魇和尖叫本身也是一种抗争，打破了个体行动（通常被琐碎化，并且未被视为社会变革的抗争力量）与集体行动（通常被浪漫化为唯一能够真正向现存秩序进行挑战的力量）之间传统的二元对立（Scott, 1990）。所以潘毅认为梦魇、尖叫、晕倒、痛经、自我的内部分裂、劳动反抗、请愿、罢工等都可以被视为抗争行为的点或线，它们共同构成一幅抗争的图画，向权利与支配发出挑战（潘毅，2007）。潘毅的“多场域的抗争”以及梦魇和尖叫开创的抗争次文学给我书写女领导的抗争故事开启了一个空间和想象，将我把发生在女领导生命中的“闭经”和她的抗争联系在一起，提升了付出身体的代价所换来的意义。

在凤楠的生命故事中，几次出现“闭经”现象，而每次“闭经”都和一定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对凤楠来说她的身体比她的心更知道如何抗争外部的环境带给它的压力。

第一次闭经是14岁的时候，那是大家学雷锋精神的年代。有一天放学的时候，天下着瓢泼大雨，有个同学忘记了带伞，作为班干部的她不顾姐姐的劝说，非要亲自送同学回家，她把自己的伞给了同学，自己骑着自行车，一路上淋了个透，第二天就发现停经了。经过多次的治疗，到了18岁的时候才来。凤楠说过，这辈子一个是父母，一个就是榜样塑造着自己的生命，学雷锋都不要命了，认为那是一种光荣和骄傲，从此就烙下了病根。

第二次“闭经”，是上山下乡阶段。她是知青队妇女组的组长，为了保持知青的荣誉，她每天不仅干完自己的农活，又去帮助那些割草慢的知青，因为你干不好、干不完，你打的工分就和本村的村民不一样，凤楠为知青能和本地村民、女知青和男知青得到一样的工分，和算工分的人争取过很多次，正因为这样，她看不上女知青的犯懒，不上进。有一次，她和一个吃完饭不刷碗的女知青争执起来，那个女知青不仅不服教育，还撒泼起来，凤楠就那么较真，一定要和这种懒惰、给知青丢脸的现象斗争到底。那个知青又哭又喊、又踢又打，嘴里骂得极其难听，忍无可忍的凤楠上去就扇了一个耳光，结果那个知青疯了似的扑上来要打凤楠，凤楠此时就觉得一股火往上窜，下面的例假血哗哗地流，结果第二天例假又停了，直到结婚以后才恢复。凤楠说那个时代怎么就那么傻，眼睛里揉不进一点沙子，就觉得心眼傻实傻实的。你说为这么一件小事情何必呢，值得吗？

结婚后，经过治疗，例假又正常了。当时凤楠分配到妇联，正赶上改革开放后全面恢复妇联工作，要召开妇女代表大会，她当时27岁，提倡干部“四化”的时候被选为区妇联副主任，因为她是年轻人中唯一读电大¹的人。她自己感觉压力大，肩上的担子重。她当时是大会秘书处秘书长，忙里忙外、昏天昏地的忙，结果又闭经了。她想闭经就闭经吧，忙完工作再说，结果等忙完了工作，又没有时间按时治疗，直到想要孩子的时候才开始治疗，受了很多罪，吃了很多药，总算没有耽误要孩子。当时正好赶上80年代初，那个时候

¹ 电大，是改革开放后的一种成人大学，白天工作，利用星期日休息时间上课，修完规定的课程和论文之后给一个大学文凭。该文凭的质量不同于正规大学。

人们对改革开放抱着一股特别的热情，干部的风气也正，所以凤楠她们仍旧抱着一股从 70 年代带来的工作热情，甚至不顾一切为党的事业工作，自己的身体仍旧置之度外。

生完孩子之后，她又中断了治疗。等孩子 10 个月之后，她又不来例假了。她发现，只要一着大急、一受累，她的身体第一个先反应，那就是闭经或者例假不正常。闭经伴随她后半段不开心的从政生涯，用她自己的话说，10 年的副处级，13 年的正处级，很多的荣誉就是压着没有提拔她，这些年，她一直停经。结果到了任职年限，她觉得累了，也不想争取什么了，也看透了，也预备着自己要退居二线了，开始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儿子考上大学、丈夫当了一把手，家里各方面都好了起来，这时候 49 岁的她例假又来了。

Penelope Shuttle 和 Peter Redgrove(1978)认为，女性周期是“永远无法容纳谎言的真实时刻”。Julie Kristeva 的洞见使我们知道，女性的时间是与众不同的，它永远不可能被社会时间所完全整合，女性的时间模式与历史，以及社会的时间模式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冲突（引自潘毅，2007：276）。女性时间是母性的时间，月经周期、婚姻与生育周期、青春期以及做母亲的周期等都是女性生命中至关重要的身体经验。Emily Martin 言简意赅地表明，女人，无论她们喜欢与否，其身体经验都是周期性的，她们生活在两种时间之中，一种是工业社会的时间，而另外一种则往往与前者背道而驰的自己身体的时间（潘毅，2007）。无论凤楠怎样跟随社会的步法和时间的节奏，但她的身体永远有自己的时间，闭经就是一个社会的时间和身体的时间不能同步的信号。

通常女性处理自己身体的普遍经验是：将自我从身体中分离出去，然后将身体作为一个与自我相对立的课题来对待。凤楠说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就会说，没事情，不来反而省事；生完孩子之后，说没事，反正生了孩子，太忙了，没办法，没时间。为了追求高尚的塑造和表示积极投身革命，女性必须将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分离。分裂自我就是一种最好的抵挡身体带来的痛楚和避免自我崩溃的方法之一。

“闭经”是一场身体发生的“沉默的革命”，它不断和“高尚灵魂”抗争着。凤楠几次的“闭经”经历，要把它放到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理解，我们就能看到“闭经”暗含着更多微妙的凤楠承受的社会文化压力。她作为班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的压力、作为妇女组长要负起知青不被本地村民在工分上歧视的责任，作为年轻的女领导要对得起党的培养和信任的责任。同时她要找对象、要结婚生子却因为闭经受到很大的影响，好在作为军人的丈夫革命立场坚定，给了她很多的安慰和支持。丈夫远在西北当兵，她作为妻子、儿媳要担负起丈夫的家人和自己家人的照顾工作。她要坚持读完电大。所以她的压力是巨大的。

在 80 年代之前，女领导干部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即为了证明“妇女能顶半边天”、“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能干”，她们和自己作为女人的身体进行抗争。淑华和男人一起跳进齐腰深的井里打井，以表示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能干，但男人是喝酒下去的，她害羞不能喝，结果她的腿疼病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根。有一位经历文革的学者，在写自己的成长历史时

写道：“我向男人看齐，不屈不挠地向自己女性性征挑战：有意趁着月经来潮，跳到没膝深河水里挖河泥，泡在水田里插秧。什么活不让妇女干，我偏要‘越是艰难越向前’。我为了像男人一样，长期进行“自我摧残”，我的健康状况也变得很糟，患上了严重的痛经、胃下垂”。¹这就是她们成长中那些年代的写照，她们要与自己女性的身体进行抗争，来积极实现社会性的解放，很畸形却很执着。

四、公开的文本与隐藏的文本

在斯科特看来，日常生活的抗争是一种具有高度戏剧表演性的艺术。斯科特认为农民有的“隐藏的文本”就是对统治阶级“公开的文本”的一种反抗形式，也是一种权力游戏。“公开语本”的意思就是“下属和统治者的公开交往”，他们彼此心照不宣地作“不真实的表现”，表面的恭顺合作也许只是掩饰的结果或者反抗的策略。“隐蔽文本”则是衍生性的，它的言论、姿态、或者行为只是因为与“公开语本”相一致、相矛盾或相变化方有意义。因为即便是现代的民主体制，对权力说真话也是一种奢侈。要想抗争有效和有可能，伪装和欺骗的手法是必要的。

公开文本是统治者意欲创造的自我形象，其作用有：第一是用比较文明、有风度的方式确认权力的威严和展示权力，独占公共舞台，以此长自己志气灭别人的威风；第二个作用是隐藏，控制了公共舞台之后，把自己装扮成任何模样显示权力的稳定和团结，不公开任何不利于权力稳定的信息，粉饰太平和冠冕堂皇。公开文本的作用无非就是让下属心悦诚服地顺从，即便不是心悦诚服的顺从也比不顺从好。隐蔽文本是一种面具文本、上层和下层都在使用的文本。凡是操纵前台表演的后台操作，都可以说是权势群体的隐藏文本，如内定协议，统一口径等，也包括暗中特权分配、收买分化等。而下层群体的隐蔽文本则是反抗策略和记忆的形成和运用的场所。这种反抗不是直接对抗的造反或革命，也不一定具有与官方话语针锋线对的理念，它是自发和随机的（徐贲，2002）。

在我的访谈中，我很难得到女领导到干部关于公开文本和隐藏文本的抗争故事，因为这些策略是无法公开来讲的，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亲自观察了公开的文本和隐藏的文本之间的游戏。

我和淑华的访谈中，我隐约从她的话中能够感受到她现在这段工作（当了市人大副主任之后）的艰辛和不容易，她谈之前的工作无论悲伤欢乐都可以娓娓道来，却几乎避而不谈这段工作。如果涉及，她总是充满了无奈的叹息及表情中带出无以名状的痛楚。而我在

¹ 梁军，“女性教育十年回顾——自我成长：从小家走向大家”，《妇女研究运动——中国个案》，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访谈她的时候所亲自经历的一个事情，让我能感受到她的艰难和抗争。

她的腿患有严重的关节炎而在家休息，给了我能够有几天的时间访谈她的机会。一天早上，我们正要开始谈话，她接到一个电话，之后她说要去一趟办公室，主任（人大第一把手）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关于某干部的任命问题，淑华是分管干部的领导，理应参加。

我和大哥（淑华的丈夫）问淑华是不是非去不可？我们担心正在治疗的腿如果走路会加重病情，劝她请假不要去。我察觉到淑华面露的难色，听到她说了一句让我莫名其妙的话，“不去又给人家抓住把柄了”，说完后没有下句，我知道其中必有缘由。淑华很快把司机叫来，我和大哥一起吃力地搀扶着淑华上了车，我不放心就跟着她。

我暗自想，这里面一定有蹊跷的事情，按理来说，请了病假是可以不去的，如果有什么事情主任也可以打电话或者以探访病人的身份来商量，淑华的关节炎这么严重，为什么非得淑华亲自出马？

我猜想不去就会抓把柄的意思是不是如果淑华不去，他们就决定了某件事情而事后如果有责任就会归结为淑华？或者他们没有淑华的意见就决定了某件事情？我无法询问也不得而知。

车开到机关的大门口，看见一辆车从对面驶来也要进机关大院，淑华说那辆是主任（一把手，即叫淑华去开会的领导）的车，按照车速或者距离，我们的车应该先进院子，这时候明白事情的司机问淑华，“主任你看我们怎么办？”淑华说让他们先走，我们的车放慢速度等他们的车开进去。

这是官场的规矩，主席台的座位安排、饭桌上的优先次序、走路时谁前谁后等等，是每个官场上走的人都要心知肚明、严格遵守的规矩。可是淑华说的时候，口气是一种不屑，而不是一种尊敬，“先让他进去，给足领导面子”。这里淑华遵守了规矩，但示弱不一定表示顺从，不屑的口气则是一种抗争。斯科特在其公开文本中就说到，公开的文本后面衍生的隐藏文本才是真正的心里话（徐贲，2002）。

主任的车停在楼前，我们缓缓地跟在后面，前后的距离只有三四米。主任从车上下下来，举着高傲的颈，直挺挺地走进办公大楼。他绝对看见了淑华的车，他也知道淑华请了病假在家休息、是他叫来开会的，他连头都不回一下，就那样直直地进去了，什么事情让他连起码的礼貌也没有？我联想到淑华之前面露的难色，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斯科特说，上级就是通过对下属傲慢无礼来表现自己的权力，在官场文化深厚的社会中，等级层次间的恭顺和傲慢表演特别程式化和规范化，形成了下属对上司绝对正确表示的体制性语言（徐贲，2002）。

我搀着淑华走进大楼，来到电梯口，发现电梯坏了。会议室在7楼，淑华的腿很难走楼梯，我再次劝淑华不要去了，托个人带个话。淑华坚持着说上楼梯吧，我想是不是会议很重要，一定要淑华去？或者淑华一定要自己去，关系到什么事情？我搀着又往楼梯走，

但走了几个台阶，淑华就觉得十分吃力，可谓寸步难行，不得不下来，一瘸一拐走到大楼门卫那里，坐下来拿手机给7楼的主任办公室打电话，打了很久电话没人接。是不是主任也走楼梯没有到办公室？不会啊，已经过去20多分钟了。我说找个人给带个话吧，淑华摇摇头，仍在不断地打，后来淑华用了门卫的电话，打通了，淑华在电话中说：“主任，你看我都到了楼下了，腿疼得没法，实在上不去，这个会我就不参加了，你的意见我同意，也是大家商量过的，你就做主吧”，放下电话，我搀着淑华回家了。我感受到大姐难过的表情，也感受到大姐因为在我面前发生这一幕的尴尬。我些微从这次的经历中能够感受到她在目前岗位上的辛苦。

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得而知，也无须知道，但是这件小事情上可以看得出权力之间的较量和斗争。从大家表演出的公开的文本上看，主任展示足了他的权力和权威，淑华的恭顺也增加了他对自己权力的认可。淑华则演示了对权力的恭敬和顺从，让主任的车子先进去、亲自打电话直到打通为止、肯定领导的决策和威严等领导权力，这是公开的文本。而实际上隐藏的文本是一种对权力的抗争策略，淑华真正要演示的是我不让你说出什么来，不让你抓住我的把柄。她用这样的姿态和身体语言告诉主任，我做到了我该做的，我拖着病的身子来了，我表示了对你的尊重和对这次会议的重视，如果是我的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我表示我尽力了。你也是真的看到我来了，停电了我也使劲爬了楼梯，也告诉你实在爬不上去，你也不会狠心到非让我爬上去，那就是你不地道了，不近人情了。最后我表示我的恭顺，告诉你，你的决定我同意，我让你说不出什么话来，让你拿捏不到我的把柄，在这场权力的较量中我认为淑华赢了。我也知道，这次带病在家也是一种对复杂关系的逃避，也是用身体进行的一种抗争。淑华说太腐败了，太不适应现在官场了，我眼不见为净。

展示这段的观察，只是展示官场中的复杂，也许这一小小的描述是小巫见大巫，不足挂齿，但也略见一斑身在其中的人的累和艰辛。会玩官场游戏的人以此为乐，不会的人身心疲惫。处在这样的文化中，累人累心，不是一般人敢涉猎的，尤其是女人。怪不得在最近2008年的一次“女性领导人才规律”调查¹中发现，女性领导多为非主动从政，被动从政倾向明显。调查显示，无论是在回收问卷，还是在座谈和个别访谈中，都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多数女性领导都认为，虽然自己在工作上很努力，很上进，很要强，但却从没有主动想去从政做官，甚至在从政之前，对政治并不熟悉，也谈不上喜欢，许多女性领导的从政之路都是组织安排。当然女性主动从政的愿望低有着复杂的原因，但其中官场的腐败和女性从政的艰难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女领导干部作为一个社会主体，其中包含着许多相互作用的力量，对这些女领导来说，当上女领导是一个双重的扭曲和错位的过程，它在个人日常抗争中制造出焦虑、痛苦，并也驱使他们进行自我形塑，以帮助完成一件霸权主义的作品，自我并非天生就是支

¹ 资料来源：http://www.tianshannet.com.cn/pn/content/2008-10/06/content_3163644.htm

离破碎的，它是被社会性地进行了否定和分割，以便制造出一个新的主体。

小结

抗争分为 80 年代之前和之后。之前，妇女参政不是突出问题，女领导干部们只是需要和家庭、自我等抗争；80 年代后，她们不仅要为做怎样的女性苦恼，更要和腐败的官场抗争。尽管这种抗争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是“弱者的武器”，她们可以为自己的读书抗争、与贫困的家庭环境抗争，和作为女人的身份抗争，和官场的腐败抗争，可以为自己的命运、官位抗争，但很少为妇女的权益去抗争。从这一点再次说明了中国妇女参政的主体性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本章中我描述的抗争故事，基本上是零星的，其本身说明日常生活中的抗争很难言说，同时也说明抗争本身就是零星的、不系统的。但我深深体会到，只有把斯科特的日常生活的抗争、格兰西霸权和意识形态反抗的说法结合在一起，才具有抗争真正的效力。

第七章 总结、讨论和建议

概论

本研究是从这样的疑问开始的：为什么现在关于保证女干部参政的政策越来越多，参政比例却低居不上？为什么总是说女干部的素质低？为什么素质低？为什么女干部的参政意识不强？为什么女领导干部没有为妇女参政的意识？先前关于妇女参政的研究将关注点集中在参政规律、参政政策、参政者素质等方面，而缺乏对参政的主体——女领导干部研究，很少问她们是如何走上参政的道路，她们建立了怎样的参政观？她们在从政的道路上遇到了什么问题？藉着梳理和回顾以往研究和理论，我提出本研究的目标，即通过文本和女领导干部生命故事的研究，分析各种论述是怎样地影响和具体形塑着女领导干部的生命历史及她们的主体性，探索女领导干部有怎样的参政观以及是如何被建构的，开启另一种解释以及解决妇女参政问题问题的空间。我提出的研究问题是：

- 1、自 49 年至今，各种论述怎样形塑女领导干部，塑造出了怎样的女领导干部的主体性？
- 2、各种的论述透过那些微观的权利技术规训了一个怎样的主体？其主体性的表现是怎样的？
- 3、女领导干部在被形塑过程中有无抗争？如果有其方法和效果怎样？如果没有，为什么？

为了回答上述的问题，首先，我对 80 年代以来的国内和国外关于妇女参政的理论和研究进行了梳理，并在基础上形成了本研究的框架，即本研究采用女权主义、批判理论和后结构理论等多视角理论的影响和启发，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了论述与主体性建立，规训与主体性以及抗争的主体性等三组的概念作为我分析资料的基本框架。并在女性主义视角的批判理论—建构主义范式下，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生命故事和半结构访谈（在第二章详细介绍了两者的不同）等作为主要收集资料的方法，对 9 个出生于 40、50 年代，其成长和参政历程与建国后中国共产党 60 年的历史同步的女领导干部进行了访谈。并用两个女领导干部的焦点小组作为辅助收集资料的方法，以便对主要的访谈资料进行补充和丰富。运用解释互动论的分析方法，通过确定研究主题、文献分析、收集资料、分析资料、发展主题、解释等研究过程，分析和展现女领导干部们主体如何被国家的意识形态影响和形塑，在形塑过程中用了怎样的具体技术，以及在形塑过程中抗争的能动性；展现意识形态作为一种

霸权的论述，透过国家的法律、政策，教育、媒体等途径，成为日常生活的常识。国家通过给树立学习榜样、使她们自己成为被人学习的榜样、提拔为领导干部等具体的微观技术规训不断加强新中国妇女的身份认同；展现在其从政道路上，不同的论述（即不同意识形态的出现）发展出了不同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是随着论述的改变而改变；展现了论述是如何透过微观的权力技术——如透过副职、权力边缘等空间位置，以及漂亮和不漂亮等外貌的要求、任职年限和退休年限的时间以及参政比例等规则的执行，规训身体使她们对既定的参政现状认同，并将她们规定在一定的位置上，使得身体成为一个权力运作下的身体；展现面对各种霸权的论述以及苛刻的规训，她们并没有一味臣服而是积极抗争，这种抗争的形式不是集体性的运动、游行，而是在其日常生活中显现出来，表达了一个充满灵性的主体。本研究除了上述的展现外，也提出一些建议和问题供大家讨论，更希望有机和西方妇女参政研究进行对话。

一、 总结和研究发现

（一）不同时期、不同论述下主体性的建构

在第二章的理论部分，我已经详细阐述过，每个人的主体性深受霸权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存在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的主体性。不同的论述产生不同的主体性，没有一个本真意义上的主体性。仅仅有论述不足以出现主体性，必须有一套将论述通过身体实践出来的技术才可能出现主体性。

本研究发现，女领导干部正是在不同的论述介入和一套技术的配合下，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主体性，如新中国建立后，她们建立了作为新中国妇女的主体性，之后建立了作为女领导干部的主体性，但没有整体出现为妇女参政的主体性。

1、新中国妇女主体性的确立

本研究中的女领导干部，大多成长于 50 年代之后，与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同步。她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和旧社会的妇女形象分离，成为新中国的妇女，确立成为新中国妇女的主体性。为此，国家不断地用一套的论述熏陶她们，即“妇女已经随着阶级的解放而解放了”，“男女平等”了，要把妇女从封建的家庭中解放出来，投身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去”，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这才是新中国的妇女形象等。这套论述通过法律/政策确立她们全方位和男人一样的法律地位；让她们上学、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运动使她们走上社会；通过媒体配合国家的政策大肆宣传“什么是好的女人”和什么是“新中国的妇女”来影响和强化人们的观念的一套技术贯彻的完成。

女领导干部的生命故事中显示，新中国妇女的主体性的确立，首先表现在她们冲破“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和自己贫困的家庭生活抗争而求学的主动性和智慧。尽管国家

为她们创造了上学的机会和条件，目的是让她们成为新中国的妇女，但求学的动力五花八门，她们中很多的人起初求学的动力绝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为了妇女不被男人瞧不起，为了自己成为有智慧的人和做一个知书达理的人。

榜样在她们成为新中国妇女的主体性确立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50年代到70年代，是一个国家不断树立各种榜样和她们认真学习榜样、并在榜样的激励下成长的年代，江姐、雷锋成为那个时代的象征和形塑她们的榜样。同时她们自己当班干部又被树立为别人学习的榜样。在积极模仿及被模仿的过程中，她们成为社会人——新中国妇女的主体性也慢慢随之建立。

除去国家灌输意识形态的法律、教育、媒体宣传等正规系统之外，借着学习榜样和自己成为别人榜样而自律的具体技术、大规模的社会教育运动如“四清”、“文革”、“上山下乡”等来进一步打造她们成为社会的人，成为新中国的妇女，其具体形象是和“男人一样”，男人能干什么，女人也能干。她们的主体性表现在一心为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努力使自己成为国家需要的人。她们成为新中国妇女的第一步走出的那么艰难却是那么坚定。

这就是新中国的妇女，在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之后，作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的妇女也解放了的前提下妇女被宣布为解放了，成为自己的主人。成为自己的主人的表现形式是她们主动争取读书、和作为女孩的命运抗争、和作为女人的身体抗争，彻底和过去封建的不解放的妇女形象决裂，这就是她们以为和认为新中国妇女应该做的事情，她们焕发了了全部的热情，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并投身到党的召唤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成为社会人和国家需要的人，奉献国家、大公无私就是这一时期她们的目标和理想。即便奉献国家、投入社会的程度有差别，但表现出妇女们的主体性比较相似和一致。当然看似铁板一块的主导论述也不尽然就那么铁板，从她们的生命故事中仍可以看到各种抗争的空间。这一点我们总结“抗争与主体性”部分的时候会涉及到。

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妇女受到单一的国家强论述的影响，从家庭中走出来便投入了国家的怀抱，没有把妇女交给自己，因此妇女没有主体性。可怎样才算把妇女交给自己？这样的主张从何而来？如果把妇女交给自己就认为妇女有了主体性的话，那个时代并没有这样的论述产生。而当时在妇女解放必须走出家门的论述下，妇女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挣脱封建家庭的枷锁投入到国家或者社会的怀抱，就是妇女主体性的表现。

2、女领导干部的参政主体性的建构

女领导干部参政主体性在80年代前后表现形式不同。

(1) 80年代之前

在这个阶段，意识形态的霸权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也只有透过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统识大家的思想，脆弱的新中国才能得以稳固和发展，那种强行的意识形态灌输是国家动员和解放劳动力以回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这种强行的形塑没有动用警察、监狱，正如葛兰西所

说的一个“争得自由同意”的过程。在一系列合理合法的、紧锣密鼓的安排之下，这种安排包括狂风暴雨般的，如强制性的法律制定和各种发动的运动，也有细物润无声般的（如榜样的塑造、带动或者使她们自己成为别人的榜样）将意识形态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处理恋爱、婚姻、家庭关系中），让人们心悦诚服地以革命干部的形象（一心为公、苦干、朴素）塑造自己的灵魂和身体，从而建立了那个时代女领导干部的主体性/身份认同——把一个新中国的妇女征召为女领导干部。

从女领导干部的生命故事中显示，她们参政的保证来源于党的各个时期的促进妇女参政的政策，否则她们不可能参政或者担任比较高的领导职位。如 74 年，国家政策开始提拔劳模和基层起步的妇女干部担任领导、83 年国家政策中大力选拔妇女科技人才参政、98 年通过公开竞聘将普通的知识分子提拔到高层（处、厅）领导干部，尽管被人称之为“坐飞机式”的参政，但这些政策给一些真才实干和女性提供了参与到高层的领导岗位上机遇。

80 年代之前，党和组织主动找干部参政。只要干部努力工作，提拔和任命的事情尽管交给党来考虑。那个年代，官场的风气比较正，党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基本一致，只要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就会用不断的提拔来肯定你的作用和价值，慢慢使她们建立了“一切交给党、跟着党、组织走”的信念，无须个人去争取参政的权利，党的政策保障了妇女能够参政。但保障本身又加强了她们被动的参政观以及依赖思想，参政行为本身表现出是一种被认同的结果，是一种政治荣誉，而不是主动寻求权力而达到某种目的的意识启蒙的结果。强大的政治氛围下，女干部们建立了政治生命是人生另一个生命的价值观。

也正因为党主动寻找和提携女干部参政，因此女干部们参政的动机出五花八门。研究显示，她们声称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参政的主体性，实际上表现出为“脸面”参政，即为了给组织争脸、给父老乡亲们争脸、给自己作为女人争脸而参政的主体性，和作为女人的身体抗争的主体性，在看似单一和具有普遍主体性的背后表现出诸多的差别。没有了政治生命就没有了面子，就很丢脸，在官称为人民服务的背后，却又有着复杂的参政的动机，面子、人情交织在一起，使得妇女参政出现复杂的文化内涵，而不是西方女权主义仅仅用“权力”的概念来解释妇女参政问题。

她们的生命故事显示，她们对该历史时期的评价是比较积极和正面的，因为她们主要成长和参政是在这个年代，尽管艰苦，却能让她们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女成为高级女领导干部，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尊重，靠自己的实力和党的主动提携走到今天，她们怎能不感谢培育她们的中国共产党！

（2）80 年代之后

女领导的参政观较 80 年代前更复杂和多样。国家对妇女参政的保护和主导作用退却，市场机制引入参政中，市场经济中优胜劣汰的价值观越来越强地塑造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价值观。发展经济和一切能让经济增长的事物成为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社会上越来越多地出现为了更多的经济利益、不择手段挣钱等而严重侵害妇女权益的事件，并屡禁不止。如

拐卖妇女、妇女下岗、侵害妇女劳动权益等等，使妇女参政问题淹没在众多的妇女问题之中，不再列入党和国家重要的议事日程。同时，国家的政治生活风气每况愈下，官场成为了利益竞争的场所，权力和利益相互交织在一起，“当官为民”的思想受到挑战。吊诡的是，这一时期，国际社会重视妇女权益的声音日渐影响着中国，尤其是随着 95’ 世妇会在北京的召开，西方社会性别意识传入中国，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分析妇女问题的视角，开始将妇女问题扩大至两性的视野，将妇女问题带出了妇女的圈子，使妇女理论研究者 and 实际工作者对妇女参政问题也有了不同的认识，该理论带有强力的妇女参政的目的是为妇女利益的意识，对妇女参政的理论研究和实际推动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尽管“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没有改变，但男女平等观已经从之前的男女都一样的平等观转变为“男女不一样”的差异平等观。差异平等观的出现一方面使女性的性别意识启蒙，但另一方面概念的误用，让女性回归到生理决定论的立场，男尊女卑、男强女弱和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观回升。这些给妇女参政局面带来了空前严峻的考验。

全国妇联为了托住妇女参政的底线，借着国际社会对妇女人权的推动，90 年代初出台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用专项法律的形式进一步保障妇女的政治权力。在 90 年代，推动中组部联合召开三次提拔女领导干部的会议，努力推进妇女参政的层次和水平。95 年，推动政府制定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督促各级政府重视妇女参政问题。比起 80 年代，这一时期推动和制定了很多针对妇女参政问题的专门政策和规定，但却没有 80 年代前那种国家强有力推动和落实的具体手段，出现了雷声大、雨点小的落实状况，贯彻不力。这些举措反映了国家仍旧在贯彻和延续“男女平等”意识形态，同时也看到妇女参政举步维艰的现实局面。

这个时期，女领导干部们的参政主体性呈现出多样性。从女领导干部的生命故事中展现出来的为人民服务的参政观宣称，随着官场越来越腐败而逐渐减弱，表现出奋斗和拼搏是为了经营官位的参政主体性；意识到男女不同和为争取回归女人的主体性；但绝大多数的女领导干部依旧把为妇女参政视为狭隘的参政观。尽管少数女领导干部出现了为妇女参政的主体性，仍旧没有从整体上出现为妇女参政的主体性，

对确立了“跟着党走、为人民服务”信念的她们来说，官场逐渐出现的各种腐败风气，使得她们坚信的价值观受到冲击。她们这代人是经受了 80 年代之前那种无私奉献的教育成长起来的女干部，甚至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却越来越觉得只埋头苦干却不能换来党和组织的认可和提拔，权力与金钱/色渗透在干部的选拔当中，充斥了官场。她们不适应，带着一种深深的痛楚，充满了迷茫和对国家前途的担忧。

无论 80 年代之前或者之后，我们看到父权制的幽灵自始至终陪着妇女参政的整个历程中并自始至终在发挥着作用。延续了几千年的“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和对妇女传统角色的定型认识，传统的性别文化如要求妇女顾家、担负起家庭责任、女人适合照顾者的角色等在政治领域依旧发挥这作用，只不过 80 年代之前，国家“男女平等”的强大论述下父权

制表现的并不是那么赤裸裸，而到了 80 年代之后，父权制和市场经济愉快地联姻，相互利用，把权力领域当成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导致对女领导的排斥和歧视。

（二）全景敞式的监控和规训与主体性

一些研究将女领导干部们没有为妇女参政的意识，归因为个人缺乏性别敏感度。尽管报刊、杂志和一些研究都会谈到官场上的种种潜规则影响了妇女参政，但都没有系统地揭示问题所在。本研究透过权力的微观技术去分析她们的生命故事时，清晰地展现出各种权力的技术是如何规训和影响她们主体性的形塑，展现出从政中的女领导干部们在风光权力背后的另一种从政样态。

1、空间的配置

对女领导干部的规训首先是通过空间位置的安排来进行的。在我访谈的女领导干部中，除了两位妇联主席是正职之外，其余都是副职，而且大多数的职位安排远离权力中心，担任非权力核心的职务。副职以及非权力核心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它是基于生理决定论的立场，认为女性天生就善于协调、心细，将其安排在副职和主管生活、思想和后勤等岗位上，发挥了“女性独特的优势”，和男性心比较粗等可以相互补充，实际上借此“科学”的依据，将女性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

副职就意味你没有决策的权力。尤其在中国政治民主制度不健全、主要领导人说了算的情况下，副职就更没有决策的权力，也无法影响决策。没有决策权就意味着女领导干部们的声音不被重视，即便她们有性别敏感性，也无法影响决策或者为妇女争取权益。几位女领导干部谈到，如果不是自己在某个阶段进入决策班子，绝看不到决策班子中对女领导的歧视现象，也正因为自己进入了决策班子，才能够为女领导干部们说话，执行一些保障妇女权益的政策。

在副职的岗位上，配合的好与不好是另一个权力技术，让女领导干部们在和一把手的配合的时候，总是陷入两难的境地，配合好也不行，配合不好也不行。她们总结自己长期在副职位置上能够生存的配合经验就是服从、服务、付出。服务就是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就是服务。不要有主见，这是服从。干活不要叫屈这是付出。在男性正职领导和女性副职领导配合好和不好之间，远不是一个男女领导的能力问题，而主要涉及到性别、性等问题，使得配合好和不好变得非常复杂、微妙。配合好牵扯到“男女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好了，人家说闲话，不好你在这个岗位上呆不住。总之如何把握分寸和怎样配合好就成为副职尤其是女性是否能够继续从政或者提拔的重要考量。配合好与不好表面上看是能力和技术问题，实际上是权益斗争的结果，配合好与不好就成为排斥女领导干部的一个权力技术因素。

如何可以固定在副职的位置上不能越雷池半步，让女领导干部心理上产生胆怯才是最

有效的排斥战术。那就是用知足/不知足，有野心和不求上进等说法看管你的心灵进而固定你的行为。在实际工作中，如果女领导不安心于自己的位置而产生晋升的思想，就会被认为有“野心”、“不知足”，一个女人如果有了这两个评价，就意味着她不像女人、大逆不道。其隐喻是她们必须安分守己，呆在该呆的位置上。当她们被困守在这里，又出现另一种的说法：“不求上进”，以此借口说明女领导干部素质差，没有进取心，把妇女参政中的困局归因为个人没有进取心，让你进退维谷，左右为难。

将女领导搁置在权力边缘的位置。纵览女性担任领导职务的职业领域就可以清晰看到对女性传统角色认定在公领域中的复制。女领导担任担任一些主管吃喝拉撒睡的事情，和科教文卫、妇联、计划生育委员会等软性权力结合在一起，这些领域被认为是适合女性的职业，都远离权力核心，而主管财务、经济、交通等等的硬性权力却掌握在男性手中。这些现象，它决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深刻的性别歧视文化和教育的产物。论述总是为权力服务的，为了认定划分的合理性，生物决定论的论述就为该权力所服务。决定了自然把男性放在正职和重要、有对全局发展有决策权的领导岗位上，而将女性搁置在决策权的边缘。将女领导放在副职以及远离权力核心的位置上，美其名曰是“人尽其才”，实际上是“男尊女卑”在不同场域的体现，将你“科学地”、“名正言顺”地排斥到权力的边缘。

时刻提醒女领导干部不要忘了家庭中的角色，是一个非常有效排斥妇女参政的空间配置的技术。无论你在外位有多高、权有多重，你到家就是母亲、妻子和女儿、媳妇，你所有的角色都要尽职尽责，把家庭角色和领导角色绑在一起，你没有好的家庭角色就算不上一个好的领导。几乎所有的女领导干部要努力在家庭角色和领导角色中努力争取平衡。评价一个女领导干部，其家庭是否幸福（子女争气、丈夫工作好并支持她的工作、孝敬公婆、父母）等都是连在一起的评价指标。几乎所有的女领导干部都说女人要干 100% 的工作必须付出 120% 的努力而得到的评价只有 80%。为了取得各种角色的平衡，很多女领导不得不放弃对事业的追求和进一步得到权力的机会。

正副职的搭配以及将女性参与权力的岗位安置在权力核心的外围，并用做好“贤妻良母”作为评价女领导干部的双重指标，表面上体现了“男女平等”中男人和女人都有参与政治权力的国家意识形态，实际上将官场为视为一个有利可图的资源，把官场变为利益争夺的场所，保证了“男权社会”中男性的霸权位置，同时也满足了传统社会性别对“女人”的期待，父权制就这样以更隐蔽的形式和“男女平等”隐秘地勾结在一起，至今持续地发挥着作用。

2、对身体的规训

福柯把身体作为探讨权力的重要场域，认为现代权力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压迫，而是透过一些纪律运作在身体上，身体是一个探讨不同的主体性如何透过权力的技术被建构出来的很好的起点。“进退维谷”的技术常常被政治宰制所使用，建构出女领导主体“尴尬的境地”。

80年代之前，男女平等的论述走上一个极端，变为“女等于男”，透过女人极力掩盖和打压自己女性的身体，进而建构成一个“男女平等”的主体性。

80年代后，“男女不一样”的论述出现，回归女性意识的同时，市场经济也乘机而入，利用回归的女性意识，把女性和市场消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制造了空前的对女性身体的重视，从之前压抑的身体变成商品和消费的身体。参政中也出现了空前对女性身体和参政之关联的操控。尤其到了90年代后，人们对女性身体美的追求和渲染到了一个极致的地步，对女性们来说，似乎给了一个普遍很清晰的概念，那就是“你长得什么样就说明了你是谁”，有人把美貌视为一种“政治现象”(Politics of appearance)，称之为“外貌的政治”，在这样的氛围中，长相居然成为选拔女领导干部的一个指标。

长相成为选拔女领导干部的指标，是无法拿到面上去说的，只有身在其中的女领导干部以及参与到干部推荐和选拔圈子的人才能体会到这一点。女干部长得“丑”没人推荐，因为对男领导来说，整天对着一个长得不顺眼的人“不养眼”。长得漂亮没人推荐，担心一推荐便和“绯闻”沾上边。选拔女领导干部变成男人选美的场所，不重视女人的内在价值却把相貌作为衡量的标准，使得有点姿色的女领导干部们蒙冤叫屈，很多女干部参政依靠自己的实力但却被误认为是自己的姿色作用的结果。但另一方面，深知姿色可以作为进军官场的资本，一些女人也利用姿色进军官场的情况也在新闻和网络报道中屡见不鲜，甚至一些男领导干部将自己的情人也培养为女领导干部，把官场变成他们中饱私囊的场所，践踏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什么在官场男人的长相不作为选拔的标准？

女人当官不仅要考虑爹妈给的长相，还要考虑自己每天的打扮是否合适？既不能寒酸、也不能时髦。寒酸了别人瞧不起，时髦了别人贬低你。怎样穿着一定要考量周围人的眼光和说法，这就出现了女领导干部聚集的场所变成时装展览会的场所的情景。对穿着的挑剔就变成了另一种对女领导干部的规训，逼得你不得不绞尽脑汁去考虑服装等外在的东西。当每天考虑穿着的时候，对女领导干部的定型认识又出现了，“即便是女领导，在一起不是谈穿就是谈家庭”，言外之意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媒体等也竞相炒作现代女领导干部的穿着标准，把现代女领导包装为年轻、漂亮、苗条、时髦和有风度的人，而背后是商家推销产品的策略，媒体无疑对女领导干部外貌的要求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3、参政机制中的游戏规则

选拔干部有一套严格的干部选拔程序和标准，然而，表面上这套程序可以完美地运作，但在程序运作过程中，有很多的暗箱操作和不可告人的潜规则在起着作用，其中以性别为考量的潜规则、游戏就把很多女干部排除在政治之外。

首先是干部推荐中的游戏规则。对待女干部，要么不推荐，要么推荐几个，总之不能只推荐一个；在推荐过程中，可以为被推荐的男干部多介绍情况说几句，但不能为被推荐的女干部多说话；对男干部如果一次推荐不行可以多推荐几次，对女干部就不敢多次推荐；如果对被推荐的男干部有争议，但可以先用起来，以后慢慢改正，而对被推荐的女干

部有争议就先搁下，这一搁被提拔的希望就渺茫。这一切背后的原因很简单，谈女就似乎在谈“性”，女人就直接等同于“性”，很怕扯上闲话、沾上绯闻，官场上最可怕的就是惹上“男女关系”。但桌面上的冠冕堂皇似乎掩饰不住有些领导干部私下卑劣的作为，报道显示，大量倒台的贪官几乎都有说不清楚和“名正言顺”的“男女关系”。这无疑是一种权力争斗中排斥女性的伎俩罢了。

其次是规定比例的游戏规则。本来国家规定的选拔女领导干部的最低比例制是保证女性在最低限度内能够参政，到了实际操作过程中就变成一种权力的游戏，把至少一个变成“唯一一个”。国家规定在各级领导班子中要考虑到各个界别的代表参政，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把参政中将各界代表（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和女性）集于一身成为“无知少女”（最近又发展为“无知美少女”，美即留洋回来的。），既满足了要有各界别代表的政策，也满足了“至少一个女性”参政的要求。官场对女性的排斥和男性的霸权可见一斑。

最后利用退休年龄和任职年限之间的时间差来排斥女领导干部到高一级的领导岗位上。任职年限是依据退休年龄来规定的，中国目前基本上执行“女 55 岁退休和男 60 岁退休”的政策，女性比男性早退休 5 年的政策本身已经限制了女性向更高一级的岗位上晋升。从女领导干部的成长规律来看，女性到了 40 多岁才可能到了处级领导岗位，如果到更高的领导岗位必须要具备后备干部的培养条件等，也需要一定时间的任某个职位的年限，无论怎样，看着 55 岁退休的年龄，很多单位的领导不再把培养后备干部的名额给女干部，从而女干部无缘晋升到更高的位置上，出现了中国的玻璃天花板效应。。

总之，将上述看起来互不关联的各种规训以及游戏规则放在一起，我们就看到了一幅从空间到身体、具体的参政程序中的全景敞式的对女性参政的限制和规训，这些规训和游戏规则不仅影响女领导干部们参政的主体性，同时她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自觉地复制和传播，也用同样的要求规训别人，规训之所以有效在于它在复制和传播。让你到了领导岗位动弹不得，让你在位置上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妇女参政的比例怎能提高？妇女的参政积极性如何培养？妇女参政为什么难的原因已昭然若揭。

（三） 抗争的主体

女领导干部是一个复杂的人群，她们一方面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参与权力的建构和复制，但一方面由于她的性别身份，她在权力阶层中被排斥于边缘。面对排斥和被边缘，她们无论面对强势的主流论述形塑或者规训下的主体，从来都不是俯首称臣的，充满了抗争的灵性。她们总是在规训和论述中寻找生存的策略和抗争的空间，从日常生活的抗争到依法维权，艰难行走在充满荆棘的权力场上。

1949 年以来，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已经确立了“男女平等”的话语，在随后的 50 多年

里，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也推出保证妇女参政的政策，实现男女平等已经成为国家的话语和国家的事情。即便出现 80 年代妇女参政落入低谷的状态和至今参政比例低居不上的局面，在全国妇联的推动下，也是靠国家不断出台政策来推动和拖着妇女参政的底线。从理论上说，一直以来，国家和男人曾是妇女解放的同盟军，即便想发起一个抗争运动，也找不到要斗争的对象。

面对上述种种的局面，50 多年来，我们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争取妇女参政的社会运动，而是我们依据中国国情、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我们在多场域开展了抗争，开展了“依法抗争”（依法维权）以及从女领导们的生命故事中发现的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抗争”到身体的抗争。

1、依法抗争

每个时期，针对妇女参政出现的问题，国家都会出台相关法律和政策来调节。这些法律和政策就为依法维权提供了证据和有力的武器，过于笼统的政策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也提供了抗争的空间。

在“依法抗争”的过程中，全国妇联扮演了推动者的角色。“依据法律来维护妇女的权益”是党赋予全国妇联组织的职能并写入妇联的章程中，直到 80 年代后期，全国妇联的依法抗争职能才逐渐表现出来并日益发挥作用，其依法抗争的行为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借国际社会的力量推动中国政府制定保证妇女参政的纲领性文件。表现在围绕 95’ 世妇会召开而推动的中国第一部政府关于妇女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出台，其中规定了保证一定比例的妇女参政是各级政府的工作目标。第二，针对 80 年代急剧滑入谷底的妇女参政状况，90 年代推动中央组织部门三次召开专门会议制定有利于妇女参政的政策，尽管这些政策的出台没有根本上改观妇女参政的局面，但也促进了各级政府对妇女参政问题的一定的重视。第三，除了政策推动外，在各层和各地领导班子的换届选举中，各级妇联力争推荐和呼吁一些有为的女干部进入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尽管效果不是十分显著，但从政策的推动和实际操作时候的推动来看，妇联发挥了在她的位置应该发挥的作用。

2、日常生活的抗争

“日常生活的抗争”也被斯科特称之为“弱者的武器”，被定义为一种持续不断地与那些压迫他们的人之间的斗争。因为它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所以除非我身临其境，否则我很难感受，而当事人更无法言表。在本研究中体现的部分是因为我和女领导干部打了将近 20 年的交道，我和她们中的几个人是故交，能在日常的交往中感受到她们的抗争。同时我个人也亲历在中国官场的腐败中，能不断地听到、看到一些女领导干部在腐败官场上的斗争，我个人也常常有日常生活的抗争。因我在其中，才可以在访谈的时候提及这些问题，才有第六章的丰富资料，尽管展现只是冰山一角，却也足见一般，展现抗争的主体性。

80 年代之前，女领导干部的抗争形式表现在积极认同新中国妇女形象而与旧社会妇女

形象彻底决裂的过程中。为了上学，和贫困的家庭生活抗争，带着弟妹们读书；和重男轻女的母亲抗争，瞒着母亲一直偷偷读到初中，发动小姐妹们帮助防线给母亲交差，一边偷着自学；为了表明妇女的解放，争取和男人平等，她们和自己作为女性的身体抗争，和男人一样跳到井里工作，落下关节病；和自己作为母亲的身份抗争，绝不能因为结婚生子耽误革命工作，基本上孩子刚满月就送到老人那里，自己坚持工作，独自承受着想念孩子的苦；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年的这些抗争行为，似乎很傻，但在当时的确是她们的英勇之举，没有这些抗争，她们怎能从姐妹和男人中脱颖而出。

到 80 年代之后，面对官场的腐败和性别的排斥，很多抗争形式就变成隐藏的文本而无法公开化。尽管如此，我们仍旧可以从访谈中得到一些抗争的策略。女领导干部不敢说话，不敢主张自己的意见，被当成“花瓶”的现象（花瓶现象很复杂，不是这么简单），就出现了她们“我就不当花瓶、不怕丢官和敢于说话”的抗争。面对干部中选拔女干部变成选美的风气，出现了“我靠实力赢得尊敬而不靠姿色”的抗争。男性领导下属对作为上级的女领导不服，处处刁难，女领导就以原则性和人情味和面对危险的勇气和胆识感动和打动那些刁难的男性领导。尽管该种抗争策略无助于改变一些歧视性的制度，但至少在局部改善了女领导干部工作的环境，表达了人是抗争主体而不完全是臣服的主体的能动性。日常生活抗争的故事也很容易被贬为一种不入流的、小心眼的东西，处理不好反而会带给女领导干部们污水，因此使得整个研究中，这方面的资料比较缺乏。在以往的研究中对女领导干部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的抗争性没有研究和讨论。似乎总是放在一个被动地等待着政策和妇联救助的形象。

3、身体的抗争

女领导干部的生命故事显示了一条非常明显的主线，即女领导干部们都经历了 80 年代前用灵魂塑造身体以及 80 年后以身体塑造灵魂的过程，在主体性塑造的过程中，是一个不断打造灵魂和身体的过程。80 年代之前，人们为了塑造高尚的灵魂以及为了让身体跟得上灵魂的塑造，就采取打压身体的办法。那个时代人们的观念是，如果照顾到身体的需要，关注身体，就会减低对革命的忠诚和奉献，消磨革命意志。而在 80 年代之后，灵魂形塑开始出现新的标准，对身体的打压转向对身体的关注和爱惜，女性的身体被市场经济利用，裹挟着妇女们走入到另一个极端的误区，对身体过于关注，甚至用身体塑造灵魂。如女人身条好、丰乳丰臀就是美的女人，好的女人，在灵魂与身体相互塑造的过程中看到女领导干部们主体性所发生的变化，似乎女人的身体就变成了女人说话的唯一工具。

在开始的第一章中，我提到我的、妈妈的以及女领导干部们“沉重的叹息”，我知道这种叹息是生命中种种无奈的反映，是种种的积压透出的沉重。但我没有把叹息和身体的抗争联系在一起，而当我看到潘毅把“尖叫”定义为一种抗争的次文体的时候，为我打开了一个解释女领导干部身体抗争的空间。叹息、闭经作为“多场域抗争”中身体抗争的一部分，女领导干部们自己自己没有察觉，但她们的身体却清晰地反映出来。本研究中枫南的

三次“闭经”的经历就是身体抗争的具体表现。“闭经”是身体发生的“沉默的革命”，在“闭经”的背后隐含着多少来自社会文化对身体的压力。一方面女领导干部们的灵魂朝向那个征召她们的意识形态，但她们的身体却实实在在发出了抗争的信息，让我深刻理解女性所遭受压迫的时候，总是身体优先反映、女性周期是“永远无法容纳谎言的真实时刻”的说法。

二、讨论

上述的研究结论中，我认为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讨论：

（一）没有论述的介入，女领导干部不可能自动出现为妇女参政的主体性

对这个话题的讨论，目的是回应第二章文献回顾中提到的关于妇女参政的概念，以及众多的研究中理所当然觉得妇女参政就是要为妇女而参政的论断。也回应之前研究所采用的定量研究方法，通过数字来说明妇女参政的状况，在数字的背后无法看到女领导干部们怎样的看待参政和参政在她们生命力到底意味着什么的问题。

本研究发现，女领导到干部们从旧社会的妇女成长为新中国的妇女、从新中国的妇女成长为女领导干部是不同论述介入的结果，不仅有论述介入，而且有一套贯彻论述的技术，否则不可能自动从一个主体位置转换到另一个主体位置。也就是说，女领导干部在一个被歧视的结构位置（领导职位）上不必然产生一个抗争的主体位置（为妇女参政），必须经过政治论述。政治论述赋予主体抗争力量，使她们开始对自己的生存状况有所理解。

把妇女参政作为妇女解放的标志，本身就是政治论述的产物。为妇女参政的思想和意识更是女权主义政治论述的产物。换言之，要把女领导干部这个结构位置放在一个政治范畴里，必须与女性主义的政治论述结盟。正如 Laclau 和 Mouffe 认为的，必须将结构位置（structural positions）和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s）进行一个区分（Laclau & Mouffe, 1985: 11-2 转引自周嘉辰，2003）也只有通过政治论述我们才能体验到自己是如何被放进社会结构里（Smith, 1998: 57）。（Smith, 1998: 58）。

个人并没有一个本质上的结构位置和起源于这个结构位置的利益，本身的结构位置也是论述的产物。比如，女领导干部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而当她和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政治论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显出这个结构位置的主体意义。副职和正职本身也没有意义，当她和一套所谓女性天然优势和男性天然有决断能力等生理决定论的论述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才赋予了它所谓男人适合做正职和女人适合做副职而用性别将领导岗位天然搁置。可以说遭受歧视的女领导干部被想当然认为具有一个为妇女参政的本真利益是不适合

的，如同无产的工人想当然认为具有参与到建设社会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体系的本真的利益一样，这是想象的景象。实际上工人参与斗争是政治论述介入的结果

(Lacau, 1990:9, 16, 转引自周嘉辰, 2003: p118-228)¹，因此如果让女领导的结构位置转换到参政妇女这个主体位置，必须有赖于一套的政治论述介入。

主体位置就是一个认同，也就是女领导干部们是否认同为妇女参政的这个主体身份，必须是政治论述介入的结果。在中国的实际中，妇女参政是妇女解放的标志的论述，使得普通的妇女被放到女领导干部的主体位置上，但缺乏一套将女领导干部转变为为妇女参政的主体位置的论述，至少说现有的政治论述不足够将女领导干部从一个结构位置转换为主体位置，即她们可以有为人民参政的意识但没有为妇女参政的意识。因此只有女领导干部们建立一个对自己结构位置拥有的共同的诠释，只有认同，而不是具有共同的结构位置，才可以作为政治团结的原则 (Smith, 1998: 61)，只有这样，女领导干部才能成为具有行动能力的范畴，才能到参政妇女这个政治范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女领导干部在其岗位上很难出现为妇女参政的意识，没有一套认同的论述就不可能自动出现为妇女参政的主体性。

中国历来把妇女参政作为妇女解放的标志，也把妇女参政率的高低作为妇女解放程度的衡量指标。从女领导干部的生命故事中显示，她们参政很大程度上与妇女解放无关。她们可以为面子、作为职业而参政、为官位而参政等，但鲜有或者很难产生为妇女参政的意识。从她们进入学校求学开始，国家就从来不把妇女看作或者培养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中国没有“个人主义”的传统，即没有把妇女作为权利的个人，可以对抗国家和社会的要求，只是当作一个泛泛的人来对待 (玛格丽特·吴, 1994)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这是妇女身份的鲜明写照，她们只有表现出积极主动争取与男人等同的主体性，而很难产生为妇女参政的主体性。一直以来，都没有为妇女参政的论述，那么为妇女参政的主体性从何而来，以往研究中批判此时妇女没有主体意识的说法过于简单，只能说此时没有出现女权主义政治论述下为妇女参政的主体性。

(二) 全国妇联能否突破代表妇女的局限性，要看她是否能突破自己的结构位置

本讨论是针对之前所谈到的，在推动妇女参政方面，国家有一套制度性的安排，即依靠全国妇联从事专门的妇女工作。事实上也是如此，在 80 年代之后，全国妇联在推动妇女参政方面发挥了积极和主动的作用，然而面对参政局面依旧不容乐观甚至没有大的起色的局面，全国妇联的角色是否需要转化，其到底发挥怎样的作用才能扭转妇女参政的局面？

¹ 该理论的详细论述，详见周嘉辰著，《女人与政治》一书 p118—128，台湾，扬智出版社，2003 年。

² 玛格丽特·吴，“中国女工的保护与平等”，引自《性别与中国》，三联出版社，1994 年。

中国共产党建立全国妇联的初衷，是将她作为联系中国共产党和妇女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因此一开始就被中国共产党搁置在一个结构位置上，去代表妇女说话和为党和政府去做妇女工作，因此全国妇联的产生并不是妇女集体认同的结果。长期以来全国妇联可以称之为职业的为妇女维权的机构。全国妇联代表妇女追求的是一种预先设定好的利益，如新中国建立后，妇女解放了，解放了的妇女们必须走出家门，参加社会劳动、妇女参政等，这相对于妇女来说，不是当下的妇女们争取的，而是她们一出生就被设定好的利益，全国妇联则代表妇女们去争取。而政治认同的过程不是反映和处理预先存在的群体利益、去寻找各种方式来满足妇女的利益，而是要建构妇女群体的认同，认同形成要通过不同的妇女群体协商对话，辩论、持续不断地创造新的认同。即政治认同是妇女们集体诉求和不断协商、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

80年代之前，在“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旗号下，全国妇联的工作基本上紧跟党的号召，主要围绕党的中心宣传、动员、组织妇女从家门走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去维护国家的利益，动员妇女积极享有一切的权利、妇女全面进入社会，全面弱化妇女个人利益和权益的时代，这些任务致使全国妇联自身也没有单独维护妇女权利意识和概念。80年代后，随着改革的深入，侵害妇女权益的现象日益严重、程度令人发指，如妇女参政落入低谷等等，全国妇联才开始逐渐转向维护妇女权益的工作上，逐渐发现法律和政策中对保护妇女权益的条款过于笼统而无法具体实施操作，开始促进各种专门维护妇女权益的法律和政策出台，如《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修改中加入“反对家庭暴力”的条款等等，针对妇女参政的政策也不断出台政策。尽管这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但全国妇联始终处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国家政权的重要支柱的结构位置¹，使得她所做的一切都离不开“依法/政策维权”的框架。一方面笼统也好、很难操作也罢，国家的法律/政策的确给了妇女应该享有的一切权利，另一方面，妇联在党的领导下，尽管赋予她监督妇女权益贯彻和保障的职能，作为国家公务员的一部分，享受体制内各种待遇，全国各级妇联干部的升迁和罢免都是由本级的党委来领导和管理，使她无法真正行使她的监督权利。

另外，女干部进入妇联当领导或者在妇联工作，不是依据她们是否有性别敏感性和有着为妇女权益斗争的经验和理想，而是和其他党政部门一样，参加统一的公务员考试，妇联和其他行政部门一样是一个职业，因此很难保证她们有性别敏感性以及有为妇女争取权益的意识。现实情况是她们进入这个机构后，看多了妇女问题，才逐渐意识到妇女权益受到侵害是一个性别歧视问题，马海、新梅、淑华、李华都谈到相似的情况。等她们有了为妇女维权的意识，她们又轮换到别的岗位上。对她们来说参政是一个职业，她们做到更高的或者更有实权位置上（相比较妇联）是一种荣誉和面子，进入妇联是无奈的选择，这个位置无权无钱，但由于是唯一一个毫无悬念地从副职可以晋升到正职位置岗位，因而一些

¹ 1990年，《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和政府对工青妇领导》文件中，第一次将妇联等群众部门作为国家政权的重要支柱的高度认识，该认识一方面提升了群众组织的地位，但同时也限制了群团组织的独立性。

女干部即便无奈也选择到妇联，马海、骊歌等都是这种状况。

全国妇联作为理所当然代表妇女利益的组织，自然缺少协商对话的机制来协调不同的妇女利益，仅代表一个以“女人身体”而划定的身份利益，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身份认同，更不要说形成大家认同的统一政治主张。即便是参了政的女领导们也没有觉得自己代表了某些妇女的利益，也就是说“女人”的身体并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她们就有一致的政治认同，或者在“女人”的旗帜下产生统一的抗争行动。

中国的现实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各级妇联，可以利用她独特的组织优势和合法的身份，在维护妇女权益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全国妇联即接受党的领导又代表妇女利益的性质也决定了她在推动妇女参政的工作时，必然倡导式的而不能是组织发动妇女运动。全国妇联要突破她结构位置的限制，就需要重新探讨一个发挥她的效应的渠道。自 80 年代以来，改革妇联的呼声就一直没有断过，也尝试过让妇联独立运作而不进入公务员系列，但最终仍然维持了目前的现状。也许中国妇女参政状况的突破和妇联结构位置的突破一样的艰难，也许有一天妇联工作突破了，中国妇女参政问题就有了突破。

（三）对妇女素质低的误认

本讨论是针对一直把妇女参政素质低作为阻碍妇女参政的一个官方论断而进行的。当我正在写作的时候，我偶尔浏览到一篇文章，发表于 2005 年 4 月 13 日《中国妇女报》，题目为“新型妇女干部‘四要素’”，该文章中写到“能否实现男女平等，关键取决于妇女干部能否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到了 2005 年，也就是 95‘世妇会召开后的十年，在中国官方妇女报上，对妇女素质的误认仍旧见诸于报端，可见该报编辑对妇女解放和妇女素质的认识程度。

从对女领导干部的成长和参政经历的研究中，我怎么也得不出妇女参政率不高和妇女素质直接相关的结论。无论哪种素质低的认识都不能和我的研究参与者挂在一起。这些出身在 40、50 年代的女领导干部们，她们经历了学习榜样的年代，经过各种运动的锤炼，她们被锻炼出并展现在参政、从政过程中的一些极其可贵的品质，如大公无私、热心助人、在困难面前处变不惊、坚强的忍耐力、艰苦朴素、为老百姓着想和为人民的服务，她们严格要求自己，敢于直言和追求真理等等，这些品质那样的难能可贵。她们在从政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如在培选中落选，把她们放在所谓适合女性的岗位上，将她们安置在副职上也不是素质低的结果，而是性别歧视下的制度性的安排。除了用优秀、坚韧、执著等来形容她们之外，无法把“素质低”放在她们的身上。即便靠着姿色从政的女干部或者为了“无知少女”集于一身而没有经过基层锤炼和严格选拔的女干部，担任领导干部之后有很多的不适应，这些也不是个人的素质问题，而是选拔干部的标准和程序出了问题，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把不适合做干部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这不是女干部素质问题是决策人拿着

纳税人的钱把人民的事业当儿戏的表现，种种的游戏规则却把大量高素质的女干部束之高阁。

80年代之前，中国共产党主要从基层提拔女领导干部，大批女干部从基层选拔上来，如淑华、秋菊等，她们在实践中边学边干，没有觉得自己的文化程度不高（不适应自己的岗位，她们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能够切身体会老百姓的疾苦和温暖，和老百姓贴的很近，大量的知识从实践中来。即便那个时候的大学生也要到基层锻炼。而现在学历成为提拔干部的重要标准，干部的学历越来越高，但干部们的心却越来越难走近群众，尽管中央也要求干部挂职到基层锻炼，但从根本上也没有解决干部脱离基层群众的问题，学历和工作能力和职业精神没有必然挂钩，我们怎么看素质问题？越来越多的女领导干部在领导岗位上将重点集中在如何经营自己的官位上，变得不那么坚持正义立场，也不像秋菊那样敢于直言，这也不能全部归结为个人素质，面对官场的腐败，这是一个集体失语的年代，正如第五章中所言，很多的规训使得她们动弹不得，但动弹不得不等于她们就没有自己的主见和立场，因此才会出现日常生活的抗争，是一种权宜之计和选择，也是一种主体性的发挥，而决不是文化素质、心理素质问题。

什么时候，全体国民的素质都需要不断地提升，但绝不只是妇女的素质，尤其在妇女参政方面，妇女素质低不是阻碍妇女参政的核心原因，解决妇女参政问题决不是先要解决妇女素质问题。

（四）产生集体的抗争的困难

女领导干部成为一个政治主体，是女性主义寻求政治再现（political representation）的基础，所谓再现，意指在政治过程中寻求将权力的正当性扩大至女性，使女性成为一个政治主体（Butler, 1990: 2），因此，国外女权主义者主张，如果要女领导干部产生为妇女参政的诉求和意识，或者成为抗争的主体，必须有运动的推动者所建构的论述推动出来，社会运动创造认同，运动主体是由运动者的论述所建构出来的。只有透过论述，主体才能出现，是运动创造了认同，而不是认同创造了运动。基于上述的论断，在中国不可能出现推动妇女们集体认同某个政治主张的社会运动。

女领导干部原来只是一个非政治的社会关系，即便在性别关系上表现为一种臣服关系，也认识到了自己在权力位置的边缘地位，或者她们有着相似的处境和遭遇，个体也有抗争的意识和行动，这不表明她们一定就能形成一个政治上的联盟关系，也不一定出现集体抗争意识。即便抗争，也把自己当成是“男女平等”意识形态下的“国家的主人”，把自己视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她们的维权是基于党和政府曾是妇女强有力的后盾，认为“共产党依旧是代表和维护妇女利益的党，认同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为国家作出过贡献的前提

下进行。因此不公平”等这些政治口号作为她们行动的依据。妇女平等参政是她们应该享受的公平待遇，否则就不公平，就是一种侵权。可见这是一种由“政治伦理”产生出来的权益，当这种“政治伦理”成为女领导干部或者全国妇联“依法抗争”的思想行动基础的时候，它为她们的行动确立了基本的“守法原则”。由于自己是党的人，因此在抗争的策略上比较克制，抗争的行为和方式上遵守国家的法定规则，另一方面政府因为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变采取过激的处理方式来对待党的人的抗争（于建嵘¹，2006）。

这一点已经很清楚地从女领导干部的生命故事中展现出来。本研究参与者新梅坚决地说自己不是女权主义者，谈到女权就变成了女人和男人对立的关系，她不喜欢这样。在我做硕士论文的时候，我访谈到很多女领导干部都不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杨静，2003），

西方女权主义者认为，只有当妇女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利益被侵犯并开始诉求的时候，她们才可以形成一个政治团体，凝聚、团结起来。中国的女领导干部们都是当下的既得利益者，很难突破结构位置和利益而凝聚起来，参政也并不是所有女人的关心的事情，为妇女参政也不是从政女领导干部们的关心。妇女研究者们或者全国妇联想当然地把妇女们建构成一个统一的政治范畴——一个被压迫的对象，把“女人”单一化。女权主义以“女人”之名行动，却忽略了“女人”这个范畴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的（Scott，1996：3-5）。身体并不是命名女人的唯一固定的内涵，政治论述在“女人”或者“女领导”成为政治范畴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对比旧社会的妇女，新中国的妇女在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了的话语中成长起来的，几乎没有被压迫的意识，因此无法产生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反压迫中去，她们感受到解放后带来的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负担，很多妇女宁愿选择做回传统的女人，无法产生出极大的革命热情。就连普通妇女都很难动员起来争取自己的权益，更不要提单纯“为妇女”而斗争的事情。从领导体制上，一方面妇女的团体代表——各地妇联依赖于当地政府，而不能形成能够独立主见的局面，女领导干部本身就是维护稳定为己任，领导班子中只有一个女性的参政格局使得女领导干部们淹没在男权的汪洋大海中，怎么可能形成统一、强大的抗争力量。尽管多场域的抗争空间存在，但上述种种条件的限制使得我们无法形成集体抗争，因而也无法革命性地突破妇女参政的现状和格局。

（五）中西方不同的妇女参政论述和逻辑

从第四点的讨论中，我们略见一斑中西方妇女参政的社会环境的极大差异性。

西方女权主义参政运动的起步和中国就有截然不同的不同。首先，西方国家的妇女参政是

¹ 本观点来自于建嵘在2006年4月3日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当代中国工人的以理维权”，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妇女自己推动的结果，而中国的妇女参政是在国家和民族解放之后，作为无产阶级的一部份而被解放。女权主义提出“个人的即政治的”的主张，是针对西方政治和政治体制中对女性生活相关的家庭、个人、私生活的漠视，而在中国，“个人的”无一列外的就是“政治的”，从男女关系到婚姻生活，政治之手无所不在，僭越乃至最终完全剥夺了个人的生活空间，两者的结果是一致的，都是对妇女的一种忽视，从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此外，“女权就是人权”，这是西方妇女喊得最响的口号，针对西方传统人权概念中缺乏女权的内容和妇女权益无从伸张这一客观事实，其口号下的行动是向“男性中心社会”要求女人同男人一样的权利。中国却不同，中国妇女已经从法律上享受了几乎一切和男性平等的权力，中国妇女恰好需要一个倒置过来的口号“人权也是女权”，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妇女才有可能改变权力问题上任人安排的心态。

再者“姐妹团结就是力量”，是西方女权主义重要的政治口号，但对中国妇女却没有多少号召力。因为我们喊了多少年针对全体人民的“团结就是力量”口号，相比西方女权主义的口号，气势上已经弱了很多。我们强调所有人的团结，如果再强调姐妹团结，就好像是在“大团结”中拉“小宗派”（李小江，1997）。

前面我们也提到在人情和面子是中国人的行动逻辑，因此在政治场域中的妇女也深受其影响和制约，这一点也和西方的妇女参政有不同。

总之，中国目前妇女参政状况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当我们用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参看中国的妇女参政状况时，一定要警惕她的话语在中国情境下是否适用等，而不能盲目加以应用。

三、 建议

综上所述和讨论，我认为解决中国妇女的参政问题，首先要建立一套的政治论述，同时我认为解决妇女参政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性别问题，必须和社会发展、国家政治生活健全和民主化的进程同步，也要根治官场的腐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单纯作为一个性别问题去解决很难见到成效。解决妇女参政问题必须通过自上而下，即国家的刚性政策保障，也要自下而上，即从基层的民众意识启蒙开始，而在两者之间需要法律、教育、媒体等营造良好的氛围促使性别意识进入各个主流的渠道中，只有三者的力量合力为之，妇女参政的问题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

（一）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论述以及政治认同产生的过程

从西方妇女参政运动的发展来看，每次妇女运动都是意识先行和启蒙的结果，总是论述带动深刻的革命，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和中国妇女解放也不列外。中国妇女从旧到新的转变，从普通妇女到女领导干部的转变，都是一套强的论述介入的结果。尽管官方对于“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没有改变，但是，事实表明，这套的论述不足以解决目前妇女参政的困局。95’世妇会之后，社会性别意识介绍到中国，迅速在农村发展领域和妇女研究界传开，作为一把锋利的武器，为我们揭开了很多关于妇女问题的困惑，也提供了多种解决妇女问题的思路。然而，如何处理官方信奉的马克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性别理论之间的关系，是学术界以及全国妇联一直讨论的话题，至今也没有建构一套对解决中国妇女参政或者妇女问题强有力的理论体系。本研究也无力承担这样艰巨的重任，但我相信要有一套强有力的论述才能促进妇女们积极参政和从政，甚至为了妇女而参政的意识，而这套论述的建立不是一日之功，我们既要借鉴西方的一些性别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同时又要扎根于中国本土。女权主义在中国能否得到认可和发展，取决于它是否能通过影响公众意识，成为一个全面的社会改造的纲领。值得欣慰的是，这样的工作我们正在进行，本研究也是其中的一个尝试。

95’世妇会之后，社会性别视角透过国际基金会首先在农村发展领域传播，之后逐渐向妇联、中央党校等地方传播，性别视角在媒体、教育、法律和政策研究中应用和展开。在一步步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这些研究逐渐转化为行动，正在一点点地影响决策、法律和人们的观念。如表现在推进几十年不变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政策来保障妇女土地权益；在《婚姻法》修改中加入“反对家庭暴力”的条款；在中央党校部分省委党校开设“男女平等”国策的课程，国家计生委采用社会性别理论为指导来治理“性别比失调”等问题，这些举动都是历史的突破。本研究也是受性别意识的影响，做一个寻找改变中国妇女参政问题的尝试，我相信在性别研究不断的深化和发展过程中，我们一定能够找到一条借鉴西方的理论但扎根于本土的论述来指导中国妇女参政。

同时，也从女领导干部的生命实践中看到，80年代之前，贯彻男女平等的主张不仅通过政策/法律，更是通过运动、宣传教育等多种途径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中。然而80年代之后，关于妇女的政策和法律出台比之前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却没有像之前的一个大的声势和举动去贯彻和执行，似乎国家把所有的推动妇女参政的工作都放在全国妇联的身上，而之前的讨论看到，妇联的位置本身就给推动妇女参政工作带来很多的局限性。鉴于此，国家应该有一些强有力的推动措施来实施国家颁布的政策，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如果不在一套强有力的论述下发动一场深刻的性别平等意识的宣传和灌输革命，性别公正和平等的思想意识很难真正成为每个人的思想和意识。在不远的将来，女权运动与民主、社

会解放的接合点正是我们重新表述“妇女问题”和重新定义妇女解放的着眼点。国家与市场之间，在有多种可能性的、开放的历史变革中，女权主义必将找到其适合的中国形式。

（二）妇女参政不是一个简单的性别问题，因此也不能只解决性别问题

从研究中发现，今天所面对妇女问题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和全球化、市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父权制等广泛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它和中国发展进程中众多的社会问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单独抽离出妇女参政问题去加以考虑的举措事实证明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妇女问题必须随着社会问题的解决而解决的论断有着历史的和经验的证据。妇女参政问题是国家民主建设进程中的一部份，恶劣的政治环境也无法促进妇女参政。妇女参政问题相比较现今严重的社会问题如社会大量农民工被排斥和侵权、外资工厂女工受到严重剥削、拐卖妇女的犯罪现象依旧严重等似乎小屋见大屋，在众多的妇女问题中，妇女参政问题似乎也排不到国家非重视不可的议事日程上。上述妇女问题的产生根源是一致的，因此不触及问题的实质就会不断产生新的妇女问题和性别问题。倡导妇女参政的人不应该只关注比例等问题，而是要分析深刻的影响参政的各种机制和论述，从改变论述以及保证论述的这些机制入手，改变妇女参政的局面。

在考察 90 年代的历史时，发现一个规律性的因素，而这个规律性的因素增加了解决妇女参政或者妇女问题的难度，具体来说，我们国家所经历的资本化的过程是被政府推进的，在社会主义的保障下完成的，所以很多不合法的事情如对工厂打工妹群体的剥削是在合法的旗帜下进行的，如打着发展经济、改善农村贫困面貌等等。我们说中国的女权主义在今天很安全，又很艰难，很安全是因为中国的妇女解放是在新中国的政权辅助下完成的，曾经成为最大的官方行为。很艰难，是因为女权主义同样是昔日的官方行为，同时面临着官方行为建立的一种思考：妇女解放就意味着某种法律条文、某种经济举措，却不是出自女人需要的真实的通过自身斗争的实践。所以，如何既在官方的保护下同时又出现妇女自己的抗争意识，才是今后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总之，尽管妇女参政紧密关乎性别歧视，但要改变妇女参政局面的策略不能集中于性别因素，将性别因素抽离于阶级、市场、国家等因素的影响。女权主义应致力于争取的并非属于“女人”的真理，而是揭穿所有围绕“女人”全称所建构起来的多重从属身份（黄兢涓，2001b:5）。我们对妇女参政的呼吁不能仅仅局限于比例和政策，或者提升妇女素质，而全国妇联更应该将性别因素和更广泛的因素联系在一起，与积极倡导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建立有力的论述联系在一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只满足于依法抗争和日常生活的抗争是不足够去改变产生性别歧视的制度问题和哪些产生歧视的论述。否则真的就变成阿 Q 精神自说自话了。

（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结合

将改善妇女参政的局面的希望，不能只寄托于全国妇联可以包揽一切，也不能期望用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来改变我们本土产生的妇女参政问题。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必须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本土的实践才是可能接近真实并有效服务于社会的途径。

自上而下，除了第一条建议之外，我认为全国妇联要推动的不单是政策，而是具体可操作性的政策。如学习印度和北欧等国家的经验，必须在各层面规定参政的比例。如人大候选人比例中女性不得少于40%，女人大代表中女人大代表比例不得少于30%，党政领导班子中女领导比例不得少于30%等，没有硬性的规定，或者达不到就不能批准组成班子或者人大代表会议就不能召开等强制性的措施等，具体的数字规定，一方面使得各级妇联在推动的过程中有目标也有依据，同时避免最低比例制在操作上变成“只有一个”的尴尬局面以及“无知少女”的出现。如果不创造自上而下的具体政策环境，各级妇联在推动妇女参政上就难上加难。

借力发力，一直以来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推动妇女参政的策略和方法。如74年借着批林批孔、90年代借着第四届世妇女大会推动政府出台《中国妇女发展纲要》，把推动妇女参政明确作为政府工作的基本内容等，全国各级妇联依旧可以借力发力、合理合法地推动妇女参政，这可能是今后一个重要的策略。因为国家依旧是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在理论上政府仍将妇女工作视为己任，这是合理合法抗争的有力条件。全国妇联的结构位置决定了她只能“依法维权/抗争”，而很难突破其结构位置的局限。很难突破不等于要被动等待，全国妇联可以借力发力，也可以创造机遇、创造力量，主动寻找参政中的难点和个案，利用舆论的力量展开讨论，或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政府人大和政协会议提交有分量的报告等，创造机会寻找促进问题讨论和改变的空间。

女领导干部分散在各个领导班子中、在各个班子中只有一位女领导干部的现实局面，使得她们淹没在男权的汪洋大海中，她们中的一些即便有为妇女参政的冲劲和干劲，一旦进入领导进到班子后，也很快在那个环境中被同化或者也不得不跟着走。同一单位的女领导干部都是利益相关者，很难产生女权主义倡导的政治认同和同盟。怎样让这些女领导部门产生并保持她们的寻求为妇女利益参政的社会性别敏感性，各级妇联可以在此创造工作的空间，如从80年代以来成立的各种女市长联谊会、女检察官联谊会、女记者联谊会等等，通过横向组织联合这些在各自岗位单打独斗的女领导干部，除了形成相互支持的网络，发挥姐妹联谊、工作经验交流、资源互通和建立良好的合作等功能性的作用之外，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开展女权主义意识启蒙和政治认同的工作。但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与组织者的意识有关，如果这些联谊会发挥上的功能，将是一个很好的形成政治

认同和联盟的机会，和一个强有力的对女领导干部的支持网络。

自下而上，指的是推动基层妇女以及民间组织积极的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参政活动。陕西妇女理论家庭研究会和陕西妇联合作，推动村级妇女参政取得了良好的显著的成果。河北迁西、内蒙赤峰等地妇联也积极推动村级妇女参加竞选村委。近些年来，国家实行村委自治，也给基层妇女参政开启了空间，基层妇女的参政议政能力也在逐步提高，NGO的兴起和草根妇女领袖的出现，她们正在用行动举起一面抗争主流政治的大旗，政治从国家和政党的层面扩展出去。基层妇女领袖的出现有助于整体妇女参政意识的提高，多元政治力量的崛起，有助于创造相互对话和协商的局面，也有助于提升整体妇女参政议政的状况，同时民间力量的产生，能真正锻炼出为自己利益争取权利行动力。

（四）多场域的抗争

多场域的抗争理论提示，既然是多场域抗争，那么我们就不应放弃任何一种抗争的形式。只要能够促进妇女参政目标和社会性别公正、公平目标的实现，我们就不能仅仅满足或者停留在日常生活的抗争上，因为它常常和小打小闹，阿Q精神很难区分，对个人有效却对整体的制度改变无力，体制制造的腐败和为妇女带来的系列问题依旧存在。也不能停留在“依法抗争”策略上，尽管很温和、也有效，但在关键时刻的冲击力不够，突破不了妇女参政的困局，所以才让我们走的路这样漫长和缓慢。现今的中国人被“争”和“斗”搞怕了，所以表面上大家谁也不“争”，因为你“争”就意味着你不“和”，中国人以“和”为贵，就不会培养在表面上的“争”的文化。中国人会“暗斗”，私下和你较劲，让你防不胜防。学会“明争”和“暗斗”结合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喜欢用福柯的理论分析问题，让你可以看到压迫在深层次是怎样进行的，但我喜欢用批判理论手法去改变问题，如果不对这个制度进行深刻的批判，对意识形态进行深刻的解析，就看不到她们如何为统治者所用却打出真理的旗号，以合理、公正面目出现。如果没有福柯理论，我们也看不到意识形态这样强大的、抽象的东西，它通过什么去塑造和规训人们的灵魂。我们知道了，我们就可以从日常生活的醒觉和意识提升开始，去揭示主导论述中的一些盲点和虚伪性，进而建立能够趋于实现性别公正的论述，达到变革和实现人的自由的目的。

重要的是，强调隐蔽语本的时候不应就此低估对主导论述的批判的作用。把自发的、即兴的、渐进而全隐蔽的反抗当作最有效的社会变革的说法与历史并不符合，否定有目的、有变革理念的集体性行动则更是民主社会改革所不能承受的高昂代价。斯考特的抵抗理论很容易在社会变革激进和保守的争论中站在保守一边，尤其是应当避免将隐蔽抵抗的“微观政治”与公众社会的“宏观政治”（如民主、人权）对立起来。尽管局部的求变要求和行为甚为重要，但将此作为变革唯一有效模式则是错误的。

隐性语本/或者日常生活的一些抗争固然有反抗的作用，但也不可低估它会对一些霸权的主导论述起到安全阀作用。隐蔽抵抗与非道德或犯罪行为间的灰色地带常常给统治集团很大的便利，他们可以借打击罪犯等一类的名义镇压政治异己，也可以从容化解和利用许多太极拳式的外线政治行为，它每年可以允许上诉，让媒体报道“民告官”胜诉的案例，他们完全不害怕这种行为的隐性语本抵抗作用。斯考特提出的隐蔽抵抗理论原本挑战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但它的展开让我们看到，结合这两种理论要比分离他们更有助于揭示社会弱者的生存处境，也更有助于理解它每年特殊抵抗的社会功效（徐贲，2002）

四、政治理想和现实的冲突

新中国的妇女，仅仅短短的几十年就能在有着两千年封建传统历史的中国，实现了妇女参政和必须参政的意识形态，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这个创举和历史让我们对解放充满了无尽的想象，并将“男女平等”作为理想。但在活生生的现实中，这条充满理想的道路是那么的艰辛和充满了冲突。

解放了的新中国妇女，将她们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下解放出来和男人一起主外，却没有动摇“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导致解放了的妇女担负着“家庭与工作”的“双重负担”的冲突；

把妇女们从家庭和男人哪里解放出来，却让妇女归属于国家这个父亲的角色；
让妇女担任领导干部，却让她们仍旧复制照顾者的角色，搁置在副职和权利的边缘；
提倡妇女要“四自”，而依旧将长相、身材、穿着作为提拔女干部的隐性条件；
致力于提高妇女的参政比例，却最后变成“只有一个”；
希望改变社会对妇女歧视的传统的思想，但将问题归因为妇女素质转而提高妇女素质；

.....

我们的政治理想总是和现实有着冲突

今后，无论我们有多么艰辛的道路要走，或者不得不重新从启蒙全社会包括妇女们的性别意识开始，但我们已经走上一条不归之路，我们有信心走下去，即便这条道路布满了荆棘，但我们知道在荆棘丛中开出的鲜花别样的美丽和壮观，只要我们对人性充满了关怀，我们就能够坚定信念。

我从妈妈和女领导干部们的叹息声入手进行研究，到本研究结束，我找了叹息的答案，也看到了医治叹息的希望，为了让更多解放了的妇女将叹息声转为一种改变的力量，我的研究值得。

我引用中国六家妇女NGO¹的领袖们，这些经历了风风雨雨、却矢志不渝地为妇女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家，二十年来用生命经验出来的一句话做为我将来行动的激励，尽管女权主义的政治理想和现实是那样的冲突，但我会带着“激情和梦想去行动”。

¹ 她们是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热线的王行娟、云南西双版纳妇女儿童法律中心的龙思海，北京大学妇女法律援助中心的郭建梅、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的谢丽华、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的梁军、陕西妇女婚姻家庭研究会的高小贤。她们都是九五世妇会后前后成长起来的中国最早的妇女 NGO 领袖，致力于妇女教育和发展、维护妇女权益的工作。在她们六家召开的经验交流会上她们总结出了这句名言。

后记

——为谁而书写

书写女领导干部们生命故事的念头从产生到完成，整整8年的时间，这是我的一个梦，我用5年时间终于圆了我的一个梦。从2000年第一次申请香港理工大学硕士课程的时候，我就打算写女领导干部们的故事，但导师告诉我，硕士层面我驾驭不了这样的选题。我似懂非懂，暂时放弃了念头，但我深知牵挂她们的心没有放下。当我有机会再次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这个题目，我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研究题目今后是否可以在国内发表、是否和我从事的社会工作的实务方向相吻合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我理解了导师说过硕士层面驾驭不了该论题的话，当我越是深入到研究中，就发现越需要广博的知识领域和深度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驾驭，看似写一些人的生命故事，但故事背后却带出了要和中国共产党60年来的发展与关于妇女的系列指导思想对话；中国的妇女解放理论要和国外的女权主义对话；需要和一切需要的理论对话。研究过程中，我很难做将理论和资料深刻对接，浑然一体……，我清楚地知道，对本研究中所提出问题的研究，该论文仅仅是个开始。

在我读书期间，大陆的社会工作专业进入突飞猛进发展时期，我的同学们的硕士和博士论文方向都紧紧地扣着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和自己的实务方向前行，而自认为在社会工作界混了很久的“前辈”的我，没有进到社会工作的研究的领域，却锲而不舍、痴迷地在研究女领导——这个强势人群。当我看到同学们、同事们、同行们纷纷成为因为不断的研究、发表而成为各个专业的专家，颇有成就，自己的内心也充满了挣扎，如果我转而研究一直浸泡的农村社会工作或者妇女社会工作的实务领域，研究和实务结合，研究和教学结合，岂不是一举几得？而我现在似乎研究和实务似乎两张皮，有限的精力却行走在两条道路上，辛苦！

更多的挣扎和辛苦是，兼职读书、全职工作。除了田野调查之外，我的写作和研究基本上回到香港才可以进行，。回到大陆，我的全部精力都要放在学校的社会工作教学、实务，以及我作为米苏尔基金会顾问身份看顾社会工作服务和农村发展领域的项目，如农民工、贫困地区农村的发展（甚至打井、修建学校、农药替代、混农林和生态农业）、智障人士的服务（各地慧灵、自闭症、轻度脑瘫）；培养大学生进入草根NGO组织，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和民间组织之间牵线搭桥；参与妇女NGO二十年经验反思的项目，……等我回到书桌前，我惊奇地发现这些对分散的、多领域的关注，并没有减低我对女领导干部的研究

热情，反而变成一种动力和激情更加投入到研究和写作中。在研究中，当我开始用批判理论、女性主义理论和福柯的权力与知识观去解读女领导干部们的生命故事时，该故事中所反映出的社会问题和她们遇到的挣扎和困惑与我在不同的领域所遇到的问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眼前第一代打工妹二十年来的辛酸打工史、流动人口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和城市里不断搬迁、边远山区的农村妇女、被遗弃和拐卖的女婴……，她们的生命影子时时出现在我阅读的书籍和笔下，将似乎不相关的领域连接起来相互激发和促进。全球化、中国改革和变迁中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政治腐败，人民的权利被践踏和蹂躏，城乡长期二元对立和分割带来的社会不公平问题，性别歧视文化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女性的生存和发展等等，一些人在享受改革的利益的同时，另一些人却分担着由此带来的残酷代价，她们的问题的根本成因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我奋笔疾书，不仅为中国妇女的参政问题更是为了中国更多的弱势群体们。难怪当我和福柯、格兰西、保罗·弗雷勒、贝尔·胡克斯等人的著作和思想相遇的时候，当我读到叙述治疗、女性主义书写、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我充满了兴奋和惊喜，因为他们早早地、淋漓尽致地在不同程度上解答了我的很多困惑和痛楚，我的研究和写作生涯少了别人所说的艰苦和单调，变得丰富和多彩，理论不再是死的空无一物的抽象词汇，而成了剖析现实活生生的武器雀跃在我的脑子里、从手下流淌出来出现在我的研究中，读书和写作不仅是变成了自我探索以及探索女人自由和解放之道的途径；变成了对边缘人群生命的深切关注；也变成了对我二十年经验的梳理。读书的这几年，我的生命用一个丰富都不足以涵盖和包括，艰辛的读书、多层面深入社会、将读书和实践的知识转化给课堂教学等，可谓是上帝赐给我的财富，让我可以有这样的机会感受生命、体验生命和享受生命。

读书的这几年家外家内风起云涌。家外希拉里竞选美国总统候选人，法国女外交部长未婚怀孕，家内遗憾吴仪在副总理的位置上退休；眼看着我访谈的女领导们退休、退居二线、从这个岗位上平级调动到另一个岗位上而永远姓“副”……，这些事件几乎都会影响我的思考和书写，更让我心里隐隐发痛至今无法愈合的伤疤是5·12四川汶川地震灾害发生后，我亲历、目睹并陪伴遇难学生家长走过的十几天的日子，我亲历了她们失去孩子的痛苦，和那些母亲为再生育的不确定行带来的身体和精神双重的压力，女性的身体和命运在不同的场域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读书期间，父亲被诊断患有癌症，并眼看着亲人永远离我而去，我只能将悲伤深深埋在心底；婆婆得了糖尿病综合症，拖着病怏怏的身子艰难地替我撑着家；儿子的老师不断召唤家长；每年挣学费和交学费的经济压力……。我深深体会到我的各种角色和我读书之间的拉扯，我也透彻地理解了我研究的女领导干部们她们作为一个女儿、妻子、母亲的角色和领导角色的拉扯，女人做点事真的不易！我个人也从90年代在主流中的巅峰状态逐渐走到一个边缘化的地步，这里有我因着思想滑入另类而自甘边缘的成分，也有被边缘化的因素。从中心到边缘才深深体验到边缘那种被孤立的滋味，从边缘重新审视中心，才清晰地看到在边缘和中心的位置都是权力技术操作的结果。

一遍遍阅读她们的生命故事，就一遍遍深刻察觉她们的活灵活现的主体性；也一遍遍净化和洗涤自己的生命，从中寻找生命的意义。我几乎就是用我的生命与理论和资料、在我自己和研究参与者之间进行对话，一个研究怎可做到客观、冷静、不动声色？！我写别人的故事，却写出了自己生命的力量！

我这5年的丰富生活是很多人的支持和帮助的结果。没有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系给我这个实务见长、理论短缺的大陆学生这样一个专门为我们设计的博士学位，我不会有5年的丰富；没有我的导师慧眼识我，也不会有这样的生命体验。我享受着理工大学世界级的资讯和学习条件；享受着为我们开课的如同朋友般可以切磋和讨论的老师带来的最前沿的学术思想以及做人做学问之道。

首先，要感谢的是参与本研究的女领导干部们，她们能够敞开心扉接受我的访谈，是因为她们期望该论文能够真的对妇女参政的研究起到一点作用，她们真的是用她们善良的心在帮助我完成博士论文，没有她们无私的和承担着风险的贡献，我怎么能够完成这些论文，我惟有回报的就是将此论文转化为武器，能够为研究界以及行动者提供一些新的思考和见解！

我要感谢导师丁慧芳博士。她也是我硕士导师。我能走到今天，是她给我信心和力量。从硕士到博士，一路走来，她的督导从学术到生活，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她的睿智、聪明，她清晰的思路，让我从一个不懂得如何研究的人，一步步迈入研究的殿堂，知道如何去做一个严谨的学问。手把手来教怎样写作，逐字逐句的修改，不应该是博士导师该做的事情，而丁老师面对我这样的学生做了。我更要感谢老师的学术风范和大度，给我学术空间，尊重我的思想和行动。我常常停下研究去做别的事情，我行我素，我能感受到老师担心的眼神和期望的目光，却从来没有半点的责备和埋怨。她总是跟随我的步伐，在我研究进入迷糊状态的时候清晰地将我拉回来。我很遗憾这些年我为老师做的太少，对导师也有很多的歉疚，希望论文的结束是师生合作的开始。

我要感谢陈锦华老师，给我在女性主义理论以及论文写作中细致的点拨，常常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奇妙感觉。他总是鼓励我说你和你的去年比，让我觉得每年我都在进步。

我要感谢古学斌老师，从硕士到博士，亦师亦友，给我很多学术上的指导和生活上的帮助；女性主义研究方法课程中姥姥故事的书写和三次做方法论课程的助教的经历，使我对质性研究方法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我要感谢理工大学的阮太，她对大陆社会工作执著、持久的热爱和推动深深地影响我，让我也以此为榜样去执著实践和实现扎根于弱势人群服务的理想。

我要感谢何国良老师，他利用他业余的时间和我一起读书，和他读书的日子深刻体会到“书不见得读很多，但要读得很精”的深刻哲理，一本书、一篇文章却开启了我对很多问题的深入思考；他看似古怪的教学方式影响了我开辟另类的教学课堂！

我要感谢曾乃明老师，听他的课真是一种享受，他的课程中已经将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和香港实践、理论融会贯通而变成他自己游刃有余的理论和实践，他很少用深而晦涩的理论来抽象地谈论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践，而是用音乐、诗歌、文学、身边不起眼的事情来旁征博引，让你深刻领悟到社会工作就是你身边的事情，理论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深邃。他是社工界的太极拳大师，他到了手中无剑、心中有剑的境界。

我要感谢的人、感谢的事太多、太多……

儿子——我的天使，从他两岁开始，我就断断续续的读书到现在，他从一个幼童到了一个和我能谈心的少年。很难想象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孩给能给我很大的理解和支持，每次打电话回去他总是说“妈妈，你就好好写你的乱文（论文）啊，不要想我，什么时候想我就什么时候打电话给我”。但我深知，孩子正是需要妈妈在身边的年龄，他想我的时候常常会闻我的衣服的味道而哭泣。儿子真的感谢你！

丈夫——一直默默地支持、给我广阔的空间和宽容。他是警察，工作很忙，但是从来没有因为此阻挠我去读书和工作；我这几年自己挣钱交学费，也很少顾及家庭，全靠他经济支持！

我的妈妈为了支持我，来到北京带孩子，水土不服和孤独寂寞，使得她每来一次都要带一种病回到老家，治疗好之后又来到北京。我内心的愧疚无语言表。谢谢妈妈！

在我妈妈身体十分不适而不能继续为我看孩子的时候，婆婆拖着病怏怏的身体来支撑我的家！婆婆说，我这把年纪也算为你的论文尽了点力！谢谢妈妈！

感谢中央党校的李惠英老师，她是中国研究妇女参政问题的专家，她利用她的优势让我接触到一些高级女领导干部，并在学术思想上给我很多的启发和建议；

感谢陕西省妇联的高小贤老师和高部长的牵线搭桥，没有你们的帮助我怎么完成我的田野，又怎么可能得到那么丰富和生动的故事，女领导能够信任我最关键是她信任你们！

感谢我的益友董欧老师，所有学校和家里的事情都由她沟通和负责；

感谢我的院长张李玺院长，她无私地贡献她在理工上学的经验以及她的博士大纲；感谢我的前系主任、现在的副院长刘梦博士，她们在我论文开题阶段给了颇多她们的建议，使得我这个刚刚走上探索之路的人受益颇多；也一并感谢我的系主任矫杨老师，这些年能够排开课程支持我到香港读书！我的同事张静、齐小玉老师、王中会老师，分担了很多我该做的事情！

我的学生、我的浸霖社区服务团队、我的朋友们，他们的鼓励和帮助一一浮现在眼前，对我来说在我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有这样一些人陪伴和鼓舞，这个世界有什么能和这些东西相比！

感谢学生陶书毅，在我论文的最后阶段，在校对和绘制表格上给我提供的帮助！

要感谢的人太多，要感谢的事太多，如果不写这个后记，不去整理这5年的历程，我

真的无法想象我的生命中这么多人齐心协力帮助我！感谢那些我在这里没有一一提到的人，我知道这个论文是用很多人的生命的力量积聚在我这里才得以完成的，功劳是大家的！

5年来，我从北京到香港、到香格里拉的藏族小村寨、青海的国家级贫困县——民和土族自治县、陕西智障学校，四川灾区……，从高度现代化的大都市到远离现代的并保存着原始的小山村，从雪域高原到四川盆地，我目睹了不同人的生命和生活，深深地悟到一个道理，人的生活可以及其简单，但人们的生活离不开亲情、友情、爱情，只有拥有这些情和爱才是生活的真谛。对我来说，我拥有的幸福不是这5年换来的学位，而是在读书的过程让我切切感受到这些人间情谊，我的生活是幸福的！

我只顾畅游于理论和实务的对接以及转化为行动的力量，却在研究中留下了空白。我只顾享受了这个过程，而延长的时间却加大了亲人们支持我的力度和难度。我甚至没有为导师做过什么，我做学问的过程堪称自私。但我所学到的知识，已经、正在变成行动的利器，将个人的享受转化给更多的行动力量去贡献我的知识，服务需要我的社群。也将变成我研究的动力，多做一些为了改变而产生的知识。

美国非裔黑人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新总统的时候，在他充满了人性和激情的演说词中很有力量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能”（we can），我也说“我能”（I can）。我能，这就是这5年的读书生活给我最大的奖赏，我能做完一个博士论文，我能开始将来的研究生活，我能将所有人的爱和支持转换为今后我去服务更多人的动力；我能用更多的精力去关心和珍惜身边的亲人。我能……

今天我父亲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日！我以此文表达对他的思念！

2010年6月4

北京朝阳区望京花园

参考文献

中文部分

- 艾晓明, 2002, 〈广告故事与性别——中外广告中的妇女形象〉, 《妇女研究论丛》, 第2期。
- 安德鲁·文森特, 2008, 《现代政治意识形态》(袁久红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 保罗·弗雷勒 (Paulo Freire), 2004, 《受压迫者教育学》(方永泉译), 台湾: 台湾巨流图书出版公司。
- 北京市妇联、北京妇女问题研究会, 1992, 《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十年》, 中国妇女出版社。
- 卜卫、刘伯红、陈新欣, 1997, 〈试析我国电视广告中的男女角色定型〉, 《妇女研究论丛》, 第2期。
- Catherine Kohler Riessman, 2003, 《叙说分析》(王勇智、邓明宇译), 台湾: 五图图书出版公司
- 陈炳辉, 2002, 〈福柯的权力观〉,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4期。
- 陈锦华, 《女权主义和公共政策》, 未发表。
- 陈锦华, 2006, 《性别与社会工作》,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 陈清侨, 1997, 〈离析“中国想象”: 试论文化现代性中主体的分裂构形〉, 载简瑛瑛编, 《认同、差异性、主体》, 台湾: 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 陈瑞生, 1995, 《女性领导干部成长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陈向明, 2000,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教育科学出版社。
- 陈学明, 2001,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
- 陈越, 2003, 《哲学与政治: 阿尔杜塞读本》,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 Denzin, N. K., 2004, 《解释互动论——个人经历的叙事、倾听与理解》(周勇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 大卫·怀特, 2003, 《故事、知识、权力》(叙事治疗的力量), 台湾: 台湾心灵工坊。
- 戴锦华, 2003, 〈大众文化中的阶级和社会性别〉, 载杜芳琴编, 《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 1987-2003》,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 丹尼·卡瓦拉罗, 2006, 《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 江苏: 江苏人民出版社。
- 丁娟, 2004, 〈妇女参政研究综述〉, 《1996-2000 中国妇女研究年鉴》。
- 杜芳琴等, 2003, 《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 1987——2003》, 天津人民出版社。
- 杜杰, 2000, 〈女性主义与社会性别分析〉, 《浙江学刊》, 第2期。
- 杜洁, 2002, 〈我国培养选拔女干部政策措施评估和社会性别分析〉, 《妇女研究论丛》, 第2期。

- 顾秀莲, 1988, <“在中国妇女参政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妇女研究论丛》2001 年 6 月。
- 顾秀莲, 2001, <有中国特色妇女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半个世纪的妇女发展》, 当代中国出版社。
- 郭砾, 2001, <试论各级领导班子的性别比例配置>,《妇女研究论丛》, 增刊。
- 郭于华, 2002, <“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读书》, 第 7 期。
- 顾雁翎等著, 2000,《女性主义理论和流派》, 台湾女书文化。
- 韩晓燕, 2004,《上海离婚单亲家庭青少年需要》,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
- 何明修, 2005,《社会运动概论》, 台湾三民书局。
- 何佩群, 1999, <朱迪斯·巴特勒后现代女性主义政治学理论初探>,《学术月刊》, 第 6 期。
- 何仕林, 曾义秀, 2001, <治权利女性角色紊乱症>,《领导科学》。
- 侯志明, 1991, <妇女参政理论研究状况及趋势>,《1981-1990 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十年》。
- 黄兢涓, 2001, <女性主义中“女性”迷思>,《性别、心理及文化——本土女性主义的展开》科技学术研讨会, 5 月 25-26 日。
- 黄启璪, 1997, <充分发挥妇女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人民日报》1997 年 09 月 29 日第 11 版。
- 黄瑞祺, 1986,《现代理论与现代社会学》, 台湾: 台湾巨流图书公司。
- J. Fiske, 2000, <英国文化研究与电视(上)>(汪民安译),《世界电影》, 第 4 期。
- Jude Howell, 2008, <中国妇女的政治参与: 为谁而选举?>,《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 第 1 期。
- 简瑛瑛主编, 1997,《认同·差异·主体性》, 台湾: 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 姜秀华, 2005, <对女性身体再造行为的文化评析>,《中国妇女研究十年(1995-2005)回应<北京行动纲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江泽民, 1998, <“解放思想事实求是自强不息艰苦奋斗 妇女能够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光荣业绩”的讲话>,《人民日报》1998 年 09 月 11 日第 1 版。
- 杰华(Jacka, Tamara), 2006,《都市里的农家女》, 江苏人民出版社。
- 金一虹, 2002, <从公众对妇女参政的认知看传媒对妇女参政的影响>,《妇女研究论丛》, 第 2 期。
- 金一虹, 2005, <妇联组织: 挑战与未来>,《中国妇女研究十年(1995-2005)回应<北京行动纲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Kathy Davis, 1997,《重塑女体——美容手术的两难》(张君玫译), 台湾: 巨流图书公司。
- 卡诺伊(Martin Carnoy), 1995, <国家与政治理论>(杜丽燕等译), 台湾: 桂冠图书出版

- 公司。
- 李惠英, 1995, 《当代中国政坛女杰》,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李惠英, 2005, 〈我国女性参政徘徊于权力结构的边缘——中国妇女参政十年评估〉, 未发表。
- 李惠英, 2005, 〈中国妇女参政十年回顾与评估〉, 《妇女研究论丛》, 第6期。
- 李静之, 2001, 〈试论党的领导、政府支持和妇女解放的关系〉, 《半个世纪的妇女发展》, 当代中国出版社。
- 李连江, 欧博文, 1997, 〈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 载吴国光编, 《九七效应》, 香港: 太平洋世纪研究所。
- 李小江, 1994, 《性别与中国》,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 李小江, 1995, 〈性别角色与社会发展笔谈〉, 《社会学研究》, 第1期。
- 李小江, 1997, 〈我们用什么话语思考女人——兼论谁制造话语并赋予它内涵〉, 《浙江学刊》(双月刊), 第4期。
- 李小江, 2000, 《女性? 主义》, 江苏: 江苏人民出版社。
- 李小江, 2000, 〈50年, 我们走到了那里? ——中国妇女解放与发展历程回顾〉, 《浙江学刊》, 第1期。
- 李小江, 2003, 〈妇女研究在中国〉, 载杜芳琴等主编, 《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1987-2003》,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 李小江, 2006, 〈关于‘女性/性别’的跨文化讨论〉, 《女人: 跨文化对话》, 江苏: 江苏人民出版社。
- 李小江、朱虹、董秀玉, 1994, 《性别与中国》, 北京: 新知三联书店。
- 梁旭光, 1993, 《女性领导论》,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梁旭光, 2000, 〈中国妇女参政问题、成因及对策〉, 《理论学刊》, 第1期。
- 梁旭光, 2001, 〈我国妇女参政的问题、成因及对策〉, 《半个世纪的妇女发展》, 当代中国出版社。
- 林春, 2003, 〈国家与市场对妇女的双重作用〉, 《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 1987—2003》,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 刘伯红, 2001, 〈中国女市长调查〉, 《妇女研究论丛》, 6月, 增刊。
- 刘东发, 2003, 〈浅析社会性别意识观与男女平等〉, 《中华女子学报》, 第6期。
- 刘宁, 1998, 〈妇女权力: 转型时期的主体回归于社会现实〉,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第三期。
- 罗斯玛丽·帕特南·童, 2002, 《女性主义思潮》(艾晓明等译),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陆伟芳, 2004, 《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马尔库塞, 1988, 《单面人》, 湖南人民出版社。

- Martin Carnoy, 2002, 《国家与政治理论》(杜丽燕、李少军译), 台湾: 台湾桂冠图书出版社。
- 玛格丽特·吴, 1994, 〈中国女工的保护与平等〉, 《性别与中国》, 三联出版社。
- 孟繁华, 2004, 〈传媒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 《文化研究: 理论与实践》, 河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米歇尔·福柯, 2003, 《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 北京: 三联出版社。
- 米歇尔·克罗齐埃, 2002, 《科层现象》(刘汉全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欧阳洁, 2001, 〈女性当政者为什么要掩饰自己的性别——女性主义批判的又一个追问角度〉, 《新东方》, 第 10 卷, 第 4 期。
- Patricia Ticineto Clough, 1997, 《女性主义思想——欲望、权力及学术论述》(夏传位译), 台湾: 巨流图书出版公司。
- 乔治·瑞泽尔, 2003, 《后现代社会理论》, 谢立中等译, 华夏出版社。
- 潘毅, 2007, 《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任焰译), 明报出版社。
- 彭进清, 2006, 〈论教育育人的主体性发展〉,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第 5 卷, 第 3 期。
- 彭佩云, 2001, 〈进一步提高认识, 积极推进培养选拔女干部工作〉, 《妇女研究论丛》, 增刊。
- 乔玉琼, 1995, 〈走出女性领导的心理误区〉,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1 期。
-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1997, 《中国妇女研究年鉴 1991——1995》, 中国妇女出版社。
- 全国妇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题组, 2004,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男女平等理论研讨会”观点综述〉, 《妇女研究论丛》, 1 月刊。
- 荣维毅, 2003, 〈关于参政妇女需求的研究报告〉, 载杜芳琴等主编, 《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1987-2003》,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 阮新邦, 1998, 《婚姻、性别与性——一个当代中国农村的考察》, 香港: 香港八方文化企业公司。
- 山东省委组织部、山东妇联, 2003, 〈女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报告〉, 载杜芳琴等主编, 《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1987-2003》,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 社会性别意识资源小组, 2000, 《社会性别分析框架》, 乐施会。
- 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Best & Kellner), 2001, 《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 宋剑, 2008, 〈意识形态与人的主体性建构〉, 《湖北社会科学》, 第 2 期。
- 孙小迎, 2000, 〈论男权社会樊篱中的妇女参政〉,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2 期。

- 谭琳、丁娟, 200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探索》, 中国妇女出版社。
- 谭深, 1994, 〈当代中国职业妇女: 由政府安置工作或进入市场〉, 《性别与中国》, 三联出版社。
- 陶春芳等, 1993, 《妇女参政导论》, 红旗出版社。
- 童吉渝、杨琼瑛, 2001, 〈妇女参政与发展——对培养选拔女干部政策执行的分析〉, 《半个世纪的妇女发展》, 当代中国出版社。
- 王金玲, 2001, 〈后现代主义: 中国大陆女性主义面临挑战和颠覆〉, 《浙江学刊》, 第 1 期。
- 王丽华, 2000, 〈社会性别意识在 20 世纪的变迁与回归〉, 《浙江学刊》, 第 5 期。
- 王行娟, 1995, 《中国妇女参政的行动》, 海豚出版社。
- 王小波, 2001, 〈再论女性意识与妇女解放〉,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第一期。
- 王小波, 2005, 〈试析我国女性群体的分化与分层〉, 《中华女子学报》, 第 17 卷, 第 5 期。
- 王政, 2003, 〈浅议社会性别学在中国的发展〉, 载杜芳琴等主编, 《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1987-2003》,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 韦钰, 1995, 《中国妇女教育》, 浙江教育出版社。
- 翁开诚, 2002, 《主体性的探究与实践》, 五南出版社。
- 翁开诚, 2002, 〈觉解我的治疗理论与实践〉, 《应用心理研究》, 第 16 期。
- 吴小英, 2003, 〈“当知识遭遇性别”——女性主义方法论之争〉, 《社会科学研究》, 第 1 期。
- 夏国美, 1998, 〈论女性主义和中国女性的自我意识〉,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第三期。
- 夏晓娟, 2002, 《游离寻岸》, 台湾: 台湾社会研究业刊。
- 肖小穗, 2002, 〈意识形态: 权力关系的再现系统〉, 《文化研究》, 年第 3 辑,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徐改, 2005, 〈女性与领导——西方职业女性研究简述〉,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第 2 期。
- 徐慧敏, 2003, 〈注重妇女政治参与的广泛性是提高妇女政治地位的重要问题〉, 载蒋永平编, 《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 当代中国出版社。
- 徐贲, 2002, 〈弱者的抵抗——詹姆斯·斯考特的弱者抵抗理论〉, 《文化研究》, 第三辑,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徐伟新, 1997, 〈妇女参政研究综述〉, 《1991-1995 中国妇女研究年鉴》。
- 许悦, 2008, 〈中外妇女参政比例比较及其思考〉, 《哈尔滨学院学报》, 第 29 卷, 第 1 期。
- 杨静, 2003, 硕士论文, “女性家庭工作者性别观念对家庭服务的影响”。
- 杨银乔, 2004, 〈论当前我国妇女参政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

- 月刊),第2期。
- 杨银乔,2004,〈论妇女参政和男女平等〉,《江淮论坛》,第4期。
- 叶边,2000,〈是女干部就该早退休?〉,《领导文萃》,12月刊。
- 应星,2001,《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三联书店。
- 于建嵘,2003,〈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湖南H县调查〉,《战略与管理》,第3期。
- 俞吾金,1993,《意识形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俞吾金,1995,〈从抽象认识论道意识形态批判〉,《天津社会科学》,第5期。
- 翟学伟,2001,《中国人的行动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詹栋梁,1988,《社会教育理论》,台湾:师大书苑出版。
- 詹栋梁,1991,《各国社会教育运动》,台湾:师大书苑出版。
- 詹姆斯R. 汤森等,2004,《中国政治》(顾速等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
- 詹姆斯·科尔曼,1992,《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詹姆斯·斯科特,2001,《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抗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
- 张广利,2003,〈重构女性主体性:一种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张京媛,1992,《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张李玺,2001,〈定性研究:中国妇女研究步入深层的一个科学范式〉,《半个世纪的妇女发展》,当代中国出版社。
- 张李玺,2002,〈社会性别与家庭责任〉,载李惠英编,《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当代中国出版社。
- 张李玺,2006,《角色期望的错位——婚姻冲突与两性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张迎红,2003,〈最低比例制对妇女参政的影响〉,《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第6期。
- 张永英,2001,〈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关于妇女参政的理论认识与实践经验〉,《妇女研究论丛》,增刊。
- 张永英,2005,〈国外有关妇女参政比例的规定及争论研究〉,《妇女研究论丛》,增刊。
- 赵小华,2004,〈女性主体性: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一种新解读〉,《妇女研究论丛》,第4期。
- 郑世仁,2000,《教育社会学导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 郑新蓉,2000,〈理论篇〉,《妇女教育》,吉林教育出版社。
- 郑新蓉等,2001,《社会性别与妇女发展》,陕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 钟雪萍,2003,〈“女人味大观”——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中的“女性话语”〉,《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1987-2003》,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周嘉辰, 2003, 《女人与政治》, 台湾: 扬智出版社。
- 邹平学, 金志林, 1988, 〈论我国的差额选举制〉, 《湖南法学研究》, 第2期。
- 周松梅, 2005, 〈新型妇女干部“四要素”〉, 《中国妇女报》, 4月13日。
- 祖德·豪厄尔(Jude Howell), 2008, 〈中国妇女的政治参与: 为谁而选举〉(师风莲编译),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

英文部分

- Adler, N. J., Izraeli, D. N. (1998). Women in Management Worldwide. Armonk, N. Y. : M. E. Sharpe, Inc.
- Agger. (1991). Critical Theory, Poststructuralism, Postmodernism: Their sociological relevanc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7, 105-131.
- Bernard Carl Rosen. Women, Work and Achievement.
- Blecher, Marc. (2002). Hegemony and Workers' Politics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No. 170, 283-303.
- Burawoy. M. (1998). The Extended Method. Sociological Theory.
- Butler, J. (1988).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 Caren Healy. (2005). Social Work Theories in Context. PALGAVE MACMILLAN.
- Clifford, J., & Marcus, G. E. (Eds).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ronon, W. (1992). A place for stories: Nature, history, and narrativ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8(4), 1347-1376.
- Elisabeth Croll. (1980). 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 New York : Schocken Books.
- Elisabeth Croll. (1981). The politics of marria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lisabeth Croll. (1983). Chinese women since Mao. New York : Zed Books.
- Elisabeth Croll. (1994). From heaven to earth : images and experiences of development in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 Elisabeth Croll. (1974). The Women's Movement In China. Angol-Chinese Educational Institute Modern China Series. No. 6.

-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Panteon Books.
- Frank, Arthur W. (1991). *For a Sociology of the Body: An Analytical Review*.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36-102.
- Gergen, K. J. (1985). The social constructionist movement in modern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y*, 40 (3), 266-275.
- Greer, Germaine (1971). *The Female Eunuch*. New York: Bantarm Books.
- Heller, T. (1982). *Women and Men As Leader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 Henry, D. Delcore. (2004). *Development and The Life History Of A Thai Farmer Leader*. Ethnology.
- Harriet Evans. (1997). *Women and Sexuality in China*. Oxford: Polity Press.
- Jacqueling V. Lerner. (1994). *Working Women and Their Families*. Sage Publication.
- Jaggar, Alison. (1983). *Feminist Politics and Epistemology*. *Feminist Politicals and Human Nature*. 353-394.
- Jaggar, A. M., Young, I. M. (1998). *A Comparision to Feminist Philosophy*. Blasckwell Publishers.
- James C. Scott.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 James C. Scott. (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Yale University Press.
- Jan Fook. (1999). *Transforming social Work Practice*. KHL, Singapore.
- Jude Howell. (2002). *Women' 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Struggling to hold up half the sky*. *Parliamentary Affairs*, 43-56.
- Judith Stacey. (1983).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ay Ann Johnson. (1983). *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Kuhn, T.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ther, Patricia Ann. (1991). *Research as Praxis*. Routledge.
- Lee, Ching Kwan. (1995). *Engendering the World of Labor: Women Workers, Labor Markets and Production Politics in the South China Economic Miracl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378-397.
-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Beverly Hills, CA: Sage.

- Lincoln, Yvonna, S., Guba, Egon, G. (2000). *Paradigmatic Controversies, Contradictions, and Emerging Confluence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 Sage.
- Liu, Alan. (1996). *Mass Politics in the People' s Republic*. Boulder, Co: Westview.
- Margery Wolf. (1985). *Revolution Postponed: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rk Poster. (1984). *Foucault, Marxism and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Matthew, C. Gutman. (1993). *Ritual of Resistance: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74-92.
- Matthew C. Gutman. (1993). *Ritual of Resistance: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74-92.
- Michael Burawoy. (1998).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in Sociological Theory*.
- Mishler, E. G. (1990). *Validation in inquiry-guided research: The role of exemplars in Narrative Studie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60(4), 415-442.
- Patricia Voydanoff. (1984). *Work & Family, Changing Roles of Men and Women*. 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 Perry, Elizabeth. (2002). *Challeng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Social Protest and State Power in China*.
- Perry. (1989). *The Political Econom of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 Phyllis Andors. (1983). *The 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 1949-1980*. Bloomington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Polletta, Francesca and James M. Jasper (2001), "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Social Move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7:283-305.
- Reissman, Catherine Koher. (1993). *Narrative Analysis*.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 Robert Atkinson. (1998). *The Life Story Interview*. Sage Publications.
- S. Irene Matz. (2001). *Women Leaders Their Styles, Confidence, and Influences*.
- Scott, James C.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A. M. (1998). *Laclau and Mouffee: The Radical Democratic Imaginary*. London: Routledge.
- Laclau, Mouffee. (1998). *The Radical Democratic Imaginary*. Smith, A. M. London: Routledge.
- Teun, A. (1993).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Discourse & Society*.

vol. 4, 249-283.

Tong, Rosemarie. (1992). *Feminist Thought: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Tong, Rosemarie. (1998). *Feminist Thought: A More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Westview Press.

Valerie Bryson. (2003). *Feminist Political Theory-An Introduction*. PALGRAVE MACMILLAN.

Wang Qi. (1999). *Women of China: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Jackie West.

Wang Yi. (2008). *Women' 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KAS-Schriftenreihe China.

Young, Iris Marion. (1990).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Young, Iris Marion. (1990). *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 in Feminist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附件一：女领导干部们画像

这里，我重点采访过的女领导进行一个故事概要。因为研究报告中的故事都是琐碎的和片断，而这里我希望用很少的笔墨给她们一个画像，让读者可以全面一点看到该领导的样貌，以增加对本研究的认识。

1、淑华——朴实、沉默寡言、有韧劲、吃苦的农民的女儿

淑华是我做论文开始采访的第一个女领导，从88年我们相识至今20年了。这些年我们各自忙碌，如果不是论文写作的目的，我们不知道何时才能再次相聚，也不可能像这次一样我有5天的时间住在她的家里，也不能完整地听她的经历。当然，如果不是她因腿关节疼痛不能走路在家休息，她也不会有这么完整的时间给我。或许是她即将离职带来的轻松、或许到了该回忆的年龄，更可能是为了帮助我这个小老朋友完成论文，总之，她坦诚地和我讲述了她从小到大的生命故事。

1945年，淑华出生于华北平原一个贫困的农家，她是老大，随后妹妹弟弟们相继出世，作为老大的她很小就担负起父母的部分责任，看护弟妹、割草、料理家务。到了上学的年龄，开明的父母让她去读书，但要带着弟弟妹妹，要拾草，只能在课堂外竖起耳朵学习。到了四年级，学校离家远了，不能带着弟妹，但家务活一点也不能少，起早贪黑和来回奔跑12里地上学有成为她求学道路上的第二道风景线。贫困的家庭环境几次交不起学费，要迫使她退学，她睡在地下几天不吃不喝，抗过一次，胜利了，去上了初中。到了高中实在需要她这个劳力，她坐在村子的水塘边三天三夜不回家，这次不得不屈服于家境的贫困和对父母的疼爱，她成为公社的社员去挣工分，替父母承担家庭的责任。她带着改变自己命运和家庭命运的责任和使命放弃了读书，但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不放弃对知识的学习成为她一辈子的追求。

踏实、肯干、任劳任怨、热心为大家干事情，这些特质似乎从她出生就造就了，也使得她走到哪里都受到大家的喜爱，因此各种积极分子、劳动模范的荣誉也陪伴着她。她小，但挣得工分和大人一样多，很快成为家里的重要经济支撑之一。也因为她的能干和肯干，6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64年被抽调去搞“四清”。那个时候能够从基层抽调去搞“四清”的人一定是政治上过硬、思想上信的过的人。在工作组里，他第一次和全国来的一些知识分子打交道，她说这些人的学识给她很大的启发，开阔了视野。由于她虚心向大家学习、工作出色，一年后就很快成为工作组的组长，给她很大的担子，据她说也非常锻炼人，因为第一次一个农民领导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四清”工作结束后，作为借调干部，当公社当团委书记和妇联主任，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她说弄不清楚在干什么，索性那派也不参加。到了68年被推举为县革委常委，任命为公社书记，这是第一次正式任

命。72 年被调到县里工作。那些时候干部就是下乡，成年累月在下面呆着，打井、催公粮什么活都干。那个时候女的能当干部的是少数，她说从来不想自己是女的，特别泼辣，和男人一样跳下去打井，上台就能讲话。24 岁经亲戚介绍认识了一个当连长的大兵，两个人见面之后彼此感觉不错就很快结婚了。两个孩子从怀孕到生产都是一个艰难历程，缺乏照顾和营养，那个时候一般人都这样，更何况她是干部，都是出了满月子之后把老大交给奶奶、老二交给姥姥带，革命工作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一心为公。

她的仕途在 80 年代之前可谓一帆风顺，在 1974 年的时候，破格提拔为县委常委，担任组织部部长。这是那个年代他最荣耀的经历。一路上带着自己特有的对长辈的尊敬、虚心和肯干、吃苦，走到哪里都能很快胜任工作，而且很快就走在别人前面。直到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审查文革时候突击入党和突击提干的干部，她被误认为“双突”而把职务一降到底，雪上加霜的是父亲重病不起，她承受着失去组织信任的打击、失去亲人的打击，而这个时候给她最大安慰的是丈夫的一句话“哪儿不要你，这个家要你，我要你”。带着家人的温暖她又开始了从最基层干起的历程。不过组织在经过考察之后很快给她做了调整。从 82 年开始，她就开始一步步提升，从县妇联主任到市商业局副局长，到地区团委书记，期间担任地区妇联主任的时间比较长，从妇联到劳动人事局副局长、局长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可谓步步高升，以她的资历及能力她可以走的更高，然而世风日下，能否升官关系比能力更重要，她有很多的抱负没有施展，因为官场已经不是一个可以作为的官场，遗憾在她的副职位置上而退。对她来说，80 年代之后她的大家的负担越来越重，父母去世之后，她作为长女就成为那个大家的主心骨，所有兄弟姐妹们的婚姻、工作、她们的孩子们的上学、工作都成为她鞍前马后要管的事情。但家里的事情什么时候算完啊，没安顿的也就顾不上了，带着对官场深深的失望，对国家有深深的担忧，她退休了，她说这辈子她对得起党和组织的培养！对得起人民的信任！对得起父母和兄弟姐妹，丈夫和孩子们，最后她要做的就是对得起自己！

从政履历	行政级别
县“四清”工作组长、队长、指导员	
县革委会委员、某公社革委会副主任	
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委员、某公社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委员、县政治部副主任、县委办公室主任	副处级
某地县委常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其间：带职任某县某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主任）	副厅级

某地区地委常委兼地革委文办主任、党组书记	
被免职为某县某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主任	
县商业局副局长	正科级
县妇联主任，县委常委	副处级
地区团委书记	正处级
地区妇联主任	正处级
地区劳动人事局副局长	副处级职务、正处级待遇
地区劳动人事局局长	正处级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副厅级

2、秋菊——一身正气

春梅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早在我打算采访她之前我已经听到过她的点滴故事。她传奇般的经历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人们言谈之中对她充满了敬佩。在我采访的女领导中，很少有干部能够得到人们这样的推崇。因此我对她采访她充满了期待，也带有一些紧张。期待是因为可以面对这样一个传奇式的人物。紧张是因为她已经在很高的领导干部的位置上，鉴于之前的经验，很多的女领导对我的采访都带着一种领导干部特有的高傲和谨慎。然而正如大家所说，春梅却给我一种特别的亲和力，不仅来自她朴实的外表，更是与人见面时的无拘无束感和你看到她 真诚的眼神、语气和爽朗的笑声给人打开和她能够亲近的空间，快人快语的性格使得我很快打消了之前的顾虑，增加了我访问的信心。当然，她传奇般的经历深深地吸引我，在整个听故事的过程中，我被感动得流了几次泪。

她从小就表现出很强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和母亲抗争学习文化，让姐妹她们帮助她防线，她在边上看书。她的传奇首先是在文革期间，从红卫兵的手下私下抢救了被判死刑的书记。别的公社放下田里的庄稼去开批斗会，她领着自己村的群众抢收粮食。结果被红卫兵打得半死，又被愤怒的群众硬是从鞭下抢了出了。也因此坚定了为老百姓做事的信心。她从来都是不畏上的人，走到哪里都是站在正义的一边为老百姓做事，即便多次冒犯了领导而被免职或者压着五年内没有动静，她也不放弃自己坚持的东西。最感人的事情是拉她去陪选，结果代表硬是要选她，否则这个会就开不下去，她不得不亲自登台相劝代表们不要选她。在省里来的审查领导干部工作组面前，别人吓得不敢说话，她敢保那个审查的干部。她的正气和敢说敢言的经历，在我所有的干部故事中犹如一股清晰的空气让人舒服和畅快。

从政履历	行政级别
大队书记兼生产队长	
县委委员	副处级
革委会副主任	副处级
县委常委，组织部常委 兼镇党委书记、乡长	正处级
机关党委副书记（降职）	副科级
副县长	副处级
县长	正处级
常务副市长	正处级
省统计局副局长	副厅级

3、凤楠——可爱、帅气、热心、有思想、有远见

性格开朗、平易近人、思想犀利、想问题周到、有远见、开明、不经意中将各种关系和人际处理得滴水不漏，这就是我给她的评价。在佩服之下我和她说过很多次，你就是当个区长都屈才了。

然而当我们俩坐下来谈到她的生命故事以及参政中的酸甜苦辣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副处 10 年、正处 13 年的她为什么没有提拔，就因为她的直率和坦诚，得罪了主要领导人。而她说，这辈子改不了，爹妈给的，从小党教育的、学习英雄模范长大的，这会儿改，晚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也快结束了，说这话带着满腹的无奈。

凤楠 1956 年出生在大城市边上的农村，靠着父亲在铁路工作，家里吃公粮，所以上学不算困难，尽管上面有姐姐，而她更像老大，从小帮妈妈干活，拿主意，成为妈妈的主心骨，到了学校也是一路上当干部，用她的话说都是一把手。不仅学习好，助人为乐，也常常成为老师的主心骨，代理办主任的角色，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喜欢。从小就爱干打抱不平的事情，为此在学校失去了成为党员的机会，插队的时候也为了主持正义为女知青争得荣誉，在教育思想懒惰的女知青的时候打起来，又把刚要到手的当票打飞了。后来为了保护谈恋爱的女知青得罪了团支部书记，把入党的事情又搁下了。她那么优秀而入党问题则一直拖到知青返城后到妇联工作才解决。那个时候时兴上电大，以适应国家开始的现代化建设，凤楠上了电大，歪打正着，83 年在提倡干部“四化”的时候，她正好沾了年轻化和知识化，破格提拔为区妇联副主任。玩命地工作、拼命地干活，这就是她的风格，小的时候学雷锋烙下了闭经毛病，当知青主持正义的犯过，这次为了筹备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又犯了，因为紧张和压力。这一路上她说她就像一个螺丝钉，真的是当哪里需要就把她码那，什么都交给党了。她当过后备干部，什么荣誉都得到过，就是转来转去升不上去。而眼看着没有能力、浮夸的人很快提升，她怎么也想不通。

唯独说道自己的家人和孩子，她的脸上充满了幸福的微笑。她说百字孝为先，她也这么做的，也这么教育儿子，对双方老人她尽职尽责，给儿子作出了榜样。对丈夫也体贴入微，对兄弟姐妹、同学朋友都是热心相助，就连我这个在工作和合作中认识和一个朋友，她也鼎力相助，接受我的访谈很大程度上是看着我年纪大了仍旧在读书而感动相助，开着蓝鸟的车从城市西南跑到东北来接受我的访谈。

从政履历	行政级别
区妇联副主任	副处级
街道办事处主任	副处级
区妇联主席	正处级
区政协秘书长	正处级

4、李华——活泼、幽默、思想深邃、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

李华家庭是军人出生，自己也是当兵出身。在部队的大熔炉了，那个没有男女区分的时代，练就了她敢说敢干，不会顾及什么风格和性格。转业到中央一家妇女杂志社，从男儿国一下子掉入女儿国，有很大的不适应。好在风风火火的记者生涯多少弥补坐在机关的不适。从来没有男人女人概念的她，经常去采访关于妇女的新闻，对她来说可谓新鲜。正是带着这种的新鲜才让她在日后掀起了一场富有历史意义的辩论，来讨论宣传的那些妇女典型和榜样到底在宣传“封建愚昧还是精神文明”？也开始了她的性别意识启蒙，从此踏上了一条为妇女争取权益的道路。走上了一条在体制内去做体制外的事情，创办为农村妇女的杂志等等，并成为著名的妇女 NGO 领导人。正因为自己在副职的位置上无法进行决策，因此对副职和妇女参政有很多的切身体会，她认为要想整体提高中国妇女的参政水平，非得从推动基层妇女参政入手不可。

从政履历	行政级别
李华，某杂志社副总编辑，	副厅级
某妇女 NGO 组织董事长	

5、南小芬——男中的豪杰、女中丈夫

这样形容她一点都不为过，她的冲劲和胆识、能量足够用这样的词来形容她。1938 年她出生在北方一个贫困的山村，加紧贫苦，从小被送到亲戚家，老两口就这么一个孩子，尽管家里很穷，需要劳动力，但执不过南小芬的硬，同意她去念书。从小她看到自己的继父总是欺负继母就很生气，暗自下决心决不让自己被别人欺负。上了学之后她就争强好胜，各方面在班上争第一，加上聪明好学，她的学习成绩很好，一路上都是同学的榜样。有一次看到村在里选妇女主任，一个男人趾高气扬地说你们那个女的行，不行我才当妇联主任的，她气得默默下决心一定不让男的瞧不起、比下去。这股劲一直带着她成为一个工

作上、事业上、生活上很要强的人。她走到哪里工作都是和男人一样地干，甚至总要干的比别人好。当时她是唯一被保送大学的农村女孩子，上大学的时候就被因为出色和优秀而被评为各种的模范。但表面坚强的她其实内心很需要爱的关怀，她生孩子的时候，赶上唐山地震，抱着未满月的孩子东奔西藏，丈夫在外地根本不能照顾她们，两个孩子基本上都是她带大的，白天工作，晚上缝缝补补，不让人家觉得自己孩子比别人差了什么，辛苦可想而知，但她说哭干了眼泪不知道滋味了。文革期间被造反派夺权批判、遭受毒打，劳动改造得了一身病，现在关节痛得病就是那时候烙的根。参政历程几起几落，更加锤炼了她的坚强。她说到这些经历的时候，表情相当平静，能看出她抵抗压力的对待磨难的能力。因为她是大学生，那个年代很稀缺，所以她任职的岗位基本上都是学校、党校、国家教委，而命运也开玩笑，她一定要给女孩子争气的想法最后让她从事了妇女教育，一直到她退休为止。

从政履历	行政级别
某公社书记	
市委党校校长	科级
某市委办公室主任	副处级
某中学校长	科级
某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	正处级
国家某部副书记	副厅级
某高校党委书记	正厅级

6、新梅——谨慎、自信

新梅，给人的第一印象穿着时髦且得体，属于很会打扮自己的那种人。语气低沉，表情凝重，不苟言笑，开始谈话的时候你就能觉出她出言谨慎，每一句话似乎都是想好后才说的。贯穿始终的谈话中，总是有“喜欢、满意、认可”等字眼出现，可见这是她比较看重的东西。

她出生在祖国的西北边陲，父亲是军人，参加完解放哪里的工作就留在当地工作，属于比较高级的官员。她自己说她有着西北人的豪放，小的时候学习非常好，很活跃，同学老师很喜欢她。赶上文革，家庭受到冲击，上小学的时候自己就跟着经历了磨难。下乡当知青，别人都返城了，只剩下了她，也因为父亲的缘故，农场艰苦的生活条件她至今难忘。那时候的她渴望被大家和组织认可，到后来她加入了共青团就觉得自己政治上有前途了。知青期间被推荐去当地的农校，她觉得这是个机会就刻苦学习，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后来她们一家子都调到内地，她也回来了，先到妇联工作，工作十年之后被提拔为妇联主任，送到党校学习之后，去镇上担任副镇长。从她的参政履历来看，她多数担任的职务都是政府部门的职位，根据她的描述都是主管交通、公安、房地产、司法等等。所以

她认为她应该在政府部门工作更合适，但没想到最后提拔到厅级干部的时候，她又来到了妇联。尽管她走到哪里就能得到大家的认同，工作开展的非常出色，但最终她的岗位和职务是由她的性别决定的，而不是依据她的能力。

从政履历	行政级别
妇联主任	正科级
镇副镇长	正科级
镇长、镇党委书记	副处级
副市长（县级市）	副处级
县委书记	正处级
省妇联副主席	副厅级

7、马海——谨慎、自信、干练、知识分子型的干部

经熟人介绍我认识了马海，一个在财政部门当副厅长很多年的干部，却提拔到了妇联的岗位，用她自己的描述，这些年她就是学这个，干这个的，很有经验，却提拔到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不来都不行，因为要挪地方留给别人，而自己也美其名曰从副厅级到了厅级干部提拔了，但这个提拔部提拔更难受。自己的父母也是支援边疆的干部，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上了财经大学之后，就一直在经济口上工作，属于业务性的领导。

8、荣爱——深沉的、有爱心的、没有丝毫架子的人

1951 年出生于中州一个普通的农村，父亲在城市里当中学教师，所以她早早就上了学，学习成绩很好。12 岁那年，父母离婚了，母亲带着她离开父亲，改嫁到农村，可是继父对她和母亲十分不好，村子里的人也欺负她，亲戚们也瞧不起她，她很受压抑和打击，变得沉默寡言。她争气考上高中，高中被一个县里的篮球队招走，后来因为篮球打得不错，从那个篮球队就分到一个工厂工作。把户口从农村转了出来，逃离了那个家庭。后来拼命地干活，就想留住这个工作别丢了，这是唯一的出路。因为我工作出色，当时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我被体育大学招去了。

毕业后不愿回到那个只留给她伤心的家乡去工作，可命运偏偏叫你去了哪里，分到一个学校教书，走上参政的道路也因为 83 年的干部“四化”政策，使得她从一名普通的老师走上了领导岗位，直接任命为妇联副主任。她自己的经历使得她对女干部的成长格外上心和提拔，差不多她所在的地区的被提拔的女干部都由她推荐的功劳。

从政履历	行政级别
市妇联副主任（县级市）	副处级
市妇联主任	正处级

市旅游局副局长	正处级
---------	-----

9、清新——一身正气

清新是某市人大代表。教师职业，曾担任过区人大代表。

作为人大代表，她手里拿着的就是宪法，走到哪里都用宪法说话，因此也主持了不少正义，深受选民的爱戴；也得罪了不少官员，她是名人的后代，因此也多少是她的政治资本，她自己也说，靠着父母能多给老百姓做事，我愿意借他们的名字。从上面的女领导干部哪里我知道从政的艰难，从她的这里我知道了参政的艰难。

附件二：中国行政级别列表

列表 1：中国行政级别¹

中国公务员的行政级别按《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1993 年 8 月 14 日国务院颁布）规定分为十五级，下面就是引用的第三章 职位分类

第八条 国家行政机关实行职位分类制度。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在确定职能、机构、编制的基础上，进行职位设置；制定职位说明书，确定每个职位的职责和任职资格条件，作为国家公务员的录用、考核、培训、晋升等的依据。国家行政机关根据职位分类，设置国家公务员的职务和等级序列。

第九条 国家公务员的职务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非领导职务是指办事员、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助理调研员、调研员、助理巡视员、巡视员。

第十条 国家公务员的级别分为十五级。

职务与级别的对应关系是：

- （一）国务院总理：一级；
- （二）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二至三级；
- （三）部级正职，省级正职：三至四级；
- （四）部级副职，省级副职：四至五级；
- （五）司级正职，厅级正职，巡视员：五至七级；
- （六）司级副职，厅级副职，助理巡视员：六至八级；
- （七）处级正职，县级正职，调研员：七至十级；
- （八）处级副职，县级副职，助理调研员：八至十一级；
- （九）科级正职，乡级正职，主任科员：九至十二级；
- （十）科级副职，乡级副职，副主任科员：九至十三级；
- （十一）科员：九至十四级；
- （十二）办事员：十至十五级。

¹资料来源：<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7141897.html>

表格 2：我国行政级别之分¹

国 家 级 正 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国家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 家 级 副 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纪委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	
省 部 级 正 职：	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下属部委行署室和事业 单位（党组）正职领导人（特殊规定的副职） 各人民团体（党组）正职 如全国妇联主席 书记处书记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人大、政府、 政协的正职领导人（特殊规定的副职）， 国家正部级企业正职领导。	正部级
省 部 级 副 职：	中共中央纪委常委，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下属部委行署室和事业 单位副职领导人（党组成员）和副部级机关（党组）正职，各人民团体 （党组）副职 如全国妇联书记处副书记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副书记、常委）人大、政府、政协的副职 领导人，省纪委书记， 副省级城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正职领导人（特殊规定的副 职）， 国家正部级企业副职领导，国家副部级企业正职领导， 副部级高校党政正职。	副部级
厅局 （地）正 职：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直属部委行署室和事业 单位的下属司局室正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全国政协副部级机关（党组）副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直属机关和事业单位 的正职， 如各省妇联主席 副省级城市党委（副书记，常委）、人大、政府、政协的副职领导人， 纪委书记。	正 厅 级、正 局级

¹资料来源：（转）<http://www.jzxn.com/read.php?tid=3113>

	各地市（设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正职， 国有副部级企业的副职和正厅级企业正职领导， 省署高校党政正职。	
厅局 （地）副 职 ：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直属部委行署室和事业 单位的下属司局室副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直属机关和事业单位 的副职，副厅级正职。如各省妇联副主席 副省级城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下属机关正职， 各地市（设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副职，纪委书记 国有副厅级企业的正职和正厅级企业副职领导， 省署高校党政副职，大专正职。	副厅级 副局级
县处级正 县处级正 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直属机关和事业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直属机关和事业单位 的下属处室正职。 副省级城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下属机关副职， 各地市（设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下属单位正职 各县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正职， 国有正县级企业的正职， 省署高校院系处室领导， 重点中学正职。	正处级
县处级副 职 ：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直属机关和事业单位 的下属处室副职。 各地市（设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下属单位副职和副处级单位 正职。 各县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副职，纪委书记 国有正县级企业的副职，副县级企业正职。 市属中学正职。	副处级
乡科级正 职：	各地市（设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下属单位所属科室正职 各县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下属单位正职， 各乡镇党委，政府正职， 国有正科级企业的正职 县属重点中学正职。	正科级
乡科级副 职 ：	各地市（设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下属单位所属科室副职 各县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下属单位副职，	副科级

	各乡镇党委，政府正副职， 国有正科级企业的副职。	
--	-----------------------------	--

附件三：历年妇女参政状况表

表 1 1954 年以来历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性别分布情况¹

届数	全国人大代表			常务委员会委员			大会副主任		
	总计	女性	女性所占百分比	总计	女性	女性所占百分比	总计	女性	女性所占百分比
第 1 届 (1954)	1226	147	12.0%	79	4	5.0%	13	1	7.7%
第 2 届 (1959)	1226	150	12.2%	79	5	6.3%	16	1	6.2%
第 3 届 (1964)	3035	542	17.8%	115	20	17.4%	18	1	5.6%
第 4 届 (1975)	2885	653	22.6%	167	42	25.1%	23	4	17.4%
第 5 届 (1978)	3497	742	21.2%	196	33	21.0%	20	3	15.0%
第 6 届 (1983)	2978	632	21.2%	155	14	9.0%	21	1	5.0%
第 7 届 (1988)	2970	634	21.3%	155	16	11.3%	19	2	10.5%
第 8 届 (1993)	2978	626	21.0%	155	19	12.3%	19	2	10.5%
第 9 届 (1998)	2979	650	21.8%	134	17	12.7%	17	2	11.7%
第 10 届 (2003)	2985	599	20.1%	159	21	13.2%	15	3	20.0%
第 11 届 (2008)	2987	636	21.2%	161	25	15.5%	13	3	23.0%

附表：1978-2008 女性全国人大副主席

¹ (资料来源：, www.xinhuanet.net)

1978 宋庆龄，蔡畅，邓颖超

1983 史良

1988 陈慕华，雷洁琼

1993 陈慕华，雷洁琼

1998 彭佩云，何鲁丽

2003 顾秀莲，何鲁丽，乌云其木格

2008 陈至立，乌云其木格，严隽琪

表 2 1998、2003 及 2008 年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性别分布情况

专 门 委 员 会	1998 年第 9 届						2003 年第 10 届						2008 年第 11 届					
	主任		副主任		委员		主任		副主任		委员		主任		副主任		委员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民 族	1	0	5	0	15	2	1	0	7	0	14	4	1	0	8	0	11	7
法 律	1	0	5	0	13	0	1	0	7	1	13	2	1	0	7	0	14	2
内 务 司 法	1	0	5	1	11	2	1	0	8	0	14	4	1	0	8	0	14	3
财 政 经 济	1	0	7	0	18	1	1	0	10	0	22	1	1	0	9	1	18	3
教 科 文 卫	1	0	5	1	22	5	0	1	6	0	24	4	1	0	9	0	20	6
外 事	1	0	5	1	6	2	1	0	7	0	8	2	1	0	8	0	8	2

华 侨	1	0	6	0	15	4	1	0	6	1	9	3	1	0	5	2	8	4
环 境 与 资 源 保 护	1	0	4	1	10	5	1	0	5	1	18	4	1	0	7	2	15	3
农 业 与 农 村	1	0	5	0	19	1	1	0	4	0	16	2	1	0	6	0	15	1
合 计	9	0	47	4	129	22	8	1	60	3	138	26	9	0	67	5	123	31

(资料来源: www.gov.cn, www.xinhuanet.net)

表 3 1978-2008 年国务院领导的性别分布情况

年份	副总理			国务委员			部长		
	男	女	女性所占百分比	男	女	女性所占百分比	男	女	女性所占百分比
1978	12	1	7.7%	*	*		35	2	7.9%
1983	4	0	0	9	1	10.0%	42	3	6.7%
1988	3	0	0	9	0	0	38	3	7.3%
1993	4	0	0	7	1	12.5%	37	3	7.5%
1998	4	0	0	4	1	20.0%	27	2	6.9%
2003	3	1	25.0%	4	1	20.0%	27	2	6.9%
2008	4	0	0	4	1	20.0%	24	3	11.1%
合计	34	2	5.6%	37	5	11.9%	230	18	7.3%

(资料来源: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 www.people.com.cn/GB/shizheng)

*国务委员设立于 1983

表 4 2007 年国务院各部委副部长的性别分布情况

部/委员会	2007	
	男	女
外交部	6	0
国防部	n/a	n/a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12	0
教育部	3	3
科学技术部	5	0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5	0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4	0
公安部	0	0
国家安全部	n/a	n/a
监察部	4	0
民政部	4	1
司法部	4	0
财政部	5	0
人事部	5	1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5	0
国土资源部	5	0
建设部	3	1
铁道部	5	0
交通部	4	0
信息产业部	4	0
水利部	3	1
农业部	5	0
商务部	6	1
文化部	4	1
卫生部	6	0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	2	2
中国人民银行	3	2
审计署	4	1
国资委	6	0

合计	128	14
----	-----	----

(资料来源: China Government Systems 2007.3 Wen Wei Publishing Co. Ltd)

表 5 第 12 至 17 届中央委员会与中央政治局的性别分布情况

届数	中央委员会			中央政治局		
	男	女	女性所占百分比	男	女	女性所占百分比
第 12 届 (1982)	199	11	5.2%	24	1*	4.0%
第 13 届 (1987)	167	8	4.6%	17	0	
第 14 届 (1992)	177	12	6.3%	20	0	
第 15 届 (1997)	185	8	4.1%	22	0**	
第 16 届 (2002)	193	5	2.5%	23	1	4.2%
第 17 届 (2007)	191	13	6.3%	24	1	4.2%
总计	1112	57	4.8%	100	3	2.2%

(资料来源: www.gov.cn,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
<http://cpc.people.com.cn>)

*陈慕华是作为 1977-1987 年两届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吴仪是 1997-2002 年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图 6 1990-2006 年中央委员会的性别分布 (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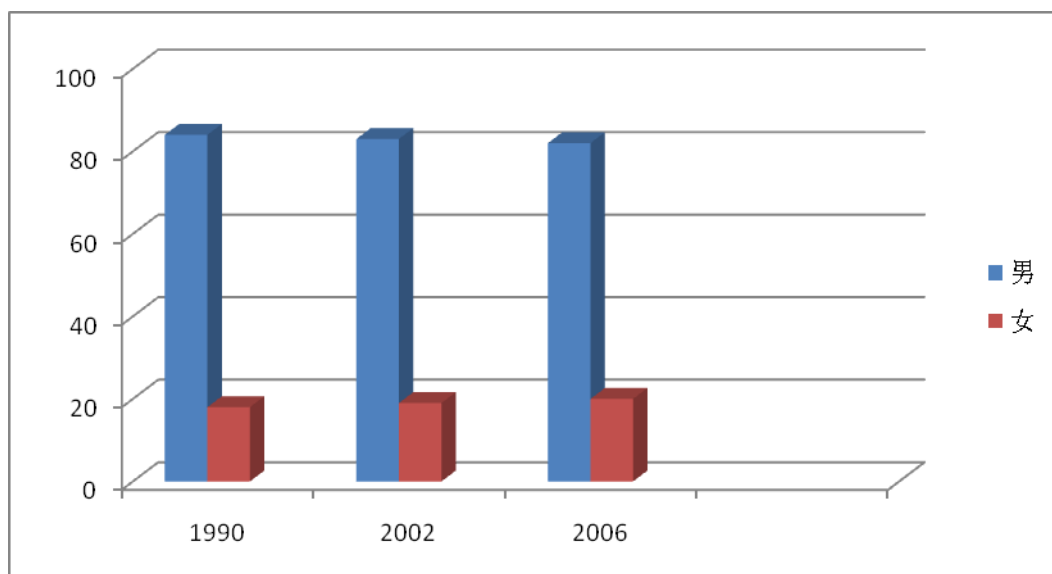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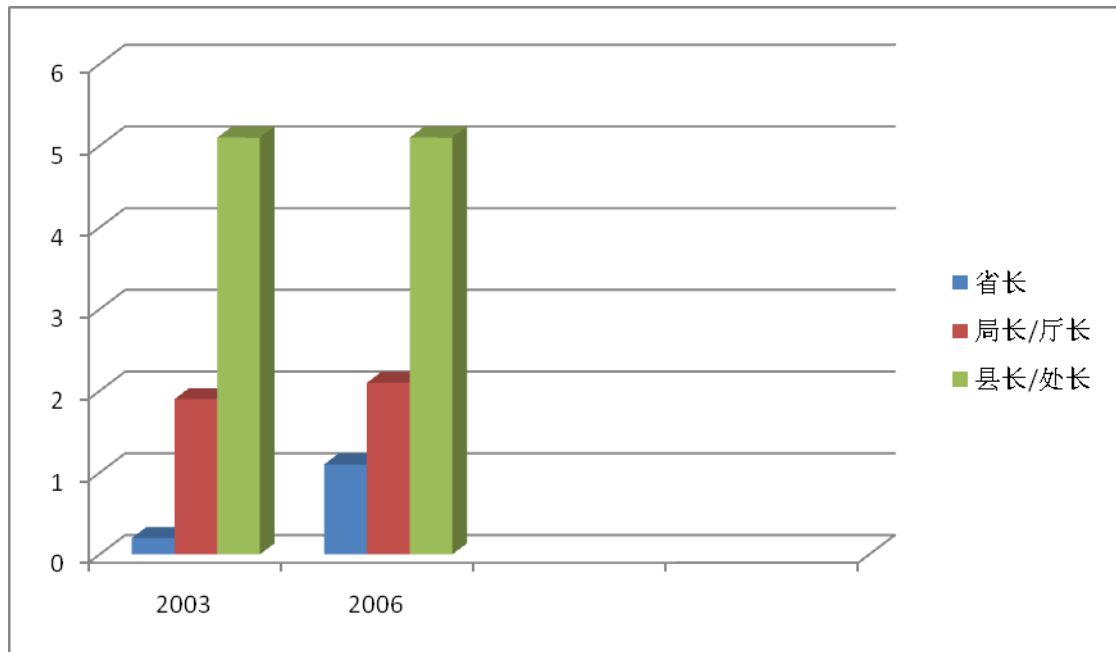
表 7 1997 年省级副省长/副市长以及党委副书记的性别分布情况

省/直辖市	副省长/副市长		党委副书记	
	男	女	男	女
北京	9	0	2	0
上海	5	1	1	1
天津	7	0	2	0
重庆	7	1	1	1
黑龙江	7	0	2	0
吉林	6	0	2	0
辽宁	8	0	2	0
河北	6	0	2	0
山西	7	0	1	1
江苏	8	0	1	1
浙江	7	0	2	0
安徽	7	0	2	0
福建	6	1	2	0
江西	6	0	2	0
山东	6	1	2	0
河南	6	2	2	0
湖北	7	0	2	0
湖南	6	0	2	0
广东	8	1	2	0
海南	5	1	2	0
四川	6	1	2	0
贵州	7	0	2	0
云南	5	1	2	0
陕西	8	1	1	1
甘肃	6	0	2	0
青海	8	0	2	0
内蒙古	9	0	3	0
宁夏	7	0	2	0
新疆	8	1	4	0

广西	8	0	2	0
西藏	13	1	4	0
合计	216	13	62	5

(资料来源: China Government Systems 2007.3 Wen Wei Publishing Co. Ltd)

图 8 各省不同行政级别的女性领导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 2007: 109)

表 9 1983 年以来历届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的性别分布情况

届数	人大代表			常务委员会委员			副主任		
	男	女	女性所占百分比	男	女	女性所占百分比	男	女	女性所占百分比
第 8 届 (1983)	n/a	n/a		38	9	19%	10	2	16.6%
第 9 届 (1988)	n/a	n/a		43	9	17%	8	1	11.1%
第 10 届 (1993)	661	224	25%	37	16	30%	8	2	20.0%
第 11 届 (1998)	567	196	26%	37	16	30%	7	1	12.5%

第 12 届 (2003)	526	243	31%	41	12	23%	7	1	12.5%
第 13 届 (2008)	534	236	31%	44	11	20%	5	1	16.6%
合计	2288	899	28%	240	73	23.3%	45	8	15.0%

(资料来源: www.bjrd.gov.cn)

表 10 1993、1998、2003、2008 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的性别分布情况 (按区划分)

区	1993		1998		2003		2008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东城	61	19	41	17	30	25	34	22
西城	69	26	56	17	51	20	57	13
崇文	40	14	30	9	24	13	24	13
宣武	54	17	42	9	35	15	34	16
朝阳	84	36	81	32	65	35	67	33
海淀	90	40	88	35	68	32	69	30
丰台	49	13	47	12	43	19	45	21
石景山	22	8	19	8	21	8	18	10
门头沟	17	5	11	4	14	5	12	8
房山	32	9	25	10	25	13	24	13
通州	22	6	17	8	21	9	19	10
顺义	15	5	13	6	16	5	16	6
昌平	18	5	14	6	18	6	20	5
大兴	17	4	17	4	20	6	16	10
平谷	13	2	11	4	18	3	15	5
怀柔	12	3	12	3	17	4	13	7
密云	14	4	12	4	15	6	16	4
延庆	11	4	11	4	16	5	15	5
部队	21	4	20	4	19	4	20	5
合计 (及百分比)	661	224 (25%)	567	196 (26%)	536	233 (30%)	534	236 (31%)

(资料来源: www.bjrd.gov.cn)

表 11 1983 年以来北京市正副市长的性别分布情况

年份	市长		副市长	
	男	女	男	女
1983-1988	1	0	8	1
1988-1993	1	0	9	0
1993-1998	1	0	7	1
1998-2003	1	0	7	1
2003-2008	1	0	5	2
2008-	1	0	6	0
合计	6	0	42	5

(资料来源: www.bjrd.gov.cn)

附件四：研究范式的比较

表 1

范式 议题	实证主义	后实证主义	批判理论等	建构主义	参与式
知识本质	证实假设， 建立可能的事 实或规律	否证假设， 建立可能的事 实或规律	结构的/历史 的洞见	围绕共识的 个人重新建 构	延伸式的认 识论；重点 是实践的知 识；批判的 主体性；生 活的知识
知识积累	增长（为知识大厦添砖加 瓦）；一般化和因果联系		历史修正主 义；由相似 导出一般	比较非正式 和复杂的重 新建构；替 代性经验	在社区的调 查扎根于社 区的实践
好的研究或 质量标准	“精确”的测量；内部和外 部效度；信度；客观性		历史情景 性；行动刺 激	可信赖的； 确实的	经验式、命 题式和实践 的知识是一 致的、带到 实践去改变 社会
价值	排斥		包容		
道德	外在的		外在的一精 神上倾向于 揭示	内在的一过程倾向于揭示； 特殊问题	
研究者的态 度	研究者是决 策、政策制 定的信息提 供者，个人 兴趣隐藏	进行倡导和 改革的知识 分子		多种声音重 构的推动 者；激情的 参与者	通过有意识 的自我反思 行动将主要 声音呈现； 将次要的声 音

训练	技术和量性	技术；量性和质性	再社会化；质性和量性；历史；利他主义和充权的价值观	合作研究者通过参与、研究研究参与者带进研究的过程；通过在一起行动的过程中相互学习；研究者/推动者要有民主的性格和技术、情感的能力。
----	-------	----------	---------------------------	---

表 2

范式 议题	实证主义	后实证主义	批判理论等	建构主义	参与式
价值论	关于世界的命题式的知识本身是它的目的，是本质的价值		命题式、改变式知识是工具性价值，作为社会解放的手段，本身也是目的；是本质的价值		关于如何去丰富和平衡自决、合作的实践性知识是它的目的。是本质的价值
适应和可互通比较的	所有实证的形式可互通比较的		实证的形式不可互通比较的；但可以互通比较的欧建构主义、批判主义和参与式取向；		

行动	不是研究者的责任，行动被看成是倡导、主体性，行动会对有效性、客观性产生威胁		特别是在赋权的形式下行动；解放的盼望和希望；社会改革、超向社会更多的公平、正义，这是最终的目标。	与有效性绑在一起；研究如果没有参与者行动的这一部分就是不完整的；建构注意的主张如果参与者不明白政治制度就应该在这方面给与培训。	
控制	所有的归属是研究者		归属寻求公众认可，新的建构，控制转向社区	在参与者和调查者之间分享	在不同层面分享
真理和知识的基础关系	基要主义	基要主义	建基于社会批判的基要主义	反基要主义	无基要主义
对有效性延伸的考虑	传统的实证主义对有效性的建构；内在、外在的有效性、客观性和可靠性；		行动刺激的，社会改革、社会公正、平等	延伸的建构的有效性；清晰的有效性；可靠性的标准；关系式和伦理为中心的标准；	见“行动”
声音	作为非正式的决策者、政策执行者的“不关心的科学家”		作为倡导者和行动者的“改革派知识分子”	作为多种声音重新建构者的“热心参与者”	多种声音混合，文本呈现很少讨论，将它问题化，反身性依赖批判主体性和自我意识